

1706

黄国芳

红安文史资料

红安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第二辑



红安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红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六月

封面设计：江厚碧

封面题字：刘永瑞

红安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红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红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32

印张 8.25 字数 22 万字

1991 年 11 月出版

红安县图书准印证 003 号

前 言

《红安文史资料》第二辑同大家见面了。我借这个机会，回顾我县政协文史工作，有助于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更多地参与文史工作，有助于从事文史工作的同志明确如何在新的起点上，把文史工作做得更好。

一九八三年县政协成立，文史工作还是一个空白。一九八六年开始至今仅有近五年时间。五年来，我认为至少有四条是应该肯定的：

第一，在抢救久远的史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五年中征集辛亥革命到建国前各个历史时期的史料共129万字，并从这些史料中，选编有价值的史料九十五篇，计三十八万字，铅印出版了《红安文史资料》一、二辑。

第二，在建立和健全文史工作班子上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县委的重视和支持，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预算都已走上正轨，初步为开展文史工作创造了条件。

第三，文史工作人员的素质明显提高。现有文史工作人员三人，五年来，他们边学习边工作，在征集、编写、出版等项实践中，摸索和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第四，在扩大文史工作的宣传和影响方面取得了成效。如果说五年前人们对文史工作还不够了解的话，那么现在的情况则大大不同了。全县已建立以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为骨干的文史通讯组十一个，共有通讯员三十多人。

《红安文史资料》第二辑，在组稿编写的时候，我们严格注意按照文史“四个为主”的特点，认真把好“政治、史实、文

字”三关，努力使资料具有鲜明的乡土气息，让大家读得上口，在编排和印刷方面，我们也试图进行了一些改进，尽可能给读者以醒目清新的感觉。但我们毕竟处在一个学习摸索的过程中，难免有许多不足乃至错误之处，恳请各界人士及读者指正。

辛 惠 明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四日

目 录

前 言	(1)
-----	-----

政 坛 轶 事

民国初年朱峙三与家人、朋友之书信往来汇编	胡香生 (1)
大革命时期黄安的妇女运动	陈继唐 (20)
忆张之乐同志的遇害	陈继唐 (43)
回忆先父李健侯斡旋国共地方关系的一次活动	李修鲁 (55)
真假王度	王树华 (58)
日伪黄安县政府简况	何治卿 (65)
国民党黄安县行政干部训练所	方映东 潘祖贻 (69)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黄安三圣庵联合中学的活动	
	李述治 (72)
我的两次香港之行	程子菊 (79)
三圣庵中学董觉生校长就职和离职内幕	吴克仁 李述治 (85)

烽 火 岁 月

李同兴铜货铺秘密为红军运枪支弹药	李大清 (88)
龙文光驾机首袭黄安县城	盛星辉 (91)
黄安县飞机场修建情况	徐绍国 陈友良 (94)
日寇侵占黄安县城始末	邹丰盈 (97)
刘正理勒死日本兵	许元耀 (106)
从享受抚恤金说起	彭德珍 (109)
从上铺坟山挖走日军尸体以后	李绍永 (111)
我所了解的袁宗国	徐达立 (113)

忆解放前我家支援革命的二、三事·····	王兆麟(116)
裕和盐栈·····	高叔樵 罗以谋 吴克仁(123)
死人沟·····	高德朗 石世美(126)

人 物 春 秋

忆父亲李华芝·····	李述祿(129)
李健侯生平简述·····	李修鲁(133)
晚清富户李光斗轶闻轶事·····	李述治(136)
两任黄安知事李墨林·····	高叔樵 罗以谋(151)
回忆父亲谢知三·····	谢淑芳 谢伯祥(159)
扁担二老爷·····	苏本友 徐念书(163)
县南名医吴慎斋·····	李述治(166)

古 迹 寻 踪

黄安古寺庙之冠——龙潭寺·····	汪德椿 李述治(169)
鄂东古建筑吴氏祠·····	胡晨钟(181)
黄安孔庙·····	李述治(185)
觅儿寺的由来·····	苏本友 徐念书(189)

文 教 拾 遗

报界名流蔡寄鸥·····	李述治(191)
我的戏曲生涯和早期的红安剧团·····	叶秀芳(203)
红安皮影戏·····	汪海东(213)
黄安师范讲习所概况·····	陈继唐(218)
“栋臣学产”始末·····	程子菊(222)
我三次绘制红安县地图的经过·····	王树华(224)

武昌黄安学社.....陈彰瑜 吴克仁(227)

金融点滴

抗战时期黄安的货币泛滥成灾.....罗以谋(230)

国民党逃台前的通货膨胀.....罗以谋(233)

社会侧影

解放前的红安妇女.....吴克仁(238)

鸦片烟对黄安人民的毒害.....陈友良(243)

说春.....李明理(248)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知识.....(251)

封面系古建筑吴氏祠一角

民国初年朱峙三与家人、朋友

书信往来汇编

胡香生

家父朱峙三生前保存他早年在黄安的信札，曾于一九八六年十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学术处的老师引荐我让红安县革命博物馆将其部份入藏，后意外见到部份发表于《红安文史资料》第一辑，使我感到亲切。经该刊负责同志约稿，现辑录的是：一九一二年三月一日至次年十月二十四日，未发表过的信件三十一封，并就我能考证出的方面给予注释。已经选好的这部分史料，有的有其连续性，有的保留其原格式，想让读者细读后能对当时的社会情形有更多的了解。并供师长们参考，指教！

武汉市机械委属工伤退休干部胡香生撰

父亲、母亲大人膝下：

儿于初六下午三点钟到团风，许二哥留午膳即宿伊处。初七日天气晴明，到柳子港宿。初八日天气阴晴，下午微雨，山路车不易行，稍吃亏即就新店宿。初九日上午十二点钟抵黄安署中，午后大雨幸儿已早到矣。即与傅端屏会商一切，住房系与端屏房相对，该县署不及我邑远甚，有楼地板者仅儿所住之房。端屏房无地板，各科员所住之房甚小，式样和河南相似。承启官系傅端屏胞叔，年约五十岁，公事尚熟。端屏未用刑名，诸事多与其叔商办。（伊叔系清附生，前年考职巡检，与周作云同省候补）。

会计、庶务皆伊所带之亲戚。科员则专属黄安士绅。两湖同学有三人在署中当科员，与儿尚能欢洽。各科科员亦均好，惟儿到此太迟似嫌孤立无助。夏生①仅插入一书记位置(办公处书记)，月薪十六串文，科员业已占满。科长尚未派定，因该县各科员有彼此不相上下之势，傅端屏恐伊等各生意见，故暂时不派科长，俟将来就办事勤能者再升。科员月薪二十四串，科长酌定三十串。承启，月三十串。监印员端屏亲弟，月二十串文。各科膳书，月十二串。儿薪水月支尚未一定，已将张肖鹄②与儿所谈之语向端屏提及，端屏云，此事须申报内务部请其酌定，此时暂就伊处支钱，俟将来回文说明或者调查各县书记官薪水多少为比例亦可。儿答云：“张肖鹄在省时曾向我说过，书记官薪水须得知事之一半，黄安知事既系二百串，则书记官应得一百串，且黄冈书记官喻某，与我同船回时亦如此说。”端屏云：“既是如此，请兄照此数暂支亦无不可。”但我县书记官不知到差否？

再，该县薪水系定为半月一支，儿既以阳历二月二十三日到县③，薪水只能支一半。现已暂时支薪水七十串文，此时惜无便带回，邮局又不能寄票，本欲令夏生专送，但往返盘费须得九串之谱。或儿竟将此款托专差寄省垣程稚松④处再转。(该县此时只有专差往省，并无往黄州者。)

儿近日身体甚好，惟此的公事较繁，伙食每日三餐系归公出，每餐三荤三素，早晨仍是稀饭，惟伙食比学堂甚好耳。现在

①幼年私塾同学，名：袁夏生，十七岁曾与之订交。

②张祝南，肖鹄为其字。《两湖总师范同学录》载其亦武昌县人。此时任鄂军都督府总务科副科长并《中华民国公报》馆副主笔，革命党人。

③一九一二年二月八号系鄂军都督府内务部议定委任朱鼎元(峙三)为黄安县书记官的时间。

④师兄弟关系并同过学，程名贤智，辛亥武昌首义前毕业于两湖理化专科，此时为省理财司书记官。

端屏拟开初等，此时正考教员。

恭叩

双亲大人福安！

儿鼎元跪禀 三月一号

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号，朱峙三向双亲禀述：第四号家信想已收到。阳历十六日，因黄安署内财政科员董君①之子回安往省之便，托带洋钱票十张，台票十张，嘱其带交程稚松收存，（董名用威②，现充理财司秘书官。）转觅妥人转交家内，不知此款现在收到否？现在傅端屏已受小人毁谤，已登报章言其用私人。又有刘钟秀者，系黄安人，现充都督府副官，已邀该县数小人在内务、司法两司呈控端屏糊涂、荒谬等语，词内牵及伊叔。伊所带之人舞弊，（并未提及书记官。）皆属乌有之虚之言。请内务司撤端屏任，内务司似尚未究。（惟批示云，如傅端屏实有此种情弊，实堪痛恨！已嘱端屏自行明白禀复，勿得含糊、致于撤究等语。）此事容续详函另录，司法司尚未有公文到县。惟黄安正派人对于端屏感情甚厚，现在该县临时议会已经成立，对于此事亦甚不平，日前为登报事已公函至省为端屏辩诬，想对于此事另有一番办法也。附报纸一段有载：《一县十知事之奇闻》黄安知事傅启楷③莅任以来，荒谬糊涂已见司法司明文并各报馆诤。渠毫不知戒，衙门执事多属私人。最奇者，父党五人，妻党四人均有知事之权力。黄安人语，咸以“一印十宦”为话柄云。（章）

同一年的六月十五日，朱峙三继续向双亲大人禀述道，傅端屏之风潮现已平息，现在司法司已派检、审判推事、检事、书记官，均已到安筹办审判厅。将来司法独立时，知事与书记官只料

①董名采臣，清附生，时年五十余，家境甚贫。

②董采臣之子董用威（必武），与朱峙三互称为庚兄弟。

③傅端屏名启楷，端屏为其别号，一八八五年出生，《两湖总师范同学录》仁斋名册中有其名。

理行政事件，较之从前各事易为举办也。我县驻军尚安静否？儿之薪水以后须认国民捐款，此时虽无定章，将来除捐外，恐每月只能得四十余串文之谱。现在同学又来催认《教育杂志》股款，儿勉强认十二元，下月要交省者。我县所派学务筹办员不知有两湖①同学否？黄安所派亦有十二人之多，视学亦尚未派人。

就在此月的十九日，朱峙三的父亲朱仁甫老先生从当时的武昌县②城，用印花信笺纸函示道，鼎元知悉：

日前第七号家信已收到了，太辅③回家所寄之钱及各物俱如信收到。汝近日身体好，家中人慰甚。端屏受谤幸已洗白，亦属佳事，我县知事日前有撤差之信，后伊晋省运动，今安然无闻矣。驻扎军队今颇安静，城内如常，生意亦好。现司法司已派审判员来县，闻所带各执事共有十二人，常年需款万余不知如何筹办，恐将来又不免百姓吃亏。近又学务派筹办员二十余人之多，每人只津贴十千，合计每月该钱贰百余串，再加伙食，此款从何而出，调剂赋闲未免太过。武昌视学员已到了，寓寒溪学堂，闻他县并未放有视学员，不解其故。郭正乾④前就我县劝业科员，未几，往省公干至今未返，想是不乐就此。……景祥祥⑤字要学习，汝字学亦不可荒。县内并无新闻，我之应酬尚可敷用。家信无妨多寄，以慰家中之望，至少每月要五、六次。饮食要节，甜食少吃，薪水减少，节用抵之是亦法也。

阴历五月初五日 父字

①这里是指两湖总师范学堂学生。

②此县次年改为寿昌县，即为后来之鄂城县。

③太辅名：胡太辅，为胡姓本家乡亲，晚月余带赴黄安补县直警卫队队副者。

④郭又名星翹，其名见《两湖总师范同学录》。

⑤其名：万景祥，自家亲戚，由朱峙三到鄂后月余，顺道省亲而带赴黄安任县署劝业科司书者，任职半年以能力差，亦由朱辞退。

当月二十日，朱峙三向武昌县呈寄的家信中稟述了，太辅来署，得手谕敬悉一切。程贤智之款，儿已另函询及矣。家中收到后可速回谕来安，以慰儿之远虑。傅端屏之事，现在闻省城安邑同人反对者实居少数，大约不甚要紧。儿之月薪仍领七十串，内务司亦无明文来署，省城议会所定各知事、书记官薪俸章程，都督府已照原章略加更改嘱其复议矣。（已将载报章文附回一阅。）署中诸事仍旧，科员中有已派本县教员者，夏生已补劝业科科员，景祥仍就司书生。此时，县内无论任何亲友万不能使其来黄安，至要！至要！最可怪者，胡林乡之胡太显来署内就事，儿始意令其当杂役，每月除伙食外只能落钱二串，伊不甚愿，继又派其在警察局当巡士，每月除伙食外只能落钱四串，伊又不愿，即在署住两天，儿即令其回县矣（并一文钱未与伊）。省城教育司已成立，两湖同学占事者，共二十五人。现闻派外州、县督学官，每月可得薪水六十串，此说不知确否？如果属实，儿意欲另谋此差似较书记官无多利害也。父亲以为何如？（闻两湖学堂名册均存教育司。）今因袁夏生之兄回县，寄回茶叶二斤，每斤价五百文。寄回《临时约法》一本，此系大总统颁布者。抄回内务司现在修改章程一本，附粘《知事及办公职员薪资表》一份……

同年的七月十三号，朱峙三收到的家书中有父亲之手谕：“……省派筹办未更换者，由伊善运动，想星翹亦与有力焉？谅此人此时必改过自新，以图后效。郭星翹系劝业科长已接内务司铨叙科札委，余三科（内务、统计、财政）闻尚未接司札委。王知事①曾与伊等请札仍未见明文，恐未必靠得住，警察局尚未成立，总因经费太多卒难筹办，民力实在难堪，当道者应如何设法安置矣！……”这是朱仁甫老先生于此之前四日写成。

①王知事名云龙，咸丰人，辛亥武昌首义之前系两湖博物专科学校学生，为推行革命新政其力者。

当月二十二日，朱老先生又寄语黄安谕示朱峙三云：……审判厅已就考棚，现在修整房屋，尚未接收移交，此厅各款闻尚未筹定，追问筹办之津贴乎？询及筹办之中只有博物、理化①之人，并无仁义两斋者，朱纯如②已就武昌视学，闻系知事指请，现住寒溪学堂无多建白，但听知事之指挥而已。郭星翹来家数次（此次亦有信与汝，由景祥带来），面晤其人才学俱好，遇人有礼。太辅家中来托信，云现在乡间被淹，伊父母欲往省谋生计，嘱伊在安不必思归。景祥精神钝滞，重件恐非所托，令伊学习公事，字要常写，不然，将何事见长也。……我县学务筹办员不独津贴无有，现伙食都不给了，向日学务存款俱为县自治把持或移作别用，并无开办中学之说，不久必起争端。……端屏又被人控决意辞去，内务司未必照准，全应撤销处分，指控不休亦不能撤，辞差亦必无效。刁衿劣棍何县无之，我行我素毁誉听他。近闻新官制有改书记官为秘书官之说，不过，为与下级书记之有特别耳，更名未必更人，受知事节制，或者然也，由知事指请无不是理。汝云“此事究非长局聊济目前”，目今世界情形大都如此，谚云“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长短非所计也。……肖鹄及汝之其他诸同学现就事否？回信并详言之。

亦是在当年的八月九号，朱老先生还在函示中教导峙三曰，“……景祥带来丸药是补中之剂，调摄之法不外节饮食适寒温，尤不可过于安逸，过安逸则运动不灵亦可生病，务宜劳逸参半方为合法。若一味静养他事不理，又将一“病”字常在心中不置，恐将来转成疾体矣。殊不知动而不能静者疲，静而不能动者又何如也？正当年富之时，应如何振刷精神以图上进，反因此区

①博物、理化两专科均系继两湖总师范开办之后增设的新式学堂。

②朱名锡嘏，纯如为其别号，大冶人。

区小疾阻人长力何以慰老人望汝之心……”

同月二十五日，朱老先生关切黄安县署政务之语句继续出现在给朱峙三的手谕中。……端屏之稟未准亦大佳事，现在，住省人多谋事颇难，以及当道者欲求一知事、书记官良非易易，汝等切不可轻视，务宜实心办事，莫负委任。……郭星翹已回省另谋去了，……劝业科长属书记官代办，统计科长属知事代办，星翹之去职是故耳。

同一年的九月十一号（农历八月初一日），朱峙三写信禀告双亲大人云：署差叶升到黄州①之便，饬带茶叶三斤、信一封、相片两张，想均收到。儿身体近好。傅端屏业已撤差，内务司牌示系云调省另委。（此乃敷衍傅端屏面子之语，而实际，在省人评之甚力也。）新任知事为褚辛培，郢阳府竹谿人②，曾学法政，满清时，候补知县即内务司铨叙科科员也。大约阴历八月初即可到差，其人之心性、手段未知如何见之于报章者，省城开会时有举褚辛培为主席之事，想亦能言之士也，端屏交卸大约亦在八月中旬之谱，各科案卷及财政各帐项均有头绪，大约无多胶葛。惟渠颇顾名义，性尚廉介，宦囊亦不丰，此甚可取之事。与儿共事始终无大好，亦无大争执之处，此番解组在渠固不得意，即儿亦快快也。各科办事之人，大约籍隶江夏者，概行辞职③。新任接印尚不知带来有若干人也。

次日，朱峙三用印有“黄安县署”字样的信笺向双亲大人写道：昨日张梅先回县（黄安人，两湖义斋同学④，理财司秘

①该地设有府级办公机关。

②这里是与褚当面核实的情况而述，褚号近午。

③系指傅端屏所带之就任署中职务者。

④张名国恩，《两湖总师范同学录》义斋名册中有载其名和别号等。

书)。晤时曾告省中事，一切甚详，并云新任知事褚辛培系云梦人，性情乖张，系第二次省师范毕业，与石镜清同学后习法政，现充内务司科员。儿等办事八阅月矣，亦未闻有错误之处，钱、漕既无弊政，遇事皆以正直行之亦无他项不能办之事。张并交到儿之毕业文凭一纸，系由夏宗言所托带者。

亦在之后一月余的十月十四号，朱峙三在家书中写道：傅端屏虽已卸任尚未起程，因议会过为吹求，现已调停解决，所幸端屏之帐不孚之处尚少，此数日内当可回省。褚近午为人尚好，署内各科员除江夏人自行告退外，余均未更动。夏生已调充统计科员，内务科长、承启官均系近午之友，闻已函招，尚未来署。刻下署内最繁之事为国会选举，省议会选举，限期既促，头绪又繁，兼之安邑地方上下级自治此际正在组织正式成立。三事一时并举，支持颇不易也。儿在此间对于安人全无恶感，事虽轻爽责任甚重，兼之拘束过甚不及学界清闲，静守一日尽一日之责任，俟将来他事运动可成，再当舍此就彼，万不至轻举妄动也。

由于需分赴选举投票地点，褚辛培在下乡未回署时，用“黄安县署”信笺自县内之八里垸邮发一函至县署，此系在同年的十一月五号所书峙三兄台鉴：

国会选举民减少法，请即邀齐各区调查员商量。再者，已成册，如能就者不妨仍旧庶，可节经费以省时日。特此续候。

留安！

弟辛培 十一、五

同月的二十五号下午，黄安县署派往武昌省城的专差梅元返回，带到了傅端屏在武昌省城写给朱峙三的信，用的是“民国公报馆鄂省印刷局用笺”书写：

峙三学兄如握：

别来两月，久拟修书问候，奈应酬纠缠未克如愿。梅元来省，获悉我兄起居妥好，甚慰，甚慰。闻兄迭次赐教，见之深情弟宁不感，惟所赐教言，弟未得一捧读则不能不怅怅耳。署内办理选举谅必异常忙碌，我兄体质瘦弱，一面勤慎办公，一面仍当注意珍摄。弟现充《民国公报》主笔，与蔡良忱①、张肖鹄学兄（肖鹄现亦充本报主笔。）朝夕聚首，纵谈天下事颇有悠然自得之乐，甚不愿别有所图、自讨烦恼也。弟前日所受风潮本拟大加报复以泄此忿，现时若联络数家报馆攻彼蠹贼正自易易，特以攻击之风有伤忠厚，故不欲以此污我笔墨也。惟对于阴险小人之某某一人，于心终有所不释然耳，来省时可通一信令弟知之。现省垣表面颇觉平静，惟内容甚为腐败亦前途之患也。书不尽意，专此敬请，

勋安！ 并请，

近午学兄大安！

署内同事诸君及学界诸君均祈代为致意！

弟启楷上言

同年的十二月八号，朱峙三在给家人的信中写了，……湖北学务将来总有起色，明春插足想亦不难，政界风波实多险恶，不能于此间恋恋也。省城各司更动不常，外县各署招呼过多，稍一不慎险象立见，月前黄安县所驻军队之解散，几酿极大之风潮，此事若成，何堪设想，学界事较政界清闲多矣。儿之位置系属湖北临时之官制，非永久官阶，今腊明春更换均不能定，不可常恃者也。将来学界事每月得三十串文之数亦甚易事。仰事俯蓄当不为难，不知父亲以此意为然否？

①蔡即蔡以贞，良村（忱）为其字。革命党人，两湖总师范学堂毕业生，辛亥武昌首义之前曾为《公论新报》撰文，此时任《民国公报》主笔。

针对朱峙三在上封信中对双亲大人之所言，朱老先生就在当月的十五号写信寄黄安有云：……汝意将去政界而就学界，只要确有把握，能仰事俯蓄又何不可，切不可轻举妄动，若丢事寻事则失算矣。汝细思之，以候明春定夺可也，此时勿躁。至云汝近日身体好，饮食健，步履、说话俱有精神，此阖家所欣慰者。……又知汝与安邑各界人相得，知事亦甚相安亦大佳事，闻之喜而不寐。……县中并无新闻，军队亦颇安静。

仅隔四天时间，老先生又在当月的十九号函示儿子曰：“……闻省中学务依然腐败，尚无起色，可不必留意政界。审判厅成立，汝等无多事矣，宜耐守，若有更调再作别想。……现在救穷之法总以得多数为妙。闻程贤智欲谋学务此时实难插足，非虚语也……”

当月的二十四号，朱峙三用“黄安县公署用笺”写的家信中有云：“省中现议定实行裁并，各司均归政府内办公，科员又当撤退百余人。外县官制尚未奉到更改明文，书记官一缺大约不裁即改为科长。惟叠见各报有谓改为科长者，有谓实行裁去者，此亦未可迷信，总以奉到正式公文为准，儿此时亦惟有静以待之，如果将来被裁，儿即由安到省另谋他事，即或改为科长亦不再禀者。……阮次扶①在省办国会选举事，名誉甚坏。夏寿康②及内务司长饶汉祥均受报章攻击。”

同样用上述公用笺，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二号，朱峙三向其父、母亲大人叩禀：“……儿此时本欲勉强筹措，多支阳历二月

①阮名毓崧，黄安人，清光绪三十一年曾任武昌县师范学堂堂长，此时为鄂省国会事务所总理。

②夏系刘心源辞去鄂省民政府长官职后，黎元洪所派代理之人。

薪资。因省城现奉袁总统命令，外官制业已更改，凡从前临时官制自应取消，现闻省城正在筹划此事，各司均属于民政府，县知事改为中央任命，书记官一席，章程并无明文，大约将来改为科长亦未可知。惟《群报》所登有‘知事公署得设佐治员’一语，是否即书记官之别名？而大总统命令中，第四条‘得置佐治员’一语系属下句，读：‘所谓佐治者，即科长、科员也。’惟尾句云：‘科长、科员须由省城行政长官（即民政府）委任。’大约书记官不裁即改为科长无疑也。此次命令中有‘设科长由二科至四科’一语，则大县可加为四科长（大县原有三科长），中县可加至三科长（中县原系二科长），亦未可知也。（另附《公报》、《群报》呈览。）……万一书记官不裁，将来改科长，其薪资自不能如是之优。儿前月已写两函至肖鹄、秋舫、泮香诸至契①处，嘱其代谋第一师范②事，昨得泮香、肖鹄复书，金云郭堂长③于派各教员时，曾问及儿之近况，因同学在省谋事者均向郭堂长云峙三之事甚佳，此时不必提也，所以郭堂长亦作罢论云云。又，肖鹄函言第一师范两监学均系义斋同学：一、张国恩（黄安人），一、邱全模（施南人）④，现在两人均被选为该县议员，如果复选当选，两人均要辞差，则第一师范监学一席，肖鹄情愿再在郭堂长前荐儿补充，郭先生亦无不可，云云。总之，即令黄安事如果被裁，则就学界事亦甚易也。”

①秋舫姓夏，名宗言；泮香姓易，名赞周；均是两湖总师范学堂毕业的革命学生。

②该校全称：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存留《同学录》有载：郭肇明、朱峙三，黄安籍戴以仁、董用威曾执教于该校；艾毓英、戴克敏等学生。

③郭之别号：炯堂，竹山县人，前清两湖总师范学堂堂长。

④邱名前模，《两湖总师范同学录》有载其别号为：楷如，利川人。他是当时在该校知名度亦较高，有较好同学关系的革命党人。

这一年的四月九号，朱峙三还是用“公用笺”写信向双亲大人叩禀：……省城近接京中来电，官制更改在即，知事仍要以京中任命者为准，褚近午在此间不能振作，声名亦不佳。儿之位置，省中虽未来文裁撤，恐亦不能恋恋也。……大约儿定于阴历三月十五日前后要到省一次，一切布置当在省中另行谋事，或考帮审员亦可。估计归家期总在十八日左右，其有从前欠债俟儿此次归家即行偿清，父亲仅可勿虑也。太辅已由褚近午荐至麻城县当小队①队长去了，因前月麻城知事来函，欲将麻城队长与黄安队长对调，黄安队长又不愿去放也。现在麻城队长已来黄安充当队目，是以将太辅补充此缺，月薪每月十二串文。

同年五月四号，朱峙三在家信中接着向双亲大人禀告道：“儿昨晚到省始知褚近午业已撤差（牌示但云褚某调省），亦无“另委”字样。现在新任系曹履贞，前年两湖总师范学堂之教务长也，平日之名誉不佳，对于同学之感情亦薄。此次伊到任与否，据外人云尚不能定，惟安邑知事既换则帮审员一节已不能做到，即或再当科长，儿将来能就与否亦不能定。现第一师范教习已说得略有头绪，若能再兼一差，即可在省勉就薪资，总与外县科长稍优也（刘永寿②之教习已让与儿矣）。总之，儿之在省就事将来必确有把握，方能舍此就彼，大人更不必挂心，此时黄安差想已来县矣。儿在省小留数日即至黄安与褚近午帮办交代。在此数日内，儿或会或不会在省之曹履贞尚不能定，此亦不要紧之事。大约儿候省中事稍有头绪即行到安，专差来，可速令其来省为要。”

当月十号，朱峙三寄往家中的“黄安县公署用笺”上写着：

①是麻城县署直属警卫队。

②刘别号，介眉，咸丰人，亦两湖师范毕业生。

……儿于昨晚由汉抵署，一路均好。褚近午事，现在黄安议事会及学界、绅界已专信到省挽留，并反对曹履贞来县，儿昨晚在议事会亦赞成此举，惟省中内务司对于此事恐不能做到耳。总之，无论曹来与不来，均与儿无大关系。曹在此，儿亦可以办事，褚不去，儿仍可以办事，不过褚与儿性情能相投，曹素未共事，恐将来不能久安于坐位耳。但第一师范，儿既已就了功课，即不就黄安事，儿尚可入学界一途，此时惟有默祝时局太平方为儿等之幸福。……署中诸事无大更动。……黄安地方安静。

时过五日，朱峙三在当月十六号寄出的家信中谈到：“……新知事带人甚多，黄安人又把持甚力，恐将不免起风潮也，近午亦同意夏生退职。

当年六月六号，署差熊腾①以黄州办事之便，带回了寿昌县城朱老先生给朱峙三的手谕：“……曹知事已接事，帮审员系警署长接充，必由知事意中重托之人，汝未就亦好，静候省垣开学，辞安事未晚也。汝可将黄安署中上下各人意气，公事有无繁难之处逐一详细在回信中言之。叫太怀②来安就传达，当即写信赶他去了，必多候几日再补别人……”

当朱峙三见信后，于同月十号仍用“黄安县公署用笺”写家信呈述：……安署帮审员，曹知事聘警署长接充，行文已经多日，未得复文。近日迭接筹备处③公文，恐渠资格亦不甚合，将来定遭批驳也。（省中资格限之甚严，现在只定于各县取消审判

①当时此人虽年近花甲，但在安署中以可靠、强健、办事利索深得上下人等信任。

②亦为胡姓本家乡亲。

③指省城后增设的司法筹备处，处长周珍。

人员中，由知事选聘，及三年法政毕业之人方能有效。）所以儿亦不想此事，此时只好静候省中开学再作计较。曹知事近兼司法诸事甚繁，儿在此做事伊颇信任，随带之人与儿均相得，第一科所办之事甚简，较从前书记官所负责亦轻，惟薪资薄耳。儿近日身体好。太怀要来总以早为妙，此缺亦不至另补他人。

在此后的当月十七号，朱峙三所寄家信中继续谈到：“昨天太怀到署，接父手谕敬悉家中近况。……现在警署长就帮审员事来半月而托情者接踵而至，伊与黄安人之感情尚浅。况儿在此近两年，设成此席，其托情之事更不知几何矣。赢官司者固喜矣，输官司者则怨矣。将来风声播出，名声亦从此坏矣。此儿意所以不愿就也。……胡太怀已派充传达，每月工食共七串文，新任同事俱相得。黄安近日雨泽甚多，各乡发山水坏田园甚多。”

因有帮审员之杂役公差之便，朱峙三在同年的七月二十九号托其所带的简短家信中有述：署中诸事均好，安邑平静如昔^①。胡太辅现充麻城宋埠镇警察分署长，（伊有信来，闻系知事委其代理。）月薪二十六串文。赣事已平静否？父亲宜时时看报。

而在时逾七日后的八月五号，朱峙三在邮发家中的信上说：“……省城各学堂开学之期亦不能定。江西事闻现有调局，署内时有报看，惟邮递甚迟，不及我县便捷耳。时局如此，正思治之时也；天下纷纷真不知何时能定，多阅报章亦不能得此事真相，徒乱人意；只好置之度外而已。袁夏生，劝其在家静守，此时不必谋事，能做小生意亦可，夏生非有作为之人，虽云办公年余，毫无见识，胡太辅在宋埠，儿前日着太怀去过一次，伊在宋

^①当时正值“二次革命”浪潮声势浩大之际，此段是为解老人之疑虑而述。

尚坐堂问案，闻尚有递禀求批者，伊即与书记生拟出贴示，闻书记生之程度与之相伯仲，真正令人发噱也。（太辅系代理之职，闻内务司现已另派人矣，太辅过不久仍回麻城充小队队长云云。）……”

当月十七号，朱峙三接着捎家书谈及：……江西乱事，据报章所裁已平靖，不太要紧，署中亦迭接省中军民两府来电，云赣事已平矣。惟省中同学及至契中均未有信来，闻现武汉邮局奉命令，来往信件必须查阅故也；大局如此，惟有默祝早日太平乃为幸事，家信如果邮寄，亦不宜提及江西之事。……安邑诸绅尚多恋恋者，待儿均厚，小留数日俟天凉即起程①。

这之后的当月二十九号，朱峙三所发家信，是在黄安县警察署所写，未用“黄安县公署用笺”，文曰：前日熊腾所带之台票贰拾张，家信一封，不知已收到否？儿已于今日辞差出署矣，已在曹知事处取有印结（以后凡属一科事概不负责，即议会、安绅与知事算帐只问知事，科长并无经手未完事件等语），现住警察署长江君②处（江与儿交情较厚）。江君系前月出衙门者，亦与曹知事意见不合。刻下安绅、学界、视学、帮审员、议会及署中同事，现均留儿饯行，均属好意又不能却，是以勉强暂住江君处勾留数日，一俟天气解凉即行动身，大约总在阴历八月初十（即阳历九月十号）以前到家也（太怀与儿同回）。途中天气甚热，恐染疾病，是以儿不得不防耳。惟儿此次回家，并无余款，

①因在当年年中，朱峙三回家探望父病时，曹履贞擅将朱之下属撤职，加上原有的貌合神离，导致此刻朱准备辞职。

②江姓名陵，号慕张，外省人。

此次盘费已在朋友处通挪，现在卫兵小队又要与儿放鞭送行，将来临行时，尚需赏钱亦不得不先为贮备也。熊腾带回之款即作为“中秋”开消之费，千万不宜乱用，再用钱惟有候儿到省耳。家中再不要寄信到安署，切要！切要！儿现向邮局言明（署内亦托人招呼）有信均转回武昌县。余言归家面陈。

同年九月二十九号，已于当月六号之前辞去黄安县知事公署第一科长职务，离开黄安返回武昌省城，先后就任了江汉公学①、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图画、习字教习，湖北教育研究会图画编辑等职的朱峙三，接到寿昌县家中转来安署书记陈嘉言②向朱老先生透露：曹履贞在朱辞职并办完交涉离安后，仍有向上司提示之隐情，就向父亲函曰：“今日下午接到二十六日所发手谕敬悉一切。黄安事，与知事结怨自六月间回家看父亲之疾之日起，是时曹已下乡勘案，儿留信一封写明父亲疾危原委，并托陈林之③（即第二科长）、郑安卿④（即第二科科员后改一科科员者。），嘱其照料一科之事，且对伊两人云：‘我此时方寸已乱不能多说，写曹之信亦如是云云，是儿之对于曹亦可谓尽情尽理矣。’后儿到安时即闻人言：曹谓儿走时该候伊回署，试问父疾危而不即时归家，尚得为人子乎？则曹之为人，忍乎不忍？冯科员因公事小有错误即时取消，不准在署逗留，此乃儿未到安时之事。大凡取消科员必令科长知觉，乃曹取消科员亦不令儿知，并不候儿

①系张国恩、董必武发起创办，该校仅存在近两年时间，初以招、考革命烈军属子弟受教育为目的，校长张祝南。教职员大多数系两湖总师范毕业生，校监、教习之待遇仅以供伙食或伏马费。

②陈系黄安人，傅、褚、曹三知事均启用之。

③陈系武昌省城人，省立师范学堂简易科学生。

④郑名先定，沙市人，两湖理化专科未毕业者。

到署，此岂目中尚有儿乎？且冯科员为署办公老手，伊之取消者，欲为吞地款步也。如是因冯事而渐与有意见，惟当日未发耳。伊之呈之前两条即是此意，第三条毫无影响，第四条更属遁辞。儿在安与各处相熟不自今日始，惟第五条之事系江署长在署内平日爱弹月琴，是夕，邓科员①、韩科员②（均黄安人。）在外邀同高等小学教员王悦襄入署，借江署长琴弹唱，（王系日本音乐学堂毕业，此人在县亦是大族，与儿仅认识尚不大熟，系今年补充高等教习者。）是夕入署弹唱系邓韩二科员之介绍，环听者则有两帮审员及各科长、科员在座。曹呈文所指旧优即王悦襄也；此事前安邑学界甚为不平。曹所谓飭儿自行检举者即云此事。是夕所唱地点系在第一科花园内，所以，曹称‘一科长引优弹唱，即将此事罩于儿一身耳。至儿呈民政长辞职文，本牵及科员郑安卿（即郑先定），所以民政长批准取消郑安卿。（此人最坏，平日在署播弄知事与儿有意见者，即此人与陈林之也。）曹此次呈文无非说儿之歹以称出郑安卿之好，冀行政公署准其复充科员，究竟此数条与儿何害？且观察使已派员至黄安调查曹究竟是否好人？该县自有公论，不难水落石出也。儿得父亲信后，比即将原件送至阮次扶处与之面商，阮云：“尔既为辞职之人，任伊呈文尽可不照，此不过曹为卸过地步，欲为郑安卿复科员地步，于尔何害？且曹此次枉费心机，现伊已撤任，已由民政府委段树芝署黄安县知事矣。此事尔切不要照，不然，尔欲进内说项，设民政长问及黄安呈文，朱某何能得知也？”等语。儿即商之同学诸兄，金云此乃曹不过籍汝垫郑安卿之背耳，其用心虽巧，其如伊已撤任何！现在黄安为伊妄报：黄安有土匪，请省派兵访拿。兵到之日，将黄安阮姓、名三角湾者，（与阮次扶所在乡隔三里许。）四十余家概行焚燃，并枪毙数人，其实乡间并无匪

①邓名海珊，高桥区人。

②韩名子洲。

警。刻下，黄安人对于此事甚为忿激，大约伊即卸任尚不能脱身，恐安邑士绅不仅留伊算帐已也！‘害人者，实自害人。’此可为鉴戒者矣。此儿所述在安及现在情形也。父亲所云弥缝了事一层，似可不必置之度外可也，况曹之此文概属些须小事，难道能将儿办罪乎？且民政府既撤伊，此次来文定无好批。请父亲不必过虑，总以调病为好，免至令儿有内顾之忧也。”

是年十月二十七号，朱峙三亦是在武昌省城收阅了以“黄安县议事会同人公启于十月二十四号”落款，系用印花八行纸书写的来信，其内容为：峙三伟兄英电：

迭次大札均已奉阅，理应即复、询问，道安！奈新旧知事交退之间尚希监核，故尔迟迟通达如兄，谅不以疏忽罪也。自兄去敝邑，佐治之员通达文雅如兄者，十不获一，行政公署遇事乖方，回忆清风，不胜惆怅。兄刻被选为教育研究会图画编辑主任暨报馆主笔①，学识夙优，名望孚众固不待言，然插画名家、言论名世，尤足为兄台贺。政界之风坏于满清，民国前途大堪痛哭。兄与傅君才长力厚，夙负经纶；久为敝邑同人所钦佩；今幸同居言论机关，监督政府，扩张民权，救社会以救国家，定符私祝。国家减政主义为救贫计划，可为建设计，恐未尽善质之；明公以为何如？段知事尚未接篆，日后政策果能整顿与否，虽未可知，谅不至如曹□□之糟至极点，刻正交代棘手无一扶持，兄本范增而不能用，庸愚如老曹，其亦悔陈、郑之误已否耶？嗟乎！嗟乎！庸庸碌碌贤否？不明坐困愁城，势所必至。笃交如兄台，其亦怜老曹之自误否耶？总之，敝邑不幸，以致小人进而君子退，行政坏而司法糟。兄等果念旧情不时援助，同人等之。铭感当心香，遥祝以谢之矣。抑更有进者，兄台贵邑八区自治会暨

①这里系指其已为《群报》做论说文而言。

议参两会来函，对于政府验契一事说透弊端，发起反对，敝会极表同情，正拟作复：“一致进行。”兄如会贵邑明公，祈代达敝会同人意思可也。

端此敬复，并颂

道安！

黄安议事会同人①公启

十月二十四号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一号
深夜定稿于灯下）

（何为嘉 整理）

①据有关史料佐证：朱峙三当时在黄安县知事公署期间有石以青（举人，平安区人。）、谢炳耀（八里坨人）、李兰亭（师范毕业，曾任教习，时任小学校长。）、黄仲雅（八里坨人）、蔡延瑞（号二传三）、刘宗夏等人，与他来往系议员、参议员或议事会议员。

大革命时期黄安的妇女运动

陈继唐

我原名陈家祥，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现将我了解的大革命时期黄安妇女运动概述如下：

大革命时期，黄安的革命群众运动先后发展起来，唯独妇女运动到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国民党黄安县党部正式公开时还是一个空白点，其所以如此，自然要归咎于妇女在历史上的社会地位不与男子平等，被压在人类最底层的原因所致。而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解放、发动、组织妇女参与到革命的洪流中来。当时黄安县党部内的“共产党党团”（以下简称党团），深鉴及此，研究决定：通过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作出开展这一运动的行动计划，迅速填补这个空白。待执委会拟定具体计划时，又深感难度很大，“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这些旧礼教束缚了妇女，使男女之间隔着一道鸿沟。要想深入到妇女群众中去，概非女同志莫属，而在县党部又无一女同志，即使是对革命工作一往直前的闯将，一提到妇女运动，便立显畏难之色。

正在这时，从省里回来一位年轻女子，名叫段修媛，本县桃花区人，家住武昌，求学也在武汉，她的丈夫后来任县党部第三届常务委员的吴兴同志。前几年她曾数次回县作“天足”宣传，并能写得一笔好汉碑，因而在县里的知识分子中颇有一点名气。她每次回县即住在吴兴的一个同族吴粹轩家里。吴系县城的一个头号绅士，曾做过四川万县的知县，家资富有，婢仆成群，凡来我县任职的县长，首先要拜望他，是县里的一个炙手可热的权要人物。段修媛如今是国民党员，这次回县仍住在他家。当段修媛得知县党部正在计划发展妇女运动需要一位女子负此责时，她便自告奋勇愿意

承担这个任务。县执委会诸同志自然是求之不得，即将此任务全部委之于她，给她县党部妇女部干事名义，而她的目的是想当妇女部长。因这一届执委会的妇女部长郭瑾丞同志（共产党员、为教育局金柜①），是位年近六旬的男同志，又是一位有名医生。当初选他为妇女部长时，就因他是个医生，世主较广，对接近妇女可以不避嫌疑等条件，极有利妇女活动的进行。当要他到妇女群众中去做工作时，在一次执委会上他脸一红，胡子一翘地笑着说：

“我曾几番想来想去，实感无能为力，我对于这个‘官职’，愿退避贤路、挂冠而去。”适在这个时机，段修瑗回县，表示愿为发展妇女运动尽力，郭瑾丞这才松了一口气，解了他一个大围。

段修瑗的活动范围，限于城内几个绅士家和与绅士有交往关系的所谓世家的妇女。这些妇女即被人们称为太太、小姐出入处，优属于贵族阶级，她们本身就是革命对象，根本谈不上参加革命。如今段修瑗来组织她们，想在县城成立一个基层妇女协会，却正中了她们的想利用革命群众组织作保护其家的意图。此风一吹出，立即受到广大群众的纷纷非议，县执委会据此情况，即向段修瑗指出了她模糊了革命的阶级路线，由她所组织的妇女协会，不会是革命的群众团体，而是反动阶级的“太太小姐团”。同志中有人斥之为拿原则作私人交易，要他立即停止这一活动，转向到广大的妇女群众，特别是深入到劳动妇女群众中去开展活动。段修瑗自知犯了原则性的错误，隔日即不辞而走了。

妇协问题，当时愈已成了县执委们关心的中心问题，但是想不出一个好主意来。在一次党团会上，又讨论到这个问题，我发言了（我是县党部的常务委员），把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提了出来。我说：“我有一个师范同学李作霖，他的母亲郑茂兰是女子小学校的负责人，是多年的老教员，在社会上颇有声誉。据我所知，在她手中毕业的女学生很多，如今都已成年，未出嫁的都在

①金柜：管理钱财的人。

家操作家务，从事纺织和缝纫等家务劳动，以补家计。她们大都是城市贫民阶层的劳动知识妇女，城里居民中，象她们这样的家庭女子，为数不少，上过学的占少数，多数是没上学的。对于搞群众运动，必须是从知识分子开头，所以郑茂兰这道门坎，应当作开头搞妇运的第一道门坎，如这道门坎走通了，她能介绍一批她的学生参加到妇运中来，开展妇运便有端倪了，再给她们以革命知识的启发，联系她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实际，辅之以形势教育，我想她们是会破除旧观念顺应时代潮流行动起来。如能从中培养几个骨干，让她们分头广为宣传，各寻各的人际关系进行联络，必然会带动一大批劳动妇女投入到运动中来。这样，当前感到棘手的这个大难题，自会迎刃而解，这是我的一个设想，请大家考虑这个想法是否有点道理。接着妇女部长郭瑾丞说，家祥的想法是有道理的，看来也是可行的。问题是郑茂兰这道门坎由谁负责通呢？我与她素不相识，自不能冒昧上她的门，只有让家祥去作试探，因他与郑早已结成了世交的一长一晚的关系，比较适宜。大家听后，都无其他意见，一致表示同意。

郭瑾丞的这个意见，已在我的预料之中，我已做好思想准备。今既在会上作了决定，就要立即行动。隔日，我即去郑茂兰家，一见面，郑含笑地说，你快有两年不来我家，今天就什么风吹来的？你如今身价高了，对同学忘记了吧？我见郑对我的态度一如往日的热情，谈笑自若，这一开头就使我得到满意的印象，便对郑说：

“我这两年来一直在乡下搞农民运动，回家的日子少，所以未能常来看你老人家和作霖，我今天是负有使命来的……”我就把开展妇女运动的事向郑提出，向她征求意见。郑即说：“你的话正说到我心上，现在是革命成功的时代，我是读过一点书的人，对革命道理，多少懂得一点（她与董必武是表亲，受到董必武的影响），近年来，我县各界都有团体组织，对妇女界却无人过问，听说有的县份已有妇女协会，我们黄安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妇女协会？我

这里经常有些学生来打听，同我商谈此事，都希望能有个妇女协会，使妇女也同男子一样，享受参加革命的权利，做个扬眉吐气的人。前几天，听说有一位姓段的女先生从省里回县，专门来组织妇女协会，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但一直没有看到她的影子，使我们失望。你今天来得正好，我叫我的女儿在邻近去找几个学生来谈谈，难得你专为此事来我家。她随即叫她的女儿出去邀人。不一会听到门外传来叽叽喳喳的谈笑声，郑的女儿带了七八个姑娘来了。我一见多数不相识，有的较面熟，却不知是谁家的姑娘，其中只有两个是我同学的妹妹。我以往与她们见面总不答腔，我每次到她们家找同学时，见到她们便问：你的哥哥在家吗？她们头也不抬，脸上毫无表情地答一声“在”或“不在”再无下文，可见过去男女界限之严到了何种程度。这次见到她们，情况就大不同了，不论生熟，都无丝毫顾忌态度，表现得很自然，都能以熟人相见的亲近语气，笑容满面的“陈先生”前，“陈先生”后地打招呼。特别是两个同学的妹妹，一个是秦伟的妹妹秦芬玉，一个是陈彰炎的妹妹陈彰仪，都象是见到久别的亲人，走近我的面前，絮絮不休地问这问那。这几个姑娘的年龄，看上去十七八岁的样子。姑娘们都按照郑的吩咐在屋里坐下，霎时间静了下来。郑茂兰说：“陈先生是现今党部的常务委员，他今天是为办好妇女协会来商量我。这都是你们想了好久，苦于摸不到门路的事。今天陈先生来同我商量，可见党部对这件事的重视。现在，就请陈先生向你们谈谈”。这时，我便开门见山地把组织妇女协会的意义、性质和没有发动的原因作了说明，并把这次来找郑先生是经过县党部执委会的委员们长期慎重而缜密地研究以后，才决定要我来先开这把锁，走通这条路，比较适宜。目前县党部又无女同志，除我以外，是没有第二人敢来担“风险”（一阵笑声）。就是妇女部长郭瑾丞老医生也不愿意出马。我强调要姑娘们知道县党部对妇女工作的一致重视的程度，同时把段修媛

这次回县组织妇协的情况，未能实现的原因也作了说明。我说，本来是希望有个女同志负责搞这个运动，自然无拘无束，深入到你们中间来，能够了解更多的情况，做更多的工作，岂知她的作法一开始就不对头，使人大失所望。我今日之来，就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下决心来的。并向她们表示，我回去后，立即同部长商量开展这个工作的具体方案，期于早日在县城成立一个基层妇女协会。我说完后要姑娘们发表意见。空气一时又沉寂下来，大家面面相觑，良久无语。郑茂兰便向一位姑娘说，你平时那样爱说话，今天正是你说话的好机会，为什么不开口？她转过来对我说，她名叫黄冠英，是我隔壁黄大顺面铺的姑娘，也很聪明，书读得很好，又会说话。这样一来黄冠英开口了，说了成立妇协是她的迫切愿望，是大多数姐妹们的要求……等等。话不多，语言清晰，谈吐动听，而且姿态端庄自然，举止不俗，在这一群姑娘中，颇与她的名字相称。接着，我便点了我的两个同学的妹妹，要她们说话，这两位都说，黄大姐正代表我们说了，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能早日成立妇女协会。我听了她们的发言，最高兴的是从来没有看见女子象今天这样敢于毫无顾虑地畅所欲言，完全脱了旧式妇女那种自卑感的传统女性的气，使我大开眼界。今天来的虽只有七、八人，她们的话，在广大妇女群众中，已具有代表性，一个个都表现出革命的巾帼英雄气概的雏形，我便说：我今天本是怀着试探的心情来的，如试探出满意的结果，就进一步来了解情况，情况了解越多，工作才有明确的方向，计划才有具体的依据，也就是我的此行有了一定的收获。我回县党部后立即召开执委会，把今天的情况向执委会汇报，进行讨论、研究，然后由主管妇运工作的妇女部长拟具更加周密和完善的工作计划和方案，以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我今天空手来，未带有关文件，我回县党部后，要妇女部长把所有有关的文件都清理出来，凡属妇女宣传品、妇协组织法，都给以大量翻印、散发。首先拟定一个《告家长

书》，先在县城挨户散发，为开展组织妇协扫清道路。今天大家回去，把胆子放大一点向家人说清道理，同时把今天的情况向平时与自己有来往的姐妹们作宣传，希望她们都来参加办妇女协会，也就是参加到这个团体中来作一名会员，各行各业的妇女都有资格参加。究竟怎么办，到下一次召集你们时，我再去谈怎样办的具体问题。我今天要谈的，大都已谈了，应告结束，现在我该回去了，姑娘们也该回家了，预料正式开会时间不会很远。此时，有个姑娘抢着说，正式开会时，陈先生也一定要到会，到会了，会一定开得更好！我笑着说：“好！好！我一定到会”。

我回到县党部，马上给全体执委会发通知，在当晚开执委会临时会议。晚饭后，执委们都到了，会议开始，我便把日间到郑茂兰家的一番经过情况作了回报，执委们边听边笑地说我真有办法，此行果见灵效。我说，对这个问题紧接着的是针对实际情况，迅速作出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今天见到的一群姑娘都盼望县党部能尽快地正式来组织她们成立妇女协会，这是摆在面前的一个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同时要通告全县各区党部，把这个运动的开展工作立即提到议事的日程上来，配合农协，广泛开展，就地组织起各村或连村的基层妇协，在短期内召开全县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县妇协。我的意思是请郭瑾丞同志切实担当起来，我尽力协助。首先是根据省党部妇女部历次发下的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妇女界的具体情况，制定工作计划，各区党部开展工作才有依据；还是提前拟一个《告家长书》，先在县城挨户散发，使人人对这件事有个正确的认识，给开展这个运动以广阔而平坦的道路。这是我今天向一群姑娘当面许下的诺言，姑娘们认为县党部散发《告家长书》到各家，她们便好说话，便好行动。这时郭瑾丞发言，他说，听了家祥的报告，我极为高兴地了解到这个长期不好解决的大难题，经他此番的苦心努力，终于得到解决，给今后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我过去的那种畏难情绪已一扫而

光，他又表示愿意协助，我自然更要振作精神尽力把这个工作作好，惟《告家长书》，我觉得这个题目象学校对学生家长说的，不很恰当，得改为《为开展妇女运动告群众书》比较切合。大家听后都表示同意，会议到此结束。

连日来，工作经过一番筹划和部署，清理出许多积压的文件，分清缓急作了整理，准备分发到各区党部，《告群众书》亦已印好，以应当前的急需。经商定，第一步工作为在县城组成基层妇协，仍由我正式去进行组织活动，以郑茂兰处为活动点。

当我再次见到郑茂兰，便向她提出：希望她能出来领个头。因她对组织妇协，在前次的接触中，看到她表现得最积极、最热心，使人极为信服，她在那群姑娘中是先生，又是县城妇女界中一位有知识、颇有声誉的长者，由她出来领导最适宜。这个问题，曾在执委会上讨论过，一致属意与她。当我提出这个问题，郑茂兰说：我是将近六十岁的人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心向往而步艰难，请你把我的这些无法克服的实际困难，转达县党部诸位委员。我后来深信郑的话是由衷之言，对她的处境，极表同情，不由得我不打消原来的一些设想，于是我向郑说：“你老人家的话是千真万确，我只有表示同情，再无别的话说，但我还得征求一下你老人家的意见，你觉得谁能担这个担子？”郑即说：我看黄冠英行，就是上次讲话讲得多的那个姑娘。其实我上次看到黄冠英的表现，已有较深刻的印象，思想上对她已作了肯定的评价，认为这个姑娘今后对妇运工作会作出一些贡献来，现在郑茂兰推举她，正合我的心意。郑不等我开口，又接着说，我考虑到领导这个工作的人，应该是年富力强的年轻人，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力，作风正派能团和人，我觉得黄冠英较符合这些条件，而且她的口才也不错，更好的一点是她的家人都赞成这件事，她可毫无顾虑地摆脱家务事，看来她的条件最好，只有她能担这个担子。自你上次来过以后，她几乎每天都要来我家一次，一来就专谈

这个问题。她希望党部能发下组织妇女协会的文件，将照章办事。她还说老是蒙在鼓里不知如何是好，真急人。但在条件上，只有她最齐全。谈到这里，忽见黄冠英跨进了郑家的门。她一看到我便说：“陈先生你来了！”郑茂兰即说：你来得正好，我正打算去喊你，陈先生今天来有话要同你谈。黄冠英即说，我什么也不晓得，陈先生对我有什么指教，我当虚心领教……。这一情况的出现有点突然，倒使我一时语塞，感到莫知所措，气氛顿显沉静。郑茂兰见机便说：陈先生今天来还是为办妇女协会的事再次同我商量，说是马上就要正式开展工作，要我出来领头，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就把你向他提出来了。郑随即把刚才同我谈的话向黄冠英重复了一遍。接着说：我的话还没说完，你就走来了，我想陈先生会同意我的意见的。黄冠英即说，郑先生，我什么事也不晓得，叫我跑腿我愿意，出来领头，快莫提我，姐妹中比我强的、能干的人多……。至此，我再不能缄口无语了。我说，郑先生的意思我完全同意，她的话一点雨（语），一点湿（实），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们还是继续谈实话不谈空话，更不谈客气话，我看黄大姐就接受郑先生的意见吧！黄冠英急着说，陈先生，那可不行，请郑先生另推荐一个。我说：你刚才不是说你要虚心领教我对你们的指教吗？怎么马上就说话不算话呢？我这句话就“将”了黄冠英的“军”。只见她的嘴在动，可话又说不出。郑茂兰即说：看来这件事陈先生是操了心的，他还不是为我们妇女办事吗？他刚才说要谈实话，不说空话，不说客气话，我看你冠英不用推辞了，你是个年轻有志气的人，我是深知的，有志气就要有作为，如今正是你有所作为的时候到了，应该大胆承担下来，你心里应该明白，我为什么单举你而不举别人！以后的事，请陈先生经常抽空来作指导，你努力地干，大胆地干，保险没有行不通的事，只要是一心为公，是会得到群众的帮助和好评的。话至此，黄冠英只是含笑不言，算是心里默认了，领头问题

就这样定了下来。

在谈具体工作如何进行时我说，任何事情都有个开头。现在办妇女协会，开头就是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首先是向妇女群众讲清办妇协的意义和能起的作用，启发和打通她们的思想、建立革命观念，然后组织她们，办个妇女协会，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组织，同别的协会一样为革命作贡献，同时也是为自身谋利益，因此，一开头就要有人出来领头做这两项工作。县党部决定近期内在县城先成立一个基层妇女协会，办妇协是个从无到有的事业，现在就请黄大姐把这两项工作负担起来。我今天带来组织妇协的文件和宣传品，正是你所需要的东西，请你先拿去看看，定能解决你上次所提出的“怎样办”的问题。我上次说的《告家长书》，经县党部执委会审订为《为开展妇女运动告群众书》，并决定不挨户散发，只有发到那些可以发展为会员对象的人家，我先带来一百份，你可分给上次来的那几位姑娘，要她们散给她们的亲朋戚友，你先把她们邀到一起，商量一下，也可以叫她们就近张贴，做个宣传员，这就是宣传工作。然后把愿意参加妇协的人登记起来，我已带来了一个会员册，照册上各栏填写，来参加的越多越好，这就是组织工作。我们经常有人来你处了解情况，等到有一定的人数就可召开成立会。你如觉得领这个头开始不方便，你可邀集她们明天到这里来，由我来作说明。（黄冠英插话：“那太好了。”）你就可以临时领导人的身份正式开始进行工作。你开始的名义为“召集人”，到正式开成立会时，即由全体会员选出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即常务委员、宣传委员、组织委员各一人，到那时“召集人”的任务即告终了。黄冠英听我讲完，欣然表示接受这个任务。

次日下午，我先到郑家，看到姑娘们已早来了，比上次还多了几个，这次有十四、五人，由于人多，郑家坐不下，座谈会就转到黄冠英家开，到黄家坐下后，我便说，不用一个个的倒茶了，

茶放在那里，谁喝谁倒。有个姑娘说，陈先生是请也请不到的贵客，应该敬茶，我们是常来的，同在自己家里一样。黄冠英说，陈先生是个爽快人，他不爱客气。接着，郑茂兰也来了。我接着说，请大家静下来，我今天来同大家谈谈怎样着手组织妇女协会的具体方法问题。大家的迫切心情，我早已了解到了，但不论做什么事总要有个适当的人来领头，“蛇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组织妇女协会这样一个大事，就更需要一个领头的人，而且这个人必须具有能够胜任得起的能力和有利条件，经我的观察和了解，在你们诸位当中，以黄冠英为最适宜，她今天能把大家邀集到她家，这说明她家的大人首先同意了，象这样开明的家长实在不多，其他有利条件就不用我说了，大家知道得更清楚。在今天所到的姑娘中，我们虽然都是城里人，我所认识的只有秦芬玉和陈彰仪两位，黄冠英大姐也是这次由郑先生的介绍才认识的。昨天我找郑先生商量组织妇协的领头人问题，郑先生就提出以她最适宜，历数了她具有的合适条件，因此才把她定了下来，在妇女协会组织之初，领头人的名义为“召集人”，有事由她来召集大家，等协会正式成立，选出一个执行会务的委员会，“召集人”就取消了。今天邀请大家来就是商量这件事。你们如果对于以她为“召集人”认为还不很恰当，可以另选，总之，要以大家公认的人才算数。郑先生和我是少数，少数应服从多数。这是原则问题，对事不对人，不必有所顾虑。我的话刚说完，大家都同声地说：我们都无意见，黄大姐出来领头是最恰当不过的，我们平时在背后谈到这件事时，都希望由黄大姐出来领导。我见这个问题又在群众中一致通过就更放心了。我便带头鼓掌，全场又是一阵掌声。我便说，目前“召集人”应做的工作，我已预先作了交待，从此，便由黄大姐来领导大家进行宣传和组织，准备正式成立妇女协会的工作。我会经常来看看，以后就以她家为联络处，再不打搅郑先生。在县党部专门领导妇运工作的是妇女部，黄大姐可

即日来县党部找我，即介绍你同妇女部郭瑾丞见面，你以后有事直接找郭部长。他是主管人，听从他的指示，我只是个协助者。现在妇女部的工作紧张起来了，我必将经常协助郭部长，光只县城的妇协组织问题不大，妇运是全县性的大问题，务必要使全县十个区同时发动，以村（或连村）为单位，迅速发展组织，希望能在短期内召开一次全县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县妇女协会，可见其工作量之大。你们属城区的一个妇协分会，城区是首区，你们要共同努力办好，成为全县各区妇协的表率。今天我来算是为你们解决了“召集人”问题的临时座谈会。你们还有什么要讲的吗？大家说，暂时没有，我便宣布散会。

过了两天，又有两位熟识的姑娘到县党部来找我，问组织妇协的事。她们是孪生姐妹，姐名叫张步青，妹名叫张咏梅，是我师范同学张之梁的两个妹妹，家住县城东街，另外还带来一位她们的邻居姑娘张琼英（与两位姐妹同姓不同宗）。我便同她们谈了当前正在进行这个工作的情况，并要她们去与黄冠英联系，一起来做这个工作。她们说，对黄冠英是相识的，但无深交，我即写了一张条子作介绍，并对她们说，黄冠英住后西街，经她发动，妇女都属西城和北城一带的居民，你们住东街，正好可以在东城和南城范围内发展，这样全城的妇运发展就平衡了，今天你们来得好，否则我还想不到这头上来。当即给了她们有关材料和宣传品。

黄冠英自接受任务后，对工作非常卖力，天天和几位常在一起的姑娘到处作宣传，她们将《告群众书》连环相送，到处张贴，全城各街各巷凡属热闹地段，数日间都贴有这个传单，看的人络绎不绝。我有一天到黄冠英家了解情况，她谈到这个传单很起作用，她说，原来有几个姑娘家中反对，现在不反对了，听凭她们出来活动，而她们也很自觉，每天总是早起晚睡，这一早一晚的时间，就帮做家务事，早起洗衣，晚上做纺织和针线活，她

们近来对家事反而比以往做得更认真，家人放心了，因而便能影响很多家的人，也让他们的姑娘出门参加活动，经常有人到我家来问情况，报名申请入会，几天之内，就登记了三十多人。我听完后回到县党部把我所了解的这段时间妇运的进展情况在隔日的执委会上作了汇报，认为即可作成立基层妇协的准备工作。

黄冠英手中的会员名册上，接连又登记了十多人，已共有三十多人了，都属劳动人家的姑娘，年龄分别在二十岁左右，读过书的约三分之一，一个大娘也没有。于是决定在近几天召开成立城区妇协的会员大会，选出会务执行委员，唯这些姑娘从未见过会议的场面，必须预先向她们作些开会须知的大概说明，才好进行开会。我的意见与郭瑾丞商量，结果由我预先去做这个工作。我便去同黄冠英说，现在申请入会的人数已有三十多人，县党部决定近日召开成立城区妇协会员大会。在开会前有很多事情要预先向会员们作一次说明，大会才能顺利进行。你可召集已申请入会的姑娘们于明天下午齐集你家，我来作一次进行开会方式的说明。次日下午，姑娘们和我都按时到齐了，我便向她们说明开会的程序和选举委员的全部过程，委员是三人，大家各自先作好酝酿，认定谁能当委员就选谁，你们也可事先互相商议一下，以增加了解面。请黄大姐准备一个选举票箱。不会写选票的人，可请别人代写，对被选人姓名由选举人向代写人口报。今天主要是谈进行选举的事，如事先不说清楚，到时就无法进行，必然会出现一阵混乱。最后我把成立大会召开的日期定下来即宣布散会。

散会以后，我同黄冠英还谈了很多在大会进行中要她先作好准备的一些细节问题。当谈到会场时，我说，县党部决定在县党部的大礼堂。黄冠英想了一下说：我们几个人也曾谈到这个问题，都认为还是在我家的好，比较随便，人数又不是很多，三十多人，我家的堂屋挤得下，天井里也可坐十多个人，堂屋的门都下掉与天井连成一片，多数人都宁愿到别处去，说没有一件好衣

服，走出去不象个样子，她们都有这种“爱好看”的心理，若是在县党部的大礼堂召开，她们更不愿去了，横直这是个三十几人的小组织，为了一切方便，还是以我家作会场为宜。我的父母弟弟愿意帮些小忙。我听后认为既是多数人的意见，而且要省很多事，就表示同意。

召开大会的日期定下来了，记得时间约为1926年10月末或11月初的一天。前一天，我与郭瑾丞部长把昨天开会应准备的各项事宜都准备好了，决定届时我们两人一起去，他作大会的主持人，我则以县党部常务委员的身份出席大会，与平时去的性质不同，我同老郭说，我们两人在会上的一切表现，务必要使她们都感到满意，给今后妇运的发展以极大的促进力，同时这些姑娘们从未经历过，而且是从未见过这种场面的，就是“召集人”黄冠英肯定不会作会场的掌握者，所以你我两人此去，要为她们作出怎样开会的示范动作，也是对她们上一次社会活动教育课。大会主席由你当，由你宣布开会和会议程序，同时在大会开始时即把“召集人”黄冠英请上去，叫她把发展会员的经过扼要地讲一讲。关于选举问题，我早几天就已叫黄冠英把所有入会的姑娘们召集到她家，我给她们作了如何进行的说明。这群姑娘看去都聪明、都热心，我看这次会是能开成功的。我们两人直谈到深夜。

次日，天气格外和煦，正是“十月小阳春”的初冬佳日，恰好成了县城觉悟起来的妇女群众从渴望已久的城区基层妇女协会诞生的“黄道吉日”。是日清晨就有几个会员来到黄家，帮助布置大会会场，首先就到邻居去借凳子，在堂屋后壁正中贴一张孙中山的遗像和遗嘱，面前摆一张桌子，铺一床花被单，把票箱搁置在桌旁，整个会场布置得简单朴素，整齐干净。八时前，会员都到齐了，聚集在黄家大门口，等候迎接县党部来参加大会的同志。这时，门口看热闹的人也越来越多。都知道是举行从来未见过的妇女协会成立大会。少顷，我和郭瑾丞部长到会了，会

员们鼓掌欢迎。进入会场，稍坐，我便向会员们介绍，这位就是你们的部长郭瑾丞同志，他早就要来看你们，没有空，我几次来就是代表他来的。今天的大会由他来主持。一杯茶之后，郭部长就宣告大会开始，请全体就座（一片掌声），并请“召集人”黄冠英同志前面就座，照例向孙中山遗像“行礼如仪”后，就宣布会议程序，然后报告开会宗旨，接着请“召集人”报告发展会员的经过，最后由我代表县党部执委会讲话。我讲话的时间较长，详细阐明了妇运意义，从基层妇协讲到县妇协、省妇协，从全省讲到全国乃至全世界，说明现在是革命时代，革命的动力为广大人民群众，群众一半是男，一半是女，妇女觉悟了，解放了，与男子平等了，她们对革命的贡献必然也与男子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组织妇女协会的根本意义和远大目标。我讲完后，郭部长即按议程宣布进行执行委员的选举，全体会员即依照前天我向她们所讲的选举程序进行。选举结果，黄冠英、秦芬玉、陈彰仪三人得票最多而当选，并当场推定黄冠英为常务委员、陈彰仪为宣传委员、秦芬玉为组织委员。这个基层妇协即为城区妇女协会第一分会，会址暂设在黄家。最后在掌声中宣布大会胜利闭幕。至此，黄安县革命群众组织中的这个空白点已填补起来了，庆幸黄安妇运史新纪元的开辟大功初步告成，她是后来的黄安县妇女协会的头生子，值得骄傲的城区第一分会，从此以后，每逢县党部举行的各种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游行队伍中便增添了一支妇女队伍，而且一次比一次庞大，她在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中，蔚为一朵绚丽夺目的鲜花，大会主席台上便多了一个妇女代表上台演讲，每次出席大会演说的为黄冠英。

郭部长身经这次妇协成立大会的盛况，高兴异常，他在执委会上对这个妇协从无到有，从散到集直至成立，以及成立大会时感人的气氛，作了痛快淋漓的长篇报告，他从来没有过象这样翔开生面地在执委会上发过言。自此以后，他对妇运工作更加重视

起来了，一有问题，他能及时开动脑筋给以解决。他在成立大会刚一结束，即以妇女部长的名义，将这次妇协的组成经过概况，编了一个简报发到各区党部，督促各区根据当地妇女群众具体情况，迅即行动起来，不要让城区妇女专美于前，期于能在短期内召开全县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县妇协以竟全功。

不久，湖北省党部派戴季伦同志(跨党党员)，到县党部来任秘书，他可代行常委工作，执委会便就此机会决定派我赴全县各区巡视一次党务。我在这次执委会议上进行“临时动议”时，我说：关于开展妇运问题，早已通告各区，迄今仍不见动静。打算附带作催促开展这个运动的宣传工作，强调其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城区为范例，要各区迅即加紧行动起来。我这个动议郭瑾丞首先表示完全同意，其他执委们认为我对这个工作已摸索和积累了许多难能可贵的经验，摸透妇女心理，能在妇女群众中毫无拘束的活动自如，因势利导地作现身说法，大家都无异地议赞同我的这个动议。

我出巡每到一区于视察任务完毕后，即与区执委和区农协负责人座谈这个问题，了解当地的妇女情况，然后要他们商定留一个晚上的时间召集当地妇女群众，由我作一次宣传演说。妇女得知这个消息并知道是县党部的常务委员亲自作宣传，便一传十、十传百，老老少少、大大小小、而且男女混杂地在定好的那天晚上蜂拥而来，听我的演说。聚集的地点有的是祠堂，有的是寺庙或其他公共场所。我每次演说时间总是几小时，全场秩序井然，少有声响。

我巡视完毕回城后，郭部长告诉我，现在已有好几个区成立了不少的妇女协会，经常收到这样的报告，他说，我已意识到这是你此次出巡的一大收获，广泛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我即同他详谈我到各区后，对促进开展这一运动的作法，但没想到，种子刚刚播下就发芽生长得这样快。他说，照这样看来，不需要多

少日子就可筹备成立县妇协，现在要充分作好思想准备。

约在12月中旬，县党部召开第三次全县党员代表大会改选执委，我仍被选上，在推选各部部长时，对妇女部长一席，仍无女同志可选，全体执委一致认为这一席的工作，在本届执委中只有家祥驾轻就熟，能够胜任，此议立即正式通过。

我当时的副业，属县一小的教员，未久县党部决定成立一个“强迫教育委员会”，设在县教育局，我是委员之一，为了工作需要，又调我到该会担任主要业务工作，这样，我便成为一个身兼二职的人。强迫教育工作，又是个新的工作，特别繁重，妇女部的工作当时虽不算重，为了要早日成立县妇协，应付面则是很广，因此，我每天只得两头兼顾。

时令已是1927年春天，接到省党部妇女部的通告：定于三月份召开全省妇女大会，成立省妇协，各县妇协选派代表来省参加大会。此时，我县妇协尚未成立，代表无由选派，于是经县执委决定，通知正在省城的詹文敏（八里区詹家岗村妇协负责人，该协会是我1926年冬巡视党务时就近发动并指导成立的），作为我县出席省妇代会的代表。我即先以我个人名义写信叫她作准备，随后以黄安县党部妇女部写报告呈省党部妇女部，并寄给詹文敏持报告赴省妇女部报到。因此，愈觉得县妇协有从速成立的必要。根据当时全县妇运进展情况，虽不甚平衡，但从总的情况看，成立县妇协的条件已经成熟，我据此情况即在执委会上提议，应开始进行成立县妇协的筹备工作。执委们认为以在交了夏令、天气暖和人们便于活动的时候为宜。于是决定在四月间召开全县妇女代表大会，会议日程定为两天。我即根据这个决议向各区发了通知，要各区选派妇女代表，每区三人出席大会，并声明县党部目前尚无招待所的设置，所选的代表尽量以在县城有直接或间接交情关系能够寄住者为宜，万一无法，县党部临时再作安排。每个代表，由县党部津贴两天的伙食费，每天五角，希各区尽先作好选定代表

的准备，听候妇女部通知开会日期，代表务必最迟在大会的前一天来县报到。

过了一周，县执委会在一次常委会上决定于4月27日正式召开全县妇代会，决定事项如下。

- (一)通知各区党部按前通知（×字第××号）的规定办理；
- (二)县党部即组成大会筹备处，也就是大会秘书处由妇女部长领导工作人员若干人，分管事务、文书等工作；
- (三)以县党部的大礼堂为大会会场；
- (四)向县里各机关团体发出请柬，请派代表届时莅会观礼指导；
- (五)大会议程：

第一天上午8时举行开幕式，首由妇女部长致开幕词和工作报告，次由县党部常委作政治形势报告，再次为来宾致词。下午2时开始听取各区代表的报告和临时动议。

第二天上午进行执行委员的选举，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三人，组成县妇协执行委员会，推选委员三人为常务委员，在三人中推选一人为会长，其余各委员分任宣传、组织、教育、农运等部门工作，一律同时选定。然后由妇女部长宣示，“今后的任务”。下午为闭幕式，由妇女部长致闭幕词，最后为游艺会，由各代表不拘形式的自由组合，作为大会胜利闭幕式后的余兴。

我即将上列事项通告各区，要他们向选出的代表作传达，使她们预先充分了解大会将是怎样进行，作好必要的准备。

大会日期快到的前几日，城里街道上、店铺里出现了一些从乡下来的女客人，她们就是出席县妇代会的代表，在城里都有落脚的地方，她们想借这个难得的机会，提前到城里来多玩几天，她们都按规定到开会的前一天再去大会筹备处报到。报到处设在县党部的大门口。到了会期的前一天，早饭后，便有代表持介绍信陆续报到，当即发给每个代表一个“代表胸徽”（用红蜡光

纸剪成短条上书“黄安县第一次全县妇女代表大会代表”）。代表总数额定为三十人。发现有几个区的代表带来几个年轻姑娘，其目的为同来县城游玩，代表们要求在开会时准许这些姑娘到会场去旁听，让她们长长见识，开开眼界，说这些姑娘都是热心妇运的积极分子。报到处的同志便将此意见反映到妇女部，得到了我的同意，便决定在大会场布置一些旁听席，因这些事我联想到有让城区妇协分会的全体会员都来旁听的必要，于是即通知黄冠英转告她们，借以壮大大会的声势和阵容。

大会会场布置一新，正中主席台上悬挂孙中山的巨幅遗像，遗像上边交叉分挂两面国民党党旗，左边上贴孙中山生前撰写的一付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下面贴一张“总理遗嘱”，主席台前最上方挂一红绸白字的大横幅，上书“黄安县第一次全县妇女代表大会”，台上左右两角为记录席，会场四壁贴上用各色彩纸写的标语。台前第一排为来宾席，后面为代表席，左右为旁听席，并请县一小的音乐队在大会开幕时前来奏乐。

大会开幕日的清晨，大会秘书处的部分同志佩上了“招待员”的胸徽，分派到大门口、会场、县党部会议室等处担任招待事宜。8时前代表们陆续都到了，引到大礼堂休息，各处的来宾也到了，引到会议室休息，跟着代表同来的客人以及城区妇协会的全体会员则与代表们同入礼堂。音乐队早来了，一时会场内外，热闹异常。我便同常务委员吴兴同志和几个执委引导来宾入场，一进场，我带头鼓掌，全场人员即跟着鼓掌，先请来宾入席，代表们和旁听者们都在各自的席位上就座，我和常委、执委们都登上主席台，由我宣布“大会开始”，全场又是一阵掌声，接着奏乐，然后例行“行礼如仪”，我即致开幕词和作“黄安县妇运发展的始末概况”和“大会的筹备经过”等报告，继由常务委员吴兴同志作政治时事报告。我们两人的报告历时两个多小时，最

后为来宾致词，休息时已正为午12点。

下午2时继续开会，整个下午为代表报告和临时动议，十个区的代表都先后作了本区妇运的发展情况和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发言。她们都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各代表报告的时间最长的有20多分钟，最短的有5、6分钟，一般都表现得很自然，可见她们是预先经过几番练习的，她们无一人带发言稿。约历时两小时发言完毕，临时动议人数不多，我即作了带鼓励性地简要小结，然后宣布，今晚有娱乐晚会，是县农协为庆祝我们的大会和欢迎代表们而举办的，节目是个话剧，演出地点在女子小学的雨操场（这个雨操场是科举时代的考棚）可容一千四五百人，请大家在七时前到女子小学，代表凭胸徽入场，所有旁听人员凭入场券入场，于是将准备好的入场券各发一张，另给每个代表五张，作分送之用，但只限送妇女，男子一概谢绝入场，我即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休会。

因为时间尚早，会外我向代表们提了个建议，我说，据我了解代表中对于娱乐方面，长于吹歌弹唱等技艺的大有人在，你们可预先组织一个小型的游艺会来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谁有一技之长除吹歌弹唱外，笑话、猜谜……等不拘一格，在大会闭幕式后，作一场余兴表演，使我们这个大会的热烈气氛贯穿始终，同时还能密切相互之间的关系，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交流经验，增进团结，使全县十个区的妇女，结成一个革命的整体则今后对革命的贡献，将是无法估计的。于是便请代表中一位年龄较大的、善于联络群众的八里区的代表耿裕坤（乡小学教员）负责组织，请她在明天上午开会前把组织情况告诉我。

那晚的话剧是以“妇女解放”为题材，由县党部、县农协、县一小的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志集体临时编出，并由他们分担演员角色，在一个月前即开始准备，排演了好几次，算是成功。几天前即选定女子小学的操场为剧场，在场内搭起一个半人高的剧

台，准备了一千张入场券，除已发出的一部分外，余下的临时在剧场口发给前来观剧的妇女群众，发完为止。女子小学的学生则整队由教员带领入场，守门的同志必需严格执行这个规定。

开演前，入场券很快就发完了，场外仍然聚集了不少的人群，这时我的婶母带着几个邻居的姑娘来了，她便同守门的人讲，请你去把我家的家祥叫出来，说他的婶娘来找他有话说，于是我便被叫出来了，我不等她开口，便说，你为什么不早来，入场券已发完，无券概不能进，你还是回去吧！这个戏以后还要演的，终于没有让我的婶娘入场。旁边的群众便说，陈先生是个铁面无私的人，连他的婶娘无票也不让进去，我们还站在这里做什么？走吧！一会儿，这一群人都散了。

场里挂了两个汽灯，台上一个，倒是很通明，唯无座位，观众只有就地坐下，在最后面的人才可站着看。

演出前，刚从省里回县的省农协巡视员余泽涵同志，要借此机会向群众发表一篇重要讲话，我即陪他首先登上剧台向观众介绍听他的演说。他一开口就把新近发生的“四·一二”政变作了简要的报告。这是突然而来的一个震惊人心的新闻，他随即高喊一声“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后台的同志们也跟着齐声高喊。他说这件事应了总理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教导大家也不用惊怪。自辛亥革命以来，至今已十六年，中间又革了多少次的命，都没有成功，原因就是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如今不同以往，全国人民群众都发动起来了，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不可战胜的力量，有了这大的力量，莫说一个蒋介石，十个蒋介石也不怕。凡是与人民为敌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我今天刚回县，赶上这个好机会，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使大家对目前革命形势的变化有个新的认识，好再接再厉地奋发起来，作新的斗争准备，等于是给你们一个新的任务带回去向广大群众作宣传，胜利必然属于革命的人民群众。他的话，言简意赅，字字

有力、句句动人，全场气氛，从大众表现的情绪看，在他这一短短的演说时间内，开始有点低沉，忽然又活跃起来，高涨起来了，可见他的话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他的演说。

入剧台幕启，乐队奏乐，演出开始了，场内空气仍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人声嘈杂而又转呈平静，剧情表演始终紧凑，形象逼真，观众秩序井然，笑声不断，直演到午夜剧终才散场。

第二天上午8时，会议照预定程序进行县妇女协会执行委员的选举，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三人，我首先作了进行选举程序的说明和布置，选举结果，夏国仪、黄冠英、吴醒奴、张咏梅、秦芬玉、×××、×××等七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并就执委中推定三人为常委，她们是：夏国仪、黄冠英、吴醒奴。以夏国仪（共产党员）为会长，其余的四个委员分任宣传、组织、教育、农运等部的部长，候补委员三人（姓名已忘记）。会议至此，宣告“黄安县妇女协会”正式成立。关于会址问题，妇女部早期勘定在土井街玉皇阁。

下面的议程是由我代表县党部执委会宣示“县妇协今后的任务”。我说，县妇协已成立，领导班子已选定，便要确定今后的任务，将领导全县妇协会员明确今后妇女工作的方向，为革命作出更多的贡献。当然，要先从自身的解放做起，确立男女平等的地位，这是妇女革命具有特殊性的首要任务。我县自有农民协会以来，各地农协会员中已占有一定的比例，她们实际上已与男子平等了，与男子共同负起革命的使命了。据我了解各区新成立的妇协中的会员绝大多数为农协女会员中的积极分子，若无她们的努力，妇协的组成就没有这样快，她们已有了双重会员的资格，妇协这个组织实际上就是启发妇女思想觉悟的学校，锻炼妇女革命意志的熔炉，可以说今日妇协的组成，实为农协增添了一支新友军，她对农协起到了“如虎添翼”的作用。我县除几

个城镇外，妇运工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任务是农村。妇女协会要与农协紧密配合起来，结成一体，共同投入农民运动中去一致行动。当然还有为妇女本身有直接关系的其他许多任务也不能忽视。最后我说，这个问题妇女部长已与县农民协会作了协商，县妇协的农运部长要经常同他们联系，凡是以后县农协向下级农协下达新的工作指示而与妇协有关的，县妇协应向各区妇协作同样的指示，对有关工作，双方便能同时一致很顺利地行动起来。至此，我即宣布上午的会就开到这里。

下午大会闭幕式。我与县党部全体执委一齐到场，由我致闭幕词，历时不到一小时毕，音乐队即奏起乐来，然后宣布，大会胜利闭幕。此时会场内，迅雷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大会闭幕后，大会余兴的游艺会接着开始。我请耿裕坤主持，代表中有吹箫的、吹笛的、拉胡琴的，也有唱几曲山歌小调的，顿时全场迴旋荡漾着一片吹弹拉唱的悦耳声，群情洋溢，极尽欢乐。表演快结束有人提议说，听说部长对于这些乐器是个全能手，由他来表演压轴戏最合适，大家即鼓掌表示欢迎。于是我欣然接受这个提议，便将各样乐器一一演奏一番，吹箫能吹出双音、拉胡琴、按风琴是边奏边唱，先唱歌曲，后唱汉戏《关公月下问貂蝉》。待我唱完，天色已经不早，代表们都表现出兴犹未尽的神情离开会场。我和执委们送她们到大门外，直到看不见她们才转回县党部。

黄安县妇协成立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不久，刚一成立，就把艰巨的革命任务重担分担起来了。1927年上半年中，我县农运高潮在农村普遍掀起，打倒土劣、斗争坏人，到处已见行动，在妇协与农协的配合下，妇协会员一个个地投入战斗，村村出现妇女积极分子，发挥了她们对革命应有的作用，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我县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是以共产党员为领导发动起来的，组织性最强，特别是农民协会最富于战斗力。时隔不久，大

革命失败，国共分家，所有跨党党员遵照党的决定一律退出国民党，转入地下，暂时自行隐蔽。这时反动势力渐渐复活，农村阶级斗争更加复杂和激烈，妇协与农协的斗争任务便更加艰巨。因而阶级敌人对革命群众都恨之入骨，凡属积极分子都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革命渐趋于低潮，白色恐怖渐渐笼罩着整个黄安，土豪劣绅等反动派一时麇集成立了什么“清乡团”，对革命群众施行残酷镇压，首先遭到迫害的则为农协会员和妇协会员中的积极分子。因我当时已赴武汉，后来传闻城区的妇协会员秦芬玉被反动派在她的脸上施行刺字的酷刑，她后来结果如何则无所闻。八里区陡山吴家的吴梅生惨死于她族间反动势力之下，因她是那里妇协中的积极分子。其他牺牲的革命群众只知为数不少。几年之后，又听说夏国仪同志于1927年冬在其汉阳亲戚家隐蔽时，事泄遂牺牲在反动派之手。她是我县最早的一位女共产党员。我县自有农民协会组织以后，她即参加本村的农协，是农协女会员中的积极分子，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待县农民协会成立，她被选为县农协委员，由于我县的妇运开展较晚，到县妇女协会成立时，她才当选为会长，不久被选为中共黄安县委成员，负责妇运。她未上过学，识字不多，无生育，丈夫王鉴，武汉中学学生，也是我县最早为农民运动宣传者之一，工作积极，后任省农协特派员回县指导工作。

我的这个回忆录是专对我县的妇运写的，对几位女同志当年被害的情况在此仅就由传闻所得，作不详尽地提一下。“烈士之血，革命之花”。这说明我县当年的广大妇女群众，在中国共产党人所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妇女协会领导和培育下，为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黄安革命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并为后人永远怀念和赞颂。

何为嘉 整理

忆张之乐同志的遇害

陈继唐

1927年冬，在武昌发生了一起反革命分子谋害革命同志的恶性事件。八里区的恶霸土劣、吞没当年救灾捐款罪犯之一的张英廷，自当时的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于1927年夏判处死刑服法后，其弟张国权一直蓄谋寻仇报复，凭借其服役于西北军的势力，乘当时第一次国内革命处于低潮，湖北政局动荡之际，潜来武汉，袭用盗匪作案的卑劣手段，伺机对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阴谋报复。当他探知曾在八里区负责过农运的共产党员刘琴圃同志在武汉时，认为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报复对象，便找到同乡人余福庭在武昌开设的“普通旅社”来，杀害刘琴圃，恰因刘不住该旅社，致使张的这一阴谋没有得逞。但就在他临离该旅社时，忽想起曾在八里坨小学任过校长的共产党员、八里区国民党党部负责人张之乐同志，估计是时也在武汉，即回头向余老板试探，打听张之乐的行踪。适张之乐正住在旅社对面余老板的杂货店内，本极隐蔽，不料余老板在与张国权的答话中，丝毫没察出其心怀鬼胎，以为他是来寻访旧友，竟以实告，致使之乐同志当即被张国权带到武昌小东门外秘密杀害。

张之乐同志的被害，我当时正在武汉，这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现在就将当时的情况客观地详述于后，决无半点虚假，半点个人仇怨存乎其间。

首先，我要讲明一下我与张之乐的关系以及我们是如何一起来到武汉的，这与本文有密切的联系。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接着汪精卫在汉口召开“分共会议”，背叛革命，这样国共两党分家。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凡原跨党的中共党员都一律退出国民党，暂时自行隐蔽。在此革命日趋低潮的形势下，黄安县城渐渐呈现出一种无政府状态。中共党员，都先后离开了县城，其时我还在八里坨一带视察学校，得知这些情况后，我即回城看看，这时原在县城的只有张之乐一人未走。我见到他时，他对我说：“看来白色恐怖，已临山雨欲来的前夕，同志们都先后走了，我正在作走的准备，你回得正好，我们两人一同去武汉吧。有个同乡人余福庭，在武昌开设旅社，我在省城上学的那几年，同此人混得很好，是个可靠的朋友，我们先住到他的旅社，再设法去寻找组织，只要与组织接上了联系，以后的事就好办了。”我当即同意他的这个计划，于是回家作去武汉的准备，时在中秋节后的几天。

次日，我和之乐各背一个包袱离家，我对家人说是继续到各乡视学。头一天宿桃花，第二天直赴平安区之乐的一个朋友家，第三天去仓子埠赶乘去汉口的小火轮，到下午三时许，轮船才停靠汉口港。我对武汉是陌生的，只得跟着之乐走。一到武汉，之乐旋即雇人力车两辆分乘，直赴目的地——龙神庙街“普通旅社”。我们在旅社门口停车，老板余福庭在旅社对面他开的小杂货店内看到了我们，便笑脸相迎地走出来了。之乐首先将我向他介绍，余福庭忙将我们的背包提进店内，又是端水，又是泡茶，出现了宾至如归的和洽气氛。将我们两人安排在店内后房中休息。

我们在与余福庭谈话时，余说：“听说近来县里情况不大好，看到下来了好些人。”之乐便说：“没有什么要紧，我们是趁此机会下来参观武汉的风色。”等余福庭去打杂时，我们二人商量，为了隐蔽起见，不住在旅社内，以住杂货店内为宜。于是之乐便对余福庭说：“我们两人，就住在店里同你们一起吃饭，不作为旅客，一方面比较清静，另方面行动自由，至于房饭钱由

你算吧”。余老板当即表示同意，我们就这样住下来了。

连日来，我们浏览了武昌全城风光，走访了余子勤和余庶苏几个朋友家。此时，老友余泽涵住在子勤家，他又带我两人去见张眉先先生（余泽涵的伯父），知董先生（董必武）早已离汉，张先生以省民政厅长兼代了由董先生主办的党义研究所长。过后我们托涵找组织关系时，他说一时还说不上，只有等些时看看。

我同之乐在回旅社途中，之乐说：“我有一个亲戚金近芳，现当团长，家住汉口，我既然已来武汉，应去他家看看”。我便说：“你很可以住在他家，我一人住旅社。”之乐说：“他家人多客多，虽属近亲，却非同志中人，连话都难谈到一块，行动极不自由，我根本无意如此。同时，他们已了解我目前的处境，未必能得到他们的欢迎，我也决不巴结亲戚，但去看看，倒有必要。谈到隐蔽，小杂货店倒是理想的所在，我与余福庭有多年交谊，他人极可靠，又是生意人，让他多赚几个钱就行了。我们两人也决不能分开，而且隐蔽是暂时之计，迟早总要找到组织的”。

越日，我同之乐过江，先到亲戚金家。金近芳不在，只有其弟金卫仪在家，他已知之乐此次来汉是“避风”，在谈话中，便叫之乐住在他家，之乐说，我同几位朋友在一起，住的地方很偏僻、安全，就不用来麻烦你们。谈了一小时便告辞，金卫仪便紧紧地拉着我们留饭，之乐推辞说，以后在你家吃饭的机会多，今天还要陪他（指我）去逛几个地方，他是初来武汉，游览重于吃喝。

过了两天，王则西同志（黄安一小校长）和车若愚（一小教员）得知我们来汉，特到旅社来看我们。经交谈得知，他们是在一个月前来武汉的，并且很快在省警卫团二团任连指导员，因该团团长曹振武（京山人）素与董先生私交甚笃，而警卫团实际为共产党所控制的部队，该团各级军政人员中，都有共产党员，尤其是政工人员中居多数，在当前时局急转之下，凡是身份显露的共产党员都履行党的“跨党党员一律退出国民党”的决定，于是

日见离去，首先离的是团指导员沈天白。其时王、车二人来汉后，即通过曹振武的关系，都被取用以补连指导员的缺额，王在五连，车在四连。这些是王则西向我们介绍的简单情况。因车若愚在场，车非我们的同志，故有许多情况不便深谈。王则西临走时，暗示我们明日再来详谈。

次日，王则西一人来了，他详细地谈了警卫团官兵的思想情况，认为曹振武一向是亲共的。全团官兵思想很进步。讲到这时，他说：我们的同志如能趁此时机，尽多的打进该团，我想该团有党的组织存在，只要我们与党的组织联系，前途是大有可为的。惟目前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情况扑朔迷离，捉摸不定。好在我们都是隐蔽之身，只要谨慎从事，待机而动。因此，我们不仅目前要作好思想准备，而且要有行动计划。现在如能促使曹振武在湖北政局未稳之际将全团转移到适当的地区举起义旗，真正成为我们的武装力量，却富有极大的可能性。我们三人谈到这里，都喜形于色，对今后发展党的事业，革命前途抱有极大希望。接着王则西说：“曹振武对我表示很信任，要我暂时兼代团指导员办公厅干事，并要我随时留心干练的政工人才，只要一有缺出，即行递补。昨天听说六连缺指导员，我想你们两人先去一个补上”。张之乐说：“让家祥（我原名）先去。”王则西认为很恰当，说回去报告团长。我说：“我去是可以的，但我的名字最好改一下，改为陈继唐，即以此名上报。”则西同意了。则西临走时，我对他说：“不要忘了我们的大事，我们刚才所谈的，寄望在你的身上，你可多接近曹振武相机做他的工作，要成其事，关键在曹。”

数日后，王则西笑容满面地来了。他对我说：“你的事当即得到团长的同意，派你为六连指导员，明天我带你去见了团长后，即可去六连正式就职。惟官长的军装都是自备，你得花一笔本钱买一全套军装”。这事虽不算大，我当时身边的钱估计是不够的，之乐表示愿意帮凑。接着之乐灵机一动，便说：“去找找子

勤，也许他能设法搞一套现成的。”于是我们三人一同走出，则西回营。我与之乐即去子勤家。见子勤，我们说明来意。子勤说：“这事好办，我家即可凑成一套”。他随即去清找少顷，端出两套中山装（当时的军装即中山装，一套是棕色人字呢的，一套是灰色羽绒纱的，都是大半新，武装带也有了，皮鞋也有了，就是缺军帽，我全部带回旅社后，立即到长街去买一顶军帽。于是我便化起装来，大家一看都笑着说完全是个军官样子。隔日，我穿好军服等王则西来带我去见曹振武。待见到曹振武时，他对我表示很欢迎，他即叫卫兵去请六连柯凤桥连长，一会儿柯连长来了，他向团长敬礼后就座，团长便将我向他介绍，吩咐了几句话，叫他带我到六连。

我到六连后，对指导员的工作见有陈规可循，情况很快就熟悉了。当晚集合全连官兵点名时，就便为我开欢迎会，我由连长陪同与全体见面，连长作了介绍，我即席讲了话，最后在全体鼓掌声中散会。次日，连长还陪我去见了两位营长。我初到一个部队新的工作岗位，连日来在待人接物处人处事诸方面都极顺利融洽，一点也不觉陌生。我的主要工作是做士兵的政治教育。每晚点名后，上次党义课，教材是采用当时新出的，士兵必读《三民主义讲话》，我极重视而又热爱这个工作，好以隐蔽之身，朝夕与士兵共处，便于有更多的时间作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建立革命感情，为今后实现我们商定的计划储备实力，打好基础，于是我对政治教育实施计划以能与当时政治形势相适应的方针，制定教学方案，根据《三民主义讲话》课文，阐明民族主义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权主义为反对专制制度，实行人民民主；民生主义为教育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农村政策，并隐讳强调中国要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必须贯彻好总理的三大政策（当时忌提这个问题）。课文内容虽极短浅，制定教案则力求与课文精神相融合。我事先了解到这些士兵多属农民子弟，入伍后即受到了革命教育，他们的思想已有一定的觉悟，我的教学方

法，深入浅出，极合士兵的口味，每次上课时，全场俱寂，个个聚精会神地听讲，连长和三个排长每次也都在场听课，过后，他们对我的教学方法反映极好，特别是士兵，个个高兴，一致认为前指导员教课也很卖力，讲解课文精神也很多相同，但不得教法，效果不太大，远不及新来的这位指导员。我高兴地感到，如今我又有用武之地来作农民出身的士兵的政治教育工作，对革命的前途，极抱乐观，一扫数月来暗淡的心境。

约一周后，团部命令，全团开赴通城县驻防，我私心窃喜，认为这是实现我们原计划的开路先兆。因该县地处鄂、赣、湘三省边境的大山区，极利于为革命开辟一个根据地，对我们来说，为实现我们的计划应具有的“人和”和“地利”两大条件已基本形成，我在连日行军时，心潮澎湃，情绪激昂，一到通城，行装未卸，我即集合全城居民群众作宣传，我站在一家商店的柜台上作演说，顿刻之间，听众越聚越多，顿时途为之塞。正在这时团长率领军官从我面前的人丛中穿过，看到这种情景，都有满意的表情，隔日县长举行欢迎会。王则西当场推举我上台去作全体唱革命歌曲的指挥者。意在让全团官兵都认识我这个新来的六连的指导员，以使用各种可能利用的机会扩大我们的影响。

在通城驻防，大约已过三周之后，忽遭遇唐生智的部队来攻打我们，双方打了五天的攻、防战。

这时，唐生智的部队，很多分散在鄂南。有一天他们有一部队突然来攻通城，想消灭我们，夺起武器，战斗开始后的前三天，我们出城迎战，敌军来势渐大，出没于遍山遍野，团长为了保存实力，减少消耗，到后两天便闭城防御，并决定突围退却，便于第五天的傍晚，从县西城门突围，团长命令到军楼司（湘鄂界线上的一个镇即粤汉铁路的一个站）集合，此一计，敌未发觉，我们且战且走，到天明敌人发觉时，我们的队伍已去之远矣。后来听说这股敌军的军纪还好，他们进通城后即出示安民，一切保持正常秩

序，官民无损。

我在此役中，有意识地自动参与城防战斗，以城垛为掩体，借以熟悉射击本领和从实战经验中壮大胆量，虽眼见自卫队时有伤亡，却寻常视之，不为所动。这是我不曾想到的一次战场生活实践。

我们快速行军，两日到军楼司，团队员已先到，经团长集合队伍，检点人员武装，有极大的损失，稍作整理，即由军楼司乘火车返回武昌。旋得知蒋介石的爪牙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已来湖北主政，成立了清乡督办公署。这一突变，特别是警卫团又开回武汉，把我们原来的设想，全变成了梦幻而破灭。由于我们到这个团，日子太短，一切情况尚在陌生中，变化又是这样快，此时我的内心又转阴沉起来。接着不幸的情况临头，团长宣布：本团奉命改编为湖北省省防军第二团，全团人事将有大的变动……。

因当时曹振武处于进退维谷之境，迫不得已只得接受胡、陶的改编。一周以后，曹振武出于好心将我和王、车三人召去，劝我们三人自动离开，就在我们离开该团的前数日，发生了张之乐同志的被害事件。

1927年阴历十月下旬的某一天清晨，武昌龙神庙街（今民主路胭脂路路口）“普通旅社”突然闯进一个青年军官，带着一个卫士，各挂一支驳壳，进门后即声言找刘琴圃，其时全旅客在酣睡中，无一应者。这个军官即找到该社老板余福庭，余以迎宾口气向他称一声张先生？！军官便问：“刘琴圃住在哪一房间，我有事要找他。”余说：“我社无刘琴圃这个客人。”军官即生气地说：“明明听说他在这里，快叫他出来。”旋叫卫兵把守大门，他们两人将枪弹上膛。余被逼不过，便让他到各房间去搜查，又将警察局的逐日巡查簿给他看，结果各房间确无刘其人，巡查簿上亦无刘其名。当查到旅社内天井对面的小房时，我正寄宿在这里。我非旅客，是头天晚上来访友，因谈得太晚便留宿在这里。这个房间有两个床位，住有两个客人：一人为王履平，一为李明道，都是同乡

好友。我原是专访张之乐来的，之乐为了便于隐蔽，便住在旅社对面余福庭开的小杂货店内后房。因此那晚我便与李明道共卧。这个军官闯进旅社后的一切言语，我都听得很清楚。我便披衣偎坐在这里，其时王履平亦坐起来，当这个军官推门而入时，王履平即以熟人的口吻迎着说：“原来是国权呀！”我才知这个军官是闻名未见的张国权，心中便有数了。我也随口问：“是同乡吗？”张此时的视线即盯到同我尚卧在被里的李明道身上，他即问王履平：“这两位是谁？”王指着我说：“他叫陈继唐（继唐是我刚改的名字，原名陈家祥）在省防军任指导员（其时我披的是军服），那一位是我表弟，前几天下来治病的。”张便把话题转到找刘琴圃一事上他向王说：“明明听说刘琴圃住在这里，怎么不见了呢？”王说：“我住到这里已很久了，从未见过刘琴圃。”（刘住在粮道街安利旅社，也是同乡人开的。他头天晚上曾来此玩过片刻），张见阴谋未得逞，只得带着卫兵无精打彩而走。他出房后，我向履平暗示要王一同出走。事后王对我说：“他问你，我说你是程汝怀的本家，一向跟着程汝怀在外工作，他才没有朝下问。”哎呀呀！谢天谢地，履平真聪明，真够知己，顿使情况化险为夷。我即穿好衣，要赶快跟刘琴圃报信，抢时间，即是抢生命。此刻张国权等人本已去远，忽然又回头，看到余福庭立在小杂货店门口，便问余：“张之乐住在哪里，你知道吗？”余信口答：“他就住在我店房里。”这一问一答，我清楚地听到后，头脑猛然一震！转视王履平，看到他的脸色也变了。我默怨余福庭：“你这轻飘飘地一答腔，张之乐的命运会凶多吉少。”霎时间，果听到张之乐在厉声讲话，接着就是推推拉拉之声，竟将张之乐带走了。我随即奔出旅社，看见余福庭象被雷击似地痴呆在门口，我上前抱怨地向他说：“你这句话答得好啊？”我因急于要给刘琴圃报信，无心与他多说话，即奔赴安利旅社，将情况告诉刘琴圃，催他赶快逃避。这时我心急如焚地感到迫在眉睫的另一急务是营救张之乐。

“营救！”“营救！”我在从“安利”转回“普通”的路上低头缓步中，几乎唔出声了，它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可设想的天大难题，我在武汉，人生地疏，不知找谁帮忙好？此刻，又不知之乐被带到何处？我已知张国权的身份，他此来找刘琴圃，必然是趁当前湖北政局处于混乱之际，潜来武汉，趁浑水摸鱼之机为其兄张英庭寻找报复对象。如今刘琴圃未被找着，脱了险，万万没有想到灾难又落到张之乐的头上了。虽然错在余福庭的一句话，但也不能全怪他，他是不明底细的，一个有心，一个无意。我边走边想，不觉已到普通旅社，见余福庭靠在杂货店里的靠椅上，呆若木鸡。我便说：“你早先知道张之乐为什么要住在你店里而不住在旅社里，不在旅客巡查簿上登下他的姓名？你稍为动动脑筋，只答不知道！不就没事了吗？如今祸已闯出，你还不快去打听去向，想法火速营救，你在武汉多年，各方面的人认识较多，还不快去央求几个有面子的人来出面营救。”余说：“我正心乱如麻，原以为他们（指张之乐、张国权）两人，过去是同学好友，经常到我这里来玩，哪里想到如今他们已成仇人？我若是先知道一点影子，我也绝不说出真话，你叫我这时到哪里去央人援救？”我说：“带到什么地方去了总该去打听打听吧？”余说：“听到这一带的街坊说向小东门方向去了。”我说：“你就应跟着这条线索追寻到底。”他默不作声。正在我无计可想时，蓦地想到了一个营救的门路，顿时心眼明亮，暗自责道：“真是糊涂一时，现成的胡子不知安须。”原来张之乐有一亲戚叫金近芳，刚来武汉时曾同之乐一起去过，金近芳是现役团长，而且他们亲戚关系也不错，我决定去找金近芳。于是喊一人力车赴汉阳门过江，到岸后又雇车直趋金家，见到金卫仪，告以早晨在普通旅社发生的事件，请他急速设法营救。金卫仪听罢说：“我哥（金近芳）中午才能回家，他若知道此事一定会大力设法营救的。但究竟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应先探听明白，我们才好着手。”

我说：“我马上过武昌，有消息时，我立即过来告诉你。”于是我又坐赴王家巷子过江在汉阳门登岸后向前走，正准备雇车回旅社时，远见段修瑗向江边走来，到我们两人碰面时，她问我：“你现在去哪里？”我即把营救张之乐的事相告，她说：“畏三（之乐的字）已毙了！”我急问“什么？！”她又说一遍：“畏三已毙了！”我哎呀一声，眼前一黑，几乎晕倒了，段修瑗及时扶住我，两人对视半晌无语。后来，还是段喊了一辆人力车将我送回旅社。

到旅社后，余福庭哭着说：“我该死！”不停地用拳击头，他已知张之乐从他店拖出后，即被带到小东门外路断人稀的铁路边遭了张国权的毒手。我对余说：“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坐在这里悔恨着急，是无用的，摆在眼前的事就是张罗他的收殓的事了。”我接着说：“办这件事，一要钱力，二要人力，关于钱的事，我去筹措，至于人力你雇几个同乡来，照例给工钱。”于是我首先去找余子勤，他当面给我大洋十元，我即送给余福庭，叫他作雇人力的开支，并叫他到棺材店去定一口棺材，以中等的为宜，我再继续去筹款。交待完后，我又赶到金近芳家，仍是金卫仪一人在家，他听了我的—番谈话后，忧形于色，当面给我大洋三十元，他说此刻手中只有这么多钱，先拿去用，不够时再来，拿到钱，我又马上过江，将三十元大洋交给余福庭。余说：“棺材已看好，价值二十四元，已请就八个同乡帮忙，言明每人给力资一元。我刚才已带此八人到小东门外铁路边，见张之乐的尸体浸在水沟里，我们即移到干地方，并将两手的绑索解掉，唯全身都已浸透。当即买了一些钱纸烧了并要此八人在尸首旁轮流看守，再就是计划装殓。”

冬日天气短，临黄昏时，余福庭安排人力先将买到的棺材抬到小东门城门洞内，然后用木板将之乐尸体抬来。余福庭又买了很多钱纸在尸体边作揖焚烧。此时，我感到一阵阵的心酸，眼泪如串珠般的夺眶滚出，于是站在尸首前默念：畏三！你今天不

幸遭到反动分子张国权的暗害而牺牲，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此仇誓必要报，责任在我们后死者身上，你可瞑目九泉了！我默念毕，向他的遗体行三鞠躬礼，随即与几位老乡一齐动手将他的遗体抬起。当他的头被抬起时，额上的弹口流出血来，在场的一位老乡说。这是他见到亲人才流血，他已把陈先生当亲人了，于是我仔细看看他的头部，敌人是从后脑打了两枪，左额有一弹的出口，右额一弹尚在脑内，从额角看得出弹头。原系平卧，血未流尽，及至抬动，头稍翘起，余血自然溢出。所谓见亲人流血，纯系迷信。将遗体放上木板，抬到小东门城门洞内，即把全身湿衣脱光，擦干身上水迹，换好准备好的干净衣服，即时入殓。我将棺材盖盖上，不要钉钉，以便他的家人来时重新装殓。入殓完毕，即决定暂将灵柩厝于附近的某寺内，所有手续，由余福庭办理。

我知道张之乐有个表弟（今已忘其姓名）在汉口某处工作，他不久前曾来看过之乐。次日，我即找他来到旅社，告以之乐遇害的经过，请他带着我的信即日回乡，要张家迅速来亲人将灵柩运回（后来，张家用竹牌将灵柩运回，安葬于红安），至此我为同志，为朋友尽了一片孤诣苦心，正是全始全终地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对得起死者，也对得起死者的亲属，公谊私情，自问可告无愧。

在此事件中，还发生一个动人心弦的小插曲。那就是张国权一再向王履平问起我的情况时，王履平能毫无犹豫地为我说了一通假话，掩盖了我的真相。他与张国权系武汉中学同学，一直工作在外。我与他的交情并不算深，但在初交时，却一见如故，相处颇洽。我在县时的情况，他很清楚，虽非我们的同志，而他在我们的同志当中却很多关系，一般人对他都都有好感，并极接近，他又是个头脑清醒熟谙世事的人，当时我的名字刚改不久，他就能习惯地记在心上，看他与张国权的话中，对我的情况能急中生

智，确有根据似地说得那样圆通，使张国权深信不疑，这就说明他的为人，具有对亲疏真假关系显然不同的态度，对事，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处处慎重细心，且能沉着随机应变，因而又使我想到这件事，他如果不具有这样的感情和智慧，当时与张国权不用多谈，只要道出原名，那天小东门外的牺牲者就不是张之乐了。事后想到我当时生死之间，仅一发之隔，其能不免于死者，是无他，人为之减年。（注：大革命时期我在黄安算是个露头角的人，而在八里区活动次数多，在该区举行的几次群众大会上演过讲，虽一直未见过张国权，估计他会熟悉我的原名的。）

陈 勇 整理

回忆先父李健侯斡旋国共地方关系 的一次活动

李修鲁

1942年9月到1943年5月，先父李健侯曾困居黄安县南八里乡李家垸故里。当时，八里乡一带有三方面的军队活动。一是共产党方面的新四军，二是国民党方面的游击队，三是日本方面的皇伪军。三方面的军队互相警戒，或我来你往，或你来他往，都不能在这一带长期驻留。三种军队中，以新四军的军纪最好，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游击队的军纪有好有坏，但不乱杀人；皇伪军的军纪最坏，每次来到乡村时，奸掳烧杀，无恶不作，百姓恨之入骨。

1942年9月的一天，新四军所属某部来到我村，大约上午10时左右，一位青年军官来到我家（他的警卫站在大门外），询问先父下落。先父当即答称：“我就是李健侯。”来人自我介绍说：“我叫程坦。”先父早已听别人谈到过程坦的名字，知道他是新四军部队中的一位领导人，这时听了程的自我介绍，就立即请程到正室就坐，并命我泡茶敬客。我端茶敬客时，只听到先父和程正在谈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情况，我不便在旁聆听，就走开了。这一次先父和程的谈话时间甚久。午餐时候，先父留程用餐，程婉辞而去。

程去后，先父命我把我的表兄周长安找来。周是我母亲娘家的侄儿，读过几年私塾，当时正在乡间经营小店，但也常在我家

帮忙做些杂事。周来后，先父对他说：“我有一封信，想请你把它送到东山（指鄂东行署所在地黄冈五广祠一带）面交程总指挥，信要藏在较秘密的地方，你要快去快回。”周持信后，邀集了几个做小生意的伙伴，就到东山去了。

事后我才知道，程坦这次到我家来访问先父，除了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外，还因他了解到先父和程汝怀有很密切的交情，所以请先父来斡旋鄂东游击队和新四军鄂东部队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先父这次要请我的周表兄来送信呢？这就必须要补充说明一些情况。

1938年时，先父任军令部总务厅第三处处长。武汉沦陷前，他因劳累过度，肺病突然复发，咯血不止，卧床不起，因此未能随部西迁重庆。1942年1月，先祖父兰亭公在黄安故里病危，先父乃扶病返故里探亲。不久，先祖父逝世。3月，先父拟到黄冈五广祠（当时鄂东游击队总部所在地）访问老友程汝怀。程汝怀与先父是同乡，又同日在武昌参加辛亥首义学生军，后同住保定军校、陆军大学，私交至笃。程比先父大两岁，先父病居汉口，程常暗中派人联系，并予以周济。所以先父这次趁回乡的机会，拟亲至黄冈访程。但这时先父身体仍很虚弱，身边需人照料，而我当时又在本村村办学校任教，不能随侍，所以先父请表兄随同前往。

先父这次在程处居住约半年之久，其间旧病复发一次，颇赖周表兄的照料。正因周表兄熟悉去五广祠的道路，又为程所认识，故先父请周送信与程。

先父信中的主要内容是：当前抗日时期，大敌当前，国共军队应该密切合作，避免摩擦，共同抗击侵略军。周表兄将信面交程汝怀手后，程当时未表态，只令人安排周的住宿。次日，程对周表兄说：“来信我已看了，但我不必回信。你回去对你姑父说，我知道了这件事。”周便立即赶回李家垸，将情况告诉了先父。

当时国共名义上是共同抗日，实际上蒋介石是想消灭共产党的。鄂东游击队隶属五战区李宗仁指挥，李也是反共的。程汝怀看了先父的信后，内心里是赞成先父的意见的。1945年先父到重庆后，与程常见面，程向先父说明了这一点，但他不能形之于笔墨。就在先父写信给程后不久，程便因“反共不力”而被撤职。先父的一封斡旋信，不能说对程没有一定的影响。

何为嘉 整理

前 言

1941年冬至1942年4月，担任国民党黄安县长的主度，当地老百姓都说他是冒名顶替的。至今了解红安历史的老人们还异口同声地说，当时担任黄安县县长的王度是假“王度”。那么真王度是谁？假王度是怎样冒名顶替的？追溯历史，一位年近八十岁的老人王树华，向后人揭开了真假“王度”之谜。

真 假 王 度

王树华

真假“王度”系叔伯兄弟，均系红安县杏花乡王祥畈人。

我的堂兄王明鸿，号思吾，学名王度，生于1901年。王度的父亲系前清秀才，中过举，张之洞督鄂时，他曾在总督府当贴写。清王朝覆灭，民国初年，他任过四川省会理县知事，一任告老后寄居汉口。王度幼时靠祖母抚养，少年时期便进入县立小学读书，1913年考入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王度虽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但在武汉中学期间，他思想进步，学习刻苦认真，每逢节假日回家，常与农民接触，了解农民的疾苦，同他们交朋友。遇到乡间有欺压农民的不平之事，他总主动出面为农民鸣不平。武汉中学毕业后，王度考入汉口医学院学习外科。医学院毕业，他经常来往于武汉、黄安之间，替人治病。我曾亲眼见到，我们垸有一个小孩，放牛时被牛角触破卵包，睾丸脱出，经王度做手术几天就愈合了。还有一个水肿病，腹胀似孕妇，终日不能进食，生命危在旦夕。王度根据病人的病情，他先用一空心铝管插入病人的腹内，抽出腹腔浊水一脸盆，再开一处方进

行药物治疗，一个月后，病人腹消，慢慢病愈身体康复，因此，王度在当地很有名气。

1924年，王度在武汉由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初，董必武派王度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短期受训。黄埔军校分校受训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北伐军驻武汉某团任团部书记职。春节回家，王度对我说，上级指示，急待北伐，我们部队正在抓紧操练。操练时非常艰苦，每天战士们背着枪跑步六、七华里路，还要练习射击、刺杀等。战士们虽然很疲惫，但为了北伐的胜利，人人精神抖擞，没有叫苦叫难。约半年时间，王度所在的北伐军某团改编。1925年暑期，董必武同志派黄安的学生回县搞革命活动，王度和同学们一起回黄安，同王鉴、雷轰（雷绍全）等人参加了黄安党小组，他还担任了东乡政府农协主席。

王度在黄安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就我所知做了如下一些事情。

一、成立农妇协会，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东乡政府设在十里红花村净瓶山顶的庙内。净瓶山顶北高南低，整个形状如一头睡狮，狮头向天，文昌阁如狮鼻，双亭矗立如狮的双目，庙前面的大殿，其形状如狮子向天张口，俗称“笑天狮子”。庙堂建在险峻的山崖上，东乡政府负责人王度、杨志道、郭开汉、王明楷、郭秀山等同志就以此庙为据点开展革命活动。他们经常到各村宣传、发动群众，培养革命骨干，建立农妇协会。1929年农历正月，县东乡建立了杨家榨、王祥畈、郭受九等三个农民协会和三个妇女协会，东乡受剥削压迫的农民纷纷要求参加农妇协会，至二月间农妇协会会员人数达到六百多人。我记得王祥畈农妇协会领导人是：农会主席王明沿，组织委员王明泳、王明堂，宣传委员王明楷、王启东，纠察委员王启远、王明宗。妇女协会主席王桂枝，组织委员李芝姐，宣传委员马意姐，纠察委员江青芝、陈五弟等。

农妇协会成立后，王度等东乡政府负责人便到各妇协会召开会议，发动群众揭发当地土豪劣绅的罪行。以此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在群众中蓬勃地开展起来。1926年4月，王家田垸的群众揭发欧紫卿与县城官吏勾结，欺压老百姓以及在当地无恶不作的罪行后，王度便派百罗耿家垸的纠察班长耿显禄（农民，现年八十一岁，现还健在）带领纠察员，将欧紫卿抓起来，带到东乡政府。次日，王度在净瓶山下的开阔地，召开全乡群众大会，批斗劣绅欧紫卿。批斗后将欧紫卿带到各垸游行示众。王度还到郭受九农会主持批斗大土豪郭云峰。

二、建立农会武装。为了惩治土豪劣绅，1926年夏，王度在杨家榨、王祥畈、郭受九三村农会中，选拔出身好，年轻体壮，思想进步的成员成立农民义勇队。王度兼任军事教官，精明强干的王明楷、王明典、郭开汉担任义勇队队长，王启海（现还健在，年龄八十一岁）任担架队长。

为了解决农民武装的武器问题，1926年秋，王度在王祥畈垸办起了简易的兵工厂。他动员王启定、王启端、王五爷、苏老大、王明楷等三十多个能工巧匠，日夜研制来复枪、土炮、炸弹。1927年4月上旬，成功地制造出来复枪三十支，大枪八支，土炮四门，大刀和长矛各五百多把。4月10日，东乡政府在净瓶山下向农民义勇队发枪，发枪那天人心振奋，义勇队员唱着“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土劣、军阀和列强……”的歌曲，并当场进行列队、射击、刺杀等操练。

三、创办列宁小学。当时农村的办学形式主要是私塾和族学两种，教材内容是“四书”、“五经”，学生接受的是封建道德伦理观念的教育。为了改变教育现状，培养革命后代，王度选择王祥畈王氏祠堂，创办了一所列宁小学。校长王度，教员王启科，教材是在县劝学所订购的思想健康、科学性强的课本，王度还自编了工农课本作为补充教材。学校成立了儿童团和宣传队，

儿童团长王明仁，宣传队长王德华（女）。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各垅宣传革命道理。我也参加了宣传队，有一首展望美好前景的儿歌我还完整地记得，内容是：“青的山，绿的水，灿烂的乾坤。鲜的衣，美的食，玲珑的楼阁，工农们，联合起来！为美好的世界奋斗！”

四、1927年3月，黄安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成立，王度任委员。4月初，他参加了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在教场岗召开审判土豪王介仁、王仕显、袁鹤山、张英廷、阮纯青、恶棍石黑子的大会。教场岗非常热闹，全城工、农、商、学、兵都参加了审判会，我当时在县立第一小学读书，我们学生列队站在审判台跟前，当审判袁鹤山时，我看到王度在台上历数袁鹤山罪状十余条，台上袁鹤山俯首颤抖，台下群众激愤万分，审判委员会当即将袁鹤山处以死刑。

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使国民党当局和土豪劣绅们大为惊恐。1927年底，国民党十二军任应岐部队同还乡团以及土豪劣绅镇压黄安革命运动。1927年12月，十二军闻其林师长带领三百余人，伙同还乡团里的段紫卿、王启书，捉拿王度和其他革命同志。12月20日，王度同农会干部王明寿、会员王明良、王启海、小学教员王藩等三十二名革命群众不幸被捕。被捕后闻其林先用尽各种酷刑，审讯王度，要他交代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和地下党员名单，他严守党的秘密。闻其林后又用劝降的办法，王度始终坚贞不屈。1927年农历冬月29日下午，敌人将他杀害在县城西门外，被害时年仅二十五岁。王度牺牲后，其妻郑先娣在十里郭受九垅的山坡下也被段紫卿、王启书抓住。段、王二人毒打她，逼她交代哪些人是地下共产党员，郑先娣满腔仇恨，怒斥他们杀害共产党员，杀害无辜老百姓的罪行，终被他们毒打致死。

1941年至1942年间，国民党黄安县的县长名噪正

度，也是十里王祥畈人。当时，黄安县城周围的群众都说这个王度是假的，是冒名顶替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王度是我叔伯哥哥，解放前他在蕲春、黄安任职时，我一直跟他在一起，情况我比较清楚，其真象是这样的：

假王度的真名叫王明德，生于1903年。其父亲在王祥畈经营小杂货店，由于他经营有方，生意日渐兴隆，家庭生活为小康水平。王明德自幼与叔伯哥哥王度（王明鸿）一起在县立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他的父亲不重视读书，想留他在家和他一起做生意。父亲常对他说，世上只有挑着箩筐找谷的，没有挑箩筐找字的。王明德不听父训，抱定读书深造的志向，于1919年到武汉，考入启黄中学。王明德在启黄中学学习期间，他父亲这个靠小本经营起家的小商人，惜钱如命。不供给他的学费和生活费，虽经他学习之余做点临时工获取微薄的收入，终不能支付最低的生活费用而被迫中途退学。退学不久，他又与王度一起考入了汉口中西医院学中医，学成之后，靠给人治病维持生活。

兄王度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之后，王明德在武汉试图报考法政专科学校继续深造。可是法政专科学校的招生条件要中学毕业生，并要求持毕业证报考。王明德在启黄中学，中途退学没有报考资格。当时，他想到兄王度是武汉中学毕业的，借用王度的毕业文凭最恰当，于是他找到汉口生成里王度的家，向王度的继母述明报考法政专科学校的情况，商借王度武汉中学的毕业证，并说只凭毕业证去报个名，用后一定归还。王明德持王度的毕业证考入了法政专科学校。武汉中学毕业证上填写的是学名“王度”，自此，“王度”的名字一直被王明德顶替。

王明德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黄冈县担任国民党团风镇的区长，不久调国民党黄冈县政府任民政指导员、保甲指导员等职。王明德年轻聪敏，办事干练，深得上司赏识，在黄冈县干的时间不长，便升任国民党湖北省民政厅秘书。黄绍竑主

鄂时，又调他到省政府搞秘书。1938年武汉沦陷，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迁至恩施。1939年，王明德曾代表湖北省政府远从恩施来鄂东视察，途经黄冈县辖的大别山区黄土岭至鄂东行署所在地黄安县，与行署专员程汝怀商谈抗日事宜。同时请求行署留他在敌人的据点周围率领军民，打击和消灭敌人，为驱除日军效力。鄂东行署同意他的请求，并电告省政府批准，当即派到蕲春县，任国民党蕲春县县长。从王明德在蕲春任职起我就一直跟随他，他当县长时将我安排在县政府建设科当技师。王明德到任后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该县漕河区经常遭驻县城日寇的烧杀抢掠，他亲率县自卫队数次伏击，狠狠打击日军，使日军不敢离城对县北进行骚扰了；二是采取了一些措施，禁食毒害人民身心健康的鸦片烟，三是镇压趁火打劫在山区活动猖獗的土匪。1941年，王明德调任国民党黄安县县长，我随他一起来到黄安县，仍在县政府建设科搞技师。王明德在黄安当县长，仍以抗日为重任，为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制定裁减枪款，减免有些税收的决定。特别是不顾个人前途，冒着上司降罪的危险，草拟别动队罪行的罪状，向五战区司令部告发，并亲自在七里坪，镇压了别动队大队长杜桂芳为首的危害抗日，坑害老百姓的十二名罪大恶极分子。

王明德在黄安任职至1942年4月。据国民党湖北省党政军联合督导检阅团第三分团团员工作报告表（民国31年3月13日）记载：民国31年2月25日夜，县府被共军千余袭陷，县长王度退移西张店，各机关印信、文卷等，仅县府兵团部及税局携出，余均被毁，职员大部被俘或外匿。县长王度脱险后，即往署请示，乞今未回。现由兵团部副团长黄志勤（新受训归）率同科员陈仲儒，皆在河南经扶（新县）县城设立临时办事处，收容自卫队七十人，枪约五十支，待机报复，故一切政治均陷于停顿。3月10日晨，黄副团长志勤，即率员兵随国军进至西张店，徐图前进回县。

督导摘要：查该县王度于事变后，径往行署请示，截至考察时止，已半月有余，尚未回县，并闻有请假逗留罗田之说，适国军挺进，未能随往办理善后，系将情形电告行署查办。

根据督导团的报告，1942年4月，国民党鄂东行署撤销了王明德黄安县县长的职务。

全国解放以后，王度（王明鸿）的遗孤王世纪及全家享受烈属待遇。但是，文革期间，一些不了解历史的人误认为王度（王明鸿）便是抗战时曾任过国民党黄安县县长的王度（王明德），王世纪因此受到株连而挨整，烈属被取消。

其实，王明德解放后因曾担任过国民党政界重职而被逮捕入狱，进行劳动改造，后假释回十里王祥畈，以替人治病为生。假释期间，十里夏店卫生所医生反映，王明德改造时不老实，于是，又被县公安局重新收监，送至汉西蔡甸砖瓦窑继续劳动改造。约四、五年时间，他病故在该地。

王文金 整理

日伪黄安县政府简况

何治卿

我是上新集镇李氏畈村人。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新五师负责搞敌伪情报工作，长期活动在日伪黄安县政府所在地河口镇（今大悟县辖）周围。因此，日伪县政府的建立，组织情况，以及军事设施等方面，我都有些了解。

一、日伪维持会

1938年秋黄安沦陷。安宋（黄安至宋埠）、安河（黄安至河口）公路沿线日军据点林立，河口镇就是日军的据点之一。日寇一进入河口镇，先是在河口、上新集镇周围抢劫财物，屠杀老百姓，奸污妇女，无恶不作。如在桥头北大塘角一家小店，一次枪杀躲避在店内的国民党伤兵十多人；桥店麻沟村一新婚妇女，路经河西公路时，被日军枪击而亡；一次日军奸污了韭菜园西袁家畈村一妇女，后又用刺刀捅其下身而惨死，其兽行真叫人惨不忍睹。因此，河口、上新集镇一带的老百姓离乡背井，躲避在外。

老百姓跑光了，日军在当地立足也就很难了。为了达到长期侵占我大好河山的目的，日军网罗一些游手好闲的人成立维持会，并利用维持会召集外避的老百姓回家。1938年底，维持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韩氏祠。维持会会长韩子钊（上新集镇韩家垸人，此人少年时上过几年私塾。1934年随远房叔父到黄梅县搞党务、办事员等），秘书雷伯奇，外勤何耀高，成员有：韩志全（戴家垸人）吴铁子（吴家垸人）、黄青山（黄家港垸人）等十多人。1939年春，韩子钊为了扩大势力，勾结河口镇一些不务正业的人，成立了维持会。会址仍然在韩氏祠，会长韩子钊，成员有：罗伯华、罗炎斋、李云青、朱成先、朱子尧、韩瑞生、韩先

梅、涂子敬、刘耀富、魏金福和一个绰号叫海底豹的等十多人。

二、日伪县政府

1939年秋，日伪湖北省省长叶鹏派一个叫徐尚觉的到黄安组建日伪黄安县政府。徐尚觉一到黄安，便将原来的日伪维持总会改为县筹备会。县筹备会就县政府设在何处和谁当县长的问题通过一段时间酝酿，县城区署的耿玉华、唐香陶、占以庄等人提议将县政府设在黄安县城；河口区署以韩子钊为首的一伙人坚持将县政府设在河口，他们的目的都是想利用自己势力范围的优势来争当县长。省特派员徐尚觉认为，河口镇地处黄安、黄陂、礼山（今大悟县）三县交界处，是战略要地，决定将县政府设在河口镇。在县长人选的问题上，日伪湖北省省长叶鹏派徐尚觉到黄安来筹建日伪县政府的主要意图，是想让徐尚觉担任县长。而日本警备司令官藤田、宣抚班辅导官竹田力举维持会会长韩子钊当县长。因为韩子钊经常给日本人提供情报，深得日本人的信任，最后还是韩子钊登上了县长的宝座。

1939年2月，日伪黄安县政府正式成立，县址在河口镇。县政府内设：内政、财政、建设、教育、产业、宣传、会计、庶务等八个科。日伪县政府县长韩子钊，秘书韩瑞生，写字员戴宗礼、许伯珩、韩志全，财务科长罗炎斋，会计罗玉书，民政科长先后由罗伯华、朱成先、许伯珩等担任，教育科长先后由姚泽新、胡在山、韩先梅等担任，韩先梅还兼河口镇中、小学校长。情报室主任朱子尧，情报长张家怀，侦探人员有，韩青山、张全兵、曾月香、武吉祥、严世玉、李道行、刘镜波、海底豹（绰号）等，传达室黄伟衡、侯怀清。

三、日伪保安队

日伪县政府成立以后，县长韩子钊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成

立了日伪保安队。保安队开始成立时是一个中队，中队长涂子敬。中队下设三个分队，分队长分别由刘耀富、戴先明、江开堂三人担任。为了扩充力量，1941年县政府又大量向地方抽丁，将原来的中队扩编为一个大队，大队部开始设在河口镇，后来迁至上新集镇。大队长由县长韩子钊兼任，大队副涂子敬，秘书戴修月，教练官金昭珠（此人是北伐战争时期的军官）。大队下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刘耀富，第二中队中队长江开堂，第三中队中队长戴先明。中队下面又编有分队，分队长分别是：韩志桃、韩华清、何存良、刘宗年、汪炳均、吴祖谋、徐开烈、徐宗学等人。同年又增编了一个特务中队，特务中队长由第三中队队长戴先明担任，徐永斌接任第三中队队长。第一中队驻黄安县城，第二中队驻河口镇，第三中队驻夏店（现大悟县辖）。

四、日伪警察局

为了扑灭黄安人民的抗日烈焰，日伪县政府紧接着组建了日伪警察局。警察局长魏金福，科长李云青，秘书季×，巡官杨忠、曾昭益、熊仲书、熊×。警察局士兵二百多人，只有十余条枪。巡官中，有一位不知名的熊×是受我新五师派遣，打入日伪警察局内部搞情报工作的。有一次警察局抓了新五师的三个人，当日深夜，巡官熊×乘看守和哨兵不备，偷偷放跑了这三个人。后来这件事被日伪军发现，结果地下工作人员熊×惨遭日伪军的杀害。警察局的士兵主要是放门哨，巡逻街道，此外还经常在河口镇周围骚扰捉人。1943年，河口镇附近的李氏畈、鲁家田、陈家垸、田家垸、杨家畈、梁家河、孟家港子等村常遭警察局士兵的骚扰。他们不仅抢劫财物、烧毁房屋，还以通新四军的罪名杀害不少无辜老百姓。

五、区署和分所

日伪县政府将所辖地区划为三个区署，即河口区署、县城区

署、桃花区署。河口区署区长先后由彭少波、戴越、李道益、何国保担任；县城区署区长先后由耿玉华、唐香陶、占以庄、方慕韩、刘耀富担任；桃花区署区长先后由陈光钦、马厚斌担任。区署下设分所，其它区署下设的分所我不清楚，河口区署下设七个分所，一分所所长先后由韩继学、雷伯奇、曾昭燕担任，辖刀背岭以南、血成坳、仙人洞、黄才畈以南地区；二分所所长田忠员（此人任职时间不长就被日伪军以通共产党、新四军的罪名杀害），后由刘天铎担任，辖刘家集、沙河以南地区；三分所所长先后由孟臭庖（绰号）、刘世义担任，辖北门岗、李家集以北地区；四分所所长赵学忠，辖桥店、姜牌店以西地区；五分所所长王少山，辖区被抗日民主政府占驻；六分所所长冯正楷，辖西林乡以北、河汉乡一部分地区；七分所所长周玉龙，辖区被抗日民主政府占驻。

六、军事设施——碉堡

日军在据点周围修有很多碉堡。如新寺岗、高店、河口至县城公路的冯受二垸，河口至黄陂公路的柳林店、龟山（现属黄陂县辖）到宣化店的公路旁，以及刀背岭均修有碉堡。1943年4月的一天深夜，我新四军第一军区将刀背岭碉堡里的十二个日伪军击毙了十一个，并将刀背岭上的碉堡摧毁。

日伪县政府周围也修有很多碉堡，据我所知，张家榨后山、叉路、破寨、朱家畈、上新集、曾家垸祠堂后山、横山、花园等处都修有碉堡。碉堡的周围挖有战壕，筑有土城，土城上安有铁丝网。碉堡里常年驻有日伪保安队，有时还有日本兵配合防守。日伪军修筑碉堡，将周围的大树都砍光，还拆毁了不少的民房。如到夏店去的公路一带，有的成整垸的房屋拆光，老百姓只好流离失所，避难在外。

王文金 整理

国民党黄安县行政干部训练所

方映东口述 潘祖贻撰稿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在和平谈判的烟幕下，加紧部署全面内战。蒋介石一方面将一百六十万正规军调集到进攻各解放区的前线，一方面强调行政要配合军事。适应内战的需要，国民党地方政府办起了行政干部训练所。

同年6月1日，我从国民党青年远征军二〇四师（四川万县）复员，国民党湖北省行政干部训练团的负责人指派我到黄安县行政干部训练所担任中尉区队长职务。

训练所设在县城东面约一公里地的张家垸郭氏祠（现属杏花乡）。县长聂国鼎兼任该所的名誉校长，所长王清溪，教育长王清溪兼。县训所下设总务、教导、军训三个股和一个中队。总务股长曹隆璋（檀树岗人），教导股长张之芬、邓晴舫，军训股长程远（檀树人，国民党中校官），中队长由军训股长程远兼。中队下辖四个区队：第一区队长周松珊（七里人），第二区队长吴建国（二程人），第三区队长吴昌启（二程人），第四区队长方映东（七里人）。

学员是全县各乡、保的行政人员，平均每保有一个人，每期学员二百余人（多数是各保的户籍干事），生活费由他们所在的乡、保负担。每期受训的时间为两个月，即一个月学习，一个月实习。

当时开设的课程有：政治、财务、户籍三门。政治教材以“三民主义”为主，兼学时事；财务主要学习会计、出纳等业务知识；户籍是按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和北平宣布

实行法西斯的警管区制和特种户口登记制，实行敌伪统治时期的国民身份证制等要求，学员学习编写户口。当时，在农村以自然村为单位，把二十户左右人家编为一个小甲，实行“五家连坐”，五家连坐是国民党控制老百姓与共产党接触的一种极其毒辣的办法，即五家联名保证不通共产党，如果有一家犯罪，其他几家要受株连，五家都要一起坐牢。受训期间，学员每天除在课堂上课外，还要在课外搞四个小时的军事训练，提高学员的政治军事素质。县训所不仅对学员进行业务和军事教育，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每批受训的学员中发展一批国民党员。发展国民党员主要由教育长王清溪负责考察、审查、批准，因为王清溪是国民党军统局系统的人。据我记忆，县训所开办一年来，发展国民党员一百多人。

一九四六年秋，蒋介石又发起第二次全国十万知识青年的从军运动，县府对征兵一事非常重视。当时县里没有设置专门的兵役机构。过去，国民党征兵主要靠乡、保完成。这次的青年从军，不属乡、保征兵范畴，因此，国民党黄安县政府责成县训所办理这一事宜。县训所由教育长王清溪专管征兵一事。我记得当年征兵布告上写着青年军服役期限为三年，服役期满取得预备军官资格，发给退伍证，享受四项优待：一、愿意入军校深造的可以保送；二、志愿升文科学校读书的，可以免试免费保送入学；三、入伍前有职业的，退伍后级别与工资各提升一级；四、无职业的，退伍后政府安排就业。招兵布告贴出后，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很大，一些低级别、低工资的工教人员、失业青年、失学学生纷纷报名应征，很短的时间内，全县有一百五十多人报名参加青年军。我记得，当时我们七里区的有高德风、郑建宏、曹隆兴、熊术仁、潘祖贻等人。

湖北应征入伍的青年，编入青年军二〇六师，驻地在河南省洛阳的西工，并在信阳设有兵站。县训所派我护送入伍青年至信

阳兵站办理交接手续。临行前县训所在现在的杏花乡张家垸村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县长聂回鹄在会上致词，县训所长王清溪对入伍青年提出了要求，入伍青年代表在会上讲了话，县政府财政科长发给每人金元券二百元作路费。1946年农历冬月中旬，天下着大雪，我带领全体人员，从县城出发，顶风冒雪，徒步经占店、觅儿到黄陂县。在黄陂县车站，我雇了几辆大卡车，将他们运到汉口大智门车站。在武汉，我找到“铁路军运指挥部”负责调拨车厢的上校课长方万纲（七里檀树人），通过他搞到两节车厢，将全体人员运到河南信阳。我和青年们一路上风餐露宿，跋涉奔波，可是来到信阳，原设兵站因接兵满员完成任务而撤掉。我按县训所交代的将青年军送到信阳就算完成任务，我没有同兵站办理交接手续，甩掉了一百五十多人，只身返回黄陂。后来听说这批青年是徒步到洛阳青年军驻地的。

我自1946年6月到县训所，直到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南下，县训所解散，我便回家务农。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 在黄安三圣庵联合中学的活动

李述治

一、联合中学的诞生。

1941年的黄安县，除县城和沿公路的桃花店、冯受二两点为日伪盘踞外，县境内东面有鄂豫边区民主政府设置的安麻抗日民主政府，西南边设置陂安南抗日民主政府，这些地方成为新五师抗日根据地，并建立了抗日区乡政权和抗日学校。国民党县政府和县大队以及国民党鄂东游击队李九皋的十六纵队，蜂集于黄安的县北和河南省的经扶（新县）以及黄安与麻城接壤的紫云区。为了发展教育，培养抗日骨干，国共两党以国共合作抗日的名义，在紫云区三圣庵创办了一所联合中学。这是县北唯一的一所学校，男女学生有二百一十多人，分四个班，教职员共二十四人，其中民主人士占半数，共产党员有董觉生、余达三、董贤荫等三人，左派人士有陈琪生（人称黄安的鲁迅）、李业仁、陈哲如等五人，国民党党员有李保民等四人。

二、开展抗日活动。

紫云区山大人稀田地少，加上国民党游击十六纵队和县大队长期驻扎活动在这一带，当时粮食奇缺。师生的生活是：早餐大米粥，中餐和晚餐不是大麦米饭就是小麦煮豌豆。没有碾脱皮的大

麦米，麦皮刺口，难得下咽，大米还得上七里坪，或经扶县去买。这两处距离学校都有近四十华里的路程，没有运输工具，完全是靠师生肩挑背驮运到学校。当时最大的问题是食盐短缺，师生常常几天甚至十几天吃不到食盐，一个个腿脚酸软，面黄肌瘦，生活苦到不能再苦的程度。但是，学生没有因此而闹情绪，没有因此而流动。他们除了坚持学习文化和军事训练外，还积极开展唱革命歌曲的活动。每天《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以及“十恨”、“五更寒”等歌声回荡在校园。周末还演文明戏，内容百分之八十是中共党组织授意陈琪生、李业仁等人编写的。如“打连响”。

1、想当年，岳武穆，抗金兵，保卫祖国，留得英名千古传，闹嗨嗨，嗨，一支莲花，哎呀！嗨嗨莲花落哟。

2、看今朝，平型关，我军民，围歼日寇，只杀得坂垣师团全完蛋。闹嗨嗨，嗨，一支莲花，哎呀！一支莲花儿落哟。

……，

对口词合唱：

学生男（白）：同胞们，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日寇铁蹄践踏祖国的土地？

学生女（白）：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日本兵枪杀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

学生男：国家仇，民族恨，我们不能容忍！

学生女：我们是炎黄子孙，要拿出中国人的骨气。

学生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学生女：拿起刀枪，杀敌！杀敌！（作刺杀姿势）

学生男：没有悲伤，没有眼泪，只有满腔怒火！

学生女：对！对！对！

合唱《难童曲》：啼哭有什么用呀？参加了抗日军，赶走了日本鬼子，才是我们难童的光荣。

他们自编的这些节目，每逢节假日就到周围村镇演出。1942年10月10日，三圣庵联合中学的学生在七里坪演出时，由于演出的内容触犯了国民党县长蒋荣平，结果文艺演出队的领队陈琪生老师被蒋荣平当场逮捕。师生宣传抗日，反遭县府抓捕，学生极为不满，纷纷涌向县政府，蒋荣平通过审查内容抓不到把柄，又出自众怒的压力，不得不将陈老师放出来。

当时，学校订有《新华月报》和《挺进报》，这些报纸是共产党办的，不能公开阅读。但是，学生还是可以从黑板报上看到各地抗日胜利的消息。这些胜利消息激励着不少热血青年参加抗日学校学习和投奔抗日部队。1942年3月，教师陈哲如、学生钟方学等离开三圣庵，到皖南抗日师范学校任教和学习。

三、强迫师生集体加入国民党。

皖南事变后，1942年，国民党县政府担心学生被共产党赤化。县党部书记长刘作为亲自带领一批国民党骨干分子到三圣庵联合中学，以统一战线的名义，强迫学生集体加入国民党。有的不愿意填写入党表，他们就按名单照写，算作国民党员，并在学校设立区党分部。从此学生的公开活动受到限制。

大家对国民党县党部强迫师生入党很不服气，当时，中共党组织暗示学生既要加强两党合作，又要注意策略，一致抗日。时过不久，在学校的学习园地里公开出现了两幅画，一幅为大风吹松树，叶动而干不动；一幅为斜月照柏树，影斜而树正。寓意为：根深不怕风摇动，树正何愁月影斜。这表示进步学生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不满和不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

四、共产党员被迫离校。

1943年7月，国民党县政府为了便于控制三圣庵联合中学而

断然作出决定。一是学校由王圣庵迁至七里坪西的秦氏祠，二是撤除校长董觉生的职务。他们企图用迁校、撤职来消沉学生的抗日意志，把学生争取过来。共产党员董觉生、余达三、董贤荫被迫相继离开学校。

董觉生在离校之前向进步学生作了交待，并给李业仁老师留赠了两句诗：

“匣中雄剑今由昔，其赖光芒销铄何。”

这两句诗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壮志未酬的遗憾。

后来李业仁在回忆录中写道：“老C、P董校长是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

五、痛打流氓。

1944年7月，县长蒋荣平见调换的校长邓仁槎不起作用，又调国民党游击十六纵队特派室主任钟象乾担任校长，后勤人员全部是钟的亲信。九月中旬的一天，学生借克扣灯油，影响学习为由，就寝前大家公开议论，有的谩骂，有的讽刺。学校军事教官方癸东（钟象乾的内弟）出面干涉，辱骂学生。寝室内，不知是谁突然熄灭了灯，怒喝：“打！”一时拳脚交加，把方癸东痛打一顿。钟象乾知道此事后，连夜召开会议，要清查凶手，开除学生。教师陈琪生、张云鹏、李业仁等挺身而出，为学生辩护，并揭露事务处种种弊端，把矛头指向学校。加上黑夜无灯，不知谁是凶手，钟象乾无法，只好不了了之。

钟象乾担任校长以后，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出入学校，一天，有一个兵痞（后来才知道是乡队长）明目张胆地调戏女学生，一群男生见后一涌而上，举拳便打，兵痞见势不妙，灰溜溜地跑掉。当天，陈琪生老师在三年级上课时板书：“流氓+小偷=警察”，李业仁老师在黑板报上写了这样一幅对联：“狐狸妖

精打臭屁，何足害怕；青年学子气如虹，不必心惊。”

六、出版进步刊物《云峰》。

1945年春，由李业仁老师主编，学生彭常贵、李美中、吴昌松等当助手，油印出版进步刊物《云峰》。印出的刊物除内部人员中发行外，吴昌松、彭常贵、李美中等还乘黑夜在七里坪街头巷尾、公共场所张贴。甚至从门缝中塞进反动人物之家。一次吴昌松从门缝中塞刊物，被吴恕之发现（吴恕之系国民党黄安县政府要员），吴大发雷霆，责骂吴昌松不该把新四军的东西乱送。幸吴昌松与吴恕之是同宗，且吴昌松的父亲与吴恕之有交情，才避免了一场大祸。

《云峰》前后出了六期，其内容是，一是摘抄《观察》、《新民晚报》、《罗宾汉报》中的新闻轶事，二是自编自写的儿歌、民谣、旧体诗、对口相声。几十年来，详细内容无法记述，只有几首旧体诗我还没有忘记。

（一）咏天台山八景之一“天池”

太子洞前咏天池，

叮冬泉水惹神思；

何时梦得江郎笔，

要写陶潜武陵诗。

（二）悼西门河白骨堆

西门河畔白骨堆，

漠漠黄沙芳草萎；

是非功过凭谁问，

人间自有钟子期。

（三）吊沈崇

消息传来吊沈崇，

四亿神州失笑容；

金甌已缺风飘絮，
西湖歌舞影朦胧。
狼犬满街称盛世，
哀鸣遍野庆年丰，
红旗漫卷西风日，
也效尧虞殛回凶。

（四）眼亮心要明

三、五小日本，盘踞我县城，
公路通河口，愁煞过路人。
行商跨公路，吓得冷汗淋，
“国军”过公路，不敢把头伸。
草绳当毒蛇，草木当成兵，
奉劝同志们，眼亮心要明。
莫害恐日病，团结向前进，
齐心又协力，打败小日本。

（五）民谣“城内肥丘八”

南北两头设关卡，
城内肥丘八。
小商顿足哭，
居民泪巴巴，
日本鬼子他不打，
只管自己杀。

七、烈士遗作。

刘邓大军战略转移后，国民党还乡团，千方百计搜捕共产党员，《云峰》刊物的主编李业仁老师的得力助手彭常贵，于1947年10月被七里区乡警队长刘思仁亲手杀害，时年十九岁。录彭常贵刊载在《云峰》第四期的遗作《伤别》诗一首作为纪念。

昨读《石壕^史》，又看《兵车行》，
史诗成现实，悲古又伤今。
保长抓壮丁，专门整穷人，
亲人被抓走，地暗天又昏。
白发嚎啕哭，红妆泪潸潸，
手足伤离别，长亭依依情。
世道不公正，赤县夜难明，
洒洒祭雄杰，萧萧剑篋鸣。

王文金 整理

我的两次香港之行

程子菊口述 吴克仁撰稿

1986年8月，红安县政协副主席高宇，委员王子荫，鄂州市政协委员程惠彬、以及红安县实验小学老教师吴克仁等一行四人，前往武汉拜访商界老前辈程子菊先生。程子菊，红安县永河区椿树乡邹家堈人，现年八十三岁。解放前，任汉口市商会理事长，全国商会常务理事，全国工业会和全国纱厂联合会理监事，武昌第一纱厂总经理。省内外有他的财产和生意，美国等外国商人也同他有生意往来。他在湖北、四川、陕西、河南、湖南、北京、上海等省市的三十六家企业有股票和红利，共有房产一百六十栋。曾流传他的财富是：“湖北第一，全国第七”。程子菊先生同四位故友见面倍感亲切，真是故人相见话偏长，当及子菊先生兴致勃勃地叙述他解放前夕的两次香港之行。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其势锐不可挡，直下江南，逼近武汉。武汉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不知所措。而武汉人民却奔走相告，迎接武汉解放的到来，当时武汉的局势非常紧张。我是武汉市总商会理事长兼全国商会联合会常务理事，对武汉的紧张局势，广大人民的向往非常关心。一九四九年春节，我利用春节拜年之机，前赴国民党驻武汉华中“剿共”总司令白崇禧的司令部，了解白崇禧对武汉局势的看法和态度。我驱车至白总司令部时，适逢白崇禧与张治中将军正在计议局势的发展之事。经门卫通报，白司令的副官先说白司令在商谈大事，不接见任何人。我正准备驱车回时，白司令的副官复而说白司令要见我。我来到司令部，三人一起座谈。

白崇禧先对我讲述了张治中将军带来有利于国民党的大好消息，后询问武汉商场和纱厂工人的现状。我借此机会向白汇报了武汉市对时局的关心，人心的向往，希望白司令向全市市民讲清形势，顺民意而安定人心。白崇禧听后默不作声，未置可否。我看到白的态度严肃，谈话很不投机，感到进退两难。此时，我思想斗争很激烈，觉得自己身为商会理事长，不能顾及个人得失，必须顺应历史潮流，一切行动必须符合民意。于是，我毅然向白崇禧表示，建议白司令当机立断采取行动。白崇禧声色俱厉地质问，要采取什么行动？我坦率地回答，我们正在搞“五省和平促进会”，“湖北和平促进会”，“汉口和平促进会”，我们将代表全市市民呼吁和平，促进和平。此时，白崇禧态度略有好转。但仍一言不发，三人默默相对而坐，室内气氛沉寂。我即向白、张二人告别，一次不寻常的交谈就此结束。

三天后，我接到白崇禧的通知，通知内容是，党政军以及人民团体负责人，在汉口市参议会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到会的有华中剿共总司令白崇禧，国民党警备司令陈明仁，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主任袁雍，国民党汉口市市长徐会之，社会名流孔庚以及汉口商会理事等一百余人。大会由白崇禧亲自主持，他手拿一张红纸贴，首先说明这次会议是根据汉口商会程理事长的提议召开的。接着喋喋不休地大谈什么和平，战争，什么战争，和平问题。究竟白崇禧是主张和平还是战争？到会的人谁也猜不透。最后白崇禧希望大家发表意见。会上发言的先有社会名流孔庚和三轮车工会理事赵某。他俩的观点是主张战争，反对和平。他们的发言，当即博得白崇禧等一些人的掌声。开始，我摸不透白崇禧召开此会的意图，没有作发言的准备，会上我未发表意见。这时，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主任袁雍走到我的身边对我说，白司令希望程先生谈谈自己的看法。此时，我已觉察到这次会议是针对我同白的一次不投机的谈话而召开的，便借未作发言准备为由而谢绝发言。

接着武汉市市长徐会之来找我谈，这次会议是程先生提议召开的，因此，白总司令说程先生一定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此情况下，我挺身而出，走上讲台，首先恭维了白崇禧一番，然后如实讲出武汉人民迫切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心愿。我还打了一个比方说：过去赌博摇单双，人们不能透过瓷盅看骰子上的点，因而无法道出单双。可是现在全国的形势已经是一目了然。关于和平与战争的问题，白总司令应该顺应历史潮流，根据老百姓的意愿，在老百姓期待和平的时候，希望白总司令顾全大局，领导和平，将来老百姓需要战争的时候，再领导战争。这样，就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我的发言，也赢得一些人的掌声。此刻，我发现白崇禧的脸色由红变白，顿时大吼“散会”。

一周以后，在欢送武汉警备司令陈明仁离汉的大会上，党部主任袁雍公开大骂武汉商会是混帐王八蛋，我听后忍辱未作任何表示。我知道白崇禧对我上次的发言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也清楚地看到武汉的反动势力，在末日来临之时一定要作垂死挣扎。周围对我的压力越来越大，当时的形势对我极为不利。于是，我藉口病重避居万国医院，并于1949年1月底，离开武汉第一次赴香港。

同年4月，香港各报纸报道，政局急转直下，武汉即将解放，程子菊先生知道自己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共产党团结的对象，他热爱祖国，响应号召，并考虑到自己应对武汉市人民和武昌第一纱厂（现在的武汉国棉六厂）工人高度负责，应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于是毅然冒险回到了武汉。白崇禧从报纸上得知我已回到武汉，立即凭提纱单，命人持枪运走了商场棉纱三千余件，导致市场混乱，纱厂停工。为了恢复市场的正常交易和维持纱厂工人的生活，我不惜拿出了自己的全部财产，积极同有关方面洽谈签约，但由于白崇禧多方面设置障碍和作梗，终难挽回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从香港返回武汉期间，白崇禧即派出武装便衣人员，与其说对我进行保护，不如说是对我进行监视，当时，我的处境极为艰险。每当我想起自己历尽千辛万苦创办起来的武昌第一纱厂停工，工人无法生活时，心情特别沉重。而白崇禧设置的重重障碍又使我一筹莫展。我进一步认清了我对白崇禧等一伙的无比仇恨。一次，我见到新任的国民党汉口市市长晏勋甫，我即要求晏市长帮忙我找白崇禧，请他撤走保护我的武装便衣人员。我和晏市长谈话的情况立即被武装便衣人员侦悉，并电告白崇禧。白崇禧下令对我要进一步进行严密监视，不能让我跑掉。情况万分危急，怎么办，值此关键时刻，市长晏勋甫当机立断，速将我拉上他的小轿车。轿车一起动，超道高速先来到璇宫饭店，甩掉了监视我的武装便衣，脱离了险境。白崇禧闻讯后，一面派出军警追捕，一面下令全国通缉我，当时全国各报载有通缉程子菊的通缉令。可是迟了，我已于1949年7月，在友人的帮助下，路经上海，第二次去了香港。我一到达香港，香港报刊马上登出题为《决不会上共产党的当的人——聪明的程子菊先生》的文章，以为我害怕全国解放而逃离武汉，避居香港。居住在重庆的友人也纷纷写信劝告我，不要再回武汉，否则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对于这些“好心”劝驾的人，我的回答是，我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事业，我忘不了武昌第一纱厂，我决不会置祖国的前途，自己的事业而不顾，避居香港，苟且偷生的。在香港期间，我向英国购买了一套机器，当时买这套机器也有一番斗争。国民党湖北省省主席何成浚想把提货单搞到手，为了将机器交给祖国人民，我拿出了四百两黄金，通过各种关系，同外商接洽，才将提货单搞到手。正值此时，武汉解放了。国民党政权彻底崩溃，白崇禧一伙也狼狈逃窜。共产党对武昌第一纱厂和纱厂工人非常关心，首先，想方设法让纱厂恢复生产，生产恢复正常后，又狠抓了质量和信誉，因此赢得了消费者的好评。消息很快传到了香

港。我听到这些消息，真是由衷的喜悦，我决定迅速返回武汉，重整纱厂，发展生产，为祖国和人民作贡献。1949年底，中共中南局商业部部长曾传六同志写信到香港，欢迎我回武汉。我收到信以后，几个夜晚彻夜未眠，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收拾好一切，秘密携带提货单，于1950年初，第二次从香港回到武汉。我一回到武汉，就将购买机器的提货单交给了国家轻工业部。后来轻工业部运回了这套机器，仅运费就花了十二个亿（解放初期的人民币一万元等于现在的人民币一元，十二个亿就是十二万元）。可见，这套机器的数量之多，价值之大，就不言而喻了。

程子菊先生同我们交谈长达四个多小时，仍兴味未减，情真语切，感慨万千。程子菊先生说，我由衷地感谢中国共产党。第一，是共产党把我的孩子教育成人。我有八个孩子，在解放前，孩子们生活在我那拥有大量财富的家庭，定成为纨绔子弟。而解放后，我的孩子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都成为祖国的建设人才，其中六个是工程师。第二，十年动乱期间，是党保护了我，使我没有受到冲击。第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问题得到了平反，现在享受了原武昌第一纱厂总经理退休的待遇，使我老两口得以安度晚年。现在我虽然到了八十多岁，但身体还很健康。我家祖孙三代同堂，生活过得很幸福。

听了程子菊先生的一番话，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程子菊先生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党和人民，热爱自己的事业的人。他一生致力于发展轻工业生产，解放前，他投资兴建武昌第一纱厂，而且将纱厂生产搞得有声有色，为武汉轻工业战线之楷模。在避居香港期间，他不惜个人的资财，购买机器，交给祖国人民。程子菊先生不畏权势，在时局动荡之时，他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不顾个人的安危，顶风冒险，为实现和平呼吁，为纱厂的生产，工人的生活奔走。全国解放以后，他怀着建设祖国为人民作贡献的满腔热情毅然从香港返回武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将

自己的武昌第一纱厂进行了公私合营。为了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85年，他一次购买国库券九万元。程子菊先生热心公益事业，同年，他捐款给武汉儿童福利基金会，为发展儿童的福利事业作出了贡献。程子菊先生最后说，我现在人虽然老了，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还要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中华的经济腾飞，人民的康乐，竭尽全力，作出新的贡献，用以感谢共产党对我和我全家的关怀。

王文金 整理

三圣庵中学董觉生校长就职和离职内幕

吴克仁 李述治

1990年4月下旬，原三圣庵中学教师张仁鹍和训育员李业仁专程从武汉回红安，告诉我当年董校长就职和离职内幕。现将两位老师讲话整理如下。

就 职 内 幕

1938年春，侵华日机轰炸黄安县城，黄安中学被迫停办，大部分学生失学在家，有的流落在外，这时教育界的知名人士王文锦、陈祺生、高耕南等既惋惜青年失学，又耽心误入歧途，遂联名向当时黄安县长李愈友请愿，要求复建黄安中学，深受李愈友赞赏。李即备文呈请鄂东行署，得到行署专员程汝怀的支持，并通知李愈友去面商具体事宜。通过面商，决定复建校址于紫云区丛山中的三圣庵，建校经费由县田粮税开支，确定校名为湖北省立联合中学鄂东分校黄安分部，这些都取得一致意见。唯校长人选，程汝怀、李愈友各执己见。程指定刘作舟、邓云槎两人中选一，李则坚持校长一职董觉生最为适宜。其理由是：非常时期作为校长必须得到各方面支持，并陈述当时日寇占驻县城，县境内东、西、南都是新四军五师组建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觉生系董必武胞弟，任校长会得到新五师的支持。觉生现任县教育局长，其人有组织和领导能力，在县内知名人士中有威望。最后，程汝怀同意了，董觉生得以就职三圣庵中学校长。愈友力荐觉生出任校长除上述理由外，也含有其他原因。1936年12月，李愈友收到同窗好友董

必武发自征途中一封信，信后附律诗二首，录其中一首：“行军难望楚云遮，救国无能早破家。兄弟常离音问少，友朋相隔路途赊。乡时乡梓须贤宰，难世儿童应有爸。我似断蓬随处转，又从秦岭入山巴。”董必武同志把教育家乡青年的希望寄托在李愈友身上。1938年9月，董觉生受职履行校长职责，在经费、人力不足的偏僻山区，组织人劈山建校。短短的四个多月时间，建成每个能容纳60多人的教室四个以及师生宿舍、办公室和厨房等，还添置五个班的课桌椅。这段时间，他吃住山中，夜以继日地为建校而奔波忙碌。次年正月，黄安、黄陂、礼山（大悟）、麻城、经扶（河南新县）五县失学青年来校就读。

离 职 内 幕

1942年春，国共虽然经过谈判，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但在黄安县内，两党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有一天，双方的部队在紫云区的江朝二发生战斗，国民党县大队队长吴隆才被打死，该部溃散。驻扎在三圣庵附近新场的黄安县政府及所属机关行政人员北逃经扶。学校依旧照常上课，当时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全校师生近三百人，全吃公购米（由县政府拔单据至乡保强购米，米折价作田亩捐）。无钱买不进米，每日食油、盐、蔬菜及自习灯油、办公用品，无钱买不到，经费从何而来？时间长达四个多月，当时我们一、二届的毕业生，平均年龄在二十岁左右，都拚命学习知识，对学校经费来源虽然担心，但无人探询议论，至于外人如何猜测不得而知。直到今年四月，我当时的班主任张仁鹏老师，才向我讲述了当年的秘密。他说，“在江朝二战斗打响的前夕，新五师栗在山旅长写信给董觉生，希望董校长维持正常教学秩序。事后又送来边币三千四百多元（当时边币一元兑换法币三元）。钱由会计李俊干秘密接收（李系董觉生内兄）。当时知其事的只有董觉生、余达三、董贤荫、李俊干、张仁鹏等五

人，是这笔钱维持四个多月的师生生活。”我才恍然大悟。

1942年夏末，流亡经扶的县政府，迁回七里坪，不久县长王度离职，继任县长的是广西部队某团的副团长蒋荣平。蒋对董觉生深怀疑忌，撤除了他的校长职务，并派人秘密监视，同时令三圣庵中学限期迁校于七里坪西的秦氏祠。觉生知蒋不怀好意，遂不辞而别，避居麻城县的深山中。临行前给战友李业仁留赠离别诗一首。其中有“匣中宝剑今犹昔，其奈光芒销铄何？”叹其满怀壮志，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董觉生去后，余达三、张仁鹏等亦相继离校。

陈勇 整理

李同兴铜货铺秘密为红军运枪枝弹药

李同兴铜货铺秘密为红军运枪枝弹药

李同兴铜货铺，平素以经营铜器为主，因时局关系，生意日渐萧条。李同兴铜货铺主人李庆亭，为维持生计，特在汉口长堤街广益桥开设“李同兴”铜货铺，并秘密为红军做了大量工作。为不忘前辈人的革命精神，就我所知道的现述述如后。

1927年黄麻起义以后，黄安军民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反扑，致使新生的革命力量只好转移到黄陂木兰山一带继续坚持斗争。当时，由于工农革命军刚建立不久，又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与封锁，造成革命军的给养十分困难，特别是枪枝弹药很难搞到。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二大队九十二团党代表江竹青（高桥余家田人），带领部队在木兰山一带活动。我的家在洪界山脚下的李家洼，距离木兰山很近。因此，他常到我们李家洼来发动群众，筹划部队的给养。1928年的夏秋之际，江竹青派工农革命军搞后勤供应的参谋主任石健民和特务队的李伯林、占学道、李大旺、李大明等到汉口“李同兴”铜货铺找到我的父亲，商量以铜货铺为据点，秘密购买军火运往红安，以解决红军急需。我当时在铜货铺协助父亲经营。我的父亲李庆亭，别名玉成，1882年出生在红安县觅儿寺镇李家洼，兄弟三人他最小。自幼家境贫寒，十三岁那年到汉口丹桂后湖在族人李炳兴化铜炉作坊当学徒，一年后转到汉口长堤街万寿桥“任谦太”铜货铺当学徒九年。我父亲十年学得制造铜器一身好手艺，便于1906年在长堤街广益桥自己创办“李同兴”铜货铺。经过他二十余年的苦心经营，铜货铺在广益桥一带颇有名气。人称我父亲为“三老板”。经过石健民、李伯林等人反复密商，决定从三方面搞枪枝弹药。一是在汉口日本租界、买办洋行，向流氓、开酒

我的母亲、哥哥（朝辉），秘密洽购德式三八枪、各类手枪和子弹，都是在汉阳兵工厂修械处，联络工人偷取武器零件、弹药，用以自制步枪、子弹等；三是在国民党四十八师、中三师留守处，秘密活动采办各类型长短枪支、子弹等。经我父亲的多方努力，采办了不少军火，有的直接以汉口转运回红安交汪竹青，有的藏于店内，慢慢转运。

当时，我母亲徐登莲和我的胞妹李达顺在老家李家巷居住。党代表汪竹青和特务大队吴汉成及吴信卿、熊学习、高志敏、吴国纠、周继显及我母亲的侄儿徐冀魁等革命同志，经常深夜到李家巷、芝麻岭（属黄陂）找我的母亲和族兄李大旺，相约同往汉口李同兴锡货铺内将枪支弹药秘密运回红安。因此我母亲常常往返于汉口与红安之间，有时是浑身裹着手枪和子弹，有时是用食品花盒作伪装，密运子弹和短枪；有时是把整捆的罗墩纸（迷信用火纸）中间挖空，将子弹和长枪拆卸后藏在罗墩纸内，或用夹板纸把子弹夹在纸中，予以运送。我母亲去汉大都是步行，回来改乘轿子，以显示“三老板”家属的“尊贵”，实际上轿子中藏有子弹和枪支。总之以各种办法瞒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检查，将枪支弹药送回黄陂亲自交给汪竹青、石健民或吴汉成手里。1927年至1930年几年中，我父亲在汉口通过以上三条渠道，一次次的采办枪支弹药，我母亲不辞劳苦往返红安至汉口，一回回把枪支弹药运回黄陂，供给红军使用，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县安我记得到还有一件事情，1928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军队里有一班四散逃兵冲过洪界山，撞住我的表兄徐显国做向导出黄安县。徐显国把他们带至黄陂，在姜家垅搞到了便衣和路费，留下四条长枪、16发子弹，他们四人开了小差。徐显国趁夜深人静，将枪弹带至我家，并与我母亲、妹妹达顺一起将枪弹埋藏。后来告诉了汪竹青、吴汉成，他们派人将这里埋藏的枪弹取走了。

在办军火中也出过事。……

李同兴铜货铺隔壁有一家藤器店。一次刚进了许多藤条，店里不慎引起了火灾。“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藤器店烧光不说，把我家铺面也烧、打了许多，偏偏把楼板烧坏了，隐藏在里面短枪没有来得及转移暴露出来，为此，我父亲被汉口警察总局侦缉大队逮捕。经过同乡和铜货帮工会的多方担保，方才出狱。为避风险，我父遂将店名“李同兴”改为“兴泰昌”，继续以办铜业作坊为名，坚持秘密备办军火。

1929年冬，先父又采办了一些军火，准备从水路运出，事没办妥，被湖北省水上警察局稽查队以“密运子弹”为由，将先父再次逮捕月余，经同办人李大明等多方设法营救方才出狱。

1930年3月，我父亲又弄得一批枪弹，并与人商妥，雇了一条打渔船将武器从汉口运出。当我父亲派人将枪弹运到汉口刘家庙上首菜园里时，被国民党水上警察局侦缉队和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拦住，抄收了军火，同时将运送枪弹的革命同志李伯林逮捕。第二天拂晓，这两支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来到广益桥，堵住了“兴泰昌”店门，警察从邻居的晒台上翻进我家，将我父亲再次捕走。我和司帐遭到伪警察的恶打，逼交枪弹。自先父被伪警察架走以后，“兴泰昌”铜货铺随着倒闭了。伪警备司令部还登报通缉密办军火的同办人李大明、黄兴发等。

1930年农历闰六月十四日，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屠杀我革命同志40多人。40多名革命同志都是挺着胸、昂着头，高喊：“共产党万岁，万万岁”而壮烈牺牲。其中，黄安县委领导的特务队的李伯林同志，牺牲在武昌保安门外。就在这一天，我的父亲李庆亭也被伪警察绑至汉口三元里和记蛋厂门口马路中心处，以“坐办军火、密运武器弹药拥护红军、共产党”的罪名，用大刀将我父亲杀害，时年48岁。

何为嘉 整理

注：李大清，曾任李家洼村小学教师，已故。

龙文光驾机首袭黄安县城

盛 星 辉

1930年4月16日晨，国民党的一架执行通讯任务的教练机，从武汉飞往河南开封执行通讯任务。归途中，由于油料耗尽，加之雾太大，突然遇上高山，再往前飞就会机毁人亡，想拉起来又不及，最后被迫降落在我根据地大别山区离宣化店西南三十多华里的陈家河。驾驶员龙文光，四川人，年龄三十岁。

飞机刚一降落，驻扎在附近的红四军手枪队同群众几乎同时赶到了。飞机降落在一块放牛的草滩上，这块地方被牛踩得比较硬，所以飞机的轮子只陷下了一半。人们老远就看到飞机是一架银灰色的双引擎飞机，机尾有青天白日的标志，机身不长，飞机降落时螺旋桨还在转动，驾驶员头戴航空帽，身穿红不红、紫不紫的美制航空服，正慌慌张张地直朝东南方向拼命地跑。当时，红军手枪队队长钱均见状大喊：“快追，要活的！”“站住、站住！再跑就要开枪啦！”队员们边追边喊，驾驶员边跑边回头看，最后自知难以逃脱，只好举起双手，当了俘虏。

那时，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包括一些红军战士，还不很懂得保密，国民党得知这一消息，就马上指示河南姚畈一带的地方武装分三路进攻，企图炸毁飞机，抢回驾驶员，我军和当地赤卫队员配合，击退了民团武装，俘获团丁数十人。但为了保护飞机不致落于敌手，有不少红军战士还献出了生命。

为了飞机的安全，红军和赤卫队把飞机的翅膀下掉，用几头牛和几十人拉着飞机，让飞行员龙文光骑着马，一直送到现河南新县的新集红军指挥部。经过教育，龙文光深受感动，表示愿为革

命效力，弃暗投明。这年，我军派往苏联学习机械和飞机导航的两位同志恰好回国。他们和龙文光一起很快地修好了这架飞机。

飞机修好后，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特地为这架飞机举行了隆重的命名仪式，徐总指挥给飞机命名为“列宁号”，并在飞机上漆上“列宁号”三个鲜红大字，由龙文光继续驾驶这架飞机。

1931年11月11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亲率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第十二师和十师三十团共8个团的兵力，由七里坪挥师南下，发动了著名的黄安战役。

当时，黄安守敌为国民党杂牌军赵冠英第六十九师，下辖2个旅4个团。其中，二〇六旅驻守黄安县城，赵冠英的师部就设在县城内的魁星楼。二〇七旅分驻环城一带。另配属六十九师指挥的敌三十师二〇七团，则分驻在城东南桃花、高桥一线，同时，赵冠英部的侧后还有4个师策应，即驻麻城之敌三十一师，驻宋埠之敌三十师，驻黄陂之敌三十三师，驻孝感之敌四十四师。这四个师与六十九师构成一个“山”字形。

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从“山”字头上开刀，采用“围城打援”战术，发动了黄安战役。经过一个多月战斗，红军大量歼灭了外援之敌，使黄安县城变成了一座孤城。红军总部定于12月22日对黄安守敌发起总攻，当时，敌六十九师赵冠英部被我国困在黄安县城，拒不投降，直接进攻已带来红军战士许多人员伤亡，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等人决定启用“列宁号”飞机来一次“实弹轰击”，以期起到更直接地震慑敌人、彻底瓦解敌人以破城的目的。

12月22日8时，陈昌浩搞来两枚迫击炮弹和龙文光一起驾着“列宁号”飞机，从新集机场起飞，飞往县城上空，这时，如“惊弓之鸟”的敌人以为是他们的主子派来了飞机，欣喜若狂地纷纷从城墙上、战壕里、营房中跑出来。有的拿着被单、有的拿着麻袋、有的拿着箩筐，准备接空投物质。当时敌人还在地上用成匹的布做成“七条”字，又在周围生起烟火，飞机给他们扔炸弹

西。谁知飞机在上空盘旋了几圈后，翅膀一抖，猛然向下俯冲，在敌司令部附近的魁星楼，几枚炸弹从天而降，爆炸声震动全城。“列宁号”飞机还撒下传单，传单上写着：“士兵们，你们都是受苦人，共产党领导革命，就是为你们，劝你们要认清形势！”“黄安五十会共了四十九会半，白区只有城里和王家畈。你们要听我们劝，跟赵瞎子（赵冠英）当炮灰，丢了生命不划算。赶快放下武器，莫跟他干。要回家给路费，要革命跟我们干……”。全城里的贪官污吏、豪绅地主、敌军都吓得魂不附体，他们知道红军有了飞机，城破在旦夕。红军趁敌军混乱之际，一举攻克黄安，结束了历时四十三天的黄安战役。这次战斗，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其中生俘近万人），缴获长短枪七千余支，迫击炮十门，电台一部。盘踞在城内的民团团总秦子卿及反动县长姚德安，参事长李香葵，议事长黄岚阳，自卫大队长王子豪等被生擒。国民党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当俘虏时还说：“你们哪来的飞机呀？”他不知道就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送来的“列宁号”飞机参战。这是红军的飞机在我军建军史上首次参战，为红军迅速攻克黄安城大显神威，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特殊光辉的一页。随着“列宁号”战绩不断扩大，名声越传越神，连敌人的《扫荡报》也惊呼：“共军飞机近日曾连续骚扰潢川、汉口等地，有关方面，须严加防范……”。

1931年7月，蒋介石对鄂豫皖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列宁号”转移了几个地方，终因战斗频繁，不得不卸开埋在偏僻山沟，国民党曾四处寻找，但一直没有找到。

陈 勇 整理

黄安县飞机场修建情况

徐绍国 口述 陈友良 撰稿

今红安县人民医院的院址，曾是原来我县的飞机场。我是县城南的老居民，曾亲睹了修建飞机场的情况。

1932年7月，由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遣30万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上当时根据地负责人张国焘顽固执行左倾冒险政策，致使鄂豫皖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向川陕边界转移。红安中心县所辖之4县27个区绝大部分沦入敌手。

当时，国民党30万重兵除一部分尾追红四方面军主力外，仍有十个师加两个旅的正规军和保安团、民团等数万地方反动武装继续在根据地进行“围剿”、“清剿”，并提出“民尽匪尽”的“清剿”方针和“血洗黄安”的口号，企图彻底消灭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尸横遍野，庐舍为墟。这期间，国民党对黄安的破坏，达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

国民党在血洗黄安的同时，湖北省政府于1932年11月，委派黄安人程汝怀充任鄂东专员公署（后改称湖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黄安县县长，以便加强对黄安的统治。程汝怀到职后，便将专员公署设在黄安县城（今公安局院内旧屋），亲自指挥地主武装配合国民党正规军“清剿”黄安。

在政治上，程汝怀严厉推行保甲制度，强化其统治。规定每10户为一甲，每10甲编为一保，保上设联保，联保之上设立

区公所。甲长、保长、联保主任、区长等职，均由还乡的豪绅、地主、恶霸充任。此时，全县划分为5个区，40个联保，588个保，5734个甲。

在军事上，程汝怀一是建立武装，成立了以王啸风为总队长、胡俊荪为副总队长的黄安县保安队，二是配合国民党正规军的“清剿”，大修碉堡。黄安县飞机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修建的。

1933年春，程汝怀决定要在县城外的南门畈一带修建飞机场。南门畈这里原是大片的旱地，地里种的小麦、花生、棉花等作物，也有些水田和不少的坟墓。在修建飞机场之前，县政府先通知各家把坟墓迁走，然后派保安司令部的队伍具体负责修建，所需民工由各区、联保派出。我记得保安队在修飞机场时，采取分块段修建的方法，先扯掉地里的棉花和其它庄稼，然后再挖四周的排水沟，削高填低，平整地面，前后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将飞机场修建成。当时，飞机场东到司姑洞，西至南门河，北达今红安商场，南临周胜垸河。当时飞机场虽修成，但是没有水泥跑道，地面也搞得很粗糙。修飞机场占用的耕地，没有土地费、麦苗费和坟墓的搬迁费，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人敢去要这些费用。我还记得县服务公司退休职工秦敬保家的祖坟，就是这次迁走的。

飞机场修起来后，名为飞机场，但实际上没有降落过飞机，仅作为部队练兵操场之用。

民国二十四年（1935）——二十五年（1936年）由四区专署在此召开了全区两届运动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湖北省第四区第一届运动会在黄安飞机场举行，当时参赛县有黄冈、黄安、黄陂、麻城、礼山，竞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兵乓球等，这次运动会上，黄安体育代表队，获得团体总分冠军，男子篮球冠军，女子排球冠军。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黄安体育队再次参加在飞机场举行的湖北省第四区第二届运动会，参赛县有黄冈、黄梅、黄陂、英山、浠水、蕲春、广济、麻城、罗田、礼山。黄安体育代表队在本次运动会上又获团体总分冠军、男子篮球冠军。

1936年，程汝怀接任第二区专员，公署便迁驻圻春。黄安县飞机场到解放前一直荒芜未用。到1963年，由湖北省林业厅和红安林业局投资，在红安原飞机场的基础上修建成一个林业专用机场，用“安Ⅱ型”双引擎飞机对马尾松进行洒药杀虫，为红安林业建设作出了贡献。

陈勇整理

日寇侵占黄安县城始末

邹丰盈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东占了上海、南京，北占了徐州。这时，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政府机关仍设在武汉。所以，武汉便成了日军进犯的主要目标。地处大别山南麓的黄安，距武汉只一百多公里，是武汉北面重要军事屏障，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日军进攻目标直指黄安。

一、敌机轮番轰炸县城

日军在侵占黄安县城之前，多次派飞机对县城进行轮番轰炸，致使城区内的各种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居民饱受了敌机轰炸的惊恐和灾难。据当时的目睹者之一吴克仁回忆：日军首次轰炸县城是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八日（即1938年8月1日）。这一天，十八架敌机轰炸武汉未遂，当天下午二点钟左右，敌机飞到黄安县城上空，从来没有见过飞机的老百姓们纷纷出门看稀奇。这时敌机突然投下一枚炸弹，正落在小北街秦永民的住房处（今县新华书店处），房屋炸了约四十多平方米的一个大坑。秦永民十四岁的弟弟秦永怀被炸死。这次被炸死的还有三人，炸伤二十多人，炸毁房屋十四栋。

国民党黄安县政府为防日机轰炸，便设立了一个防空哨。即在当时县政府东边的一棵大桑树上（今县公安局院内）挂一个大钟，每次日机一到黄陂，黄陂立刻打电话通知，防空哨马上敲钟报警，城内居民听到钟声迅速带上钱、田契、房契等贵重东西出

城，隐避于田畈荒野。日机开始一天轰炸一次，后来一天多次，有时轰炸后居民刚刚回城，敌机又来轰炸。从农历七月八日到九月五日近两个月的时间，敌机先后出动近百架次，投弹二百余枚，炸毁房屋五百余栋（吴克仁家的房屋就是八月中秋那天被炸的）。炸死炸伤城乡居民数十人，许多珍贵文物被炸毁。黄安县城到处是残垣断壁，呈现出一片荒凉惨景。

二、县城沦陷经过

经过近两个月的轰炸之后，日军便陆空并进，向黄安县城展开了全面进攻。民国二十七年九月初五（即1938年10月27日），驻宋埠、歧亭的日军龙川香受二师团三个陆战队和周村师团野炮队共约三千余人，沿（黄）安、宋（埠）公路进攻县城。当时，一路上日军坦克打头阵，后面紧跟着铁甲车、汽车、骑兵、步兵，空中有三架日机盘旋掩护，杀气腾腾地向县城方向扑来。日军到永河后，为防抗日军民的抵抗，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沿（黄）安、宋（埠）公路经永河、桃花、下店进攻县城，另一路则沿西北方向的山间小路进攻。从小路进攻的日军全是骑兵，大约五六百人，个个骑着高大的东洋马，经永河、汪河、熊家河、蔡家河、红花冲、青番龙、九宫店、鄢昌畈、鄢仲武，从侧翼进攻县城，两路日军于当天下午占领了县城。

日军占领县城后，除少数兵力驻县城外，将其大部分兵力分布在洗手盆、罗家田、王家垸等县城附近各乡村驻扎。从此，黄安县城处于日军的铁蹄蹂躏之下达七年之久。

三、日伪统治下的黄安县城

日本侵略军侵占黄安县城后，为巩固其统治，除建立各级傀

伪政权机构外(见《红安文史资料》第一辑),还在县城及其周围,设立据点,修筑工事,以推行法西斯统治。在军事上大搞“点线占领”。“点”即据点。日军在县城外围沿宋(埠)、河(口)公路的门前湾、永佳河、桃花、下店、冯受二、上新集等地,修筑碉堡工事,设立据点,由日军驻守,以控制黄安县城的外围。

在县城内,日军先后建有东门坡、上岗和鏢子山等据点。日军在黄安县城建立的第一个据点是东门坡(当时县城有东、西、南、北四门。东门即今朝阳巷十字路口处,西门即今县人民武装部处,南门即今县物资局处,北门即今北门岗处。城内以鼓楼今县中心百货商店处为中心,鼓楼以东为东街。由于县城遭日机轰炸,仅东门坡一带房屋幸存)。但日军驻扎不久,便调走了一部份,城内仅留有日军一个中队一百余人驻守。后来,日军又撤出东门坡,驻扎东门城外吊桥一带。到民国三十二年(即1943年),日军又撤到上岗(今红一中操场处)驻扎,并修建营房。大门口挂有用日文写的“松山部队石田队”的牌子。除驻有日军一个中队外,当时,日伪联络机构宣抚班也设在这个军营内。

日军在上岗驻扎期间,一直未放松对城东鏢子山防御工事的修建。据曾任过日军翻译的邹丰盈回忆:城东鏢子山是距县城最近的一个制高点,鏢子山东、西两头高,中间低,形似鏢子(鏢子即元宝。)。因此,该山得名鏢子山(今烈士陵园内)。日军只要占有鏢子山,方圆不到四平方公里的黄安县城就直接控制在日军的火力网内,同时,又因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经常活动于县城周围。为此,日军不惜民力,修筑鏢子山军事防御工事。

日军为修鏢子山防御工事所需民工人数,全由日伪区署分到各联保,再由各联保定期轮流摊派给百姓。据当时参加过修防御工事的耿良瑜同志回忆,他曾三次被摊派到鏢子山做苦力。日军为了防止民工逃跑,将民工分成三、五人一组,每组各有一个日本兵看守。民工从早到晚,挖壕沟、挑土、抬石。中午,日军才给

每人一顶干草笠，吃定后不准休息，强迫民工又接套手，如发现偷懒就息工，轻则打耳光，重则拳打脚踢，用皮鞭抽。秋良琦说他（当时就是因为拿耳罩换掉日本兵的拳头。工事的一些重要部位由日军自己修筑，不准民工靠近。做苦力的民工中，还有木匠、泥瓦匠和挑夫等。日军对待民工十分残暴。如县北刘世祥有位泥瓦匠就是被日军活活打死的。蜈蚣山因山高无水，日军所需之水全由民夫从山下挑上去。日军在饮用之前要民夫先饮一碗。在夏季天热时尚能忍受，但在冬季，冰水难以下咽，如不喝尽，日军就提着水桶灌。从开始动工修筑到完工，据日军自己统计，共用民工三百多万人。同时，修筑工事还需要大量木材。当时县城及其附近稍大一点的树全被日军砍光。寺庙、祠堂的栋梁也被拆卸一空。邹丰盈说，县城北面的王亮，当时有三棵又高又大，需两人合抱的枫树，当地人称之为“三柱香”。日军要锯这三棵树，叫我办理此事，但这件事十分棘手，王亮的人说这三棵树是神树，不准任何人动，但日军要我去砍，不去又不行。正在为难之时，我想起平时与日军接触中，发现许多士兵屁股后面都挂着一平方寸大的一个小包，里面包的有的是金牌、有的是绒布，上面标有“皇天”“神”等字样。我还发现有些士兵腰间系有一条约三尺长的白布，白布中间绣有日本国旗——太阳旗。国旗两边绣有“武运长久”字样，在布的两边有许多用丝线绣的各种图样。据日军自己讲，这是他们来中国打仗之前，他们的亲人或朋友在上面绣的，日本人叫它“千人针”，带上它是一种对远方亲人的怀念。我想到这些，我知道日本人也很信神，也念故土之情，于是我就去同日军小队长藤田说：“这是王亮的三棵神树，不能随便砍，而且我妹妹和姐夫也在王亮。望太君能把这三棵树留下。”藤田小队长说：“我们现在急需木材加强防御工事，既然这是三棵神树，又本是你亲人家，那就留下一棵，砍两棵。”王亮的两棵古树就是这样被砍的，锯断成木板运到蜈蚣山做了环形地道的盖板。

日军为了修筑防御工事，还到处拆民房、毁城墙、搞石料。邹丰盈回忆：日军每天强迫城内居民上百人去搬拆城墙上的青砖，从早上搬到下午，要来回搬一、二十趟。为防止民工逃跑或怠工，上工时，在每个人背后作个标记，到下午收工时凭标记发给每人一点盐，作为一天劳动的报酬。

日军为修裸子山防御工事，前后花费了四年多时间，给黄安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因劳累和惨遭毒打而死伤的人，经济上的损失都无法计算。

裸子山防御工事修建完工后，据守日军一个小队，约二十余人，小队长藤田。在裸子山修有一人多高，三尺宽的环山地下走道，走道上面全部用木板铺盖，然后再用沙土加厚加固掩盖，以防炮弹的轰击。沿环山地下走道，每隔三、五十米就设有一个射出掩体（即地堡）。地堡伪装得十分隐蔽，从外面根本看不见地堡的位置，而地堡里面则可以把外面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在地下走道内，日军还修有火药库。当时，日军主要驻扎在裸子山西头。在西边，日军挖有一洞作储藏室，洞的上方是日军的伙食房，洞的右边修一小平房，地面铺有苇席（日本人叫榻榻米）。日军小队长藤田就住在这里。在裸子山西侧山头，日军修有一座高二、三丈的碉堡，全都是搬的城墙砖石砌成，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供日军士兵夜晚住宿，上层为岗哨处，碉堡四周有许多射击口。

驻守裸子山的日军，因人数少，他们十分害怕抗日军民的轰击，又特在环裸子山腰设置了两道铁丝网，而且，在铁丝网上挂满了空罐头盒。并在每个盒内放置一些小石子，铁丝网一被触动，罐头盒就会发出响声，日军就会发现情况。为了威吓百姓，他们还在裸子山碉楼上面架着一根约二丈长的松树，外面用油布掩盖，远看象是一门大炮。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即1945年7月）一天夜晚，国民党黄安县长蒋荣昭率两个自卫大队的人由七里坪出发乘黑夜攻襄县

城，日军凭借坚固工事与县自卫大队展开激战。自卫大队从北门攻入城内。由于河口、宋埠的日军得知消息，分乘汽车增兵县城，自卫大队才返回七里坪，这次袭击虽未占领县城，但对日军打击很大。

四、实行毒化、奴化政策

日军为了欺骗群众，达到长期奴役中国人民的罪恶目的，在政治上实行“以华制华”，大肆推行毒化、奴化政策。

邹丰盈、叶秀芳回忆：民国三十三年（即1944年），日军在县城东门坡处，搭起了一个戏台，拼凑了一个楚剧班子，利用演戏之机进行奴化宣传。当时戏班由徐少清（八里人）、李少奎、董哈巴（新洲人）、谢明炎（艺名谢小花）、何玉山（黄陂人）等十余人组成。戏本有《郭丁香》、《陈世美不认前妻》、《拷打红梅》、《平顶山》（又名《美女瓶》）、《方卿拜寿》等。戏演出时由赌博人出面招集，这些人多是与伪维持会有联系并且要维持会同意才能演出。如高桥蔡家田的钟四喜（活着鬼喜、死后人喜、外出家里喜、在家外面喜。爱吃鸦片烟），经常出面招集，唱赌博戏，从中坐收红利。当时前来看戏的除日军外，绝大部分是城乡百姓。在戏班开演的第一天，驻县城日军小队长藤田特从裸子山来到戏场向百姓训话，说什么“中日同种同文”、“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经济提携”、“建立东亚新秩序”等等。在教育方面，日军推行奴化教育。在日伪黄安县政府内设教育股，城区设有小学一所，但招生半年多，除少数敌伪子弟外，绝大部分居民的适龄儿童，宁可失学，也不愿去接受亡国奴教育。日军占领县城后，为强化社会治安，给城乡居民实行签发良民证，中国人进出城门，过日军岗哨时，必须脱帽，要向日军行九十度鞠躬礼，然后递上良民证，才被允许通行。如稍有怠

慢，轻则罚跪，重则挨耳光，拳打脚踢。罗以谋回忆：日军刚进县城时，他和在河口经商的杨介生准备从县城西门进城，因不晓得进门规矩，守门日军先脱光他俩的裤子，接着挨耳光，然后，要他们向日军敬礼，才允许他们穿上裤子。

日军除实行奴化政策外，还大批贩运烟土（即鸦片），毒害百姓。先以低价出售，引诱一些人吸烟，凡接近日军的就给鸦片。日军推行毒化政策，企图达到摧残黄安人民的身心健康，瓦解人们的斗志。

五、经济封锁和掠夺

日军武力占领黄安县城后，在经济上实行了严密封锁和大肆掠夺。他们在全县各地设立哨卡，对粮食、布匹、药品、食盐等物品实行禁运。如日军对食盐实行“统配”制度，城内居民凭“良民证”每人每日只能买到少得可怜的一点盐，而且食盐价格又很贵。日军买进时一斤盐仅需一角伍分日钞到二角日钞，但卖出要八角到一元日钞。因此，很多居民买不起盐。广大农村农民根本买不到盐。1939年春，日军又强迫百姓以粮换盐，当时粮和盐的比价是：每担稻谷换盐八斤，到后来食盐数量根本无法保证。据耿良瑜同志回忆：他曾提着大半篮子大麦（十多斤）到洗手盆换盐，日军只给了一把盐。他当时要求多给点，日军却甩了他一耳光。还有一次，他提着一满篮子红苕去换盐，沿途日兵一见红苕就抢，他慌忙抱着篮子往伙房跑，这次，日军不给盐，只给了他一瓶罐头酱豆。由此可见，日军对食盐控制是十分紧的。当时日军还在全县处处设卡，对过往商贾严密搜查。如民国三十二年四月六日，日军逮捕盐贩陈贤方，并对其实行酷刑，将盐灌入陈口中，强迫他吞下，吞完又灌，直至陈奄奄一息之时，又用刺刀剖其腹将陈杀害。又如同年十月八日，日军

拦路抢劫了经扶一商人布匹、瓷器十二车，该商人乘黑夜逃走才免遭其难。

日军为了“以战养战”，在占领区内大肆搜刮，掠夺物资，除供给本县所驻日军外，还大量运至武汉。据不完全统计，仅县城一带，日军在占领期间，共掠走粮食35116担，铜、铁、锡等各种金属8800多斤，猪、牛1200头，各种工具5400余件。此外，日军为烧木炭取暖，将城区周围数十里的树木砍伐一空。

六、县城日军投降始末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最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迫使日本天皇裕仁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农历8月，日本已宣布投降了，可是驻防裸子山的日军并不知道此事。据邹丰盈回忆：农历八月的一天，他当时正在日军小队长藤田处吃午饭，忽然进来两个枪上挂着白旗的日军士兵。他当时感到十分奇怪，心想日军怎么也挂起白旗了？那两个日本兵走近藤田说：“我们是驻守宋埠日军”。之后他们用日语谈了很多，其大意是天皇已下令停战。到这时，我才知道日本已宣布投降了。过了两天，藤田又找来那两个日本兵询问来时沿途情况。那两个士兵说他们是打着白旗从宋埠，经门前坑、永河、桃花、夏店过来的，沿途一路平安，没遇到什么情况。又过了两天，藤田叫我分别给国民党和共产党抗日游击队写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我们奉上司命令，特宣布停战、和平。”当时信写成后一式两份，分别送给国民党黄安县长蒋荣平和在觅儿一带打游击的共产党员江家生收。第二天，蒋荣平便派一个人来同我商议。约定双方第三天上午在城东大山岗谈判。到了第三天，日军小队长藤

田带上四个士兵和我一行六人步行到县城东大山岗。当时，蒋荣平早已带领约一班的人等候在那里。大山岗四周都埋伏着蒋荣平的人。蒋荣平见日军来了便说：“我们奉上级指示，要你们就地投降，放下武器！”这时，藤田小队长说：“我们也接到上级命令，要我们到黄陂集中，然后去武汉投降！”谈判后的第二天，藤田便带领驻裸子山的日军约二十余人，我也在一起，携带枪械，沿夏店、桃花、永河步行到宋埠，然后和宋埠的日军一同到武汉投降。日寇侵占黄安的历史从此结束。

陈 勇 整理

注：本文根据邹丰盈、耿良玲、吴克仁、程敬文、叶秀芳等人口述整理。

刘正理勒死日本兵

许元耀口述

说起刘正理勒死日本兵的事，太平桥一带年近六旬以上的人都知道，曾广为传颂。

刘正理是太平桥乡大路边村人，种田出身，靠自己勤扒苦做富了起来，便在大路边开设了一个杂货店，经营香蜡纸炮、糖果糕点和酒醋食盐等。杂货店紧靠大路，南来北往的行人，本乡本土的百姓，都跟他家有些生意来往。他家日子过得很好。刘正理头上长了几个癞痢，其貌不扬，但身体很壮，他不满足已获得的资产，凭着自己的能力又摆了一张屠凳，杀猪卖肉。经商十多年，他在小小的大路边可成了有名的小绅士。自日本人侵入中国，特别是1939年日本人侵占黄安县以后，刘正理见到、听到过日本人在中国奸掳烧杀干了不少坏事，他经历了生意日趋冷落萧条的苦闷，更尝到日本人一次次路过店门抢劫货物的苦果，他和其他百姓一样过着一日数惊，经常逃乱的生活。中国人民的日子被日本人扰得不得安宁。

1943年是中国人民坚持抗日的第六年。当时日本人占据了八里坨，把八里坨、太平桥一带划为日占区，虽是日占区但不是日本人的据点。据点在新洲李家集。在八里、太平桥一带既有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部队，又有国民党领导的游击队，在这里坚持抗日活动，我们金家田村就常有新四军来驻扎，给百姓极大的鼓舞，反日情绪一直很高。

1943年农历中秋节过后的一天，驻扎在新洲李家集的日

本人又出来打劫，经太平桥到八里坑，当天下午，这支日本人又返经太平桥。这天上午刘正理为避免日本人的抢掠，早饭后他把门关了，拿起套棍独自到平安栈附近几个村子去买猪。买猪的生意没谈好，在熟人家吃了午饭，挨到下午过半，估计日本人已经回李家集去了，便带着套棍过平安栈到黄地凹。他看到日本人骑马的、步行的大队人马都已过了太平桥。他走上大路时，发现一个日本兵背着背包，枪横放在背包上，走路一跛一跛的正在路上走，与大部队相距很远，正走在刘正理的前面。刘正理跟在这个日本兵的后面，磨磨蹭蹭，思绪万千，终于按捺不住心里渐渐升起的怒火。他见大批日本人已过了山沟，田畈里只剩下他和这个掉队的日本兵。他仍跟在日本兵的后边，边走边盘算，当走到太平桥附近时，刘正理凭着他杀猪的胆量和力气，举起套棍套住日本兵的脖子，一手拿套棍套住日本兵的脖子，一手握紧套棍绳头勒住日本兵的脖子，一直把日本兵勒死。他找来几个人，把这个日本兵的尸体弄到离太平桥远一点的王国栋村附近，然后在尸体上捆上石头，连人带枪一起沉入水底。

刘正理勒死日本兵时的情景，当时无人看到，把日本兵尸体沉入水底时很多人亲眼所见，并听他讲了勒死日本兵的经过。于是，“刘正理把日本兵勒死了”的消息不胫而走。百姓们高兴的说刘正理有胆量，有板眼，为我们出了一口气，百姓们也很耽心，日本人要来找掉队的日本兵，这也预示着灾难。

第二天，驻扎在李家集的日本人，再次沿路到太平桥一带寻找头一天打劫时掉队的一个日本兵。日占区的中国百姓见日本人要来之前，能跑的就跑，能躲的就躲，也有走不了的就把日本国的“膏药”旗子打出来，表示这个地方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在日占区的人都是好人、良民，是不会杀日本人的。我们金家田离大路边不远，见日本人要来，也作了一些准备：姑娘、妇女都钻到大阴沟里去躲着，青壮年男人躲到后面山上去了。坑里还推荐由许石

双（绰号跛老爷）出面，把日本人的旗子挂在堍子前面的界石上，由他守候在那里。我躲在自己的屋里，从门缝里向外窥视，见跛老爷坐了一个时辰，日本人也没去问他，跛老爷刚起身移步小便，正在这时，日本人打来一枪，子弹落在界石上，把界石打了一个窟窿，吓得跛老爷又回到原地守住旗子。日本人在大路边附近各村查过来找过去，似乎那个日本兵就是在这一带掉队失踪的，可是又找不到一点痕迹，查了半天也无结果，只好收兵。

箭楼堍（又叫李学孟岗）村里也有日本人在清查。李必全是这个堍的人，见日本人要来又躲不及，便搭了梯子，爬上了李香庭的屋顶，匍匐在屋脊边上。李香庭是个商户，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前三年，请了许多能工巧匠做一进三幢的青砖瓦屋，屋内雕龙画凤，屋顶上兽头高翘，十分壮观。刚刚竣工，日本人侵占了黄安，袁少奇以游击队的名义，先后三次白天企图抢占此屋都未能进去。李香庭还没有住过就把门锁了。日本人在箭楼堍的村前屋后都放了哨，村前哨兵站得近，把李必全搭的梯子搬了，村后的哨兵站得远，一眼发现屋脊上爬着一个人，便大声的哇啦一阵，许多日本人都看到了，示意要李必全下来。李必全被迫从屋上下来。日本人不由分辨，先是打，后来用刺刀捅，把李必全捅死后，放了一把火，把箭楼堍李香庭的屋化为灰烬。

何为嘉 整理

从享受抚恤金说起

彭德珍 口述

我的父亲彭华庭，是觅儿寺镇凤凰山村人，1891年出生，1957年7月8日病逝，终年66岁。

省领导人张体学同志得知我父亲彭华庭去逝的消息，感叹地对人说：“要不是得到彭先生的多次搭救，我们不知会出什么样的事情。”张体学省长亲自批准，花了一千元钱从武汉买了一具棺木送到觅儿，又派省政府的三名科长帮助料理丧事，父亲去逝以后，政府一直给我发抚恤金，每月四十元，我现在仍然享受这种待遇，党和政府的关怀，使我父亲含笑于九泉之下，我们后人也一直铭记在心。

我父亲小时候读过几年书，因家景贫寒，便休学了。1905年，他14岁，用两串铜钱做本，同乡邻一道推红车，从觅儿寺运棉纱等货到襄樊去卖，又从那里带回本地紧缺的日常生活用品，靠挑货郎担、摇波浪鼓叫卖，一趟生意往返行程上千里路，吃尽千辛万苦。父亲靠肩挑运输在家乡做了几年小生意。后来到襄樊从事小本经商，经他二十余年的勤奔苦做，逐渐富裕起来。1927年，父亲便筹备资金，安排家事，租赁房屋，联系有关事务，从襄樊搬到了武汉，在汉口小甲街开起了饭店。

父亲是受过苦的人，在做生意方面，本着便人利己的精神，常教育家人对顾客服务要热情周到，要经常照顾有困难之人，不论是大买卖还是小生意，无论是开张之时，还是生意做发以后，我家一直是这样待人接物，从而受到社会上的好评。从

30年代起，可算说是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在繁华闹市的武汉扎下了脚根，店堂有十六人吃饭，其中自家七人，雇请了九人。家底厚实了，门面扩大了，结交也就更广了。

在八年抗日期间，我20岁左右，就我所知，不论是共产党的部队还是国民党的军队，只要是积极抗日，平时又有往来的，凡上门求助者，我父亲总是慨然相帮，董必武、李先念、张体学等首长，对于我父亲极其信任，常出入我家吃饭、筹资，宣传革命。有时在饭店的后面召开秘密会议，我父亲不仅保守党和国家机密，掩护首长开展秘密工作，保护首长安全，而且经常捐献钱，支援抗日战争。

全国解放后，城乡上下开展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我全家人提心吊胆，我父亲更是坐卧不安，正当我们忧虑之际，董老、李先念、张体学等领导人来到我家，他们亲切地与我父亲交谈，宣传党的政策，动员说服我父亲将五大财产交给国家，参加公私合营做生意。我父亲及全家人铭感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深情厚意，毅然决然地将家中所积的金银、房屋等财物捐献给国家，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被定为开明地主。全家人不仅没受任何冲击，而且多次得到各级政府的表扬。我父亲还光荣地当上了省人民代表。为感谢党和政府的恩德，抗美援朝时，我父亲又捐献出一汽车洗脸用的毛巾，送到了朝鲜战场上。

徐念书·苏本友记录整理

注：彭德珍系家庭妇女，住觅儿镇。

从上铺坟山挖走日军尸体以后

李绍永 口述

至今，只要一提起日本人，我和老伴的心尖就突突地直跳，过好一阵子又咬牙切齿地恨。

我今年七十六岁，是觅儿镇座坡店附近李庆垸人，旧社会，父辈在座坡店小街的南头做了三间房子，全家人住此，除种田作地外，农闲做些肩挑货担和摆摊的小买卖。虽然谈不上富裕，但是，在日军入侵之前，日子过得还算安宁。

自日军侵占黄安后，我们就没有过个安宁日子。1944年7月中旬，国民党鄂东游击十六纵队李九皋部属袁少奇游击支队，在黄安新集与黄陂县交界的栗子园一带与日军作战，一天，在稻场垸打死了六个日本兵。7月18日，袁少奇派人将六具日本兵尸体抬着游行示众，从稻场垸一直抬到游击队自己驻扎地，即座坡店附近的叶家垸、游了十几里地。游后将六具日军尸体埋在叶家垸、许家田、李细垸三个村子交界的上铺坟山。

驻扎在新州县仓子埠的日军大队得知这一情报，很快派人带上两只警犬寻尸。路过阮家岗时，垸里有两个人坐在门前的石条上吃早饭，日军在离垸百米远的公路上望见有人，便放了一枪，全村人哄乱地跑反。日军进村放火烧了阮家岗的房屋后，又接着寻找日军尸体，两只警犬沿路嗅着东寻西找，将日军带到了上铺坟山。

日军从上铺坟山挖起六具尸体后，便进行野蛮的报复。从7月下旬至春节前后的半年多时间，硬是闹得这一带人人过乱、户

户遭殃。

7月21日，日本鬼子兵分两路，一路是三架飞机轰炸袁少奇支队驻扎地叶家田，飞机飞得很低。飞机轰炸后，叶家田、栗林岗的房屋全部被烧，李家楼也被烧了几家，李庆堃四十岁出头的半哑巴钟佑被炸死，座坡店的一口大石窖被炸毁。飞机走后，接着是一队日本兵凶神恶煞地来到座坡店。因人们见日本鬼子的飞机扫荡，已躲避了，日军找不到人，于是，见鸡就捉，见猪就杀，见房就烧，三四个垸子被烧得浓烟滚滚，烈火熊熊，从下午一直烧到第二天上午，我们座坡店二十多户人家的上百间房屋，除一吊沿户外，全部被烧得干干净净。22日下午，人们见日本鬼子走了，才纷纷赶回座坡店，但房烧屋倒，鸡犬无存，店不见了，人无家可归。妇女哭、小孩啼，一片惨景。

日本侵略军真是惨无人道，七月份用飞机轰炸，放火焚烧了座坡店一带，还不罢休。到腊月二十六日，一队日本兵又闯到了座坡店，直撵得鸡飞狗上墙。他们见被烧毁的房屋大多数重新盖起来了，又第二次纵火焚烧座坡店。刚刚建起的房屋，在一天之间，又被这伙鬼子烧毁得断垣残壁，变成了一片瓦砾场。

日本军两次火烧座坡店，我家深受其害，第一次烧毁的三间房屋，中间的两个山头都是木架，古皮隔扇，上面是木板楼、檀子、椽子都是杉木，更易着火，三间房屋变为灰烬，损失严重。我家的四只鸡，一头百多斤重的猪，他们也不放过，将鸡抢走，将猪打死，火烧油炸，吃得干干净净，他们还抢走了一担杂货，害得我们连做小生意的本钱也没有。第二次火烧座坡店是春节期间，我家新建起的房子被烧，一家人连安身的地方也没有，只好挤在一个临时搭起的棚子内，换了两斤黄豆的豆腐，割了一斤半肉哄哄小孩，算是过了一个年。

徐念书、苏本友记录整理

注：李绍永见儿镇座坡店村民

我所了解的袁宗国

徐达立 口述

袁宗国，1908年生，颍儿寺镇袁家畈人，他是国民党鄂东游击十六纵队司令李九皋的叔伯外甥。

1938年，30岁的袁宗国当上了游击纵队的中队长，保卫李九皋司令部，1939年，他又当上了特务大队长，仍是干保卫李九皋司令部的事。

那时，我是勤务兵，在袁宗国的手下，既听用，又替死。就我所知，他手下有三个连加上一个手枪排，约四百人。1942年部队收编，李九皋调到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去了，袁宗国的队伍编到刘达九司令的部队，袁宗国任一团三营营长，带四个连，500余人。

抗日战争时期，袁宗国对日本鬼子的侵略行为恨之入骨。抗战初期，敌强我弱，他经常下令便衣队摸打日军的岗哨，找岔子向日本维持会要钱要物。

记得1941年春节时，袁宗国的部队在本县永河驻扎，与住在永河丰山的一队日军对峙。一天早上，我同警卫部队几名队员化装成农民，有的挑柴卖米，有的提油瓶、挎篮子，有的拿锄头扁担，分头到永佳河镇上进行游击活动。不多时，看见三个日军从河西的丰山上下来搜查。我们几个人相互暗递眼色，等走到一个偏僻处，瞄准后面的日军放了一枪，将一名日军打倒在地，另两个日军一见，成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惊慌地往驻扎地

跑。我们的便衣队员秦敬亨跑上去，用杀猪刀剁下那个被打死了的日军的头，然后高高吊起示众。对此袁宗国十分满意，还要维持会送来7000元钱。

又有一次，我巧夺了一支日军枪。回到营地，他大为夸奖。事情是这样的：1944年春，我们部队驻扎在黄陂六指店附近的村子里，六指店住有日本兵。一天中午，我们八名便衣队员各自带着日本维持会发的“良民身份证”，腰插短枪，化装成农民，用分散而行，相互接应的办法往六指店走。我身高力大，胆壮不怕事，走在最前面，快到日军营寨时，瞄见一队日本兵围成圈吃午饭，四周围有不少小孩，他们象是看热闹似的。在人圈一丈多远的空坪上，支架有十几条长枪，一看便知是日军训练时用过的，我看着日本兵狼吞虎咽的抢着吃，又见周围有不少农民。我便若无其事地混在其中走到放枪的地方，趁日本兵没有防备，大胆地抓过一支枪就往东面走。走出一丈多远，日本兵才发现有人偷枪，当他们放下饭碗慌乱地拿枪追赶时，我已经跑出好几十丈远。日本兵不知底细，又知附近驻扎有共产党李先念的部队和国民党李九皋的军队，不敢来追，退缩回营去了，我们回到队部，袁宗国见我袭夺的是一支德国造的三八长枪，脸上露出了笑容。

1942年和1943年，我们营和刘司令的部队开到蕲春县漕河镇、广济县的武穴镇和浠水县城一带，与日本鬼子打过多次仗，一直打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1946年国民党裁军，袁宗国的部队拆散。他回到了家乡。

袁宗国识字不多，性子直，脾气暴躁，对部下要求严。1940年，我们的队伍扎在觅儿寺，他得知部下的两个小兵在外有抢劫奸掳行为，立即下令在镇南头的下坂，枪杀了这两个小兵。就我所知，他在七里亢（孟）家洼也杀了自己的一名士兵。1941年，他还杀了九连连长姚济元。姚济元是程汝怀总司令的侄女婿，自恃是程的亲戚，为非作歹，抢劫财物，奸污民女。袁营长得

知此事，捉住姚济元迅速枪杀了，事后，他找文书商议，公布了姚的五大罪状，程汝怀司令见此，也只好作罢。

袁宗国于1985年在袁家坂病逝。

徐念书、苏本友记录整理

注：徐达立，投诚起义人员，现住瓦儿寺镇

忆解放前我家支援革命的几件事

王兆麟

我是黄安县（今红安）七里坪夏畈村人。从1927年到全国解放，共产党的地方政府及其领导的游击部队一直活动在七里地区。1942年和1947年在国民党统治的险恶情况下，我家分别两次在经济上支援革命部队。

（一）

我家世代出身贫苦，祖父王明珠，在乡间教书，过着清苦的生活。我父亲王正身，是个佃农，种王锡九村王雪樵家的六斗二升田。我小时经常挨饿，捡谷捡麦，挖野菜采野果充饥。我大哥王兆祥（字述曾），自幼聪明，幼时曾跟祖父读过两年书，后因家贫而辍学，邻村教书先生黄伯邵感到可惜，便对他进行义务教学。几年后大哥文化大有长进，读完私塾又考取了武汉市湖北西路高等小学，公费就读至毕业。辛亥革命后，大哥任湖北财政司科员，并就读于江汉政法学校。1915年大哥赴北平考取知事，接着在陕西任过三任知事。1927年起，大哥脱离政界，在武汉市操律师业务。这一年，董必武任湖北省农工厅厅长，聘大哥出任总务科长。董必武离开武汉，由大哥代理湖北省农工厅厅长职务两个多月。卸任后，大哥在武汉重操律师业务。这时，国民党政府的金融紊乱，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相继倒闭，影响市场，因此，债权债务的诉讼案件增多，律师业务亦随之兴旺发达，这样，我大哥在经济上就有积蓄。

(二)

1932年国民党对共产党所辖区域视为“匪区”，并对老百姓进行血腥屠杀。我的家乡亦是“匪区”，青壮年不是参加革命，就是散之四方，留下老弱病残，田地荒芜，粮食短缺，啼饥号寒，极为悲惨。此时，大哥回七里坪，当在难民集中处。每人发一块银元，以救乡亲燃眉之急。返汉后，他把黄安县北乡苦况写在募捐簿上，亲自向汉口各界募捐，同时自己也拿出一笔钱，请县北乡方家垸的方香山先生作主，在七里坪煮稀饭放赈数月，以救难民。家乡的邻居、亲朋见我大哥这样慷慨，误认为很有钱，便把乡间售价二元钱一斗田的价格，抬价到四元钱一斗，写成田契来汉找我大哥。在这种情况下，我大哥就买了一些田，并叫我二哥王兆澍（又名学书、字献曾）回家照管。

(三)

抗日战争时期，我大哥王兆祥被选为汉口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武汉沦陷时，大哥留下三千元银币，对我说：我劳苦一生，等日寇败走后，我回家休息，作为晚年的生活费，切勿用掉。大哥离开武汉、经湖南至广西，大哥在桂林的住处被日机炸毁，致使携带川资行李损失一空。后得朋友资助逃至昆明。在昆明经李老印泉（根源）介绍到程老颂云（潜）家中教书。后因程老迁居重庆，大哥就在昆明再操律师业务。此后，生活艰难，疾病缠身，1942年12月因患脑溢血病而去世，且身后无以为殓。

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时候，国民党却勾结日伪围剿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游击队，对苏区和游击队进行经济封锁。这时，游击队有两位同志找我二哥，要我二哥借给银币八百元，以解急需。二哥当即答应筹齐款后即交。二哥随即来汉与我商议。我于1934年就读于湖北省中医专科学校，毕业后一

直在武汉从事中医工作。我对二哥说：国民党贪污腐化，没有长治久安的可能，共产党有主义，有组织、清正廉洁，办事认真，大有发展前途，不能不支援。但在七里坪驻有国民党正规军，距村仅六华里，后头洼又有国民党游击十六纵队李九皋部，距村仅五华里，两者巡逻队来往如织，万一交款时碰上巡逻队，不仅款到不了共产党游击队之手，我们还要人头落地，千万要想个安全之策。二哥说：“现在已近阴历年关，就在除夕晚上交款如何？”我说：“你回去与管家方应江商量，视情况决定。”方应江遂与游击队领导商定，除夕晚天黑时由方应江在杨家边坟山树林内交银元八百块给游击队便衣队员。当时游击队员收款后即交给我家一张盖有“某部第几游击队”名称的长条印鉴的收据，鉴于当时恶劣环境，收据不敢久留，我便把它销毁了。

(四)

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何耀榜司令曾在七里坪住过一段时间，我二哥与他也有所接触。我们认识何耀榜是1938年。南京失陷后，国民党政府迁居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也迁来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由董必武负责，董老与我大哥交情甚深。根据董老提议，一天董必武、郑位三、何耀榜三位首长至我家看望我的大哥。三位首长阐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畅谈了当时抗日战争的有利形势。对我们兄弟的启示和鼓舞很大。当时我们都在场，是这样同时认识了郑老和何老，并保持联系。中原突围后，何司令带领一支部队在大别山与国民党军队周旋。1947年3月，共产党黄安县县长①徐锡煌派了位游击队同志至七里坪对我二哥说：“五师突围北上，我大别山根据地的部队仍留在后方与敌人作斗争。现军需紧急，特向你家借银币一万元，

①当时是黄安县工委，徐锡煌是工委书记。

日后定还”。当时我大哥已去世，难以筹集这笔巨款，二哥同意设法筹措借银币七千元。二哥来汉告诉我，我同意在汉千方百计筹款。于是，我将大哥留下的三千元拿出，又把汉口济生路的一栋房屋和祥顺车行的人力车及执照卖了还不足数，便把家乡的田廉价出售，又托人不惜重利在汉口赊借银币。七千块银币是分数次交给革命部队的，前两次由地下党员石世荣陪同送交的，后来是由王文祥和王正林二人直接送交的。当时，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已全面展开，国民党政府已发布了战乱总动员令，令内规定：凡以物资接济共产党者判死刑。在这种情况下，我家是冒着生命危险解决革命部队军需问题的。

(五)

1947年6月，国民党黄安县情报组长高维钧，将中共七里乡党支部书记石世荣捉去，捆在七里坪石城南门楼上，声言他是七里乡地下党支书，要带到县里审讯，并处以极刑。我当时刚从汉口回到七里坪。共产党黄安县县长徐锡煌当即找我，要我想尽一切办法营救。我遵照指示，当天以我的名义在七里坪请酒两桌，客人全是当时各界知名人士。席间我说：今天承蒙各位驾到，甚是荣幸。我有一事恳请各位大力相助：我舅母的侄儿石世荣，昨日被高维钧组长拘留南门楼上。听说有人告他是共产党地下支部书记，要送县审讯，处以极刑。我认为这是陷害，第一，高组长说有人告他是共产党地下支书有无可靠证据？依照法令应物证重于人证，此事不仅没有物证，连人证也没有（物证就是要任七里乡地下支书的文件）。第二、高组长说经他审讯石世荣后，就会得出真情。古人云“严刑之下，何求不得？”我认为，严刑拷打出来的供词会是真情吗？第三，石世荣上有年老父母，下有幼小儿女，全靠他一人种田度日，杀他一人等于杀他全家。上述三点意见，请诸位亲朋斟酌并转达高组长，请高组长早日释

就石世荣，以免滥杀无辜。各界名流亲朋与高维钧多次磋商，仍未见释放石世荣。我会意，送给高维钧银币四十元，他才通知放人。

（六）

全国解放后，听说何耀榜司令、徐锡煌县长向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副主席程坦，以及当时在汉的中央委员郑位三反映了我家解放前在经济上支援革命和营救地下党员干部石世荣的情况，因此，党和人民政府给了我一系列照顾。1950年12月，我以中医特邀代表参加了湖北省第二次卫生会议，并系大会执行主席之一，大会开幕时，首长还叫我上台讲了话。1951年3月，我参加了中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门门诊工作。同年6月，湖北省卫生处栗秀贞、谭泰阶两处长致函约我面谈，要我出任中医科长，以主持全省中医行政工作事宜。鉴于我行政工作能力有限，难以胜此重任，遂再三婉言辞谢。这一年，政府对我乡间农业税也予以免征。对上述党和人民政府对我的种种照顾，我万分感激，也是我几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医疗事业作贡献的动力。

何为嘉 整理

注：王兆麟，现年84岁，退休医生，家住汉口。

整理附记：

1989年5月，刘涛同志（1947年至1953年任七里区区长，政委，现为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离休干部）来红安，我访问了他。他说：解放初期，七里坪有吴恕之，潘河泽、徐万东、江大肚子、王二老爷（献曾）都是统战对象。王献曾家有田有地，是有名的富人。他家在历史上为人民做了些好事。1932年国民党杀了许多共产党人和群众，还有“肃改”杀的人，尸骨遍野，无人收殓。王献曾的哥哥从汉口回来，以“一担谷换一担人骨头”的办法，将所有尸骨收拢，然后出钱请人挖坑将白骨埋掉，还建了白骨塔。不管是共产党人的尸骨，还是群众的尸骨，得以收殓，这是一件好事。1947年9月，刘邓大军到大别山，把我留在七里工作。当时工委负责人向我介绍说，在我到来之前，王家拿出很大一笔钱支援何耀榜部队。我们来后，一直把他家当成统战对象、开明人士看待。解放后开大会时，还请王献曾出席。

1989年10月12日，我走访了孙才甫同志（他是1946年来黄安，任独二旅何耀榜司令保卫连连长，后一直在黄安工作，现为县总工会离休干部），他说：1946年底，大雪封山，国民党军队乘机常来搜山，对五师突围后留下坚持斗争的独二旅进行围剿。在我到来之前，独二旅保卫连连长负伤被国民党捉去死活不知，罗干事牺牲了，国民党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到黄陂站的城墙上，并写着“何耀榜的头，这是共产党的下场”。用此威胁群众，以切断与独二旅的联系。我原是在鄂东部队搞侦察的，是何耀榜把我要来独二旅任保卫连连长。当时，独二旅的生活与给养十分困难，冬天没有棉衣穿，粮食很少。部队一方面坚持斗争，

牵制国民党军队，另一方面设法解决生活给养问题。1947年元月，何耀榜与黄安县工委负责人徐锡煌商量找七里乡夏畎村王二老爷家借款之事，具体事宜由工委办。听说王家的钱是分几次交的：一次是用茶叶桶，下面装银元，上面装茶，挑到余家店余少文家交的，另一次是把银元扎成捆，夹在竹扫帚中间背着送到上天台山的路上交的，还有一次是送到部队驻地交的。总数字我不清楚，光给独二旅的是三千元银币。当时用了一部分，剩下的埋在红军洞附近，解放后没有找到。1947年9月刘邓大军来红安。由于工委做了工作，没向王家征借什么。1951年土改时，县里做了工作，把王家当作开明人士对待。就在这一年秋季免征了他家的农业税，以抵独二旅的借款。

1990年3月到夏畎村走访了王法辉、王尚明、王法康几位老人。他们讲了徐锡煌，杨先凯、余应福、秦敬安等工委成员如何来找王献曾借款，王献曾如何派方应江、王文祥、王尚亲筹款交款和如何营救石世荣的具体情节。王法康（解放初期任村长）说：1951年政府免征王献曾的农业税折粮48000斤。

1991年8月3日，走访了因病住院的老红军石世荣同志。他说王家与我是亲戚。工委找他家借款的事我晓得。交了几次还差千把块银元。他家让乡邻自己选田出售，二块银元一斗买田筹款。最后一次是在余家冲枫香树交的。由于钱不够，送了布匹、作价凑齐七千块银币。每次收款都由管财经的一个姓鄂的开了条子，盖了章子。我得救亏了王家，也亏了我的表兄方泽民。

以上情况可以对王兆麟先生的回忆文章给予一些补充和印证。特此附录。

何为嘉

裕和盐栈

高叔樵、罗以谋、吴克仁等口述

红安县虽系山区，但人民生活必需品——米、面、油、棉、鱼、肉、茶叶等，都自给有余，唯缺食盐需到外地购运。红安一向食淮盐。清末，黄安县城设淮盐分销局于北街（小学处），八里坨、七里坪设有分销处，年销食盐四千引（每引600市斤），计24万市斤。为防止私盐越境，在黄陂、两河口、黄陂站、七里坪、华家河等处，驻有缉私营盐卡分哨，查禁私盐（没有缴纳盐税而购销的盐叫私盐，缴纳了盐税、持有护照而购销的盐为官盐）。民国初，沿袭清代作法，食盐官办，价由官定，虽取消缉私营哨卡，仍禁止私人贩运。盐价不仅昂贵，且在食盐中发现人为的掺有石膏、米粉等杂物。1926年以后，由于战乱，食盐无法入境，盐价迎风上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食盐价上涨到一块银元1斤。穷人买不到、也买不起盐，只好以辣椒代盐。

1932年秋，程汝怀任湖北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兼黄安县长，驻扎在战后的黄安县城，市面萧条，食盐奇缺，为了繁荣市场，解决人们对食盐的需求，于东正街即现在中国工商银行营业所处，创办食盐运销合作社，由其六弟负责。红宋公路刚刚搞通，便用一辆木炭作燃料的汽车，专门至武汉运盐来县。公路路面狭窄又高低不平，车速缓慢，往返一趟需两天半时间，载重量又不多，因而成本高、盐价贵。当时，在县城设有“火油食盐总会”，对其所辖地区居民的火油食盐，实行定量、定点、凭票供应。人均二两盐，由保、甲长分到花户人头，二两也不足。在

七里坪设官督商办的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在招牌上还写着官督商办，以此切断群众与共产党的联系，控制苏区。虽如此但杯水车薪供不应求。程汝鄩与省盐商协商，请其来黄安县开设盐栈。从1933年夏季始，黄安县开设裕和盐栈，食盐结束官办，改为商办。

裕和盐栈是省盐局设在红安的一个盐号。经理是黄冈县的王赐民，经济人，当年约40岁。据估计，在黄安的投资总额约二万块银元。盐栈开设在吴翠轩的房子（即现百货公司至五金门市部处），门面很大，上十多步台阶才能进门。开张时，门口点的腊烛有手臂那么粗、那么长，据说是高瑞良亲手浇铸而成。并在南门河岸边建有盐仓。另于八里坨、七里坪开设裕和分栈。雇用人员包括内纪纲及办事员，工人达三十余人。雇请八里坨柯家墩、大刘家、王太河的竹排共八对，专从武汉运盐来县，顺便带山货至汉。所雇用人员大部分是本县人。裕和盐栈的内纪纲是高沈家的高瑞良，掌管出进帐务。县城及县境内各杂货铺都在裕和盐栈批发食盐，肩挑车推运往县境各地销售。裕和盐栈对来批发食盐的商人有明约规定：一、批发用库秤（每斤18两），零售用钱平秤（每斤16两），不得短斤少两；二、批发以“引”为单位，一引为600市斤，银元四十五块，每斤单价八分。因此规定县城食盐零售价每斤不得超过九分，边远地区不得超过一角；三、不得在盐内掺入石膏、米粉等杂物。违犯上述规定者，一经查证，报官究治。1934年食盐官价提高，每斤折合银元一角六分六厘。

自从裕和盐栈开业以来，全县百姓吃的是平价盐和没有掺假的盐。控制了盐贩的重利盘剥，减少了缺盐的痛苦，百姓无不称赞裕和盐栈。

盐栈经理王赐民和内纪纲高瑞良都不仅是开明的经济人，且是有远见、有民族气节的人。1935年，王赐民首先把得力的

内纪纲高瑞良安排到七里坪裕和盐栈分号当经理，并向七里坪大量运盐。高瑞良主持七里坪裕和盐栈分号虽只有七个人，但把盐栈办得很有条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事上的节节败退，王赐民预见到县城迟早会遭到日军的蹂躏，又将七里坪裕和分栈改为总栈，竹排运进的食盐直上七里坪卸货，还将县城总栈库存食盐陆续运到七里坪。日军侵占县城后，建立了汪伪政权，日伪政权扶持的维持会，号召商人进城，特地托人去劝说裕和盐栈回县城复业，并许以优惠待遇，遭到王赐民的拒绝。自县城沦陷、水陆交通阻塞，南盐北盐均无法入境，县中和县南百姓又陷入无盐的窘境。在县城，日军强拉民夫修裸子山据点，每天给民夫发给一点食盐，以抵力资；民夫得到一点食盐却认为是很高的报酬，可见当时食盐之紧缺。然而在县北七里坪、紫云等地区的百姓和抗日军政人员，凭裕和盐栈的存盐，免遭缺盐之苦。七里坪裕和盐栈设在甲夹巷北第一家，坐西朝东与中西药局相对。盐栈的经理高瑞良曾任七里坪商会会长，总经理王赐民极信任他，所以他可当王的家。国共两党在七里坪和谈统一抗日中，他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郑位三、高敬亭、方毅等，在七里坪、福德创办的“枣林岗抗日政工干部训练班”、“秦氏祠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等，裕和盐栈都给予过经费上的支援，受到抗日军民的称赞。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乱发钞票，货币贬值，1948年与1935年相比较，食盐价格每斤由0.166块银元，涨到每斤22万元（关金）。年销售食盐量为6千引（36万市斤）。全国解放后，食盐由人民政府统一销售，原任裕和盐栈的内纪纲、七里坪分栈经理的高瑞良，被人民政府优先录用，不久就被提升为麻城县村店供销社主任，1967病逝。

李述治 整理

死人沟

高德朗 口述 石世美 撰稿

紫云乡有条山沟叫“死人沟”。为了搞清楚“死人沟”的来历，我访问了83岁高龄的高德朗老人。1933年，高德朗老人是共产党刘思奇独立第七师二十团的传令兵和便衣队员，曾参加过刘思奇领导的八里岗战斗。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目睹的史实，叙述了发生在紫云地区的一段悲壮的历史。

“死人沟”原叫扛家洼，是现在紫云乡东北高家垸村六关坟水库的尾部南面的一条大山沟。沟向朝北，山上每到春天树木葱郁，山花遍野。两山上的水通过此沟流向山脚下的小河，注入六关坟水库。这样一个风景秀丽，景色迷人的地方，是怎样变成“死人沟”的呢？此话要从大革命时期的紫云区说起。

现在的紫云乡，大革命时期包括檀术乡以及河南的箭厂河在内叫紫云区，它东与安徽毗邻，北与河南接壤，1930年春黄安县苏维埃政府在紫云的闵家祠堂成立，这里是鄂豫皖苏区的活动中心。大革命时期，董必武同志的学生赵次吾、曹学楷、甘济时等人在这里领导紫云地区的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农民运动的兴起，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政权。蒋介石即派国民党八十九师汤恩伯部，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1933年2月21日（农历正月二十七），国民党八十九师从麻城县林店方向直入紫云区。进入紫云地域后，便兵分三路，从东、南、北三面对紫云区进行包围进攻。当时，共产党主力部队已转移北上，只留下刘思奇率领的独立第七师（实际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来牵制敌人。刘思奇率部在现在的许葛楼村的八里岗与国民党八十九师打了一仗。在与国民党军接火的过程中，刘思奇看到敌我兵力悬殊太大

且又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的任务，便利用地形熟悉的优势，由凤凰台向西突围，将部队带到河南省去了。来不及转移的伤病员，共产党地方政府干部，以及当地的老百姓，为了避免这场灾难都隐藏在大山沟里。

虽然共产党部队已经转移，但国民党八十九师仍然到处搜查共产党人，并对紫云区实行烧杀抢掠。他们开始将捉来的人进行拷打审问，想弄清共产党的组织情况，后来见老百姓宁死不讲，八十九师有一个名叫徐源泉的头头说，这里是共产党的老窝子，都是被赤化了的共党，对他们不必审问，下令统统杀光，以除后患。于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他们杀人的手段真叫人惨不忍睹。

一、集中屠杀。国民党军将捉到的老百姓用绳子捆着，一百人一串，押到扛家洼用机枪扫射。凡捉到的男女老少，上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下有未满月的婴儿都无一幸免。

二、对年轻女性先强奸，后杀害。麻城县一青年妇女赵金花被国民党军拦住。国民党军先脱光她的衣服进行轮奸，后将其杀害在扛家洼山脚下的一棵大枫树下，敌军撤走后，是刘兆齐老人收尸掩埋的。

三、两树分尸。国民党军用几个人先将相邻的两棵树扳到一起，把人的左右手和左右脚分别绑在两棵树上，绑好后再将树松开，把活人撕成两半。桂家洼的李启伦就是这样被处死的。

四、镰刀砍瓜，打活靶。他们把人捆成一团，将裤子脱下套在头上，从山顶往下推。然后用枪射击。他们把这种杀人办法称为“镰刀砍瓜”、“打活靶”。闵家垸的闵新奇就是这样死去的。

国民党八十九师从1933年农历正月二十七进攻到二月初二撤走的五天时间内，仅在扛家洼一处就屠杀了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一千多人。其中紫云扛家洼一带有亲人认领尸首，收了尸的有

87人，也有外地人和虽是当地人，但因全垸，全家被杀光没有亲人认领尸首的就无法搞清具体数字了。尸体遍布扛家洼山沟，血和着雨水从扛家洼山沟流到山脚下的小河直到袁英河大河，全长十余华里，河里流淌着殷红的血水。无人收尸掩埋的尸体后来腐烂了，扛家洼一带臭气冲天，饮水被污染不能食用，周围十几里路的地方不能住人。少数幸存者只好搬迁到外地居住。当时不少的户全家被杀光，有的整个垸的人被杀光，垸子房屋被烧光。如朱家洼垸的刘良学一家3人，石门口垸赵中应一家4人，李家洼垸黄根富一家6人，都是当时国民党军杀光而绝户的。卢家垸村的小冲垸在国民党八十九师“进剿”中全垸的人被杀光，全垸的房屋被烧光。整个紫云区，当时成了“无人区”，人们又把它叫“死人区”。时至今日，原紫云小乡就有23个自然村绝了人烟，现在只有残垣和瓦砾依稀可辨。长塘边村现在还没有人烟的垸子有塘家畈、毛屋嘴、甚士洼、上郑家边、方家畈、刘家洼、羊毛冲、张家畈等。建国四十多年来，这里还没有恢复大革命时期的人数。如长塘边垸大革命前，据档案资料记载有52户，321人，现在只有45户，196人。江朝二垸大革命时期有78户，378人，现在只有63户，257人。

1933年春，国民党八十九师血洗紫云区，革命志士、无辜百姓的尸体遍布了扛家洼山沟，所以当时人们将扛家洼山沟叫“死人沟”。解放后，人们又叫它“烈士沟”，并把它作为对年轻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场所。现在这里满山上生长着松树、杉树、山茶树，一年四季郁郁葱葱。人们非常爱护这里的树木，这些苍劲、挺拔的树木，好似烈士们巍然屹立的形象，永垂不朽，永远活在红安人民的心中。

王文金 整理

注：高德朝，红军失散人员，现年83岁，紫云乡高家垸村三组人。

忆父亲李华芝

李述栋

我的父亲李华芝，派名作仁，字森香，1897年7月出生
于红安县杏花乡长山村灯龙冲垸一个农民家里，幼时在私塾里读
了六年书。他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其经历对我谈了很多，就我的
回忆记述如下：

清朝末年，政治极其腐败，官吏横行乡里，百姓受尽欺凌。
官吏们对百姓动不动就吼道：“你们吃的谁家的饭，穿的谁家的
衣？”商品、货物上都有“大清”的标记，就连糕点印模上也有
“大清”二字。广大人民对清政府的暴虐行为十分不满，反清情
绪日趋激化。我的祖父是个忠厚、勤劳的种田人，常带着我父亲
下田干活。我的父亲也能体谅家庭吃饭人多的困难，坚持做些力
所能及的农活。1909年我父亲已十八岁了，身强体壮。由
于痛恨清政府腐败，官吏横行，便出外投入湖北新军，到三十二
标当了一名士兵，后被提升为正副目。

(一)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全中国范围内秘密发展起来。我父
亲虽参加了清朝的新军，但也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为推翻满清腐
败统治，联络一些人积极开展工作。不久，清政府起用端方为铁
路大臣，率湖北新军三十一标、三十二标入川镇压人民的保路运
动。部队刚入川，就得悉武昌已经举行起义，新军中的同盟会
立即响应，杀了端方，倒戈回鄂支援武昌首义。

部队返鄂途经荆沙时，驻防清军中的同盟会员，自推同志举旗反清；三十二标一部分同志回武昌，我父则留下与其合作，共同反击驻守荆沙的清兵。革命队伍侦悉沙市空虚，趁虚而入，一弹未发。轻取沙市，百姓夹道欢迎。荆州距沙市约十里，时闻荆州清兵炮声，自恃城墙高固，又藐视革命军无炮无后援，闭门顽抗。革命军队奋起攻城多次不破，迨安襄郢荆革命军来援后，荆州清兵被迫投降。我父亲在光复荆沙之役有功，受到总统黎元洪的嘉奖。在1946年出版的《辛亥首义史迹》书中，载有《鄂军在资川举义经过》和《荆襄光复之概况》两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三十二标的革命事迹。我父亲收藏了该书并在这两篇文章题目之下，盖有他的鲜红印章，足见我父亲对亲身经历的历史无限深情和自豪。

那时当兵是很苦的，他曾对我说，就在一次行军途中，他突然患了伤寒症，步履艰难，请了两个抬夫护送。途中又渴又饿，发现路旁有个榨房，满以为进去后可以弄点吃的，可是里面无人，但发现榨房的灶上有油炒的米饭，于是三人分吃了。谁知此饭是用木榨油炒的，弄得人上吐下泻。伤寒症未愈又染上了痢疾。在当时，既无医生，又无药物治疗，仅靠自身的体质来抗御疾病，拖延了很长时间，才痊愈。

民国开年后，我父亲从武昌退役回乡。临行时，武昌人民夹道欢送，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回到黄安，深觉县知事公署不能代表民意，反而奉行袁世凯的帝制之章规，弄得乡里不宁，民不聊生。在阮复等人的组织发动下，我父亲与辛亥首义同志一起武装进攻打黄安城，惩办了黄安县知事公署中的贪官污吏。这次斗争虽取得了胜利，但后来受到县署的刁难。此后即从事小本经营谋生。1927年黄麻起义受挫后，有人向国民党政府告密，说我父亲参加了攻城，国民党县政府便派人来我家搜查，把我父亲退役时带回的两件心爱纪念品一把军刀和一件军大衣拿去，还把

我父亲捉去，打了四十大板，关押了几天才放回家。

(三)

民国时期，对参加过辛亥革命首义的老人，还是很尊重的。每年“双十”节，政府部门邀请辛亥革命首义的老人参加纪念会。1947年我五岁时，随父亲到武昌参加“双十节”庆祝会。会上发了许多证件，有的证件保持至今。当时，凡佩戴证件者，享受很多优待：进剧院可以免费看戏；馈赠糖果、瓜子和五香卤干子等。父亲把我带到黄鹤楼去玩，在那里照了一张合影像保存至今。他带我到潘武峰先生家里去过数次。后来我才知道潘先生也是同盟会员、辛亥首义同志、三十二标的标长，他跟我父亲既是同志又是上下级，关系十分亲密。潘先生亲自为我父亲撰写了一篇简历，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在收藏时磨损得残缺不全，但仍可见我父亲在辛亥革命时的功绩（见抄件）。潘先生为我父亲手书的一幅“缔造中华”四个大字的中堂字挂，至今保存完好。在战争时期对持有辛亥首义同志证件者，有些国民党人礼让三分。有一次，我父亲同乡同姓的一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军队捉住，情况十分危急，我父亲得知后，立即持辛亥首义同志证件找当局为那位共产党员说情、担保。国民党当局居然放了那位共产党员。此人现在陕西省某地工作，“文革”期间，陕西方面派人来红安为此事作过调查，取了证明。

(四)

解放后，我父亲仍然从商，他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服从人民政府的领导，积极实行公私合营，是第一批公私合营的职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辛亥革命老人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文革”前，红安县城关镇政府每年春节请我父亲参加茶话会；经济上每年都给予一定的生活照顾。县里征集文物，

我父亲毫无保留地将保存多年的五件辛亥革命文物捐献给了博物馆，受到表扬并荣获奖状。湖北省政府曾多次来函询问和慰问。

1961年底，我父亲已经退休，享受与在职职工一样的待遇。春节前县委统战部还派人登门向我父亲转赠了省政协颁发的一枚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的铜质纪念章，我父亲感激不已，时在念中，在六十年代的一个春节，他亲自写了一幅春联贴在大门口，上联：辛亥革命老人承蒙照顾。下联：社会主义祖国日暖人心，横额：感谢共产党。表达了我父亲一片真情实意。

我父亲于1970年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附潘武峰先生撰写的简历)

李华芝号淼香，派名作仁，生于光绪辛卯年六月二十六日子时，吾少读儒书，长娴母训，存心忠厚，秉性尚平和，及强壮也，恨满清之腐败，慨政治之专横，遂投入湖北陆军队第三十二标，充当正副目等，迨后抱民族主义参加同盟会，暗中联络同志，冀图推。“驱除满清，恢复汉室”，于首义前期，开驻施南……，②佔领施、宜，继而光服荆沙……则总统给予奖状，有……，以首义同志会……元勋之……，谱牒告诉……后世子孙……朽云。

辛亥首义同志会三十二标办事处

三十二标代理潘武峰敬撰印

何为嘉整理

注：①李述林，现任红安县城关镇镇长

②映文字均为磨痕处

李健侯生平簡述

李修魯

李健侯，字永年，号光泽，1892年1月3日（即清光绪十七年腊月初四）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南乡李家垸。

1906年，由同族李愈友及其挚友董必武带到武昌考入湖北省立中路小学求学。1909年毕业。1911年考入黄州府师范学校。

同年，10月10日晚，武昌部分新军首义。次日，新军为加强军事力量，抵御清军的进攻，在街头大量招兵。健侯弃笔从戎被编入学生军第二营第四队为学兵，担任守护藩库和官钱局的任务。不久，调第二队副下士，到汉阳参加汉阳保卫战。

南北议和后，1912年，健侯考入南京入武生队炮科学习。不久，这个队改为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迁武昌南湖。1914年毕业。经实习六个月后，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炮科学习。

1916年初，袁世凯正式称帝。稍晚，健侯与一贯反对帝制的两位同学杨效欧、徐祖诒同时私自离开学校去山东。因当时山东胶济铁路线上的坊子、潍县、周村一带，均为居正、吴大洲等反袁的民军所占领。健侯投入山东坊子民军部，任教练官，积极训练士兵，准备北伐。保定军校得知三人去民军消息后，将三人同时开除。这一年6月，袁世凯暴卒，三人返回保定军校，年底毕业。

1917年，健侯被分配到陆军第六混成旅（旅长刘锡广）炮兵营（在武昌）任中尉见习排长（当时排长均系中尉），曾率队赴通城、崇阳、平江一带，参加湘鄂边界战争（湖北王占元对湘军赵恒

惕、桂军谭浩明的战争)。1918年,调陆军十八师(师长王懋赏)师部上尉参谋,驻宜昌。1919年,参入北京陆军大学第六期学习,1922年毕业。1923年,四十八师(这时师长为卢金山)继续任上尉参谋。

这一年,十八师奉湖北督军肖耀南之命,援助川军杨森,师部移驻重庆,健侯升少校参谋。1924年,升中校参谋。1925年,川战结束,十八师移驻宜昌。1926年春,卢金山兼任长江上游总司令,健侯升上校参谋,转炮兵团代理团长。同年冬,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贺龙)、第十军(军长王天培)、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联师西征宜昌。卢金山在革命军的强大压力之下,自动退职。健侯与王、何有旧谊,被编入第十军,任直属炮兵团少将团长。从这时起,健侯就从一个北洋系的旧军人,转变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分子。

1927年初,健侯任第十军二十九师(师长杨胜治)少将参谋长,随师东下,驻圻春。旋辞去参谋长之职,到南京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训练处(处长张治中)少将炮兵科长。

这一年九、十月间,国民革命军在津浦铁路线上失利,总司令蒋介石下野。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组织军事委员会,领导国民革命军的各项活动。健侯因与白崇禧在保定军校同期同学的关系,被任命为参谋厅第一局局长。在此期间,他主持制订了“西征”、“北伐”的军事作战计划,后来均被实施。他在任第一局局长时,还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有记录)。他建议将这个学校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另设中央政治学校,被上级采纳。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重组总司令部。健侯被调为少将高参。4月,应七军军长夏威之邀,任该军中将参谋长,冬兼任南京中央编遣委员会中将委员及第四编遣区中将军务局局长。

1930年,因肺病严重,辞去本兼各职,到北平疗养。

1936年病愈，回南京，在参谋本部(参谋总长程潜)总务厅任少将章制科长。1937年，调任军令部总务厅第二处少将处长。1938年秋，肺病复发，甚危，未随政府西迁，在汉口太和医院治病。1940年，病略愈，汪精卫伪政府参谋总长杨揆一等亲至太和医院劝诱其到南京任职，他坚决拒绝。1941年冬，回黄安李家垸闲居。1944年，身体逐渐康复，决心去重庆。乃先到汉口筹措路费，于1945年5月30日抵达重庆。到重庆后，任军令部少将高参(闲差)。

抗战胜利。11月，返回武汉，任黄安旅汉同乡会筹备主任，1946年8月1日，奉准退役。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和谈时期，董必武以合法身份，在汉口暂住。董老在汉口时，打听到青年时代的友人李健侯也在汉口，非常高兴。他们互相宴请数次。谁知这件事情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怀疑健侯与共产党有所勾结，在董老离汉后，他们于9月24日傍晚将健侯秘密逮捕。经当时国民党“华中剿总参谋长”王天鸣和其他友人的营救，方获释放。武汉解放后，董老于1949年11月24日从北京写信给李健侯，其中说：

“三年前汉口晤谈后，曾闻特务滋扰，颇为兄累……兄所经历之不幸，祸由我起，此则私心总觉不安耳……。”

武汉解放后，湖北省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党的统战政策。1950年7月，健侯被任命为省政府参事室参事。

1950年10月，被民革中央任命为民革湖北省分部筹备委员会委员。1956年4月，当选为民革省委会第一届委员。1961年8月，当选为民革省委会第三届委员，是湖北省第一届、第二届人民代表。

1962年1月24日晨(农历辛丑年腊月十九日)病逝于武昌四衙巷寓所，终年七十岁。

陈 勇 整理

晚清富戶李光斗軼聞軼事

李 述 治

李光斗是晚清黄安（今红安）有名的大富戶。不仅家有田连阡陌，而且是当时黄安“十八老子”的首领，兼东烟会会首。为人心计多端，颇有名气。现据乡里传闻，记述如后：

发 迹 前

李光斗，号承鳌，字炳文。清道光七年（即1827年）十月生于城关区桂花楼村一个普通农民家里。清宣统三年（即1911年）九月去逝，享年84岁。李光斗少时，家有自耕田七亩，其中四亩远在五里路外的似马山下，即使是丰收年景，粮食也只够自给。七岁时，其父为光耀门第，送他入学。十四岁时，应黄州府童试，不第而归，从此灰心仕途。他对父亲说：“几卷‘子曰学而’，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即便考上秀才，也不过教书糊口，何日能发迹？不如学点拳棒，免遭人欺侮”。道光晚年，盗贼蜂起，各大姓都设坛习武。光斗学武两年，因父亲染病，不得不弃学而挑起家庭生活担子。

李光斗十六岁那年除夕，家里无米下锅，他约了几个揭不开锅的同姓穷汉，至附近富戶兼管祖产的李宗奎家，以清算祖产收支为名，胁迫其借粮。李宗奎知来者不善，怕闹得新年不吉利，咬牙答应开仓每人借谷一石（约120斤）这便是李光斗在邻里出名的开始，也是他步入人生道路的开端。李光斗十七岁就推独轮车，帮人运货，来往于宋埠、黄陂等地。后来，他把这些脚力钱攒起

来，自己进货，自运自销，挣了一些钱，解决了家庭温饱，还略有积余。

李光斗年轻时不大信迷信，当时社会迷信成风，李光斗的父辈当然也不例外。当时有一种名叫“扶乩”的迷信活动，即方桌一张，桌前烧香点蜡，桌上铺细沙，沙上摆着桃木制成形似无把的小扬叉，名曰“仙乩”，乩头装半尺长桃木，两个童生或秀才，并排站在桌前，分别用左右手握住乩柄，不停地击罄，反复念咒，说这是神仙在作指示。有一次，李光斗从外地回家，遇到父辈在家里搞“扶乩”迷信活动，说是请来“何仙姑仙人驾到”。李光斗一脚留在门外，一脚留在门内，进退两难，扶乩人问李光斗：

“你是进，还是退？”李光斗笑着嘲弄扶乩人说：“你是仙姑，知道我是前进，还是后退？”扶乩人说：“你前进三步必死，后退三步必亡”。李光斗回答：“我横行五步可得安康”。说罢扬长而去。

又一次，李光斗遇到父辈在搞“扶乩”活动，说是吕洞宾仙人驾到。李光斗对扶乩人说：“我有一联请仙人联对，‘三虎堂前三虎啸，笑、笑、笑’。扶乩人停顿多时才在沙盘上书：“九龙洞里九龙吟，……”，对后面三个“笑”字却无法对出。扶乩人憎恨地书：“此人可恶，当挖心而死”。李光斗对扶乩人长长一揖说：“谢谢神仙，恶字去心，当是亚字，今后我必高中亚元”，说罢长笑不止。

李光斗青年时期还有点爱打抱不平。当时，李宗奎由于富有田产，兼管公堂，还充当里正（相当于后来的保甲长），常倚钱势欺压平民百姓。他家在村北有一片肥沃的河地约十余石面积，夏季保收小麦、油菜，秋季保收花生、棉花，人称“金不换”，但是中间夹杂着同村一个“李贱狗”的约二堆粪的一块地，也很肥沃，李宗奎为逼“贱狗”卖地，春秋犁地时，总是命雇工用犁削其地边，使“贱狗”的地越种越小。“李贱狗”怀恨在心，便求救于李

光斗，寻机报复。其年四月，正值小麦抽穗、油菜开花的关键季节，李光斗指使“李贱狗”浑身涂上菜油拌上锅烟灰和墨汁，趁着打雷下雨的时候，偷偷地跑到李宗奎的河地中央，把小麦穗和油菜花乱打一气，打乱一大片，再倒睡在地里，假装被雷击的样子。李光斗又唆使一班伙伴，煞有介事地到处惊呼说：“贱狗被雷打死在河地里了”。消息传出，村里人都涌去观着究竟，李宗奎暗地喜得手舞足蹈，庆幸李贱狗被雷打死，地可连成一片。第二天，雨过天晴，李宗奎跑到河地一看，只见抽穗的小麦和开花的油菜，踩成一片烂泥，心里一阵绞痛，而李贱狗却又出现在村头，并未遭雷打死。李宗奎已知被愚弄，但也明白这是李光斗唆使所致，也莫可如何，从此，再也不敢叫人用犁翻李贱狗的地边了。

据传说，咸丰元年（即1851年）正月，有一客商带有五辆满载黄豆的红车，路经李光斗家，要求借宿。第二天，那位客商对李光斗说：“这些黄豆暂寄存你家，待五天后来运。”可推车人去如黄鹤。一个月后，李光斗把袋子解开，发现黄豆中夹着一串串铜钱，并有一纸信笺，信云：“蒙君救命，时刻铭心，知君侠义，未便言明，谨奉黄豆千斤，铜钱百串，聊表谢意。受恩人。咸丰元年正月”。当时，对这五车货物，众说纷云，多疑其来路不正。李光斗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曾当众说明：前年腊月，他路经七角山，遇到劫贼正拦住一客商，他搭救了这位过路客人，此五车货物想必是那位过路客人所赠，并拿出信笺作证，群疑始释。这五车谢礼，在有钱人眼里，不值什么；但对当时不算富裕，正立志发家的李光斗，却派上了大用场。他用这笔钱，加上平时的积累购置竹排一只，雇水手三人，用竹排装山货。顺倒水河南下阳逻，又从阳逻购买南货回县，采取薄利快销，获利甚丰。这年8月，李光斗得一子，取派号“大治”，乳名“一万”，意在要立志置田千石，收租万石。咸丰六年（1856年）黄安大旱，

田地颗粒无收，市场米贵如珠。李光斗贩卖大米，获利无数。当年有不少农民贱价卖田，以度饥荒和卸田税，李光斗趁此机会买田，这一年就置田200多石。从咸丰七年起，连续两年，田地丰收，黄安米价贱。李光斗又大量收购谷子，连同自收的，就拥有近两千担谷，请人整成米，将米用竹排运至阳逻市场出售，又获利无数，李光斗由于这样挣了不少钱。后来，经过几十年的经营，截至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为止，置有田地760多石。从大塘垸至现在二程区西部，一连二十四个土地庙的所在地区，都是李光斗的田庄，散布在各地的零星庄田不在数内。

发 迹 中

李光斗是个能说会道，强词夺理的人。在买田置业、发家的过程中强行买田置地。当时，有一刘姓的田座落在李光斗家田上沿，李光斗欲逼其卖田，每逢天旱禾苗需水的关键时刻，李光斗暗中命人用铁钎钻穿刘姓田埂，致使一夜之间，田水干涸，刘姓明知此事是李光斗所为，不敢说话，田无收而捐税又重，只好将田卖给李光斗。

李光斗家有一田与徐姓隔河对岸，共河用水，一遇天旱，两家合筑河坝，拦水救苗。每逢关键时刻，李光斗命人驾车车水灌田，等田水灌足，便命人把自己岸边的坝挖开，使河水流逝，等徐姓驾车，河中无水。徐姓与他讲理，李光斗回答：“我挖的是我田边自己筑的坝，并没有侵犯你那一边，你不服气，可去告状”。徐姓眼睁睁地看着出穗的稻谷干死，只好干脆将田卖给李光斗。

有一次，李光斗想买同姓另一富户的二亩好地，该地座落在李光斗的田上沿，其地边长有木梓树两棵，每年收入木梓两担，李光斗不讲道理，便命人锯其树，收其柴，徐姓告状到县衙，李光斗出庭对县官说：“树在彼坎，荫遮我田，彼地无税，我田有粮，官

府免粮，我赔树钱”。县官不敢答应免粮，原告只好自认晦气，把地卖给李光斗。

同治初年，本地一名叫张其伦（原籍八里人）的守备，因犯法吃官司需钱送给上司打通关节，故将20石田卖给李光斗，已写契约，讲明定期付款，未待付款时期到来，而张其伦已被拘捕。后来，张其伦的妻子按期来提款，李光斗先是热情招待，酒饭后，李光斗请张妻出示单据验证，张妻将兑款单给李光斗，李光斗收了单据说：“天色不早，请夫人留宿舍下，明日早行付款”。第二天，张妻要求付款，李光斗回答：“契约写后，田款当即付清，并无拖欠”。张妻不服，李光斗大发雷霆，指张妻有意讹诈，声言要送官法治，张妻既无凭据，只得含泪而去。

光绪年间，四方湾有个武秀才名叫冯长春，家里也很有些田产，但比起李光斗家，还属于小富人。

有一年，冯长春到附近刘通湾一朋友家作客，与李光斗偶然相遇，并同桌吃饭，冯长春自恃有功名，目空一切，瞧不起李光斗，在酒席上说了一些讽刺的话。李光斗见冯长春瞧不起自己，心里暗暗愤恨。

当时李光斗家有个佃户叫三老缘，是个有点二赖泼辣性格的人。李光斗想利用三老缘，帮他去整冯长春，李光斗先是用钱收买，三老缘不干。后来，又用收回庄田的办法进行威胁，三老缘才不得不答应。

平时，李光斗经常怂恿三老缘到四方湾的田边、村头、指鸡骂狗，甚至有时指名道姓地骂冯长春。冯长春知道三老缘背后有李光斗唆使，也奈何不得，只生个闷气。有一年大年三十日晚上，正当冯长春全家熟睡，三老缘便来到冯家大门前，把一根草腰子一头系在门上，一头系在自己的颈脖上假装吊颈。这时，冯长春听到门外有动静，出去开门一看，见是三老缘在他家门前寻死上吊，料定又是李光斗唆使。但又奈何不得，只好说：“老兄！

你这样做可对不起人呢，我冯长春家与你上世无仇，今世无怨，我劝你不要听别人的算计啊！”说罢请三老缘进屋高宾大宴地款待一餐，方才免去一场大祸。

光绪末年，李光斗买到了附近细塘岔的一冲田，从冲上到冲下十几石一见水都是自家的田，唯独只有一个六斗丘夹在中间，属于冯长春家的，李光斗眼里容不进这粒沙子，暗想不吞并这个六斗丘我是不会罢休的。刚好这一年的8月间，三老缘无意中误砍了冯家禁山上的一棵树，被冯长春看见，冯长春以为找到了向李光斗、三老缘发泄愤恨的一个机会：一要三老缘赔礼并将树送还，二要按禁条罚款。三老缘家穷得无米下锅，哪有钱赔款？万般无奈只好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哀求李光斗帮助，李光斗倒认为这是整冯长春的一个好机会，便对三老缘说：“三老缘哪，你怕冯长春不成，有我作主，你去和他搞！再说，你也是上了年岁的人，还怕死不成？冯家来要罚款，你就上他家去寻死放赖，我决不会白看冯长春欺侮我家的佃户”。三老缘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自觉理亏，不敢去闹。但后来不久，不知什么原因，三老缘不明不白地吸毒而死。李光斗见三老缘已死，便来到三老缘家，对三老缘的儿子说：“你的老子被冯长春逼死了，还不快把尸体抬到冯家去，要他封棺大葬，闹他个海底朝天，你们去闹，一切由我作主”。冯长春也是个有脸的富人，别人砍了他禁山的树，死了人还要他封棺大葬，他当然不干。这时，李光斗装出鸣不平地来到冯家说：“冯长春，你逼死了三老缘，俗话说：打狗欺主，三老缘既是我姓户族，又是我家佃户，你不把三老缘当人，也是拿我不当人！你不安葬三老缘，我是不会罢休的，不然，你就把细塘岔冲的六斗丘赔给三老缘作为安葬费也行”。冯长春深知李光斗出面说话就不是好事，自己无论如何斗不过这条地头蛇。最后在李光斗的威逼下，虽未封棺大葬三老缘，但终于将细塘岔的六斗丘赔给了三老缘作安葬费。李光斗见那块六斗丘已赔给三老缘家，

就对三老缘的儿子说：“这个六斗丘卖给我，你父亲的安葬费由我出”。三老缘的儿子本是个老实人，哪敢不同意。就这样，李光斗很简单地打发了三老缘的安葬，将那个六斗丘据为己有。

收租放债是李光斗发家的主要途径，李光斗家放债，一般是采用九八利债，即借出钱一串（一千文），而实际上只借出980文，年息大加一，一年期满付息两串；月息98文，到期不还，以利转本，借债者需有实产（田地房屋）作抵押，否则不借。当时，借债者多系中、小有产者，累计过多，还不起债，只好将田地房屋抵债。就这样李光斗盘剥进来的田地产不少。

青裸债：李光斗家每逢青黄不接或饥荒之岁，即开仓放谷盘剥。借谷者多系些佃农，四月份借谷一石，八月份收债还谷一石二斗。

佃礼钱（即保险金）：佃农租种李光斗家的田亩先要写承租种字，租种田一石，交佃礼钱1200文，承租种字上必须写明，退佃之日，佃礼钱原数退还，如拖欠租课，以佃礼钱作抵金。李光斗则用佃礼钱放利债，一般一年可得佃礼钱2000串，两年就是4000串，这样年复一年，得钱无数。

谷租，也叫秋租：李光斗向佃户出租田亩，按田亩常年产量，收租百分之五十，佃户在承租字上需写明：丰收之年租课不加，荒灾之岁租课不减，李光斗家正盛旺时，年收租谷7600石，加上大斛桶量进，实收租谷年达8000石。

送贺礼：每逢李光斗生日或家中后辈婚嫁、生子，都由管帐先生分别通知佃户，凑钱送礼。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李光斗家生了第一个玄孙，李光斗为了炫耀其“五世同堂”，便命人专程到武汉请来戏班，演戏七天，轰动全县。这次得了不少贺礼钱。

大小两种斗：李光斗家从外形上看有两个高矮、大小一样的量谷斛桶，形模虽然一样，但容度不同，其一可装谷二斗六升，其二

桶底垫层木板，只装谷二斗四升。每年八月佃农送谷上仓，用二斗六升的斛桶量入；青黄不接时卖谷或放谷债时，用二斗四升的斛桶量出。每年一进一出，可尽赚谷280多石。这对斛桶，民国15年(1926年)土地革命时，曾在群众大会上亮相销毁。

李光斗是凭自己从推独轮车帮人运货，到自己做生意而兴家立业的，虽然置田几百石，富甲全县，但是他的生活始终比较俭朴，对家人要求尤为严厉，他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子孙：“起家犹如针挑土，败家犹如水推沙。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如果生活不节俭，即使一座金山，也会吃空”。他言行一致，年满六十，每天食无重肉，家里除逢时过节或来客外，桌上无荤腥。他家正兴旺时，雇请收租先生及长工30多人，吃年饭开八席，每席四菜——鱼、肉、皮子和白菜，酒一壶，他要求子孙对人不要摆少爷架，除到外地读书者外，在家必穿家机布衣，还教育子孙要学会拉磨、筛米、种菜等家务劳动。连厨工烧饭，他也有规定：把稻草扭成条，再扎成把，送进灶膛，火即旺又经烧，避免烧柴浪费。正是李光斗这样在外巧取豪夺、残酷盘剥，在内苦心经营，吝啬持家，才创出这个田连阡陌的首富之家。

据李光斗的后人回忆：当年李光斗家田地产分布情况是南北一条线，以高桥河为中心，有庄园35个；东西一条线，以二程乡为中心，有庄园46个，共计庄园房屋2280余间，总田面积760石（即3800亩），山地1200多堆粪（每堆一升麦种），柴山360余座，面积约3万余亩，大小水塘243口。雇请管帐先生有张、彭、徐、杜、骆等5人，男女佣28人，佃农790户。三人抬的斧头轿四乘，两人抬的小轿和四人抬的大轿各二乘，马四匹、牛九条，仓库除大塘垸三个外，另于高桥大垸、二程乡的柏家田各建一个，共五个仓库，由五个管帐先生分管。

李光斗本是城关区桂花楼人。光绪二十三年（即1897年），他找了一个阴阳先生看风水地，看中大塘垸这里是个发祥之地。便

确定出在这里建造华厦。据传大塘垸这里原是一个由北向南的山岔口，东西是两座小山，李光斗一心想富，经过精心策划，策动当地群众，劈山挖土，将东西两座小山连接起来，筑成一条山脊，形成“富”字顶上的那个宝盖头。然后，李光斗便背靠着山脊，座北朝南做起三幢华丽的房屋，每幢20余间，每幢前后相隔约一丈距离，用见方石块砌成甬道，甬道两端砌成圆门，每门又有铁、木门板各一副，外面是粗大铁条制成的铁栅门，里面用三寸厚的栗树制成的木门扇，房屋四周墙壁，砌墙时等距离地嵌满了三尺长的铁棋，非常坚固，房屋的东边是花园，有四时开放的花草，总占地面积约10余亩，每幢有大厅一个，厅内沿墙每隔八尺竖朱红杉树柱一根，用宽4尺、长8尺4寸、厚一寸半的木板，横钉在柱子的上端，木板分上、下两层，上面经过能工巧匠精心雕刻的山水人物，维妙维肖，大厅里现出一派古香古色，尤以中幢大厅装饰最为华丽，厅前是戏台，戏台两边有木刻金字对联：“厅前丝竹迎宾奏，苑里琼花吻露开”，上横金字匾：“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面对戏台的正厅，能对开酒席。每逢李光斗寿辰或儿辈结婚、生子、高贵宾客。就宴于中厅，边吃酒边听戏。整个房屋建筑成功，便形成了“富”字中的一横。接着，李光斗又在房屋面前修造了一口面积约二十余亩的方形大塘，这便是富中的“口”字，大塘垸即因此而得名。大塘的前面是一片农田，即富字中的“田”字，构成了李光斗所设计的那个“富”字。据传说大塘垸李光斗家的房屋非常宽大，能容纳一个营的军队。1932年春，红四方面军攻克黄安县城，军医院及总指挥部就曾设在这里。

发迹后

李光斗是一个有名的讼棍，连县太爷也惧怕他三分，凡来黄安县做官的人，必须记住四句护身符：“做官不丢丑，结识李光斗，得罪李光斗，挟着行李走”。清代做官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大小官员上任、押司、属吏、衙役都是自己的亲信。同治十年（1871年），有个叫魏辅宸的命官来黄安县任知县，到任之初，照例命两名衙役送红帖问候李光斗，两衙役也是初来乍到不知隐情，且有些恃势欺人，行前知县又疏于嘱咐，他们一到李光斗家门口，便碰上一位老人，劈头就问：“老家伙，李光斗是这屋里的吗？”老人正是李光斗，一听这话就怒火中烧，但并未露出声色，笑着问：“二位哪里来？”“县太爷派来送信给李光斗的”。

“啊！我就是李光斗，请进屋待茶，”两衙役昂首进屋，李光斗拆开红帖一看，笑着说：“啊！你家县太爷也客气了，要石磨何必言借？抬去就是。”即命家人将石磨、抬杠、麻纤一起拿出来，指着两衙役说：“县太爷命二位立即抬石磨回衙急用”。二人听说是县太爷信上说的，怎敢违命？抬着就走，两扇石磨加磨凳，足有二百多斤，如何抬得动，又不敢不抬，行不几步，就得歇下来喘气。时值初冬，累得浑身衣服被汗浸透，走走歇歇，行程八华里，走了大半天，终于将石磨抬进衙门，二衙役忙进后堂道：“老爷！石磨抬回来了！”“什么石磨！”老爷不明白地问。“李光斗说老爷信上指定我二人抬石磨回衙急用。”魏知县一听勃然大怒：“你两个蠢才，一定是出言不逊，得罪了李老爷，你两个被捉弄是小事。却给我惹下大祸，明天你俩抬着石磨，随着老爷大轿，前去李府赔礼道歉。”两人累了一天，得不到赏钱，反招来一肚子闷气，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从此对人再也不敢恃势欺人了。

距离县城西边五华里有个天门寺，是黄安县主要寺庙之一，位于徙义、东烟两会交界处。天门寺四周，分别集居着陈、叶、周、唐、徐、阮、刘、李等诸大姓。按本地风俗习惯，每年元宵佳节，各姓玩龙灯、狮子，必云集在天门寺，先敬神讨赦，然后在山岔坪上竞技、玩龙灯、耍狮子、赛锣鼓。各村红男绿女，群聚围观，场面十分热闹。

天门寺原系周姓家庙，周姓规定，各村讨赦的龙灯、狮子，不得先于周姓，必待周姓敬神讨赦后，他姓龙灯、狮子才准进庙，进庙后还要付香资和擂鼓撞钟钱。周围各姓人人抱怨，但敢怒而不敢言。因为周姓不仅族旺人多，且有几家富户，特别是有几个戴银、铜鼎子的举人、秀才（注：银鼎子是举子的标志）。李光斗家距天门寺约三华里，他对周姓把持天门寺的作法也不满意，加之听到各姓的抱怨声，便想了一个歪主意。咸丰十一年（即1861年），元宵节过后，李光斗召集天门寺四周除周姓外的各族长计议，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要把天门寺由家庙变为会庙，各姓族长无不赞同，并自愿凑钱，请李光斗领头诉讼。是年2月，李光斗礼请天门寺的斋公（带发出家的人）来家做斋念经，故意留宴至深夜。李光斗派人分为二路，一路人偷偷地去挖开天门寺后山多年的斋公坟墓，撬开棺木，将棺内斋公的头发取出，一根不留。然后把棺盖好，墓复原样；一路人进天门寺庙内，把庙内梁上书写的“周氏族人同建”字样改为“徒义、东烟同建”字样。然后涂上桐油搅拌的锅底灰。待两路人完事后回来，始送在李光斗家吃得酒醉迷糊的斋公返回天门寺。

是年腊月。李光斗向县衙起诉，控告周姓仗势欺人。霸占天门寺会庙为家庙。此案使得知县左右为难。原告人是得罪不起的李光斗；被告人也有几位戴银、铜鼎子的周姓举人或秀才。原告、被告在大堂展开辩论。被告拿出周氏族谱作证，李光斗反驳：“族谱系自编自印，不足为凭”。被告人反问：“你说能作凭证的是什么？”李光斗回答：“第一要检验天门寺庙内悬梁上的落款，如系家庙必书周氏建立，如系会庙必落款会名。第二要开棺检验远年掌管天门寺僧人的尸体。”知县问：“检验庙梁可以，死葬多年的尸体，肉身已毁，如何作证？”李光斗朗朗陈词：“肉身虽毁，骨发犹存，如是家庙葬者必是斋公，有发可验；如系会庙，必是光头和尚，无发可寻。”知县听后连连点头，

被告人也无词反驳。双方同意请知县检验，并记录在案。次日，知县并原告人和被告人，同时坐轿至天门寺，轰动县城和徙义、东烟两万余人，赶往天门寺看知县断案。知县令人擦去悬梁上的灰尘，显出“徙义、东烟同建”六字；又掘坟开棺验尸，却有骨无发。被告人心里不服，但有言在先，且记录在案，只好凭知县判决。于是天门寺由家庙变成会庙。从此，天门寺周围民众，进香集会、玩龙灯、狮子讨赦，不再受限制了。

清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黄安大旱，田地歉收，百姓饥寒，流离失所者甚多，而朝廷的田粮捐税分厘不少，逼得不少穷人投河上吊。当然李光斗的田地收入也严重减少，李光斗便召集五十会会首商量上书请愿，呈请朝廷减免田钱捐税，大家公推李光斗领头向黄州府请愿，经费由各会筹措。李光斗至黄州知府，呈上请愿书，呈文写道：“……官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民无食，则官无本，请免田粮，以救灾民百姓……”。知府看罢，暗暗思忖，现今正值荒年饥寒，百姓到处闹事，皇粮国税，谁敢减免，来人必是刁民讼棍，让他一人带头，众人起哄，我这个知府如何向上交代，不如抓一个进行严惩，杀一儆百，以警效尤，遂以抵抗朝廷国课罪将李光斗打入监牢。随即呈文上报巡抚批准，判李光斗为死刑，并判定斯年冬至日斩首示众（注：清律，判处斩刑的人在冬至日处决）。

当年，正值省试秋闱结束，李光斗的儿子李雨村与同姓另一秀才落第归来，闻父亲李光斗被黄州府冬至日问斩，二人急奔黄州府刑场活祭。当两位后生身着长袍，外套马褂，头顶翘帽上闪亮的铜鼎子，手捧香纸鞭炮，盒盛酒食，走进法场，并排跪在李光斗面前，接着三人抱头痛哭，情动法场周围观众，哭罢始敬酒燃香鸣炮而去。监斩台上的知府看到这情况，便将李光斗带到督斩台前发问：“活祭者何人？”李光斗答：“罪民二子，闻罪民服刑，赶来活祭”。知府沉思片刻，即放下朱笔，命行刑人将犯

人带回监牢。原来清朝最重功名，而且认为功名必出自有德之家。知府听说这两秀才是李光斗的儿子，心想此人必有德行，否则不会二子齐入黉门（注：考入秀才，称之为黉门），且知府本身是秀才、进士出身，暗生同情，便再度呈文巡抚批准，将李光斗免罪释放。

清同治九年（即1870年），附近高桥河坑陈姓富翁，有子名敬祖，游手好闲，终日赌钱，其父恨而训之，不听，父怒，锁敬祖于房中，敬祖扳断窗柱而逃。父发觉，手捉儿衣，敬祖情急，用手推父，误中嘴而落父齿，父怒，告忤逆于官。清律：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敬祖惧，携银三百两，跪求于李光斗面前：“敬祖不肖，日事赌钱，不听父训，以掌推父，误落门牙二颗。父怒告官，求老爷救命”。李光斗怒视不语。敬祖跪叩而祷之：“敬祖无兄弟，我死而陈门必绝后，老父虽一时气愤，久后必悔，求老爷发慈悲，存陈氏一脉，则陈氏祖宗感德，敬祖必接草衔环以报。”李光斗沉思后训之：“赌钱是犯罪之根源，富人赌钱，必至倾家荡产；穷人赌输，必生歹心，偷盗抢劫，自投法网。你不听父训，已属不孝，以掌击父，死有余辜。如能诚心悔改，或能死里求生。”“敬祖愿痛改前非，求老爷救我。”李光斗命其附耳过来，聆听密计。敬祖凑近，侧耳听计。李光斗突然咬住耳朵，鲜血直流。敬祖负痛而怒：“我将死之人，求救不许，不该咬耳使我死前受罪！”李光斗微笑说：“正是为救你才咬耳，明日见官，只需如此这般回答，保你不死。”次日见官，敬祖跪陈：“父怨我赌钱，恨咬我耳，我负痛而逃，致落父门牙，”官验缺耳，果有齿痕，遂训斥敬祖，劝勉陈翁而罢讼。

隐 退 时

当年，我县南乡有一富户。人称吴四老爷，也是个有财有势的人，连县太爷也怕他三分。有一次，县太爷宴请豪门，吴四老

爷到县太爷家作客，各界豪门见吴四老爷驾到，纷纷起坐迎接，唯独李光斗的大孙子李固诚坐着不动，吴四老爷见此心中不快，认为有藐视自己之意，便走到隔壁，故意大声的问县太爷：“刚才坐着的那位是哪家的后生？”县太爷答：“李光斗家的大孙少爷。”吴四老爷故意挑逗地问：“他家有几多田产呢？”县太爷答：“有八百石田。”吴四老爷挑衅地夸口说：“你作个中人，叫他写个字据将田全卖给我！一手交约，一手付银”。其时，坐在隔壁的李固诚听得清楚，气得无言可说。回家后将吴四老爷奚落李家的情形诉予李光斗，李光斗气得脸上发赤。从此，两家豪门便结下了仇怨。有一年，东上店附近的夹沟坑，有王姓者户主死，留下一寡妇（后妻）和前妻的儿子，因家庭困难儿子瞒着后母托人写好契约把田产卖给了李光斗。吴四老爷得知此情后，便乘机托人暗地串通寡妇，用同样格式和日期写一张契约将田产卖给吴四老爷家。待第二年收租时便发生争斗，李家说这田是李家的课田，吴家说是吴家课田。两家相争打官司，报到县衙里，县太爷奈何不得两大豪富，只好将官司推到省城。此时，吴四老爷的二哥吴文源在平渡洲做知州官，吴四老爷便通过其兄吴文源串通省衙的宜吏，最后经省衙断定：“父死从叔，无叔依母，此田因以母契为证。”在这场官司中，李光斗打输了，于是威信扫地。他便隐退家居，并将家事委托其长孙固诚掌管。同时，又推荐族侄李士显为东烟会会首兼黄安五十会首领。这样，李光斗千石田的愿望没有实现。所以，号称千石田的首富李光斗实际上不足800石。

李光斗一生剥削、欺压百姓，但在晚年为了收买人心少落骂名，也做过一些善事。

建凉亭、施义茶。清末，从县城南下黄陂、汉口，必经缠三里这条山大路，春夏秋冬，南来北往，肩挑车推，行人不断。李光斗为了方便过路行人，就在缠三里跨路修建凉亭，亭内沿墙摆设石条，以供行人休息，可坐可睡。又于亭东劈山建一石屋，派

专人煮义茶为行人解渴。

开药铺、施药救贫。宣统二年（1910年）。李光斗见时疫流行，病人日多，遂命长孙李固诚开设一药铺，聘请名医为时人治病，对家境贫寒的患病人，看病付药，只记姓名，不收药费。

施粥救灾民。凡遇荒年饥岁或歉收青黄不接时，当地饥民甚多，李光斗就命家人四处张贴告示放赈施粥，每日两餐，四方饥民前来就食。

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李光斗已是八十大寿，儿孙满堂，五代同居，生日那天，知县亲自送寿匾一块、对联一幅，寿匾上书斗大金字“慈善之家”，两边对联是：“千顷良田，四方仰德；八旬高寿，五世同堂。”李光斗这天十分高兴，也亲书寿联一幅云：“年享八十春，虽死不为短寿；课收七千担，不富亦算小康。”当时，歌功颂德有之，怨恨讥咒者亦有之。有一秀才就李光斗生日亦作一联为其写照：“年享八十春，老而不死，课收七千担，为富不仁。”这幅对联流传着成为时人的口碑。直至今日人们谈论起李光斗的生日，总爱提起这幅“老而不死”的对联。

李光斗在生之时，已是堂同五代。他死后子孙相继繁衍，其后裔甚众。由于历史的变迁，有的已远离故土，移居异域他乡。而今邻里族人，一提起大塘坑，仍然还是相称李光斗，对其后裔却不甚了然。

陈勇整理

两任黄安知事李墨林

高叔樵 罗以谋

李墨林，号西园，河北天津人。他曾受北洋军阀湖北督军署委派，两次出任黄安县知事。第一任的时间是1919年至1921年，第二任是1925年至1927年。李墨林虽初到鄂东黄安，人地生疏，但任职期间，他为人圆滑，长于世故，善于依靠当地人办当地事。因此，李墨林两宰黄安，百姓对他没有恶感。

1919年，李墨林第一次出任黄安知事期间，他能秉公办事，因未迎合地方上土劣们的心理，支持他们为所欲为，故遭到他们的攻击，在处理县务上处处作梗。如河汉会（现二程民利）劣绅杨干卿，此人为人暴恶，常以权势压迫穷人。杨干卿是二程张杨家垸人，有田200多石。他既是县议员，又是个大绅士。杨干卿权势很大，不仅张杨家垸人人对他唯命是听，而且邻村的老百姓见了他也畏惧三分。张杨家垸背后有一个15户人家的小垸叫楼子周家垸，全垸姓周，垸前面有一座山林历属周家垸周姓所有。而杨干卿伪造契约，硬说这山是他们垸的座山，是属杨姓所有。周姓不服，找出他们周氏族谱，族谱上绘有图，证实这山林是属周姓的。杨干卿还是置事实而不顾，告到县署，企图霸占。双方为此事打官司至县知事公署，知事李墨林为了搞清这件事，带着县衙役乘轿亲自到河汉会现场察看。杨干卿得知县太爷亲到现场，便设宴款待他们，并邀请东烟会（现城关金沙）议员李芥仁、李香蕖（均系杨的内亲）作陪。李墨林虽然应邀赴了宴，但饭后对此事并未表态便坐轿走了。杨干卿自以为这个官司一定能够打赢，过

了几天，县署下传票，传原告杨干卿，被告周姓代表周光坦到县署。李墨林当着原告和被告的面判决，此山林周氏族谱上记载得非常清楚，证据确凿，应该属周姓所有，杨干卿伪契约，实系图谋霸占。杨干卿听后气得翻白眼，说李墨林贪赃枉法，庇护周姓，并下决心要上告，摘掉李墨林的乌纱帽。1920年年底，杨干卿告到湖北省督军署，状告李墨林贪赃枉法，庇护周姓，告周姓仗势霸占山林，并在汉口用重金聘请了律师。被告周姓是周光坦出庭。周光坦是楼子周家垸的一个普通青年农民，他曾读过三年书，有胆略，能言善辩。周光坦出庭，得到了武汉一个周姓律师的帮助，在法庭上将杨干卿驳得理屈词穷。省督军署还派员查清李墨林在此案中无受贿贪赃嫌疑，要杨干卿向李墨林赔礼道歉。杨干卿为此事输了官司又赔了钱，搞得威风扫地，因此对李墨林怀恨在心。杨勾结议员李芥仁、李香蕖、阮纯清等人，对李墨林处处进行刁难，1921年，李墨林第一届任期满，便离开了黄安县。

1925年，李墨林第二次任黄安知事，他决心同当地豪强再次较量一番。他曾经对老百姓说：“我两宰兹土，亲如故乡”这也说明李墨林对黄安有依恋之情。

李墨林第二次出任黄安知事期间，正是黄安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之时，尽管革命活动是秘密进行的，但在社会上和群众中影响很大。如当时县署的文案师爷冯晓初的儿子冯重璇系国民党员，钱粮师爷雷作霖的儿子雷绍全系跨党党员。他们在县城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之事，李墨林虽然知晓，但他佯作不知，对他们的革命活动未加干涉和阻挠。当时，黄安进步组织“青年协进会”中的成员吴亮友、王文焕等人，上街散发传单，遍贴标语，反对军阀吴佩孚搞食盐加价，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反对议参两会的议员各设救灾捐款，盘剥群众。议员们看到传单、标语非常恼火，参议会出面要求知事李墨林严密彻查，实行弹压。李墨林对此却一味虚

与委蛇，不了了之。当时湖北省督军署多次密令他严密监视革命党人的行动，并授予他对证据还不太确凿的革命分子，就地处决，准其先斩后奏的权力。而他对省督军署的密令，表面上积极奉行，实际上持漠然置之的态度。1926年北伐胜利，10月，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在讨论县政人选时，大家认为李墨林虽属北洋军阀委派的官吏，但他思想上倾向革命，革命党人开展的革命活动未加干涉和阻挠，决定让他继续担任黄安县长。12月，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同意李墨林留任黄安县长，并将县知事公署改为县政府，称知事为县长。后来县党部又吸收他为国民党员，李墨林能继续担任黄安县长，又加入了国民党，他乐不可支。从此，他消除了恐惧心理，积极支持革命活动。1927年“七·一五”事变后，李墨林被清乡团列为通缉的首犯。李闻此讯就乔装成商民，潜逃至武汉，后来又逃回天津。

李墨林第二次担任黄安知事，就我的记忆，做了几件值得留恋的事。

一、关心旱情，设法度荒

1925年，百年未遇的大旱，严重地威胁着地处大别山麓的黄安城乡。农历四月间，李墨林视察全县，目睹塘堰干涸，树木野草枯萎，路上尘土飞扬，麦子歉收，又无水插秧，饥饿的老百姓一个个鸠形鹄面，这满目荒凉、惨不忍睹的景象使李墨林忧心如焚。一些老百姓请求知事设坛求雨，李墨林明知求雨是一种迷信，也只好顺从民意，于5月下旬，不畏酷暑，不畏路远山高，日夜跋涉至天台山，请道士设坛求雨。虽然天仍然没有下雨，但知事爱民之心意已尽。眼看求雨未下，农民抗旱无水，大荒之年已成定局。怎么办？李墨林想尽千方百计，使农民度过荒年。

1、知事公署出示布告，严禁本县粮食出境。我记得布告贴到了几条主要街道，内容大意是：黄安县城乡，去年冬季少雨，

大部分农户未种上麦子，今年春季雨水更少，麦子歉收，入夏以来，滴雨未下，故栽不上秧，全县旱情严重，灾年已成定局。凡我县富裕之户，多余的粮食要按知事公署的规定价格出售。具体规定是：①严禁大户奸商囤积居奇；②禁止粮商乘机抬高粮食价格；③严禁粮商在粮食里掺沙灌水；④严禁粮商乘机偷运粮食出境，违者没收粮食，捉拿是问。

2、开丰豫仓放粮赈救灾民。黄安的丰豫仓始建于清道光年间，座落在本城后西街李氏祠对面，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四周墙壁全是古青砖所砌，地面全是厚木板铺成，可装粮食1000万多斤。丰豫仓历来用于储备粮食，每年县公署所征粮食存入此仓，遇到荒年，县署不收利息，借给农民，第二年如数归还，如有特殊情况无力偿还者可以免还。1925年夏，李墨林开丰豫仓，将大部分存粮赈借给灾民，以救燃眉之急。

3、动员全县富户放赈救灾民。同年夏，知事李墨林亲自下乡到各会，动员富户放赈救灾民。一些富户被知事的诚心所感动，主动放赈。如龙潭寺的大户僧晓静，在龙潭寺周围的村庄一次借给农民稻谷四千担，不取利息，次年丰收便如数归还，如果歉收可以缓还；东烟会大塘坑富户李蔚仁施粥赈，每天两餐干粥，持续两个月；河汉会富户杨干卿，为了缓和同知事的关系，树立个人威信，他每天中午施一餐干饭，领赈者每人一斤（十八两一斤的老秤），持续了50多天。

4、成立救灾委员会。救灾委员会由李墨林兼任主任委员，议参两会的会长任副主任委员，议参两会的议员负责处理救灾的日常事务。救灾委员会成立后，一次，李墨林以救灾委员会的名义动员工商界捐款救灾。1925年秋，全县共收到捐款十万余元（银元）。后来这笔巨款大部分被议参两会挪用，小部分投入救灾。当时黄安青年协进会得知此事后，会员吴亮友等十多人走上街头，遍贴标语，散发传单，揭露议参两会各借救灾捐款之名，盘

剥老百姓的罪恶行为。我印象很深的是标语上有“名为救灾，实为幸灾”两句，写出了老百姓对议参两会所作所为的愤恨。救灾委员会还专门出有红绿两种颜色的钞票，票面值为“壹串”曾一度流通市面，名为救灾，实乃剥削老百姓，但时间不长便倒了。

二、灾民抢粮，衙役受惩。

1925年，县北士绅阮纯青乘干旱之机，伙同李家集的粮商，在七里坪囤积粮食数十万斤。四月间，他们无视县知事公署关于严禁粮食出境的禁令，将二十万斤粮食偷运至李家集（当时属黄冈县辖）出售，企图从中牟取暴利。当装载粮食的竹排行至现桃花乡沙河王家垸附近时，竹排搁浅。此时农村正处在“正月长长，二月遥遥，三月饿死老小”青黄不接的紧要时刻，农民们在当地农运工作者的领导和发动下，沿河两岸的群众，抢光了粮商偷运的粮食。二十万斤粮食数目惊人，粮商们对这一惨重的损失十分痛心，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向知事公署控告农民抢粮之事。县知事公署即派衙役多人下乡缉拿抢粮的农民，穷苦的农民团结一心，守口如瓶，没有露出一一点破绽，衙役们抓不到一点证据，抓不到人，便乘机在沿河两岸的村落敲诈勒索，农民深受其害。时隔不久，李墨林传讯了原告，当面对粮商们讲明了县署早就出了布告，严禁粮食出境，虽然你们的粮食被抢光我们有责任追回，但你们偷运粮食出境违犯了县署的禁令，即使追回了粮食，县署也要全部没收。知事的这一判决早在粮商们的预料之中，听了这一番话，他们冷了一节，知道这个官司打下去没有什么价值，便撤回了诉状。

时值暑假，在武汉读书的黄安籍进步学生吴亮友、王文焕、徐希烈等人了解到，县署的衙役以缉拿抢粮农民为名，对桃花乡沙河王家垸一带的老百姓进行欺压和敲诈，老百姓深受其害。这些进步学生义愤填胸，主动出面，为受害的农民告状。他们向县

知事公署递交了事先写好的诉状，陈述了衙役们在乡下骚扰打劫无恶不作的种种行为，李墨林受理了此案，经调查确系事实，便将为首的衙役关进了监狱，其余的也都受到了惩罚；对受害较深损失较重的农民，都一一进行了赔偿。

三、捣赌博戏，扶正压邪。

1925年，在黄安城乡盛行唱亭子戏。亭子戏就是一些流氓地痞、赌棍在当地士绅、贪官的支持下，请戏班子唱戏。赌徒们在戏场摆赌案，根据看戏人的多少，案子可多可少，多时赌案达二百多台，少时也有一百多台。出面包亭子戏的头头们，便逐个向赌案收取经费，这些经费，一部分作为戏班演职员的工资，当时唱戏的生活费用，以及导具折旧等开支；一部分交士绅、官吏作为进贡，剩余的由赌徒们任意挥霍。这种唱戏的办法，美其名曰亭子戏，实际上是唱赌博戏。

1925年9月上旬，赌棍秦子舫、秦锦山在县城士绅胡贡先、吴静如的支持下，请了著名的“福海”戏班在沙坪会（现属杏花乡十里辖）戴家坳唱亭子戏；另一处是劣绅李士显请武汉“楚新”戏班，在东烟会（现属城关镇金沙辖）的天马寺为他唱寿戏，实际上是唱亭子戏。这两处各摆赌案二百多台，声势之大轰动四乡。李墨林知道此事后，亲率县警队四十多人，首先到戴家坳，包围了戏台和赌场，当场捉拿了以花旦桂香为首的二十多名演员，捣毁了戏台，焚烧了导具，逮捕了赌棍秦锦山等十余人。李墨林将捉拿的演员、赌徒关进了县城监狱，第二天准备捣毁天马寺戏台，然而李士显闻讯速拆台，停演。当李墨林带着人赶到天马寺，唱戏的、赌博的、看戏的早已消声匿迹。

李墨林捣毁赌博戏，扶正压邪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这次赌棍秦子舫、秦锦山等与官吏、士绅勾结唱亭子戏的内幕，县城一名读书人吴南陔（又名吴舫）非常清楚，他对知事李墨林力捣亭子

戏，扶正压邪的主动十分钦佩，对绅士、赌棍们的行为深恶痛绝，他即兴写了一首打油诗，揭露士绅、官吏、赌棍们互相勾结的丑态。当时我抄录下来，现在翻开，内容是：多只谓沙坪会来把戏唱，惊动了四乡下多少儿郎。戏台上一阵阵锣鼓声响，赌案上吆喝声回荡戏场。戏班人都说黄安的戏不大好唱，胡贡先、吴静如（均系士绅）手拍胸说我们一手承当。你们若这台戏不愿心唱，我将你们一个个捆送班房。戏班人听此言魂飞天上，尊一声各老爷细听端详。只要是各老爷将险保上，唱十本或八本，我们承当。秦子舫喜在心将台搭上，次日里请些人搬上戏箱。一开演看戏人云集戏场，戏唱了三、四本热闹非常。赌棍们在赌场吆三喝四，看戏人想观赏名旦桂香。这时候县署勤务熊滕来场，上赌案把些钱输得精光。熊滕找秦锦山帮忙付帐，秦锦山听此言恶气昂昂。小熊滕见此情去禀县长，李西园（李墨林）带警队四十条枪，将锦山和戏子一齐捆绑，并将花旦桂香带到二堂。绅士们听到了锦山那还不讲，听捉了花旦桂香都很着慌。遭不幸只因为换了县长，李西园在黄安复坐县堂。黄晓雅（士绅）见此心惊肉跳，畏知事避风头返回农庄。唯有个石季平平安安区长，他去找汪焕坤，又找南阳。偶遇着邓海山筹备处长，进县署与桂香说情帮忙。十日里县太爷将戏子都放，冯晓初将桂香接到客堂，小桂香到客堂干爷拜上，冯晓初见面礼官票十张。干娘说做衣服现赶不上，缎子帽、卫生袜，鞋子一双。小桂香出门来儒学一往，儒学里正在唱产子磨坊。孙团副叫桂香我把话讲，你若是与我把朋亲结上，换一套寒衣服又待何妨。宋友山、王云山（均系士绅）真是混帐！他们说孙团副不顾面光。孙团副脸一红乌龟模样，听此言羞得他起身离场。回家去命小乔儒学一往，送给那小桂香官票四张。小桂香出儒学刘斌（开大烟馆的）家往，吃几口鸦片烟再把饭赏。雷作霖为桂香把铜元放上，陈康储也花了官票两张。大夫地孟斌楼这回身抱贵恙，畏风寒因此上未到戏场。小花旦进城来也把他拜了

一趟，曹秀姐（县城名妓）闻听后闹了一场。只搞得黄安县乒里乒乓，这家接那家请筵席几张。张之清（县商务会长）开客单将行钱上，冯晓初将桂香接到客堂。众街邻都问这是为了哪样？为的是名旦桂香不枉来黄安一场。

这首打油诗，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县城居民茶余饭后的谈资，以发泄对士绅、官吏、赌棍们的不满。

（王文金 整理）

回忆父亲谢知三

谢淑芳 谢伯祥

坎坷一生

我的父亲谢知三，原黄安县的名医，曾自号庸中隐，又号酿粥。世居红安县八里区中和乡谢家垸，生于清朝同治九年（1870）那时正是科举时代，父亲天资聪颖，少时勤奋好学，早有驰骋当世之想。后因身体长期患病，两次考试不第，加之，不满于当时清政府的黑暗腐败，遂放弃科举，潜心学习中医，通读中医书籍，遍访各地名师。由于他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因此，他逐渐成为当地名医。

四十岁后，父亲以医为业，游历于京都豫鲁江浙等地，凭医道走遍全国名山大川，放怀于山林泉水，遗世独立以终身。不料我的哥哥（当时父亲唯一的独生子）和母亲相继病世。父亲闻讯归家，既痛门庭冷落，又悲后嗣无人，乃于次年复娶我母，生我姐弟三人。那时父亲已五十多岁了，一家数口生活困难，父亲便先后在武汉、宋埠等地行医来维持家中生活。父亲在武汉行医期间经汉口特别市卫生局考核为国医。后来，他应宋埠杨太和药店的聘请，在该店坐堂行医，直到日寇进攻才回乡。1939年，父亲又到武汉去行医。1945年转至宋埠同谢家楷、李文卿等人，在宋埠东门外魏家咀合伙开一小药店行医。我（伯祥）当时就在那里当学徒，小弟伯威十三岁就在武汉当学徒，不满三年就患病死了，给父亲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1947年秋，父亲因年老体衰回到乡里，于1950年元月病故，终年八十岁。他著有《医鉴》、《诊余随笔》及《心远轩诗存》等。

父亲的一生，可谓坎坷的一生。尤其是晚年儿女幼小，家境贫寒，时局动乱，为生活所迫，东奔西走，受尽了磨乱。

医 德 医 风

父亲平生乐善好施，最关心民间疾苦，济困扶危，救死扶伤，为穷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我们小时，父亲在乡行医，对穷人诊病格外小心，他常说：“穷人靠体力劳动谋生，经不得患病，病了请不起医生，买不起药，只有听天由命了”。所以，父亲给穷人诊病不但不要诊金，对最困难的人还给钱让他去买药，因乡村买药困难，父亲就自己买了许多成药，施药送诊数年，乡间一时称颂。后来父亲到武汉行医，还常常带药回家，教我们按某药治某病，施送给人。

我们随父学医，父亲经常告诫我们：“医术是仁术，要有仁心，不能象某些医生只图赚钱，拿技术去骗人。”在宋埠药店里，父亲特写下座右铭：“医药谋生，切莫骗人，炮制遵古法，力行近乎仁。周急不济富，取利要怜贫。自己亦平民，要与穷人心连心”。他爱作诗，他的词句有：“庸医胆为穷民小，忧国心因灭种寒。”他的朋友李知五曾有诗赞他曰：“独知甘苦怜贫病”，可谓对父亲的医德医风的最好评价。

洁 身 自 好

父亲性情刚直，品格清高，注重气节，不畏权势。1938年父亲回乡以后，由于日寇横行，游匪猖獗，农村日夜不宁，无法谋生，父亲只得又到武汉去行医，当时，武汉在日伪统治下，市面萧条，年近七旬的父亲只身在外，收入微薄，处境维艰。当时，武汉日伪警察总监刘翰如（红安县鹿儿区人）、警察厅厅长吴伯龙（红安县八里区陡山村人）都是父亲的同学，经常请父亲诊病，看到父亲的窘境都很同情，就叫父亲到警察厅去当一名医

官，每天只去报到签个名，不必在哪里上班，每月可领取几十元日钞，有点固定收入，可以缓解一下困难。父亲断然拒绝，甘受穷困，保持晚节，不愿接受日伪的施舍。还有一次，父亲在街上行走，经过日伪岗哨，没有停步敬礼，被哨兵拦住毒打一顿。从此他愤然回乡，誓不再回武汉。后在宋埠城外开小药店，城里是日伪驻军，父亲从不进城。

日寇投降之际，父亲的孙儿在家乡降生了，父亲晚年得子，快到八十岁才添孙子，这是平生最高兴的一件大喜事，打算立即回家看看。恰在这时，国民党八里区区长肖俊成派人送来请帖，请父亲到八里坨参加绅耆宴会，此次区里宴请的都是本区的绅士耆老，非常隆重。我们以为父亲正可借此机会回家（八里坨离我坨只七、八里路），父亲不但不去赴宴，竟连家也不回，一直过了两个多月才回家。

倾向革命又害怕革命

父亲在旧社会整整生活了八十年，亲身经历了几个朝代。在那灾难深重的旧社会，兵荒马乱，外强入侵，人民民不聊生、灾难重重，父亲忧国忧民，常寄希望于革命。我的哥哥谢伯庸，少时读书习武，饶有胆识，且富于革命思想。为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他和本县的刘伯英、阮楚才、吴伯川等人奔走革命数年，父亲积极支持，在经济上给予资助。后在卢家大山起义攻打李家集失败，阮楚才被杀，父亲又害怕了，不让哥哥再出去，要他在家教书，哥哥壮志未酬，于1920年病逝，年仅二十七岁。

土地革命时期，父亲在宋埠，母亲和我们在家乡，我乡已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父亲对我们非常耽心。大革命失败后，我们都到宋埠居住，开始上学读书。那时程汝怀任鄂东剿共总司令兼黄安县县长，大量搜捕杀害革命同志。我坨有个叔叔叫谢吉三，在县里当秘书，奉程汝怀的命令，到八里坨去捉我坨的人，有谢帮

俭、谢帮林、谢光祥、谢声文、谢声旺（还有一个记不清）共六人，他们革命时当过干部。吉三先到宋埠，顺道看望父亲。父亲闻知此事，勃然大怒，斥责吉三：“做了官不为桑梓做点好事，反而助纣为虐，残害穷人。”吉三说：“这些坏人不杀不行。”父亲说：“这些都是穷苦老实的农民，没做坏事怎么说是坏人？”在一场争论之后，他立即写信给程汝怀，用自家性命力保这六人，程慑于父亲的威望，竟取消了缉拿，没有拘逮这些人。父亲与程汝怀并无瓜葛，只因程汝怀的父母、兄弟都住在宋埠，平时少不得请父亲诊病，父亲为人正直，早为程所钦佩，所以父亲的一封信起了这么大的作用。

尹河区刘华英，当年在新四军里工作，1946年3月负伤回尹河，驻宋埠的国民党七十二军违背国共在宣化店谈判时不提伤兵的协定，将刘华英捉去，有生命危险。父亲人上托人，通过各种途径，多方营救，方得释放。解放后，刘任红安县水利局局长，至今他见了我们，常提起此事，对父亲感念不已。

抗战时期，中共陂安南县长董绍明驻在我垸附近的杜家田，他和父亲交往甚密，感情很好。父亲在宋埠，每次回家和他互相看望，有时为他们诊病，他经常派人到宋埠托父亲买药，那时西药要到日伪的医院里去买，父亲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1983年董的长子董德茂同志在湖北省纪委工作时，我（伯祥）曾去看他，董说我们两家是世交，可见我们父辈之间交谊的深厚。

1949年春，我们家乡解放了，我（伯祥）参加八里区支前工作并担任农会和乡政府财粮委员，淑芳当时从事医务工作，父亲虽年老体衰，但还经常教导我们：“做人要正派，办事要忠心，财经要清白，待人要真诚。”

（陈勇 整理）

扁担二老爷

苏本友 徐念书

在觅儿寺镇，谈起扁担二老爷，五十岁以上的人，几乎人人皆知。

扁担二老爷，本名徐东升，1873年生，1939年去世。他是当地有名的士绅，当过五十会会长。他身材高大，长约一米八五，体重二百多斤。他的一对奶与平常男子不同，象育龄妇女的乳房一样，又大又丰满，挑秧时袒胸露肚，两奶在胸前一打一打的，常逗引得人们痴看生笑。他没文化，有力气，用圆木碾米，杠子作扁担挑过多次秧。他性子直，个性强，说话高声大噪，敢说公道话，而且说话得算数，又因他在兄弟当中排行老二，为此，人们习惯地叫他扁担二老爷。

扁担二老爷，力能制服触人牛，用双手举起过一担小麦。有一年大旱车水灌田，别的四人一乘车，他一人一乘车。他拜曾是清朝武举人的叔叔为师学艺，叔父用的青龙大刀，老秤九十六斤重，他练武时也拿着用，能舞弄玩花。叔父练武用的一对石锁，象两个小石滚，有四五百斤重，他常提来练功。有一次与人斗狠，他双手提起两只石锁在垆前屋后走了整整一圈。他能做能吃，用大土罐子煨的肉，一餐可吃八斤，有时一餐可吃四斤米的饭。

1912年，住在河口的盐局常找茬子对一些小商小贩进行敲诈，二老爷本没有做盐贩生意，但盐局听说二老爷家富有，便起心敲一竹杠。一次，特派十个人，带着枪支到觅儿寺找二老爷算帐，满以为可捞一笔钱财。当时有人见盐局的枪多势众，便劝二

老爷躲避，不可硬抗。血气方刚的徐东升，咽不下这口气，他不听旁人劝告，赤手空拳朝着盐局拿枪的人迎面而走，不等近身，他便先下手，一个箭步上前，挥舞手臂，一下子将盐局四个人的枪支挽在腋下，又猛一用力，将四个人和四条枪支高高举起，忽又摔进路边的臭水沟里，将那四人摔了个仰面朝天，衣服透身湿不说，还喝了几口脏臭水。盐局其他六人一见，惊慌失措，想开枪打，但四周围有不少人，自己的四个被打兄弟捏在徐东升的手上，便打消了开枪的念头。这一下，二老爷用胆略和武力制服了盐局的十个人。消息传开，四下乡里的人们称快，至今仍作为传奇的故事言谈。这次打盐局惹下了祸，二老爷与盐局打了几年官司，幸亏县长李墨林出面调解，案事才算了结。

在觅儿寺镇，二老爷家开有屠铺、当铺、糟坊、作坊、商店、绸缎铺，他一家的铺面占了半条街。他手里出过油纸票子，在觅儿一带、麻城宋埠和本县七里等地通用。有一年，宋埠有个大老板听说二老爷家的纸票子走红，便想试探虚实，特地在附近收了不少二老爷家出的纸票子，带着随行人员用红车推到觅儿寺，找二老爷兑换银元和铜钱。二老爷一见，当时的确拿不出那么多硬货，又不能任在客人面前掉了底子，他便心生一计，先只字不谈兑换之事，安排人员设宴招待，领客人看他家的铺面。夜晚，他派亲信悄悄地到附近几个大钱户联系，将银元和铜钱收到家，然后笑问宋埠客人，是要银元还是要铜钱。宋埠客人本来是想摸摸底细，眼下亲见二老爷仗义疏财，家底厚实，又知自己拉不动那么多银元和铜钱，只好暗暗地叹了口气，依然推着纸票子返回宋埠。

谈起二老爷卖肉，几位老人很有兴趣地说，每当过年或节日时，他家有杀几十头猪，觅儿寺和附近荡家田垸里的住户，有钱无钱都能割到肉，有钱交钱，无钱记帐。有的穷困人家赊了一次再不好意思赊第二次，二老爷就站在屋后的山坡上，双手叉

腰，高声大噪地叫着户主的名字，喊到他家去割肉。人家回答没有钱，他又大着嗓子讲：“不要怕，过年过节哪能不吃肉，先割去再说，等钱财活动了一些再付钱。”

二老爷有五男二女，是个有钱人家，可他很注意节俭。年过半百后，从没在家过个生日，每逢八月初二生日那天，他总是到岳母家躲生，他的妻子彭氏嗔怪他小气。二老爷的孙子、曾孙有的在觅儿寺老家，有的在县城，还有的在黄石和贵阳。

县南名医吴慎斋

李述治

吴慎斋是解放前黄安（今红安）的名医之一。他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待人平易近人，看病不问贫富，且不收脉金，其医德亦倍受人称道。1945年，笔者曾在慎公家乡槽门村槽门小学，连续任教三年。1946年春，不幸中风，四肢瘫痪，多亏慎公的精心医治，始得痊愈。当时，慎公年已五十九岁，一部银丝似的长髯直垂胸腹，配上他那颀长五尺的身躯，给人以福泰慈祥的感觉，时人称之为美髯公。慎公至今虽辞世已二十三年（1966年8月逝世），但为了一代名医事迹不致湮没，笔者新近走访了慎公亲妹吴隆梅、儿子吴茂旭以及有关知情人士，谨将其生平、传略如下：

吴慎斋，号隆振，清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正月初六出生于高桥乡槽门村，其父从事香纸生意，叔父吴锡爵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医生，兄弟俩在河口镇分别开设裕泰店和香药店。慎斋六岁入私塾，十五岁熟悉四书、五经，十六岁应黄州府试，未中秀才。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慎斋转县立高小学堂就读，次年，从父命弃学去河口镇从叔父学医。叔父吴锡爵膝下无儿，于是，把继承医技事业寄希望于嫡侄。慎斋白天随叔父见习，晚上攻读药性赋及各种病症论和《本草纲目》。由于文学根基厚，所以学起医来易懂善记。三年后慎斋即能对病人独立诊断，到民国初年就已成为小有名气的青年医生。叔父吴锡爵看到慎斋进步很快，称赞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慎斋并不因此而满足，礼拜黄陂著名外科医生张若谷为师，学治痈疔外伤，后又与麻城眼科医师崔道成为密友，学习眼科治疗医术，慎斋还多方收集民间土药方，

集各家之长汇为一体。后来他试制成“炉火药粉”用以医治外伤，颇见奇效，在民国十年前后，西医西药尚未进入黄安，“炉火药粉”治疗外伤，曾风行全县。现年七十一岁的吴茂家告诉我：

“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我背上长了箩筛筐子大的蜂子窝，痛得我吃不得，睡不着，多亏隆振叔诊治，才救活我这条命，有了我这一家子。”他边说边指着家人感激而满意地叙述着，徐家垅徐汉清老人说：“当年妻子小腹生瘤疔，不痛不痒，常年流脓，婚后九年不生儿女，后来吴先生将妻瘤疔治好，才生四子一女。”可惜吴茂旭只见过“炉火药粉”的制法，不知其药物配料。慎斋一生积累的各种病症诊断的经验手稿及药方十一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连同医药藏书一起被抄焚。

辛亥革命后，一些散兵游勇，流窜河口，乘机敲诈商人，欺压市民，慎斋遂将药铺迁回老家槽门，在当地行医治病长达三十余年。

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董觉生、王鉴等率领党团工作组回黄安，发动知识分子，深入乡村搞土地革命。慎斋与董、王本系故交，一经串联便积极参与革命活动，被选为县土地革命委员会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曾短暂外逃，后隐居家乡，仍旧行医治病。

抗日战争爆发，黄安沦陷，慎斋对日寇汉奸深恶痛绝。1944年春，曾与抗日的安麻县长郑维忠、政委郑维孝秘密交往，动员吴姓管公堂的管事拿出稻谷六十石，加上自己的捐献，合计法币三十七万元，给安麻抗日县政府作抗日活动经费。同年三月在三圣庵中学任校长的董觉生，受国民党县长蒋荣平的迫害，逃避麻城山区，慎斋将其妻儿五口，接至自己家中居住，给予生活照顾，并介绍其次女董良士在小学任教。1947年，董觉生病逝于武汉，董必武曾函至慎斋，托其照顾觉生遗孀及侄儿、侄女。慎斋虽辞世，远在北京、武汉的董氏兄妹，仍时有书信与吴茂旭联

系，回国时必至其家问候，赠送礼品，以示不忘旧日情谊。1945年春，吴慎斋被邀请出席越南抗日民主政府举办的“三三制”参议会，还免费为抗日军政人员治病治伤。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秋，慎斋被选为保民代表，他为人直率，不畏强暴，对民事纠纷敢于直言是非，使乡民免遭霸强者欺凌。对慎斋的判断，持强者敢怒而不敢言。因此得罪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背后污蔑他是“八四”老爷（意即说话算话的人）。

全国解放后，1950年春，县长马友才邀请吴慎斋参加全县十三位名医的座谈会，马县长要求大家，授徒传医学，用自己的医术为人民服务。会后县长马友才还和到会医师合影留念。

1951年春，全县展开土地改革运动。经查实，慎斋家七口人，只有水稻田四亩，不够资格划地主。大儿从医，小儿就教，家无劳力，常年雇请半个长工（注：每日半天或隔日一天）。又查帐目，除药费钱者近百人，加上身任保民代表，遂划经济地主，药物和装药制药工具属工商业，依法不予没收，病人每天上门求医者，仍如往常。1953年2月，乡农协主席吴克华出面组织吴慎斋、王德绍、吴行九等三人，以慎斋为首在东上店开设联营诊所，周围十几里病人宁到诊所就医，不愿去县医院。由于慎斋在群众中威望高，从1953年起连续两届被选为县人大代表。1955年春，县人民政府接收慎斋在联营诊所，月给慎斋工资四十七元。这年秋，慎斋又被评为高级知识分子，政府每月另补助十元，并发给高知证件，供销部门凭证件每月平价供应糖、油、肉、烟等生活品。县医院裘忱允院长曾两次登门聘请他去县医院就职，慎斋以年老多病不能胜任，婉言谢绝。1955年2月间，董老回红安视察，特地派专人专车从东上店将慎斋接到县城会面。吴慎斋老医师抱病坚持在城关东上店卫生所任职，直到1966年8月，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9岁。

陈勇整理

十二寺者千姓寺元印明所修（年0421）年五十三附列于本碑刻
公田一，只么一其照 碑刻 刻修明县刻其 刻刻由人共主世火
黄安古寺庙之首 龙潭寺

汪德椿 李述治

采由地寺题款 一

我们从小就听老人讲，黄安（今红安）过去有三大寺庙——龙潭寺、永安寺和介林寺。介林寺的旧址位于现在的华河镇阳台山上，永安寺则座落在今丰岗乡，唯龙潭寺独出一奇，当年的庙宇竟然是建造在距县城以北十五华里的今长山乡境内的倒水河河床之中。乡下历来流传着三句话“龙潭寺的田多，永安寺的钱多，介林寺的拳多”，由此足以想见当年三大寺庙的盛况以及各自的特点。然而，自从民国16年（1927年）土地革命到现在，历经六十多年的沧桑巨变之后，三大寺庙除介林寺尚有部分庙宇保存原样外，其余二寺早已是面貌全非，不复存在了；位于丰岗乡的永安寺，多年就被改建成林牧场；龙潭寺早在1927年就被焚为一片瓦砾，1974年至1978年间，这里的人民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大兴移河改道工程，使这一片废墟变成了千亩良田，建成了红安的一大农场。当年位居黄安古寺庙之首的龙潭寺，如今已彻底难寻踪迹了。为了使后人能够大体了解该寺的概况并且见诸于文字。我们专程去过本县火连畈和位于该寺附近的梅才方村，走访了曾在该寺当过长工的九十二岁高龄的王茂志和现年八十三岁的姚得银等老人；还三次去麻城访问了从七岁出家到龙潭寺当沙弥，后准备定为龙潭寺二十九世方丈的僧月池法师，法号心豁。在座谈中，法师除详细地讲述了由其师祖传授下来的关于该寺始建何时及其兴衰经历之外，还献出了由他珍藏多年的传世之物——是该寺从一世至二十八世的全部方丈、执事名单，二是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单月手抄该寺的经文本以及心豁

法師本人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被汉阳归元寺授予该寺二十九世主持人的戒牒，其戒牒是用道陵纸印刷长一公尺，宽四公寸，上面盖有方、圆大小不等的六颗法印。根据心豁法师座谈情况和走访了上述老人的介绍，现概述如下：

一、龙潭寺的由来

龙潭寺旧址，位于今县北长山乡农场大楼西侧倒水河的河床中间（现已改为一片农田）。倒水河蜿蜒数百里，南北贯穿黄安全境，当河水流经这里时，由于地势平坦，水流缓慢，因而使水面扩宽，形成了从东到西有一千二百余米的河床。就在这个特别宽阔的河床中间拔地突起一个土墩，面积约150余亩，酷似一个椭圆形的岛屿，其北端呈尖锥状，“岛尖”把河水自然地分成东、西两股，此后河水落差增大，河床逐渐变窄，于是两水会流处便冲击成潭，潭深两丈余，水绿如兰。相传潭底有龙眼，直通东海，故名龙潭，龙潭寺便是根据龙潭而命名的。

龙潭寺始建于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据传在此以前，汉阳归元寺大沩祖椿法师，云游至麻城游仙山（黄安建县后划归黄安），挂褡（肩上驮的布袋子）来到位于海拔四百多米高的游仙寺，适逢阴雨连绵，山洪爆发。大沩祖椿法师站在游仙寺殿前廊檐下，西望倒水河，见黄水荡漾，沿河两岸低洼地一片汪洋，唯有河中土墩岿然不动，他马上叫寺里主持和尚出来一同瞭望，说这是一块难得的仙境佛地，并提出要在墩上建座寺庙。于是，大沩祖椿法师四方游说募化，谓河中之岛墩是一块盘龙宝地，因而能够水涨墩涨，若在墩上建庙，定能风调雨顺，造福于民。百姓为其游说所动，乐意捐款建庙，于是便很快形成有钱捐钱，无钱献力的捐献高潮。1405年冬动工开基挖土时，于一石块下挖出瓦罐两个，还挖出不少铜炉、铜盘等金属器皿。罐内各装有白银千两，这一发现，马上轰动四方。大沩祖椿法师更是因势利导，乘

机宣扬这是“天赐黄、白，资助建庙。”把它传为神话，四乡百姓闻之则更加热心捐钱出力，当年就建成了上、下二殿及僧舍耳房，大殿中塑有佛祖、龙王及水族诸神像，寺庙初具规模，大沔祖椿法师遂正式给它命名为龙潭寺。

二、龙潭寺的兴起和极盛时期

龙潭寺建起以后，大沔祖椿法师一方面招收僧徒，一方面将余款大量购买香火田。在封建时代，人们本来就十分迷信“神威”，加上大沔祖椿法师四乡游说，劝人从善信佛，因此庙中香火日盛，大小富人为了求寿、求福、求子跳龙门，不惜捐献土地、钱帛，有的甚至捐献整个庄园。穷苦人家有的因为缺衣少食，养不起子女，有的为摆脱贫困，求神灵庇佑，不少人便将儿子送到庙里出家，因此庙中僧徒日众，田庄年年递增，寺庙的收入也随之越来越多。庙宇也逐年扩建，并在土墩的东、西、北三面砌起一丈二尺多高的石块围墙，三面围墙各开一门，以方便和尚、香客进出，寺庙南面因紧靠河潭，因而只砌胸墙，起保护土墩不受河水冲洗和防盗的作用。

明朝永乐十年（即1412年），龙潭寺已有和尚二十多人，其中多数是沙弥，为了使这批年轻和尚能念经诵佛，知书达礼，大沔祖椿法师在寺内开办“隐修院”（相当现在半日制学校），亲自讲经授课，沙弥们半天听经课，半天做各种杂役。在大沔祖椿法师的教导下，沙弥们进步很快。此后，“隐修院”遂成为该寺和尚读经学文的场所。大沔祖椿法师还重视培养人才，把隐修院僧徒中，心地善良，虔心奉佛，而又德才兼备的沙弥，亲自送到汉阳归元寺受戒，使其获得戒牒后，作为龙潭寺方丈、执事的继承人。对一般和尚只在本寺剃度受戒，给受戒僧发给度牒，这些作法一直沿袭到1927年庙毁僧散。

龙潭寺随着庙田的增加，所收的田租谷也一年比一年增多。

在青黄不接时，有的贫苦农民揭不开锅盖，寺里便开仓，贷予借贷，待其秋谷登场，如数归还，利息不象豪绅那样苛刻。因此，农民争种庙田，远近乐于布施的施主日益增多，龙潭寺也就逐步兴旺起来。至明朝嘉靖元年（即1522年），寺内和尚已达80多人，另雇请的长工、火工60多人；庙田达600多石；寺庙扩建成殿堂、经堂、僧舍等各类房屋150余间，还建有犬房、猪圈和一个面积约一亩大小的放生池。犬房里豢饲养着照庙的黄犬近百只，猪圈和放生池均为施行善事而建。猪圈专用于收养五爪猪（迷信的说法为作恶的人投胎），而放生池则用于把俗人捉的龟、鳖买来放入池内。此外，还做木船两只，分置于岛墩的东、西两侧的河中，专渡来寺敬神的香客及过往僧人。所有这些都有专人管理。当时，龙潭寺规模之大，居周围百里寺庙之冠。

僧人的日常生活也有明文规定，清晨听钟声起床，梳洗毕，然后进殿堂，跪拜佛前，焚香拈柳念早经，其经文为：“香焚一柱，烟御九霄，结成凤录龙章，引鹭骖鹤驭，仰值日当该传递使者，下赴火堦，听宣关文，宣读关文，出班宣示，幽池不待月，池深月自来，皈命上圣慈悲主，惟愿慧眼遥观，参道随弥勒登上品，拈炉善信虔诚，愿诸佛早上莲台。嘛，缚 唵 罗 目 佉 哩 曳 娑 诃”。拜佛也有许多规定，其拜法与俗制不同，要求：（一）拜佛者需双手（十指并拢）合掌（斜向上）当胸，站于蒲团之前，两足作八字式，左右足距离二寸左右，足尖距离约八寸；（二）分右掌向下，按于蒲团之中心，左掌不动，两膝跨开，跪于蒲团上；（三）以左掌按于蒲团之前左边；（四）以右掌从中心移于蒲团之前右边，两掌相离六寸许；（五）以头伏于两掌中间之蒲团上；（六）以两手掌向外边翻转（手心向上，意在以两手承佛足，故曰头面接足礼）；（七）以两手屈指反转，仍按于蒲团之原处；（八）头离蒲团由伏而起；（九）以左掌移于蒲团之中心；（十）以左掌离蒲团，置于胸前如合掌之状；（十一）以右

掌用力撑起（两膝同时离蒲团），合于左掌当胸，此为一拜，每次至少三拜，多则以三数递加，如六拜、九拜、十二拜等。拜毕后尚有一拜，如世俗之作揖，名曰问讯。乃刚拜毕两手合掌当胸时，即以所合之两掌微侧向下（是时鞠躬），放至近腹处。复以右掌置于左掌之内，叠成拳式，缓缓从下向上举起与眉齐（是时已直其躬），再以两手徐徐放下合掌当胸，手心向上，右手叠置左手之上，两大拇指相接，此即大三昧印也（弥陀印即左手叠置右手之上余与三昧印同），此为拜佛礼毕，头再略一低而已，手便散开而退。

上午进经堂，盘膝静坐，讲经说法。下午各在禅房，盘膝叠坐，闭目合掌，默念经文。晚上睡觉前，同样念经。其经文为：“上来现前清净众，发菩提心，各发虔诚，奉诵如来大乘经，酬天地，谢龙神，报答皇上万万春，父母劬劳，法界冤情，四生三有出迷津。生净土，孔慈尊，以此功德普回施。利群迷，免灾危，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澄盟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无常道。请尊菩萨摩訶，萨摩訶般若波罗密。伏以，东土昙花谢，西域白莲开。修因事已毕，法乐遵诸神。”平时，僧人见客，必双脚比齐，双手合掌，指尖对鼻，口称“居士、施主”，回答客人的问话后，口念“南无阿弥”而退。吃饭、睡觉也有规定，每餐饭钟一响，僧众从各自禅房走进饭堂，饭堂摆满整齐成排的条桌条凳，众僧依次就坐，每人面前早由火工放好竹筷一双，瓷碗两个，送饭送菜的厨工，忙着给碗里盛饭盛菜，主持饭堂的执事，手摇铜铃，带头唱念消饭经，念毕才吃饭，吃饭时不准说话，饭菜各一碗，吃饱与否，不得再添。睡觉的规定是：向右侧卧，右手枕头，左手搁在被外，覆以僧袍，或仰卧，则以两手十指交×，手掌向上，垫着头部。

心豁法师还介绍了龙潭寺每年佛事节日。附表如下：

佛事节日名称	时间（农历）	地点
--------	--------	----

弥勒菩萨圣诞	正月初一日
释迦牟尼佛出家	二月初八日
释迦牟尼佛涅槃	二月十五日
观音菩萨圣诞	二月十九日
普贤菩萨圣诞	二月二十一日
文殊菩萨圣诞	四月初四日
释迦牟尼佛圣诞	四月初八日
韦驮菩萨圣诞	六月初三日
观音菩萨成道	六月十九日
大势至菩萨圣诞	七月十三日
地藏王菩萨圣诞	七月三十日
观音菩萨出家	九月十九日
药师佛圣诞	十一月七日
阿弥陀佛圣诞	十一月十七日
释迦牟尼佛成道	十二月初八日

以上佛事节日，有的要举办隆重斋会，如农历四月初八的释迦牟尼圣诞和腊月初八的佛成道节，龙潭寺都要举办五至七天的斋会邀请各地施主来寺祈神赐福，来者必具一份斋礼。每餐招待素席八十余桌，佛事在大雄殿和殿外广场举行。场上用方桌垒成宝塔式的两丈高台，台上竖长幡，台四周各层都挂满神像，神像前摆上铜质翅子香炉，炉内燃烧拇指粗、二尺长的特制檀香，清烟缭绕，香雾笼罩龙潭。心豁法师介绍：“佛成道节”是佛祖释迦牟尼将杂粮煮成稀粥，喝了成佛的日子，所以，定为佛门弟子的节日。斋会中最重要的仪式是朝拜佛祖，台上设佛祖塑像，僧众头顶三脚香炉，手捧竹甌，甌盛杂粮粥，面佛而跪，在梆、磬伴奏下，反复唱诵：“阿弥陀佛，巍巍金像放霞光，苦海作舟航。九品遵邦，同愿往西方！”然后，将甌中杂粮粥喝下，俯伏宣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菩萨！”祈求普渡众生，两

次斋会，都设有专坛拜请雷公、电母、龙王及水族诸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斋会期间，每天从早到晚，殿内钟鼓和鸣，场上八音齐奏，鞭炮声不断，晚上焰火直冲霄汉，远近居民，不分男女穷富，象过节日一样前来观看斋会，沿河两岸，摆满了来自四面八方做生意和卖吃食的摊子，直至佛事结束。

据心豁法师介绍：当时，寺内有许多清规戒律，其中最主要的有“八戒”和“三不留”。“八戒”是：（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奸淫，（四）不妄语，（五）不眠坐高广华丽床座，（六）不涂饰香发，（七）不食非时食，（八）不饮酒。违犯其中之一者，轻则罚跪佛前，作自我忏悔，重则鸣钟击鼓，聚众僧于殿前，由长老宣布其罪过，赐白绫，于佛前自缢，不用经官。“三不留”是：（一）游方僧人不留，（二）住小庙僧人不留，（三）返僧归俗僧人不留。

明朝末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李自成农民大起义。针对当时的官吏、地主、寺庙广占田地，提出了“均田免粮”的斗争口号。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也是清朝顺治元年，李自成兵败山海关后，退出北京，由陕西退到湖北，一支起义军路过龙潭寺，见龙潭寺富甲百里，遂攻占龙潭寺，赶走僧人，没收了寺内部分财产。同时，一些不法之徒也多次趁火打劫，使得多数僧人不能回寺。这时，龙潭寺经历了一段短暂的萧条。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因为这位皇帝本人诚心奉佛，于是上行下效，各级地方官吏也争相求神拜佛，于是曾经冷落一时的龙潭寺又香火旺盛起来，外逃的和尚也陆续回寺。该寺十五世长老清见法师，鉴于明崇祯末年间，寺庙连续遭劫的教训，为保护寺中财产及僧众的安全，遂于寺中增设武馆，教授僧徒武功。从此，该寺不仅有文韬，亦有武略。清道光年间，四乡盗贼蜂起，到处抢劫成患，但无人敢冒犯龙潭寺。民间盛传该寺二十六世的了凡和尚，武功超群，能飞檐走壁，且为人豪爽正直，行侠仗义。清末

为警告贪官，于县衙寄谏留刀，署名僧侠之美谈一直盛传至今。

据心豁法师说：“龙潭寺历经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这是该寺的最兴盛时期。此时，捐献和购置的田地达1600多亩，从县城以北，沿倒水河两岸，多系该寺田地，东界麻城，西临大悟，北至河南省边界，都有该寺的庄园。和尚增加到120多人，这时龙潭寺还在武汉修建了一座规模宏丽的老观庙（庙地今在汉口小江口附近）。

三、龙潭寺的没落和焚毁

据月池和尚介绍：龙潭寺从清道光年间就开始走下坡路。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有不少富贵人家，许愿入空门，但又舍不得荣华富贵，只好请替身受戒为僧，其中作替身的，有不少是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这些人受戒后，不守清规，先是偷盗酗酒，后发展到吃肉嫖淫。这些人由于有后台，长老无法管教，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而影响了少数意志不坚定的和尚及个别执事僧人。如少数和尚暗中奸污佃农妻女，当家和尚千方百计盘剥农民和佃户，借谷、借钱时加重利息，不亚于当地豪绅。加上道光年间，十年九荒，庙中管收租的执事，不顾农民歉收减产，反而加紧勒索，弄得臭名远扬，怨声载道，佃农被迫而纷纷组织抗租。因而寺中收入日减，香火冷落，一些僧人奢侈挥霍仍有增无减，只好靠卖田产来满足其奢侈的生活。

清咸丰初年（1854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兴起，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的纲领，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政治口号。咸丰四年（即1854年），太平军攻克黄安县城，龙潭寺诸执事逃避深山，太平军打开寺里粮仓，征收其全部粮食，除满足军队食用外，余粮全部分给周围贫苦百姓。佃农也免交租课。太平军转移后，和尚回庙，已是钱粮俱无，又不敢向佃农逼租。为了满足奢侈生活，又耽心太平军重新回来，遂将田地大量贱卖，

到清同治初年，庙中田地已不足亩石，由一世祖大沔祖椿法师制定的一切佛规，名存实亡。该寺新任二十三世长老晓慧法师，见佛风不振，遂将方丈衣钵，传给师弟晓月，只身到汉阳归元寺。由于他的好学多识，深受当时任两湖制台的张之洞的器重，后遂选为归元寺方丈，晓慧方丈俗家姓汪，原籍今红安县杏花乡新建大队皮鼓冲人。1925年，晓慧方丈圆寂，遵照其生前遗嘱，将其遗体迁葬于龙潭寺东岸的土岭上。1958年，开山种梨时，其坟被毁。

1927年，共产党领导农民兴起了土地革命，各区、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1927年3月，共产党员、县农协委员兼县妇女协会的党委夏国仪（女），在龙潭寺附近的牌坊店，召开乡农协大会，农民愤怒地控诉龙潭寺和尚不守佛规，欺侮乡民的罪恶事实，一致要求找和尚算帐，在夏国仪支持下，组织起来的农民一哄涌到龙潭寺。由于农会开会风声事先早已传到了龙潭寺，38个和尚均仓惶逃走。心豁法师就是这次逃出来的僧人中一个。农民们只捉到一个管粮仓的和尚和一个洒扫佛殿的沙弥，管粮仓的和尚法名智空，百姓给他取了一个浑名叫“鲤壳”（据当地俗语，“吃了鲫鱼吐鲤壳”，比喻其人毒辣）。农民们给他戴上高帽子游行四乡进行了批斗，农会将庙中的财产全部没收，然后开仓分粮，农民由于多年积愤，遂一鼓作气，放火烧毁了寺庙。

从公元1405年冬建庙起，至1927年3日止，龙潭寺经历明、清和民国三个朝代，历时521年。黄安三大寺庙之首——龙潭寺至此宣告结束。

附：龙潭寺历世主持和执事僧人名单：

（说明：名单系照僧月池法师献出的手抄本。僧月池法师告诉我们：“各世执事人数不等，僧多执事多，僧少执事少”。所以，从下列名单中可意识到该寺不同时期的盛衰情况。）

世序	各世主持、执事名单
一世祖	大汾祖椿法师
二世祖	丧吾和尚
三世祖	若无和尚
四世祖	守闻、守极和尚
五世祖	克敬、克浪、克凡、克己、克诚、必密、必藏、必行、不方、不偏等和尚。
六世祖	真思、真理、真化、真彦、真宜、真作、真容、清修、明修、广修、已修等和尚。
七世祖	止息、瑞林、瑞成、瑞祥、平野、文慈、文映、定仁等和尚。
八世祖	大宜、省宜、渠宜、浪宜、澈宜、英杰、能杰、复会等和尚。
九世祖	旦贤、旦莱、旦合、旦晓、旦秀、旦成、旦润、自修等和尚。
十世祖	广时、广澈、广全、广明、广月、广慈、洪达、复我等和尚。
十一世祖	志文、志弘、志月、志林、山峰、连峰、道峰、素峰、林峰等和尚。
十二世祖	见容、能容、德容、性宗、恒容、席容、开容、海容、道容、瑞容、启容等和尚。
十三世祖	实安、实润、实念、真悟、实惟、实怀、能学、心润、真几、能猷、能性、能远、能明、能智、必贤等和尚。
十四世祖	永宁、永言、永连、永宗、永福、永禅、永法、永周、永和、永松、正法、如胜、如旺、如雄、如相等和尚。
十五世祖	清惟、清悟、清贤、清晓、清见、清禅。

清池、清正、清学、清波、清霞、清山等和尚。

十六世祖

悟元、悟先、悟照、悟胜、悟明、悟真、悟达、悟月、悟安、悟修、悟凡、悟华、悟心、慈春、悟德等和尚。

十七世祖

法诚、法能、开朗、法席、法升、法宗、法印、法云、法耀、法炬、法妙、济德、济三、济量、济远、法空、法雨、法显等和尚。

十八世祖

容瑞、容彻、容光、容修、容宽、容续、容海、容玉、容华、容庆、广才、容量、容福、容舒等和尚。

十九世祖

知止、知前、知性、知权、知己、知空、知谦、知念、知智、知极、知春、知寿、知静等和尚。

二十世祖

妙善、妙全、妙三、妙法、妙理、妙智、妙振、妙意、妙见、妙化、妙胜、妙香、绍钵等和尚。

二十一世祖

遐昌、遐福、遐祥、遐训、遐镜、遐龄、遐参、遐慧、绍喝、大洪、大余等和尚。

二十二世祖

果绿、悟禅、果纯、果实、果诚、果满、果熟、果善、果澄、果真、果修、果行等和尚。

二十三世祖

晓虹、晓岚、晓江、晓梅、晓明、晓彻、晓严、晓峰、晓慧、晓月、晓山、晓元、晓法、晓静、晓禅、晓岱等和尚。

二十四世祖

性道、性法、性海、性学、道岸、性空、性安、性明、性悟、性宽、性毅、性善等

琴山青，蕭青，苑青，辛和尚，五青，蜚青

二十五世祖

因緣、覺緣、尚鑑梅、覺照、覺禪、覺得、

真哥，即哥，祖哥，照覺明，武鑑振、示鑑群、覺妙、正鑑能、十覺清、

半哥，凡哥，趙哥，支鑑生、具鑑安、古鑑定等和尚。

径，襄野云觀望县南面，國語八景又曰代有觀望之景，并載詩，
“日輪西火”，“觀野王文”收錄，并入《詩經》卷之五終篇。

鄂东古建筑吴氏祠

胡 晨 钟

红安县八里镇陡山村附近，面朝倒水河的林木深处，有一座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的古建筑，它就是吴氏祠。

据《吴氏家谱》中记载，吴氏祠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即1763年），由吴姓族人合资兴建。同治十年（即1871年）重修，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新修，历时两年，耗银一万两，还不包括族中诸子捐献的田地等。

吴氏祠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做工考究，在当年的众多祠堂建筑中，属于“豪华型”。经过十年浩劫后，其它祠堂基本被毁，难觅踪迹，吴氏祠堂却在当地党政领导和人民的悉心保护下，居然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随着时光的流逝，历史的变迁，这座颇具宗族色彩的姓氏祠堂，一下变成了吸引众多游客的鄂东建筑文化古迹，跻身于红安重点保护的文物之间。

乘车直达祠堂所在地，只见吴氏祠侧身而立，五尺高的青砖围墙环绕四周，门口的牌楼高高耸立，楼顶的铜铃迎风作响，祠堂外几株大树绿荫掩映，“犹抱琵琶半遮面”，一眼难见祠堂真面目。

转到祠堂正面，只见祠堂斗拱龙头鱼尾式的飞檐，前有牌楼，后有深院，门口牌楼悬一巨匾，匾上四个遒劲大字：“家承赐书”，楼顶悬一竖匾，上书“吴氏祠”。

推开朱漆大门，拾级而进，门右有一座精致的木楼，站在楼顶仰面望去，楼顶是一幅红、兰、白三色的八卦太极图案，图案下均衡分成八格，这八格画幅线条清晰，色彩鲜艳，富有装饰性，画的是传说中“八仙”所用的宝剑、莲花、云板、葫芦、拐

杖等物，这八幅图案的外围又是八幅画，画的是些腾云驾雾、登坛拜将之类的神话人物，诸如“文王访贤”、“大禹耕田”、“群英会”、“文房四宝”、“渔樵耕读”等传说故事及富于地方特色的山川风物。虽然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但这些图画的颜色还是鲜艳如初。

令人拍案叫绝的是楼下三丈多长的横檐木雕，雕刻的是武汉三镇。古朴典雅的黄鹤楼拥立于众楼房中，好象鹤立鸡群，分外醒目。长江两旁楼房林立，错落有致，街道上人来人往，很是热闹。浩瀚的江水从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流过，江上千帆，竞发逐波追浪，三镇间拱桥飞架，桥上人流簇拥，尚有人倚栏而立，凝思远眺。整个画面是半立体雕塑，镂空的窗户可以塞进去一小指，桥上栏杆可用两指夹抚，千万人像皆有喜怒哀乐，令人驻足不前，百看不厌。

站在前院稍稍后退一点，就可以看见这座楼也悬挂一匾，上书“观乐楼”。据资料记载，楼下立柱两边，篆刻着一幅对联，上联是：“桂苑溯仙踪浑疑广乐频张月里霓裳传法曲”，下联是：“桃花寻古迹依旧家声还振楼头钟鼓庆赓歌”。对联书法造诣颇深，可惜在文革中被毁。

只要登上观乐楼，就可以沿着楼上四周的“回”字形雕花走廊走动，观看院落中的歌舞表演。吴氏祠的前院栽有两棵合抱的大桂花树，据族中老人讲，这两棵树是清朝同治年间栽种的，视为族中圣物。每逢秋高气爽时节，桂花开放，秋风一吹，楼阁上便撒满了桂花，不光是这楼，连整座祠堂，都透着浓郁的馨香，人们在十里之外的八里湾镇，就可以闻到这桂花的香气。

走过前院，踏上石阶，就到了祠堂的正殿——拜殿，这里过去是吴氏宗族议事的地方，上面供有祖宗牌位，长年香烟缭绕，殿的正中原有用铜线扎的金龙一条，两旁是五尺高的木雕挂幅，全是木雕葡萄，葡萄的叶、藤、须、果都雕刻得栩栩如生，仔细

看去，在肥大的葡萄叶和卷曲的须的空隙间，正活动着一群老鼠，这些老鼠或露或藏，或上或下，垂涎着那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整个画面构成一幅金鼠戏葡萄的“百鼠图”。只要走近去，才发现这些老鼠也是雕刻的，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木雕老鼠身上居然毛茸茸的，如活的一般。使人觉得这些老鼠刁钻奸猾，可恶可厌而又可爱。需要花一番力气，方可数清这些老鼠的只数，一共有50只。此外，殿的四壁还雕有凤凰、仙鹤、麒麟、狮子等珍禽瑞兽，刀工考究，形象逼真，妙夺天工。

据《湖北日报》介绍，吴氏祠的木雕艺术在本省民间雕刻中属上乘水平，是当年木雕艺术流派“黄孝帮”的得意之作。

沿着拜殿再往后走，就到了寝殿，在拜殿与寝殿之间，是吴氏祠的后院，面积与前院相仿，里面并排立着两棵年逾七旬的老梅。寝殿就是吴氏家族过去议事休息住宿的地方，寝殿的两旁是厢房，一间一间皆用镂空雕花鼓皮隔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红安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吴氏祠成了倡导“新生活”的“女学堂”，寝殿成了女学生的课堂，厢房成了她们的卧室。董老培养的先进青年学生，在这一带积极活动过。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拿着枪，举着火把，闯进祠堂，准备行凶作恶，但一进大殿，就被大殿的富丽堂皇震动了，他们不但乖乖地放下了枪熄灭了火把，还恭恭敬敬地朝吴氏祖宗牌位磕头呢。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几次来到这座祠堂“破四旧”，当地群众闻讯集中起来，拿着锄头扁担，声明谁毁祠堂就和谁拼命。祠堂两边的石鼓被群众悄悄地沉到门口水塘里，门口那块“家承赐书”的大匾，就用泥巴糊住，上面再复盖一个木牌——“陡山中学”，这样瞒过红卫兵的耳目，得以幸存下来。难怪中央、省里文物管理的负责同志到这里来，忍不住赞叹道象这样保存完好的祠堂，不仅在黄冈地区，就是在湖北省也是罕见的，旅游局的负责同志称处在僻远山区的吴氏祠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关于吴氏祠堂地址的选择，还有一段传说。相传公元1354年，朱元璋率军经卓王山（今红安县八里镇境内）遭敌军突袭，大败溃逃，朱元璋逃至此地，此处的读书人吴琳（吴氏三世祖）见朱元璋气度不凡，让他藏入一阴沟中，自己又布了些蜘蛛网在上

黄安孔庙

高叔樵 罗以谋

吴克仁 李述治

孔庙亦名圣庙、文庙，是纪念和祭祀孔子的祠庙。黄安（今红安）孔庙，位于县城西街今县人武部驻地，初建于明末崇祯年间，由知县赵利贞主持修建。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知县张三跃应钦命重修，将庙瓦改成黄、绿色的琉璃瓦，庙脊上用青砖砌成尺高的脊屏，屏上绘刻青云拥黄龙腾飞。屏中央用黄铜制成大小不等的圆球堆砌成宝塔式的装饰品，形似今日高楼上的避雷针，脊屏两端各塑有金龙一条，头相对，尾上翘，成腾飞状。另于脊屏两端，分东西南北用砖砌五寸高的垂脊，还绘有花纹图案，直达庙檐，骤看庙顶，象似古代将军的头盔。庙内用四根杉木合拼制成的四根红漆圆柱，直撑檐檩。四柱之间用三寸厚、二尺宽木板连接成整体，木板上绘刻：负薪、挂角、囊萤、映雪等历代名人勤学故事。殿中靠北墙有木制红漆花纹龛案，龛案中央塑孔丘像，像前有木牌，上书“至圣先师孔子”，两边用一尺二寸宽，八尺长红杉木红漆板，楷书金字对联：“尼山而复一夫子，鲁国之中大圣人”，横额是“万世之师德祀天地”。紧靠孔子像东西两侧，各有两个木牌，东为“述圣子思、复圣颜子”，西为“宋圣曾子、亚圣孟子”。殿的东西壁亦有花纹龛案，案上依次排列七十二贤人牌位。前殿东西两侧各有一间小房，作为朝圣和祭祀人员议事、休息场所。前殿建筑式样及殿内布置装饰与后殿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知事刘承启于孔庙前扩建前殿，前殿与后殿之间有两百米见方的院落。院的東西側建有廂房，作为朝圣和祭祀人员议事、休息场所。前殿建筑式样及殿内布置装饰与后殿

相同，只是地势较低，殿内供奉有历代先儒牌位，如韩愈、柳宗元、苏轼、朱熹等名儒，因称前殿为先儒殿，后殿为大成殿。先儒殿前壁有正门，但砌闭而不开，只有正门左右各开一门，一般谒圣祭祀者从左门进，右门出。先儒殿前有二百平方的院落。院落东、西、南三面有八尺高的石砌围墙，南壁有正门亦闭砌而不开，只在东、西壁各开圆门一个。东圆门外，立有六尺高石碑，碑上楷书：“文武官员到此下轿下马”。西圆门可直达耿天官（耿定向）专祠。园内植有成行松柏。园外有约五米宽的草坪，草坪前砌有长宽四十米正方形的泮池，池内植藕荷，意在“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流而不妖”，借以教育后辈读书人洁身自爱，不做不忠不孝玷辱圣门之人，百姓习惯叫它为藕池。知县刘承启还别出心裁，于前后殿四角檐椽上各安上铜铃，风吹铃动，其声如啁啁莺啼。人们瞻仰孔庙，步行于苍松翠柏之下，聆听舒心悦耳的铃声，会不自觉地产生清雅肃穆的感慨。

因不开正门是知县刘承启和本县宿儒绅士商量决定的。规定“不出鼎甲，不开正门”。所谓“鼎甲”指清代殿试一、二、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意在鼓励后辈学子，努力上进，考中鼎甲，开正门谒圣以示庆祝。庙成后，黄安一直未出鼎甲，所以孔庙也一直未开正门。

孔庙是封建时代士林最崇拜的地方，每年学宫开学，由教谕、训导率领师生至孔庙，在至圣先师牌位前点烛、燃香、鸣炮奏乐，实行三跪九叩礼（即一跪叩三头，三跪叩九头），然后全体肃立，听教谕宣读《圣谕广训》。继之由训导朗诵学宫卧碑上刻的条约八款，其中规定生员不许交结官长势要，不许轻入有司衙门，不许上书陈述军民的一切利病，不许集团结社干预政务及多曲……违者听提调官治罪。读毕，开学仪式宣告结束。

府考和乡试考中的秀才、举人，首先得戴上考中的标志——顶子，一路鸣金放炮，进孔庙，跪拜圣人，然后才能拜会亲友。

清代愚民政策中有一条规定：有功名的人见知县长揖不跪，与人诉讼虽理屈，知县不敢随便加刑，须会同教谕、训导通知全县生员、增生、附生及各书院教师，齐集孔庙，在至圣先师牌位前由训导数其罪状，教谕亲摘其头上顶子，然后交知县按律施刑。

最隆重的祭祀是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的诞辰。知县下令城乡禁屠宰一日。全县官吏及举人、秀才、童生一日沐浴斋戒，当天辰时集中学宫，知县、教谕、训导官走在前面，次为戴银顶子的主人，再次为秀才，后面是童生，鱼贯进孔庙的东圆门，按次序休息于中院两侧的厢房。此时，大成殿内四角燃起熊熊火炬，孔子位前香案上点燃二尺高茶杯粗的红烛，香炉内烧着拇指粗的檀香，殿内香烟缭绕，灯烛辉煌，两个礼宾司于案侧分东、西站立（以下简称东司、西司），东司高声喊：“鸣钟击磬，政宪官，分厢官就位”。知县、教谕、训导进殿面对香案肃立。东司喊：“士子整冠入堂”。举人、秀才、童生依次进殿。东司喊：“设香案”。西司答：“香案设”。东司喊：“设俎豆，鸣炮奏大乐”。随着喊声锣鼓伴着唢呐声奏《昭平曲》，在悠扬的唢呐声中，八个穿戴整齐的执事各双手捧着盛着供品的红漆盘，按西司指点摆在香案上，接着由四人一组抬进三个特制各有三只脚的红漆木盘，盘内摆着拔毛去皮整体的牛、猪、羊摆在案前。西司喊：“大礼作毕”。东司喊：“作细乐”。随着喊声，箫、笛管弦齐奏昭平之曲（反复多次直至礼成）。东司喊：“跪！初上香，亚上香，三燃香”。西司执香插入炉内。跪着的人随着喊声向香案作揖。西司：“上香毕”。东司：“献爵，初献爵，亚献爵，三献爵”。西司手捧锡壶依次给案上杯子酌满酒，殿内人随喊声作揖如前。西司：“献爵毕，起立”。东司：“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殿内人随着喊声磕头三个，然后起立，再跪再叩，如此三次。东司：“俯伏，政宪官诵读祝文”。读罢

祝文，西司最后才喊：“礼成，起立。”

以上是封建社会祭祀的全套礼数。所奏的《昭平乐曲》是专为祭祀孔子而撰写的曲牌，其词为：“大哉孔子，至大至正，安内扫外，国事无伤，万世师表，德祀天地，与日月明，与天地齐”。

孔庙经历了明、清、民国三个朝代，历时三百余年，是红安县城历史最悠久、最雄伟的建筑物，总占地面积约1200平方。民国十六年土地革命时，农民憎恨封建地主，自发地毁掉前殿及两院。1927年2月下旬，黄安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王鉴、徐希烈、戴克敏、夏国仪等当选为农民协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县农协机关设在孔庙。现在幸存的大成殿，1984年5月被定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勇整理

觅儿寺的由来

苏本友 徐念书

时值秋冬，我们在觅儿寺镇找了六十二岁、六十五岁的教师周希友、徐达国；七十岁的徐达立，七十三岁、七十八岁的老人彭德珍、徐雨山；九十岁、九十五岁高龄的徐显应、袁淑珍等人座谈，现将他（她）们对觅儿寺的亲见亲闻情况整理如下。

觅儿寺原名永新集，是一个地处丘陵岗地的小镇。解放以前，在二百五十米左右的狭长街道两旁，有一些矮小的房屋，开有杂货铺、屠宰铺、饭馆、酒店、客栈等各类铺面，虽不很华丽，但每逢赶集或年节到来之时，小镇上除了进行各种商品和农产品交易外，唱戏的、说书的、卖艺的也到镇上各显其能，使小镇不时呈现出热闹气氛。

关于集镇改名的事，老人们介绍说：有一天，一个名叫徐必清的亦农亦商的外乡人，带着他五岁的儿子到永新集赶集，那天正是中秋佳节，街上人来客往，十分热闹，徐家父子被集市上那派热闹景象深深地吸引住了，一时买东西，一时听鼓书，一时观卖打，一时看戏，兴致很高。特别是徐必清，在看戏时，竟被戏的情节和演员的精采表演吸引住了，连在身边的儿子离开自己去看其它热闹也没有发觉。当他发现儿子不在身边时，慌慌张张地到处寻找，找了半天，街上罢集，也没看见儿子的踪影。于是，他在街人的指点之下，走进集镇附近的显灵庙燃香叩头，求助神鬼保佑，发誓如能找到儿子，定在集上修一寺庙。事情确有偶然，时隔不几天，在人们的帮助下，他终于在集镇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找到儿子。在惊喜之中，他自认为是神的威力，便决心修庙还

愿。他带着儿子回到家乡筹凑钱财，很快修起了寺庙，并取名“觅儿寺”。

据老人们讲，这座寺分上下两幢，建筑结构为石墙木架，占地面积600多平方米。庙上有一石多田，有尼姑、和尚三至六人，有泥捏撒金菩萨、木制菩萨，四时有人燃香许愿还愿。年节玩灯，四周的人们先要将龙灯举到寺内，燃许多香、烛、纸草，敬奉菩萨，也就是人们常称的讨赤。庙的下殿开过学堂，徐显应老人讲，他在此读了二年半书。解放后还做过教室用。寺庙院内有两棵大柏树，树高六丈有余，可横跨五大间屋，笔直粗壮，腰围得三个人手拉手才能环抱。树枝香气扑鼻。外地陌生人问到觅儿寺的路时，当地人习惯地望着远方的大树用手一指：“那就是觅儿寺”，引得客人抬头仰望。这两棵树，解放前夕死了一棵。1976年锯了一棵。九十岁、九十五岁的两位老人讲，从他（她）们记事起，两棵树一直那么大，他们分析推算说：起码有三百多年。有庙才栽树，这就是说，觅儿寺修建有三百余年。寺庙于六十年代拆毁。

觅儿镇附近有洪界山、上孤山、大金山、小金山，从元末民初至解放前止，一直是战争之地。据传，明太祖朱元璋在觅儿寺附近的朱圣塘打过仗，带过兵，避过难。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打过多次仗。那时常看见路下的稻场边堆着白骨。1939年秋，一天中午，一队日本兵在觅儿寺放火焚烧草堆、房屋，烧得浓烟滚滚，烈火熊熊，烧后又杀了30多人，直到天近黄昏时才走。镇上的房屋毁去一半，集上一时出现冷落现象。

解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集镇上路面扩宽，房屋增多。集市贸易又呈现一派热闹景象。

报界名流蔡寄鸥

李述治

蔡寄鸥，派号天猷，学名乙青。其人出身书香门第，聪慧过人，一生从事写作，不仅能写政论性文章，而且擅长文言文小说，先后任过报馆记者、编辑、主编、社长等职务，其著述付印成书的小说、戏曲达十一本之多，因此，曾用过不少笔名，其笔名有淇书、乌台、黎阁、寄鸥、秋虫，其中以寄鸥署名最多。

一、神童秀才穷家子，两湖师范优才生。

蔡寄鸥，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七月十六日出生于黄安县山角会的蔡家河村（今红安县杏花乡）的一个穷户旺族的家庭，所谓穷户，是全家六口，只有稻田九亩，所谓旺族是蔡氏一门先后有八名秀才，寄鸥及其大伯、二伯均系清末生员。其父蔡殿臣亦是饱学之士，母亲出自名门，熟悉经、史、诗词。寄鸥幼受家庭熏陶，是他后来以文章驰名湖北的因素之一。他四岁入学读书，由父亲肩负手抱接送上学，九岁已熟读四书五经，十岁能文。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寄鸥十一岁，随父应黄州府试，恰遇湖北学政蒋式芬前往主试，不准考生携带书籍或抄本入场。当时有一广济考生饶汉堯进场时拒绝检验，被门卫殴打致死。这一事件激起黄州辖八县廪、增、附生的义愤，他们包围贡院，封锁龙门。清军派兵镇压，考试被迫停止。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再应黄州府试，时寄鸥年仅十四岁，成为黄州府辖八县最年轻的秀才。

寄鸥小时喜爱诗词，但清朝取士单凭制艺（即八股文），不重词章，因此学校无此课。寄鸥的诗词基础来源于母亲，母亲告诉他：“作诗不难，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从八

岁起，母亲每晚给他读诗词，先授浅俗章谣，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读五绝、七律及长篇古风。十岁时寄鸥就能背诵诗词二百余首。十一岁时不仅制艺文章出众，亦且能诗，每作一诗，文人争相评阅传诵，被誉为神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随二伯父就读于桃花的天窝书院，清明节回家扫墓，因雨后溪河涨水，淹没石墩桥，须脱鞋袜淌水过河，时一及笄少女，立于溪边，望河惆怅，急于过河又不能脱鞋袜，用眼神求助于寄鸥负之过河而又羞于启齿。寄鸥窥其美，自愿背女渡河，回家之夜，即援笔成七律一首：

“二七佳人阻急流，书生代作渡人舟。

一双玉手胸前抱，两只金莲背后勾。

虽与其眉难共枕，未曾结发也同头。

轻轻放在沙洲上，默默无言各自休。”

诗意虽近轻浮，但对仗工整，平仄和谐，且诗情如画。回校后，诗稿被同学发现，争相传阅，无不叹服。二伯父平时最讲究封建礼教，阅其诗，除恨其轻薄外，心却赞其奇才，只给予规劝，未加深责。

同年腊月，窗友王佑义结婚，妻张氏，系张生员独生女，幼随父就读于馆中，年渐长就教于闺阁，因此张女不仅通晓经史，且善诗词对联。新婚之夜，窗友邀约贺喜。黄安旧习，“新婚三天不出房门”。遂设宴于新房，要新娘陪酒对话，张女正在进退两难之际，见摆上的菜肴，有鱼和羊肉，触动灵感，笑着表白：“诸君都是饱学之士，妾有一联请诸君对，能对，遵命陪席敬酒，否则恕不从命”。众人心想吟诗作对是我们的家常便饭，量一黄毛女子难不住我们，遂不约而同地说：“请新娘子赐教”。新娘提笔写上八字：“满桌鱼羊，鲜者鲜矣”。大家面面相觑，苦思冥想，无法对出。原来这不仅是个绝对，且语意双关：鱼羊两字合拢为“鲜”字（后“鲜”字读xiǎn，同“显”字音，是少的意思），寓意是：你们都是读书人，但能娶得少。时寄鸥经过思索

已成竹在胸，但因自己年少，不敢僭越，见窗友以目求援，遂执笔写上：“一群女子，好者好之”。女子两字，并排为“好”，（后面“好”字读hào，音同“耗”字音，是爱的意思），寓意是：女子虽多，不好我不爱。众人叫绝，新娘只好陪席敬酒。

1904年，考中秀才后，回家拜客，即兴作七绝二首：

(一)

“十载寒窗苦琢磨，簇新金顶戴如何？
行时屡问当头模，已比人高二过多”。

(二)

“兰衫冠带一身荣，拜客家家扫径迎。
不敢对人科帽子，怕他仍说是童生”。

据跟随蔡寄鸥多年的蔡锡怀老先生说：此诗当时蔡氏老幼均能背诵，老人并以此教育后辈，后寄鸥觉得情虽逼真，但其文太俗，系托词为赤壁无名氏作。

寄鸥家除了父母，还有三个妹妹，一家六口靠九亩稻田为生，丰收之年只够一家温饱，一遇水旱蝗灾，就得靠借贷维持生活，家固贫寒，名门旺族名声在外，应酬亲友，常使父母困窘而头痛。寄鸥中秀才后，为减轻家庭负担，应富戚赵姓之聘，设馆授徒，课余之时，刻苦自学，准备应省城秋闱考试。教书一年，完成著作《批通鉴》、《治春秋》、《事显笔记》等二十余册。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为了强国强军，决定废科举，仿效西欧，兴办学堂，引进西欧文化，培养新型人才。寄鸥梦想的举人、进士变成梦幻。是年冬，父亲因劳致病，不幸病逝。为安葬父亲卖出用以维持全家人生活的稻田四亩，家境日趋寒酸，更加激起了寄鸥刻苦学习，以求出人头的决心，来养活母亲弱妹。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寄鸥赴黄州府投考速成师范，答卷署名“楚黄居士蔡乙青”。试官姚晋圻见署名而怒其狂，继阅其文而奇其才，推荐于太守，并建议保送两湖师范。

范系张之洞主政湖北时首创的重点最高学府。入学通知书下来，遭到大伯父、二伯父反对，理由是：“两湖师范教师，多是留洋生，侈谈革命，高唱自由，乙青年幼，一旦陷入，祸及全家”。幸其母全力支持，谓科举既停，非求学不足以图上进。

两湖师范虽系公费，供给学生食宿，但距离三百华里，步行需三、四日，沿途食宿费毫无着落，母亲拟卖口粮田，寄鸥不可。幸亏三伯父蔡星台作主，宴请蔡氏族长，请求支援，族长们决定每年由祖产收入供给学费十一串：春季五串，秋季六串。上学时寄鸥只拿两串作为上学和假期回家的路费，余钱留作家用。寄鸥含泪拜别母妹，从此寄鸥成为两湖师范最年轻的学生。秋，两湖师范师生组织“菱湖诗社”，寄鸥作七言诗——“黄鹤楼怀古”：

万里长江分九派，烟云划断荆襄界。
扁舟试泊武昌矶，俯仰古今成与败。
雄图肇自六朝先，两汉分争四百年。
只有当年苟与费，清闲无事酒中仙。
东吴一代成宫殿，汉水苍茫横四面。
天堑分开南北军，至今惟有江如东。
日落长江照大旗，一举打碎鹤楼时。
神仙去后杳无迹，午夜何人把笛吹。
南楼秋门西门柳，陶瘦两家都籍手。
王业偏安昼策难，江干那得舟师守。
每怪中原百六多，江汉平地起风波。
宋唐以后金汤在，节制荆襄又几何？
后之视今今视古，沧桑变幻知何许。
游子梦迥南浦云，词人泪尽潇湘雨。
凤凰台上凤凰游，江上扁舟任去留。
无限无涯无限恨，一联佳句付东流。

全诗三十二句，此诗一出，轰动江城，读其诗者无不叹服其

才，均谓崔灏之后咏黄鹤楼诗者，无出其右。寄鸥并不因享有声誉而自满，仍夜以继日，刻苦自励，文学成绩居全班之冠。经学教授黄翼喜其勤奋，爱其聪慧，对寄鸥的辅导超过一般。寄鸥学名乙青，号乌台，黄教授认为不雅，为他改名蔡阁，典于青蔡照读故事，并亲书一联以赠：“蔡照炳麟金莲赐第，阁开文凤彩翼和鸣”。同学无不羡慕。

寄鸥读书期间，母妹的生活，全靠三伯父支援。宣统元年（1910年）三伯父不幸病逝，母妹的生活来源断绝，寄鸥悲恸万分，申请辍学回家瞻养母妹。时两湖师范共有黄安籍学生十二人，以张眉堯年长且多智，为同学们所信服，眉先召集其余十人，倡议资助，以免即将毕业的寄鸥功亏一篑。同学们都乐于资助，共捐钱四十八串，解决其母妹生活，使寄鸥得以完成学业。

寄鸥青年时期的学习生活是在艰苦辛酸中度过的。

二、参加反清同盟会，反袁失败受通缉。

两湖师范除经、史教授外，其余多是留洋生，尤以留日学生居多，且都是反清同盟会会员。在新思潮影响下，寄鸥在肇校就加入了同盟会，与余莪、吴钺、徐锡麟、秋瑾、占大悲等人经常秘密会晤，徐、秋的言行给寄鸥以极大鼓舞。1909年参与吴钺等谋炸旗人在汉官吏，事发，吴钺被捕蒙难，寄鸥等被通缉。他逃回黄安，避居县北龙潭寺，终日与该寺方丈性空谈诗论文，曾亲书一联赠性空长老：“蔡养北堂含笑色，阁开东面订知心”。次年春，潜回学校。

1911年秋，毕业于两湖师范的蔡寄鸥，即与在汉同盟会会员参与辛亥革命运动。武昌起义成功，大江南北齐颂共和，寄鸥任新创办的《民国日报》记者，继任该报编辑。冬，又兼任蒋翊武创办的《文学社》编辑。时寄鸥虽初露头角，在武汉文化界已小有名气。1912年2月，又兼任《民心报》编辑。三月，被聘任《震

《中报》主编，该报是当时武汉最有影响的大报，发行量居武汉各报之冠，寄鸥忙于编辑，不得不辞退兼职。1913年春，兼任黄克强领导的《汉口国民日报》小说版编辑，曾写小说《华胥梦》逐章刊载，后综合付印成书。

正当全国人民欢庆共和时，国贼袁世凯窃夺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后，宣布解散国会，派人刺杀同盟会领袖宋教仁，企图恢复帝制。于是大江南北掀起反袁浪潮，蔡寄鸥在《震旦民报》上刊出大量的反袁文章。由于组织不健全，第一次反袁运动失败，寄鸥主持的《震旦民报》和《民国日报》同时被封，革命党人惨遭捕杀。寄鸥潜回故乡时，黄安在籍的党人，皆在县署侦察缉拿中，幸知县曹履贞原系寄鸥老师，得其庇护，并嘱其隐居山寺，静待风声平息再出山。

民国五年（1916年）正月，袁世凯要实现皇帝梦，恢复帝制，自己做皇帝，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为收买人心，对革命党人既往不咎。蔡寄鸥潜回汉口，担任革命党人在日租界山崎街创办的《中报》编辑，深居简出，终日书写编印反袁文章在《中报》上发表，袁政府官员恐惧，下令通缉《中报》编辑及负责人，但报社在日租界，巡捕无权去租界抓人。黎元洪亲下手令，“租界以外不准订阅中报”。因此，报纸发行量锐减，经费来源枯竭被迫停刊。寄鸥离租界去武昌，担任《教育杂志社》编辑，仍以隐晦的文字反袁反帝。时过不久，《教育杂志社》亦被黎元洪下令封闭，政府对寄鸥的通缉加紧，为生计所迫，寄鸥仍避居租界，在一家富户教私馆，收入勉强糊口，无力养家。幸教会主办的《德公报》仰寄鸥名望，聘请他为报纸写小说，月薪四十串，才有资格养活母妹妻女。七月，因妻死回家，经理丧事，作悼亡诗百首，登载于《新闻报》上。

1915年12月25日，袁世凯称帝前一个星期，蔡锷在云南起义反袁，因而武汉当局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寄鸥被逼避居租界同仁

医院，才幸免于难。袁世凯下台，接着是军阀混战，加上复辟与反复辟，战祸频繁，国无宁日，这段时期的寄鸥仍在武汉从事报馆编辑和记者工作。从进两湖师范到军阀混战平息，十余年寄鸥的生活，是失意超过得意，烦恼多于欢乐。从民国十年起生活开始转入安定。摘录其自述：“由民十至民十五年，为余文字生涯之最安逸时代，盖每月有一定之薪金，则生活有一定预算。虽日依人作嫁，而经济上实不感恐慌。每月至《大汉报》作时评一则，只需一小时，每晚至《正义报》编辑电稿，亦只需二小时，此外则吃饭、睡觉、打牌而已。大凡处境愈适者，其坠落也亦愈深。余自知文章与事业退化，实伏病根于是时。周均亮每向余曰：“读君之民元作品，前途何可限量？今若此，可谓自暴自弃矣”。余是时闻之极不懈。今始认为直言，然而华年已逝，须发俱斑，回首思之噬脐何及哉”。读此段文字，印证以后客观事实，寄鸥不失为有自知之明。

三、敢于抨击权贵，不取非义之财：

在反清反袁的年月，寄鸥确实雄心勃勃，似乎大有作为，但其人恃文傲物，以清高自许，终不得志于官场，但也有其过人之处：就是敢于抨击权贵，不取非义之财。武昌起义成功，原两湖师范学生牟鸿勋，一跃而当上部长，出必骑马，卫兵前呼后拥，见故友亦不下骑，傲慢气焰盛极一时，学友均憎之。寄鸥于《民心报》上作诗以讽之：“策马扬鞭何所之？相逢不下意何如？布衣安步何高雅，问尔何缘得马骑？”见面时并当众呼其绰号“小毛”。牟怒威，掏手枪威胁，寄鸥毫无惧色，牟终不敢开枪。此后牟鸿勋的傲慢气焰亦自收敛。

辛亥革命成功，党人拥黎元洪为都督，但黎心怀疑虑，贪图个人享受，疏远革命军人。清兵南下，汉阳失守，黎元洪逃离武昌，群议非之。袁世凯篡取中华民国大总统后，黎元洪投入他的

怀抱，武汉新闻界主要人士形成两派，《中华民国公报》和《群报》等拥护袁黎。《民心报》、《震旦民报》等拥护孙黄，蔡寄鸥是反对袁黎的。《大江报》被封后，他在《民心报》发表《哀大江报》一文，抨击黎元洪摧残舆论“内有英雄不出，徒令竖子成名”。不久，蔡又在《民心报》发表小说《新空城计》，揭露黎元洪在清军攻占汉阳后拥爱妾仓惶出逃，竟使武昌城内没有主将指挥。该书开场白为：“双眼花翎泛绿，寸高顶子飞红，捉拿革命抢头功，报答皇家爵俸，赚得银洋万万，修来金屋重重，红颜伴我白头翁，翡翠衾寒与共”。黎为此大怒，指派总兵陈血岑、民生银行总裁徐中立出面宴请蔡寄鸥，遭蔡拒绝，随后黎又派徐中立携带银元万元，要求寄鸥停刊《民心报》，并声明：“如不停刊，就请试枪”，用手枪对准寄鸥。寄鸥从容回答：“银元非我所属，枪亦非我所惧，言论自由乃宪法规定，任君行之可也”。利诱威胁无效，黎元洪莫可如何，但心怨寄鸥，恨不急死。乃用银元一千，收买流浪汉，浑名叶疯子者，给手枪二支，秘嘱刺杀蔡寄鸥。叶固流浪汉而有侠义心，骗钱到手，反将黎的密嘱告寄鸥，并与寄鸥结为朋友。暗杀不成，黎元洪最后下令逮捕，经蔡翊武出面求情，把《民心报》停刊，换得蔡寄鸥一条性命。

1913年“二次革命”时，汉阳兵工厂工人反袁最激烈，该厂总办刘庆思多方刁难工人。寄鸥在《震旦民报》上刊载大量文章，支持钢铁工人的反袁运动，并揭露指责刘总办刁难工人的非法行为。文章引起江城政、学、商界对该厂工人运动的支持。刘庆思亲来报社，请求寄鸥更正攻击刘总办的文章，遭到拒绝。刘又派人奉送银元二千元，寄鸥不收，并给来人严厉地斥责。后袁世凯借口《震旦民报》声援汉阳兵工厂工人罢工，串通英驻华使馆欲将蔡引渡，蔡才被迫流亡江西。

1916年12月，蔡寄鸥主持复刊后的《震旦民报》对段其瑞执政不断抨击。他还在《大汉报》上发表《坠花楼》小说，从袁世

凯称帝开场，到张勋复辟、安福系当国、曹锟贿选止，对帝制之迷梦、军阀之专横、政客之齷齪，一一揭露无遗。胡宗铎任湖北清乡督办期间，他在省主席张怀九家，对党政措施意见不一致时，不但疾言厉色的抗辩，甚至还公诸报端。如对省政府组成人员，他题有一联：“一府两民党、五科三江陵”。指责张怀九任人唯亲。他还和石青阳、覃理鸣、李西屏等人反对胡宗铎和张怀九秘密商妥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监委名单。

蔡寄鸥对家乡百姓充满恻隐和同情心。民国29年，黄安大旱，高渴的冲榜田颗粒无收，三分之二的家庭揭不开锅。寄鸥从蔡氏族人中得到信息，即邀请黄安籍在汉的乡亲集会，倡议捐资救灾，寄鸥把存入银行的稿费全部取出，雇人购买大米运回黄安，救济灾民，此事曾获得国民党政府黄安籍官员的赞许。当时湖北三区专员石幼平、四区专员程汝怀都曾赞叹：“寄鸥虽变节投敌，但不忘故里，倡议捐资，救济灾民，确也难得”。

四、恶毒攻击共产党，充当反共急先锋。

蔡寄鸥不仅自己反对共产党，还劝同乡同窗好友放弃马列主义信仰。早在北伐前他曾以同窗同乡身份劝勉董必武放弃共产主义，遭到严词拒绝，他十分惋惜，曾在所著《四十年闻见录》第五十页中写道：“……其后，董与邓演达游，亦一变而为共产党之中坚分子矣。董本寒素之士，性极谨愿，而人格乃甚高洁，其不幸而堕入歧途，乃为环境所误耳！惜哉！”。

1927年秋，黄麻起义攻克县城，以后拉锯式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持续了三年。红军第二次攻克县城后，建立了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寄鸥恨之入骨，在他主持的报纸上，大肆污蔑咒骂共产党，说什么“极尽其奸掳烧杀之能事”。后他还选择污蔑共产党的所谓事例五十五则，载于《四十年闻见录》中第197~210页，计九千五百余字，兹录其原文两则：

(一) “沙平会有王姓青年，初入共产党时，会议席上，有指其父为劣绅者，众问王，应如何处理？王曰杀之。问谁则杀之？王沉思乃曰余自杀之可耳。散会后，逮其父至，宣布罪状，父长跪乞哀，王叱令向外跪，其父如言，王乃向其父背后发枪，毙之。旁观者笑谓之曰，汝不当面发枪，而令其向外跪，殆犹有不忍之心乎。王默然，旋为共党所杀，并杀其全家，指为杀父无诚意，非确能忠于党者”。

(二) “匪区负责人物，大为篾匠、酒匠、剃头匠和雇农等等，总而言之，无一能识字者，其书记工作则为裁缝、道士之流。以前之教书匠，大带绅士色彩，固早已杀尽无余也。呜呼！余书至此，肝肠寸断矣，瞻望故乡，将变为无人之沙漠，酸风苦雨，磷火荧口，此乾坤何等时耶……”。

文后还赋诗：

“独坐悄无声，未识夜何许，
敲窗风有声，窥户月无语，
辗转读乡书，写尽哀鸿苦，
千家闹鬼哭，四野横尸腐，
一息或苟存，宛如鱼在釜，
永氏宁扑蛇，鲁妇不避虎，
感此心伤凄，对影泪如雨”。

其诗其文见报后，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

民国二十一年（1933年）秋，程汝怀任湖北四区督察专员兼黄安县长，大举清乡肃匪。蔡寄鸥担任黄安驻省清乡委员会委员，他还毅然决然地回到黄安，从事“清乡运动”。他在《四十年闻见录》一书中写道：“……余返汉后，他无所事，惟仍以卖文为活，有暇则致力于清乡……”（文见《四十年闻见录》第134页）。是年清乡，杀死无辜百姓数以千计。寄鸥虽未亲手杀人，作为幕后策划指挥者，其罪更甚于刽子手。

抗日战争时期，寄鸥仍羁留武汉，他与汪精卫都是同盟会员，为文字莫逆交。汪精卫投降日寇，寄鸥遂成为汪伪在武汉文化战线上的健将，成为敌伪的喉舌。武汉沦陷后，他在日伪《大楚报》当了几个月的记者，在日本的默许下，用秋虫的笔名出版了《武汉新闻史》。

抗战胜利后，为了生活，他不得不重新拿起“早已焚却了的秃笔”，为《罗宾汉报》写起“寒不可以为衣，饥不可以为食”的文章了。

解放战争中，他掌握的报纸杂志发表过不少攻击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文章。

五、罪当镇压而不杀，感恩戴德立新功：

人民解放军云集长江北岸时，国民党政府的大官、权贵，纷纷搭轮船、坐飞机，离开大陆，去台湾、香港、美国。寄鸥自知数十年来自己对共产党攻击谩骂，一旦解放，罪在不赦，也想外逃。他虽是文化界名人，但必竟不是官场中人物，且个人历史上有污点，他明白无论去香港或台湾，均无立足之地，且儿孙满堂，一家十余口，离开大陆无法生活，加上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对他开导、劝勉，才留住武汉，等待命运的安排。

武汉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他既没有逮捕，也没有限制他的人身自由。1950年春，郑位三同志介绍他和红安籍的伪政人员余义民、李俊谦等去湖北省文史馆工作，后到省文工团工作，寄鸥深感人民政府对他宽大处理，到省文工团后，感德于内心，报恩于行动。他自觉地夜已继日地工作，首创戏剧《太平天国》在武汉各区公演，受到政府和观众好评。续之写出歌颂党和人民的歌谣百余首，在湖北各地演唱，后又编写《武昌革命史》（即辛亥武昌起义），付印成书送北京文化部审查，评价很高，文化部给予奖金3000元（旧币），他将钱捐赠文工团。1958年因病逝世，终

年六十八岁。

蔡寄鸥从1911年~1949年，在武汉从事记者办报工作38年，先后担任过编辑的报社有：《民国日报》、《文学社》、《震旦民报》、《中报》、《大汉报》、《民心报》、《大楚报》、《正义报》、《中山日报》、《民乐园报》、《水晶宫报》、《光明日报》等（其中，后两报为双日刊系寄鸥自己创办，社址在大成里）。

蔡寄鸥从事著述，已知其著作印成书的有：《血衣儿》、《坠花楼》、《银台梦传奇》、《鄂州血史》、《四十年闻见录》、《杜鹃魂》、《豆棚瓜架下》、《王妈妈的裹脚》、《癞痢头上放霞光》、《殷汝耕叛变记》、《新空城记》、《莲花公主传奇》、《武昌革命史》等。

陈勇整理

我的戏曲生涯和早期的红安剧团

叶秀芳口述

我是红安县八里坨镇旭东村叶家坨人，今年六十五岁。我这一辈子从事过两种行业：从1941年到1964年，整整唱了24年的楚戏；在此前后，一共做了26年的糕点。我的本名叫叶四伢，旧社会学糕点手艺，望的是生意兴隆、赚钱发财，因此又取名叶万银，从事戏曲艺术，唱的是青衣和花旦，所以艺名叫做叶秀芳。

(一)

我从事戏曲生涯是从解放前开始的。那时候红安的文化生活十分落后，据我所知，全县只有两个唱花鼓戏的乡班子，一个是老袁（袁启林）、小老袁（袁启昶）兄弟二人组织的一个十来人的二程班，在县内演唱。袁氏兄弟都是唱青衣、花旦的，唱的多是呵嘞腔，属东路。另一个是以徐少清为班头的八里班，艺人多属县南乡的，如谢小花（谢明炎）、李少奎等，也在县内外演唱，唱的是西路，用胡琴接腔。东路、西路都是属于楚戏（过去叫花鼓戏）的分支。除此之外，县里只有一些打鼓说书、唱皮影戏和唱“围股子”的艺人。所谓唱“围股子”，就是三五人在街上或沿门演唱，让群众围观。一折戏结束，艺人向围观的群众收钱，因而江湖上称其为“围股子”。其中也有一些从外地来卖唱的艺人。这就是解放前红安的文艺状况。

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红安，我家本来就很穷，日本人入侵后，家里的生活更艰难，无奈便把我送到麻城宋埠一家糕点铺里当学徒。当徒弟学做糕点，生活是很苦的。为了谋生，我每天起早摸黑，尽量做到让师傅满意，同时还潜心学会了一些糕点手艺。我

从小爱看戏，也喜欢学着别人唱戏，凡是有戏班子来宋埠唱戏，我是场场不误的。认为唱戏比较轻松愉快。十五岁那年，丢下糕点手艺加入了徐少清清乡班。从此走上了从事戏曲艺术的道路。常言道：闻香不得进，闻臭不能出。社会上把唱戏的人叫“戏子”，唱戏的被看作是三教九流，受人歧视，进戏班首先要拜师，拜师要自己拿钱请酒，拜了师，徒弟就得象儿子一样跟着师傅的身边转，而且三年没有工钱。徒弟要学戏，师傅只说上几句词，教你唱上一两遍，然后就由你自己去练。师傅教的戏还必须唱好，不然就要挨打，轻则挨“栗壳”，重则打棍子。我的师傅熊子厚，麻城人，为人忠厚老实，青衣戏唱得好，可就是一生没有跑过红。说真的，从师傅那里学不到好多东西的。只好买东西送人，请别的师傅教。过去有句俗话，“从师不如访友”。主要靠自己看别人的，看了以后自己揣摩，挖别人的神，来提高自己的艺术。这个“神”就是以后所说的唱、做、念、打、手、眼、身、法、步。戏班子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必须遵守，例如初一、十五徒弟要向菩萨叩头。唱戏的人敬的菩萨叫老郎王，据说老郎王就是唐朝皇帝李世民。戏班走到哪里就把菩萨带到哪里，唱戏的收入少了要供菩萨，唱戏人的嗓子嘶哑了，也要供菩萨。凡是向菩萨叩头求保佑的人，都要自己出钱买黄表烧。又如唱戏的艺人中，唱丑角的人最大，只有他敢坐衣箱，其他角色都不准坐，尤其忌讳花旦，青衣坐衣箱的。丑角最大也有个传说：唐王李世民喜欢唱戏，他要宫内太监扮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自己没有什么角色可扮，就扮了个丑角。自此，便形成了丑角为大的规矩。从前，唱戏的都是男性，包括花旦、青衣，后来慢慢开始有个别女性参与。我的记忆中，解放前红安唱花旦的女性，只有觅儿夏家中房的夏二姐（夏银秀），她家很穷，小时候被送到养生堂抚养，后来被杂技团买去学采软绳（走钢绳），不演杂技后就改唱花旦，赖以谋生，很跑红，后来年岁大了，群众便称她为夏大娘。我到戏班后，学唱青

衣、花旦。即使是男性演青衣、花旦，在旧社会也会遇到麻烦。一次，我随剧团到新洲温家洼唱戏，一个姑娘看中了我，要跟我走，我不同意，也就算了。当我们转点到刘敏垸唱戏时，温家洼的那位姑娘不知何故出逃了，垸里人说我拐走了那位姑娘，便聚结全垸青壮年男子到刘敏垸来围住戏台要人。情况十分危急，是徐少清找到刘敏垸的四老爷（头人）出面，向来人解释后才没有抓我。我得到四老爷的保护，可是我的师傅熊子厚却被捉去挨了一顿打，还被关了两天。当时红安有名的说书人胡明朗，他不但会打鼓说书，还会唱楚戏，他总乐意与我搭档演《逃走》，他演家院，我演小姐。每当我们戏班不能唱戏，生活遇到困难时，他就把他说书挣来的钱供我们生活，还主动邀我们与他搭班唱戏。他真是一位多才多艺、好心肠的艺人。

日本人在这里时，唱戏不受限制，有日本人住的地方我们不去唱戏。我们到日管区去演戏，事先得与维持会的搞好关系，还要与当地的一些大老爷（有钱有势的人）搞好才能唱戏。凡是维持会或大老爷承头要我们去唱戏，都是演的赌博戏。所谓赌博戏，就是在一个地方，同时有两个戏班来唱戏，台上唱戏，台下开赌，一开赌就是几十张赌案。维持会或大老爷从赌案上抽头给戏钱。哪个戏班的戏唱得好，哪边的赌案就多，抽的头就大，但付给戏班的钱仍然只是开头讲好的数字，多余的钱就归维持会或大老爷们所得。哪个戏班唱输了，哪边的赌案就少，抽的头就小，唱戏的人的钱也得的少。一次，我随徐少清的班子到高桥蔡家田唱戏，是由国民党县参议钟象乾的弟弟钟四喜承头唱的赌博戏。与此同时，蔡家田附近的黄陂潘家寨也有一个黄陂乡班在那里与我们搭对台唱赌博戏。我们唱赢了，黄陂乡班的张班头很恼火，便唆使头人沟通六指乡的维持会派人来捉我们戏班的人。那天，我正在台上唱《梅氏泼水》，一见抓人的来了，我顾不得脱去戏装便跳下台，钻到了观众中间。观众把我围住保护起来，这样幸免没有被当

场抓去。戏唱不成了，我们戏班的人都分散到群众家里去了，结果还是被以杨大官为头的黄陂保安队捉住了。当面就用杆面杖把一个名叫陈春奎的艺人打得不做人叫，然后用一根绳子把我们一连串捆着带到了黄陂六指乡，不分清红皂白地关了六天，最后还要我们每人拿六块大洋才肯放人。戏唱赢了，钱却被人敲诈去了，人还要坐牢挨打，从此戏班子也垮了，唱戏的人各奔东西，自谋生计。我便跑到汉口去唱了一段时间。

戏班子常聚常散所以也叫“四季班”。四时八节，如年关唱灯戏，五月唱端午戏，还有庙戏、谱戏、春戏等等。每逢这些时候，戏班就摇锣摆鼓地唱大本头戏，其收入略有结余。平时一般都闲散在家，遇上有人唱寿戏，再把班子拉起来。凡是唱戏都要请台。请台就是头人把三牲和香、蜡、纸、炮、用托盘端到戏台前的桌子上，由戏班的丑角演员摆开三生，点蜡、焚香、烧纸放火炮，作揖打躬，口中念一些吉利之词。事毕才能开锣。

乡班是以乡老板为主，唱戏的行头（服装、道具、首饰等）都是班头的。一个乡班的行头一担可以挑起。那时拥有一两个门帐的乡班，就算很了不起的班子。没有灯光、布景。乡班里最多十几人，但行当齐全，丑、旦、生、须、文武场都有人，只有打小锣的是由唱戏的人兼带。班头一抹带十杂，样样都搞。

戏班子里分红也有规矩，如打包银，也就是打分数。一场戏的收入中提百分之三十给班头，其余按各个行旦的分数分得。最多的十分，最少的四分。还有提帐的规矩，如某人是十分，议定该加五分，可得十五分的分红。当天唱戏，当天结帐。唱戏的人大多数都是衣不遮身、食不果腹。艺人与艺人之间也是人吃人，五抢六夺，忠厚老实的吃亏，有的人唱了戏只混个嘴巴，根本拿不到钱，跑江湖的人老了全靠戏班的人施舍。

旧社会唱戏的人住的是“官店”，所谓官店，就是祠堂、庙宇、学馆等这样一些公共场所。站的是草台就是露天地里用门板搭的

台。点的是夜壶灯，吃的是千家饭。

过去唱戏虽有固定的本子，唱戏的人多属文盲，均由师傅口传手教，字句上的大同小异，文词不清是常有的事。

红安的戏班不多，为了生活，还排演了不少的戏本子，如《郭丁香》（四十八本），还有《方卿拜寿》、《荞麦馍赶寿》、《朱氏割肝》、《美女瓶》、《李业贵卖水》、《晒罗裙》、《天仙配》、《贵五抬亲》、《白艳红招亲》、《白蛇传》、《白骨塔》、《蔡鸣凤》、《杀子报》，小戏也不少，如《蔡鸣凤辞店》、《张大和辞店》、《呼延昌辞店》、《张大和投店》、《张大和休妻》、《嫁妆》、《思凡》、《喻老四打瓦》、《喻老四上竹山》、《张二女赶会》、《喻老四反情》（有大反情、小反情）、《杨二女起解》、《乾隆皇帝游苏州》、《断桥》、《祭塔》、《杨氏送饭》（又叫南冲耕田）、《不茅房》（又叫五女夺夫）、《庵堂会》、《拷打红梅》、《桃花洞》、《逃走》（又叫越墙破镜），后来还演过武戏，如《水漫金山》、《许士林祭塔》、《断桥会》等，文戏中有《安安送礼》等。

以上是我解放前的从艺的部分经历。

（二）

1949年红安解放时，我正在八里垅唱园子戏。1950年元旦，县里为了庆祝人民的翻身解放，叫我所在的徐少清乡班到县城演出三天，费用由县人民政府负担。这是解放后我第一次进县城演戏。戏台搭在红一中操场，演出剧目是《赵汝珍装疯》。过后，县里留我们继续售票演出。戏班“打官店”住在南门岗耿家榨房，演出地点在东门岗。演戏的收入不少，但钱被班头董哈巴和另外两个人拿去吸了大烟，弄得我们连饭都没有吃的，我只好与占海燕结伴离班跑到宋埠唱园子戏去了。

1952年以新洲、红安两县艺人共同组成的新红楚剧团成立，团长吴银洲（新洲人），副团长夏银秀（夏大娘、红安人），我

是团里成员之一。虽说剧团规定在新洲、红安两县之内演出，但到红安演戏的机会很少，特别是逢时过节，红安要戏要不到，不要戏的时节又要来演戏，由此双方艺人产生矛盾，继而分裂，直到1954年底终于散了摊子。

1955年，红安艺人张大新联系来红安演出的长凌楚剧团，县里留下作为红安县楚剧团。开头人数不多，于是又吸收了一些红安本地的艺人，我就是这次被吸收到县剧团。长凌楚剧团团长黄长伢，副团长高凌云（艺名高金花），长凌楚剧团便是取“长”、“凌”二字而得名。县里对这个以私人班底为基础组成的剧团很重视，先后委派谷伏松、夏训礼、吴恒盛等干部到剧团当辅导员，县文教局也曾安排王子伦、刘士卿等同志到剧团加强领导，安排剧团住在西门窑附近的五间平房里，住不了的安排在小礼堂（县招待所）里住，把新建成的红安大礼堂作为剧团的演出场地，吸收有名望的艺人充实剧团，经济上给予一定的资助。县剧团相对稳定后便开始售票演出，八分钱一张票。海报天天出，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花轿或采莲船上，然后抬着花轿或划着采莲船到街上转几圈进行宣传。这时，剧团已有女演员唱青衣、花旦。两个女旦角中王幼珍的扮相好，演戏水平一般，赵秀萍扮相差一点，演戏很有水平。当时观众看戏是以貌取值，不以艺术而论，称王为大八分，谓赵为小八分。一场戏收入只有十几、二十几元钱，收的钱先把衣箱费一提，再接丑、旦、生须行旦分帐，跑龙套的分钱最少。当天收的钱，当天就分钱。演出的人员大多数生活很苦，有的人收入维持不了生活，戏散场以后，便跑到台下拾烟屁股吸。

县里派到剧团的辅导员也有分工，刘士卿管思想政治工作，经常组织艺人学习时事政治，夏训礼负责业务。团里旧艺人多，习惯于流浪，散漫的生活，组织纪律性很差，早晨摇铃起床，有的不起床还说“听到摇铃声就要吐”。辅导员还是坚持做工作，使

团里大多数人能集体行动。县里为了培养自己的演员，1957年春，先后招收了王辉凤、王辉虎、王泽联、陈才秀、陶芙蓉、谢家贵等青年学员。当时演出是打活本子，所谓活本子就是唱提纲戏，唱词、道白由演员即兴编出。过去打活本子是靠口传手教的，旧艺人多属文盲，不懂文词，师傅怎样教，徒弟就怎样唱，辅导员为使师傅不致以讹传讹，而真正把戏演好，做了大量的工作。因而即使是活本子，也能做到台词统一。

1957年春末，县里计划让剧团到外地打场演出半年。我是负责打场（联系演出地点）的。首先下场的地点是仓子埠，上座率很好。仓子埠离汉口比较近，又有轮船可以直达，于是团里就有人趁机跑到汉口去唱茶馆戏，演一场可得十几元钱，搞得剧团不能正常演出，还影响不少人吵着要离团。为此，县里把剧团从外地撤回，集中在大礼堂开会整风。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整顿作风，统一思想认识。可是，要整风的话一传开，有的艺人就吓跑了，如谢小花就是一例。还有些人满不在乎，互相串通说：“整个么风！你也不提我的意见，我也不提你的意见”。这样整风搞了很久，旧艺人的旧思想仍然很难转变过来，流浪散漫的生活习惯也不能在短期内得到纠正。整风结束后，仍然有许多人要离团。当时，地区文化局副局长丁成，县长叶绍先，宣传部长童杰，都参加了这次剧团的整风。叶县长说：“排个队，要走的站在一边。愿意留下来的站在一边”，六十多人的一个剧团，要走的那一边站了一大半，个个态度傲慢，留下来的有我、王秀川、肖从金、陈汉文、林顺山、李明山、熊子厚、郭转运（女）、张双喜等九人和六名学员，乐队的有吕志怀等六人。叶县长说：“在红安不走的人，活着是红安人，死了是红安的鬼，老了红安养起来。”我们留下来的人听了个个都受感动，深深感到政府在给我们撑腰。

剧团剩下这十几个人，在辅导员的指导下决定演个争气戏。选排的剧目是《郭丁香》。角色不够，就一个演员串几个角色。长

辅导员夏训礼也亲自出来打鼓。夏训礼是县城人，能拉会唱，也有文化，很懂戏，人也好。夏训礼出面请何荣甲、谢西林两人画机关布景。服装不足就租用高金花的衣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这个戏排演成功了。离团的人还赶上看了我们的演出。《郭丁香》这个争气戏演得很成功，看戏的人很多，收入也很好，还引动了不少人学唱楚戏。1957年8月，县楚剧团第一次公开招收学员，招收的男学员有董玉山、董幼卿、高厚清、张继福、张金元等，女学员有侯舜华、熊春梅、董世荣、魏正馥、王仙娥等。学员吃供给制。另外每月男学员发五角、女学员发壹元钱的零用钱，一直到六〇年才发工资。为了培养提高这批学员，由郭转运带领其中的一部分到地区戏校学习一年，学回了《打金枝》、《白扇记》两个戏，留下来的学员随团演出学戏，分别由我和几个老师父口传手教，排戏由王秀川负责。扩大后的楚剧团第一次下乡演出是由县委宣传部开的介绍信，每场包场费40元。下乡的第一个点是永河区，区长黄世华接待了我们。自此以后的时间里，剧团办得很有影响：师傅热心教学，学员用心学戏，既排演了老戏，又排演了自己创作的新戏《徐大妈》，该剧还到省里进行过演出，并被省电台录了音。剧团培养的这批学员后来多成为团里挑梁的演员。在这一年里，县里拨专款为剧团添置服装道具。自那时起，县里每年给一定数量的钱兴办剧团。当时全团人员的思想比较统一。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剧团和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一个艰苦的阶段。为了弥补剧团演出的收入不足造成的困难，全团上下大家动手千方百计共度难关，有时台前演完戏，回到后台就动手做土砖卖，到安东农场去（紫云）筑土墙、养猪、养羊；女演员帮人挖花生、摘花生，男演员到山上割葛藤送到供销社卖五分钱一斤，到华河演出还给人当挑夫搞搬运。把蜂箱从县城送到赵河，男的挑六十斤，女的挑四十斤一趟分别只能领到三角钱、一角五分钱的力资。此外剧团还在铁炉乡开荒办农场，种上了小麦和花

生，由于采取各种办法增加收入，弥补了生活之不足。因而使剧团得以生存和保留下来。这个时期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全团人员仍然坚持早上练功，白天劳动，晚上演出，大多数人没有怨言。剧团每到一地，都要收集当地的好人好事。编成快板在演出前进行宣传。这样，我们在群众中彻底改变了过去“戏子”的地位，大家都把我们称为演员。

1963年前，县里另外成立有一个文工团，60年9月撤销，部分青年演员合并到剧团，至此剧团已扩大到八十余人。这时不仅演老戏，还排演新戏，不只演戏曲，还演现代歌剧，如《红珊瑚》、《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等。自这时起下乡由包场演出改为售票演出，剧团也增置了围棚和网子。

剧团的新生力量远远超过了老艺人，县里为了使青年演员能学好艺术，专门订立了“师徒公约”，要求做到教戏育人。公约的内容是：遵守团里一切规章制度；尊师爱徒；师傅要教好戏，徒弟要学好戏。我的徒弟是陈才秀和王秀莲。通过这一教学相长的活动，师傅们焕发了艺术青春，增强了责任感，悉心向徒弟传授技艺；徒弟们尊敬师傅，虚心学习，苦练基本功，努力钻研艺术。这期间相继排演了《闹瓜园》、《打猪草》、《买杂货》、《杨绊讨亲》、《赶会》、《思凡》等小戏，艺术水平较原来大有提高，群众对剧团的想法越来越好，剧目在县内的影响越来越大。

1962年5月中旬，董老回红安，要看家乡的戏。我们全团人共同努力为董老演出了三小戏《访友》、《拾玉镯》、《错婚配》。整个剧目的排练和演出都是红安楚剧团建团以来所未有过的盛况。演出结束后，董老还与演出人员一一握手，赞扬我们演出成功，全团人员倍受鼓舞。

这年县剧团进行调整，有一部分人员被精简。5月下旬，省里有一批演员下放来红安。这批演员中有省里挂牌演员，如李三喜；有戏校的教师，如黄婕、万学涂、吴四海；有戏校的学生，

如朱雅生、汪宝珠等。县剧团增加这批力量，也增加了他们带来的一些剧目，特别是演出水平较原来又大有提高，因而在县里的影响就更大，收入也更好了。但剧团这个时间下乡演出仍然是坚持肩挑背驮，演员们除了要挑自己的行李外，还要分挑服装道具，到各区政府所在地演出，还要带上灯光布景。

自省里下放人员来团后，剧团的行政领导班子相应作了调整，团委由原来的九人，增加到十三人。剧团作为艺术生产单位，设立了艺术股，股里配有专职创作人员，成立了导演小组，成员有：王秀川、李三喜、黄婕、王辉凤、王泽联等，使一台戏的各道生产工序逐趋完善起来。此时剧团虽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单位，但在文化部门中的地位和影响是较高的。剧团原来是由吴恒盛主持工作，1961年由县委党校副校长谭光清同志兼任剧团党支部书记、吴是副书记，1962年剧团单独成立了党支部，谭不再兼党支部书记。党支部原有的团支部人选作了调整，由黄婕担任团支部书记，青年思想工作很活跃。由于党、政、青年工作的加强，因而更坚定的执行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随着演新唱新的逐步展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就相应地演少了，剧团还演出自己创作的大型现代戏《安乐村》，排演了移植的现代戏有大戏《三里皖》、《卧龙湖》、《海防线上》，小戏有《搬家》、《送粪》、《双教子》、《补锅》、《打铜锣》、《斗笔》等。我在这些戏里只能饰个群众角色。鉴于这种情况，我认识到自己已不适宜再在剧团继续工作，于是便向剧团写了请调报告。剧团的党、政领导对我这个团委的请调很重视，一方面做安慰我的工作，一方面积极为我联系接收单位。不久，我的申请获得批准，接收也联系妥当。一九六四年四月离开了县楚剧团，到县商业局报到，被分配在副食品公司副食品加工厂当糕点工人，从此，我告别了二十四年的戏曲生涯，依然重操旧业，一直工作到退休。

何为嘉记录整理

红安皮影戏

汪海东口述 吴昌金、彭志才记录

皮影戏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在红安兴起与延续，是有其广阔的社会背景的。据我所知，红安是边远山区县，解放前，长期的封建专制禁锢着人民的思想，经济不发达、文化落后，各种文艺形式很难在红安推行。清朝末年，随着社会思想的维新，山区人们思想也逐渐觉醒和活跃起来，于是乡村中的地主阶级，为了顺应历史潮流，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维新思想，促进社会变革，同时也掺杂着宣传封建思想，达到用“善戏”来笼络群众的目的，在他们推行的许多文艺形式中皮影戏在山区的效果最好。

据我的师傅讲，光绪末年，红安县丰岗乡王贵轩垸有个叫王凤鸣的秀才，多才多艺、能写会画、吹打谈唱样样都会，他在博览群书中发现了关于皮影戏的传说，并被深深地吸引住了。相传，皮影戏兴于唐朝，太宗李世民为了显示唐朝政权巩固以后的太平，在御苑内大摆戏台，彩女宫娥上台唱戏，三宫六院在黎园仿效，台前加用帷帐掩盖以遮羞耻。二月花朝那天，唐太宗游御花园，见此情况甚觉有趣，于是留连忘返，恰巧皇儿因无人照看，坐到聚宝盆里吃玉米而被噎丧生，太宗于是下旨，从此宫内禁演此戏，并驱逐了宫娥彩女，这种演戏的形式于是便带到民间，人们纷纷仿效并加以演变，逐步形成了皮影戏的雏形。王凤鸣不仅对皮影戏的传说着了迷，甚至放弃对功名和仕途的追求。亲自进行皮影戏的试验和演出。在实践中，他亲手摸索出一整套制作皮影子的工序。他首先勾画出男女老幼的人形，再行设计各种服饰道具，然后逐一用牛皮剪割下来，经过着色添色，精雕细刻连缀成各种人

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可以与各种戏曲舞台上的丑、旦、生、末、净相比拟，他按照当时流行的汉戏剧本结构和唱词格律，将《封神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小说改编成皮影戏唱本；并且采用汉剧唱腔和胡、月、弹为主的乐器进行伴奏。他对自己的制作、编剧、演唱感到满意之后，又决定创立皮影戏班，为此，他跑遍了全县各地，招收了一些良家子弟为徒弟手把手地教他们提皮影子，向他们口授唱腔和道白，一句句，一节节地教，一折折，一本本地传，不仅使徒弟能够熟读熟记，他自己也可以倒背如流。而且还做到边教授边实践边改进边提高。这样，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艰苦训练，他所创立的皮影戏班终于走上了戏台，演出了红安历史上的第一台皮影戏。皮影戏一经唱开，深深吸引了长期渴求文化生活的贫苦农民。由于皮影戏简便易行，戏班的费用不多，农民们也可以凑得拢，负担得起。因此，皮影戏逐渐扩大了影响，成为农民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这就是红安第一个皮影戏班的诞生经过。

王凤鸣带的徒弟很多，最得意的大徒弟李大合。李大合是丰岗乡上李安村人，绅士出身，他聪颖过人，凡是王凤鸣教过的东西，都能接受。在戏班中很有威望，王凤鸣死后，李大合便继承了台主。李大合主持戏班后，一方面注意招收新人；一方面进行皮影戏的革新。为此，他与徒弟们长时间进行认真的摸索，实践和相互切磋，他认为汉剧唱腔不大合乎山区人民的口味，于是自编一种腔调，唱给全班艺人听，让他们批评、指点然后加以纠正，于是逐渐将原来的汉剧唱腔改为独具特征的皮影戏唱腔，在实践中，李大合还发现用胡、月、弹三琴在室内伴奏，具有幽雅动听，表达感情细腻真切等许多长处，但对于常在野外空旷地方演唱的皮影戏来说，却存在着不少的缺点：音量太小不热闹，费时又多，群众音乐素质差，难于接受。于是他就改用鼓、锣、钹、板取代胡、月、弹三琴进行伴奏。经他所改的这些唱腔与乐器曲

牌一直延用到现在。到1935年又在其间加进了唢呐伴奏，好处是可以烘托剧情气氛，活跃戏场，提高观众的情绪。乐器和腔调的不断改进，使皮影戏日臻成熟起来，皮影戏的改革，显示了李大合杰出的艺术才华。

我的师傅是刘金山，他是李大合徒弟中出类拔萃者的一个。清末民初，他到李大合家学艺，在李大合的悉心教导下，他吹、打、提、唱样样娴熟，深得李大合的器重。1934年李大合病故，刘金山于1935年回到二程乡新寨刘先泗村招徒授艺，与我一起拜他为师的有汪亚东、黄四海等人，刘金山治学严谨，对徒弟提出明确的要求：词句要优美，情节要熟悉，音乐要奏得和谐，影子要提得活，情绪要高昂、精神要饱满。他教导我们：一台戏要唱得好必须是奏乐提影，唱腔和道白四者的有机结合，水乳交融，每个人眼、脑、耳、手同时高度集中，如人物出场前奏乐造气氛，影子要根据奏乐情况适时提出，灵活地指使人物活动，往往是一个动作发挥得好，会引来观众热烈的掌声。诸如文官的龙形虎步，武官的粗犷豪爽，旦角的一步一扭凤点头都要靠提影的技术，说词唱曲者要根据“人物”的活动适时唱曲、道白，这样才能使人物形象完美，虽然我们不敢用“名师出高徒”的格言来自夸，但我们几个弟子的确没有辜负他的教诲和期望，从而使他传授的皮影戏艺术增添了生气，扩大了影响，就在我们三年满师的那年，我十分尊敬的师傅，红安皮影戏承前启后的艺星刘金山去世了，弟子们万分悲痛，我们师兄弟们都推举我为台主，因我和汪亚东都是汪散的人，所以称为汪散皮影戏班。在七里、华河、二程等地巡回演出。以崭新的艺术展现在农村观众面前，赢得了人民的爱戴，我们每到一地唱戏，纵横十几里地大小村庄的群众，都争先恐后地赶来看戏。唱什么戏一般都是在唱演前任东道主点戏，比较长的连台传戏就采用提纲式的活本子唱法，单本或较短的戏就按照剧本固定台词，我从艺以来共演一万五千余场，

刘东和我的名字横直几十里老幼皆知，在淫散戏班的推动下，刘金山的师兄、师弟、师侄们分别到七里、高桥、华河、永河等地招徒授艺，逐渐繁衍，皮影戏的班子日趋增多，皮影戏在红安各地成为人们喜庆节日和文艺娱乐不可少的一种文艺形式，凡是有钱的人请戏班为其唱寿戏、唱愿戏等，唱正戏前还要请台。我所唱的本子不计其数，主要有《封神演义》、《岳飞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征东》、《征西》、《狄青传》、《粉妆楼》、《隋唐传》、《反唐传》、《三贵头》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民间艺术，红安县政府更加关注皮影戏的发展，首先派文艺干部深入皮影戏班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提高演出人员的思想认识。帮助剔除封建迷信的糟粕，对皮影戏如何改进与提高作了不少的工作。1961年县文化馆委派曲艺股长杨一辉带我专程到黑龙江去学习东北的皮影戏。1964年红安县成立了由我、李正礼、黄崇新等人组成的“红安县皮影戏队”，作为脱产的专业文艺团体到全县范围内进行营业性演出，隶属文化馆领导，在县皮影队的影响下，红安皮影戏这个民间艺术形式，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班子的台数和从艺人员不断增加，就我所知，全县皮影戏班一共有三十九台，演出人员有二百余人，其中丰岗乡有十八台，七里四台、高桥和二程八台、华河二台，还有从麻城传入红安永河、两道的各一台，从河南传到七里耿家洼的一台。至此，红安皮影戏就一共有三支，其唱腔、提法和幕帐的大小等各不相同，但演唱的剧本内容基本一致，群众喜闻乐见也是一致的。这些皮影队伍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活跃农村文化生活起了很好的作用，除了对传统剧本剔除封建糟粕之外，我们还致力于自编自演，说新唱新，例如由我改编的《五块大洋》、《小兵张嘎》、《三丑会》、《两个队长》、《审椅子》、《大闹平川》等和学演外地的优秀剧本《三世仇》、《血泪仇》等都以全新的内容出现在幕台上，深受广大

群众的欢迎。

“文化大革命”中，皮影戏也遭到了厄运，县皮影戏队解散了，各地的皮影班也不存在，艺人们各自回到家乡从事农业生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使濒临灭绝的皮影艺术重放光彩，获得了新的生命。1979年落实党的政策，县皮影戏队也基本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但我和队员们均已年近古稀。尽管这样，我们个个老当益壮，人人显得精神饱满、劲头十足，大家按照改革开放的要求，努力运用皮影戏艺术，说新唱新，热情歌颂党的政策，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省、地文化部门还组织皮影戏汇演，让我们到外地参观学习，以期对这种艺术进行推陈出新，使之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我们把演出过的折子戏写成剧本，刻印下发到各皮影队进行推广，我相信，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指引下，皮影戏这个深受红安人青睐的艺术奇葩，必将会散发出永不衰竭的芳香。当然，随着电影、电视等现代文艺形式的日益普及，皮影戏能否长期存在，社会实践会决定它的命运。不过，它作为一种历史上曾深受爱戴的艺术形式，群众是不会忘记它的。

何为嘉 整理

黄安师范讲习所概况

陈继唐

我县的国民教育，自废科举兴学校直至民国十五年以前，仍不见普及，全县十个区，除城区县署所在地设立高等小学校、模范小学校（初小）、女子小学校各一所，七里、八里两区各设完小一所外（中间曾设立过几种农业学校，似只办一期即停办），其它七个区则各设一所名新而实旧的区小学（初小），教员最多者为二人，旧式私塾仍然遍布全县乡村，其性质毫无改变，当时我县教育界有声望的先进之士董必武、张眉宣诸先生，有感于在我县兴办学校，先决条件为解决师资问题，于是在省城发起筹办师范讲习所，设立于黄安县城，培训适应当时所需的国民学校教员，该所于1924年春，宣告正式成立，以城隍庙为所址，庙东侧的杨四将军殿为教室，西侧的财神殿为办公室和教员宿舍，前面围墙内的大院（可容数千人的大戏场）作操场。所长由当时的县教育局局长周彬仪兼任，聘请省一师毕业生而有多年教学经验的姚虞卿（蒲圻人）、陈云祥（黄安人）、李镜唐（汉川人）等三人为教员，以姚虞卿为主任，文隼邓克之、庶务余子清。在本县招考学生，经录取四十余名。是年四月初正式开学，章程规定教育期限为两年，毕业后由教育局派充我县各小学教员，以期逐渐消除私塾。一期当然不够，决定作长期计划。一期接一期的办下去，这次所招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曾经当过私塾老师的，年龄大的在四十岁以上，如郑国樵等人，一般都是三十岁上下，最小的十七八岁，占极少数。所有各科书籍和服装制服（青、白色各一套）全由所里供给，并每月发给每人生活津贴铜钱三串（当时银洋一

元值钱约四串》，学生自行在外分组伙食团走读，有人日食百文，亦能果腹，可见当时生活之艰苦。

教员陈云祥，担任国文（兼授注音字母）、史地、教育学、儿童心理学、文字学等课，姚虞卿担任教授法、伦理学、算术、办学指南（包括公文程式和表册大全）、工艺、图画等课，李镜唐担任公民、英文、数学、理化、生理卫生、音乐、体育等课，周彬仪担任伦理学，每周讲授一次。

该所在教育设置上和教学方式、方法上以及在社会上的表现，都是前所未有的，给人们以新颖的美感，一时成了黄安教育园圃中一个崭新的灿烂夺目的花坞。几位教员的教授姿态和方法，都是活灵活现，引人入胜，效果极佳！音乐、体操、游戏，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开学不久，便组成一个音乐队，乐器是中西合璧，即西乐器的铜鼓洋号，中乐器的笛子，还夹以三角铃，小铜钹。每逢上体操课，最后全体学生列队，总是兴高采烈地要在李镜唐先生率领指挥下，以音乐为先导，在全城各街巡游一周，一色的制服特别耀眼，虽大多数是老学生，也表现得生气勃勃，雄壮昂扬。李先生上穿马褂，手舞指挥鞭，口衔哨子，精神特别抖擞，指挥若定。观众大有倾城之概。

开学转眼迎月，即举行“五七”、“五九”国耻纪念活动，组织宣传队分赴城乡宣传，更是有声有色地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一时全城鼎沸。接着作龙潭寺的旅游，沿途进行宣传。

是年下学期，成立学生自治会，举行大会开幕典礼之日，张灯结彩，请来县城各学校、机关、团体，自县议会议长和县知事以下，各派代表前来观礼，典礼程序，首先为筹备负责人报告，接着为来宾致贺词，最后为游艺会。是日上午九时开始，城隍庙西边城墙上的观众，糜集成了一座黑压压的人山，隔着院墙居高临下，院中一切，全收观众眼底，城墙便成了观众的天然观礼台。议程进行到游艺会时，全体学生首先进行大合唱，接着在大院操

场作各种精彩的体育表演，阵阵欢声声浪，为城墙所阻遏回的回声，经久交响不息，这一切，又是我县新出现的一番稀罕的空前盛况。至此，学生自治会完成开幕典礼而休会。

当日下午，进行自治会执事人员的选举，结果，学生董献之当选为会长，陈德畅当选为副会长，下设音乐会，陈家祥被选为会长，体育会，熊厚忠被选为会长。同时决定开办平民学校，公推陈家祥为主任。组织所刊（季刊）编辑委员会，刊名《诚毅》杂志（“诚毅”为所刊），公推李应棻为主任（该杂志终未出版）。

时隔不久，该所教育渐成虎头蛇尾的趋势，是年冬季，因多数同学不满所主任姚虞卿的官僚派作风，便掀起倒姚的学潮，以至停课多时，唯终无结果，不了了之。自此以后，教育的进行受到影响，不复如当初的活力，教学渐呈不景气之象，直拖到寒假。

次年上学期，在社会活动方面，值得记忆的是先后举行了“五七”、“五九”国耻纪念和对“五卅”惨案的宣传运动，其规模气势，较之前一年举行的国耻纪念更为扩大而雄壮，因我县是时已有秘密的而又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组织和公开的黄安青年协进会为背景。在此以后，又作了一次长途旅行的宣传活动，先至龙潭寺，经七里坪到天台山，沿途向群众宣传革命。渐渐时近暑假，即未再上课，只草草完成了学生学习的最后一课——分派到模范小学进行教学实习。实习完毕后，即该所宣布停办之时。所长打算发给每个学生一纸毕业证书，因经办人趁混水摸鱼，竟将证书费全部吞没，后来也无人问及此事。该所学生修业期本定为两年，实际教育只有一年，由于人事之不藏，便告夭折。

几位教职人员的性格和学术修养，各有千秋，周彬仪（五十岁上下）是个极古板的老先生，毫未脱科举时代的文人氣味，陈云祥（二十八岁）虽属新学派，却是个读死书的人，对他事概不闻问，姚虞卿（三十三岁）学识基础不厚，又习于吹拍，人见而生

厌，被视为官僚派，故遭到学生的群起驱逐，唯有李镜唐（二十四岁）学识面较广，是个热血青年，具有革命者的豪迈气度，当时人都说他是个过激分子，后来得知他是地下跨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黄安革命启蒙运动和秘密建立革命组织，他是一马当先的人，在师范讲习所教职员中，独树一帜，也只他一人，深得全校学生的敬佩和爱戴。不幸后来殉难于“三·一八”惨案。

该所对发展黄安的国民教育和革命运动，虽无大的建树和贡献，但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借一期的教育尚未完成即告夭折，及今想之，遗憾难忘。今日吾乡后辈鲜有知者，故特作此概述，耳知我县在大革命前期曾有过这么一回事，也好作我县教育史的补遗。

王文金 整理

“栋臣学产”始末

程子菊

我的父亲程栋臣，1864年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永河椿树邹家垸。这年正是捻军抗清的时候，村子被清军烧毁了，碎瓦颓垣迎接他的诞生。童年时他也曾刻苦自学，但终因贫困学得很少，给他带来终身的痛苦。从他挑贩经商起，到他拥有“湖北第一”富厚的资产，几十年的社会活动，更使他体会到教育的重要。他要长子程子英读书，直到去北京读大学。在我十三岁时，叫我离家出外读书，还教育他的子子孙孙要重视教育，可见他对后辈受教育的重视。

他为了让更多的人受教育，便于1935年从他生意盈利中捐资四万两白银，资助家乡的教育事业。这年恰逢黄安（即红安）县七里、紫云一带灾情严重，不少农民灾荒难度，只得变卖良田。为解灾民燃眉之急，他使用此银将灾民田产、房屋买下，计田地五百九十七石、房屋数百间。此事还呈报到省政府、省教育厅备案，获得省政府的嘉奖，黄安县为此设立了“栋臣学产”保管委员会，负责人是陈乾初，这是“栋臣学产”的起因和建立。

“栋臣”学产的房屋、土地，由保管委员会负责租赁给农民居住和耕种，每年秋季向佃户收取租谷。收取租谷的标准，视收成、土地好坏而定，一般每斗租田征收租谷六斗至一担不等，正常年岁收租谷折合银元计八千四百九十元。田地都属全民所有，钱也属全民所有，专作本县教育经费使用。

抗日战争时期，黄安县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栋臣学产”的田

地无人耕种，荒芜一百二十余石，房屋被毁五十余间，“栋臣学产”收益锐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黄安县经济萧条，县政府将“栋臣学产”收查归并于地方财政，由财政委员会管理，当时分管“栋臣学产”的负责人，先后有王益三、郑继堂、张幸山。由于学产收益分散使用，以至教育经费拮据，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为此，“栋臣学产”保管委员会专门向湖北省战后救济委员会写了一份报告，并请拨款、复耕、修房，利民利教。

1946年，黄安县临时参议会议决定，“栋臣学产”收益仍由县政府统收，交库保存，专作教育之用。还明确规定了支出范围和标准：县立中学补助费及县中学临时补助费3·5成，县直小学补助费3·5成，黄安在外地读书的初、高中生、大学生及留学生常年津贴费2成；征收保管员薪金及保管委员会整理田产费1成。事后，“栋臣学产”的收益和支出，一直是按照这个规定的标准和范围执行，直到黄安解放。

“栋臣学产”本与我无关，由于他在那个历史阶段起了一定作用，记载这段历史，在于引起更多有识之士关心教育，培养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何为嘉 整理

我三次繪制紅安县地图的经过

王树华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三圣庵中学内，见到一张挂着的中国行省地图，湖北省界图，在省图上，鄂东北方位、倒水河东面，注有黄安县的县治标记。还有一张本县地图，没有注明缩尺，凭我的感觉大约是五千分之一，图形上圆下尖，象锥头形状。我再仔细一看，既不合制图规则，又不切合实际。制图者没有把当时国民党政府划割本县东北部分属河南经扶（现新县）管辖、西北部分属礼山（即大悟）管辖的地域去掉。这样的地图，只能作为装璜门面，无实用价值。

1942年，王度（号明德）任黄安县长时，叫我担任县建设科技士，并叫我绘好一幅切合实际的县图。我与王明德是同姓同坑，又属本家，因此，他对我家比较了解。因我父亲王藩（1886—1944年）是前清张之洞督鄂时创办的铁路专科学校毕业，他监修京汉铁路时曾参加过法、日工程师开道武胜关隧道工程的设计，及沧（沧州）、石（石家庄）铁路和粤汉铁路的施工作业，他还勘测过本省鄂东、鄂西、鄂南等省道公路和绘制工作。1932年我在武汉市立职业技术工程科训练班三个月学习结业后，就随着我父亲绘制、晒印图表和公路测量绘制施工作业。他深知我酷爱绘制地形图技术，所以他在主持县政后，便叫我担任此项工作。

当时，国民党黄安县政府设在七里坪，地处山区，即无测量

仪器，又在日寇骚扰之下，不可能全面勘测绘制精确的地图，我考虑到以前测量长途公路平面地形图，常向陆军测量局借用行军地图，作为参考，那些地图非常精确，地图上有立体等高线，还有海拔高度数字记载，连小到一个庙宇一个祠堂，都有记号。经请示县长，向当时五战区国民党驻军一七二师五六团团部，借来小幅印有黄安县城的五万分之一的行军地图六张，作参考图开始绘制。我划去了新县和大悟割去之地域，把图扩成三千分之一的精确县图，标明比例和名字，这是我县第一张地形图。

1943年，蒋荣平接任黄安县长，又派人至我家，叫我去绘制五万分之一县图，并要求象行军地图一样，有山区、河流、村镇、庙宇和海拔等高线数字记载。这份地图我绘制了两份，一份是玻璃纸，由于当时日伪的封锁，买不到晒图药纸，没有印制，束之高阁，另一份带至七里坪，找到开印刷厂的耿显礼弄来的药水绘制而成底图，并用石印印出三十余张，分发机关、乡公所各一份，绘制这两份县图耗费50余天，在付印之前，我在县图下角写了“绘制者王树华。”

1949年红安解放了。国民党政府留下了腐败、破碎的黄安，百废待兴。人民政府对全县地域、区乡、交通、治安、行政等进行规划，不可没有县图。那时，我已在王祥畈（本村）教书。有一天，县人民政府派人送来一封信，原来是马友才、程鹏二位县长给我写的，要我绘制县图。据说解放时，人民政府从国民党某乡公所收缴了一张县图，县图上有我的名字，这样才来找我的。马、程二位县长拿着原来的那张详图对我说：“要缩小些、简化些”。我接过了图说：“绘图是我最喜爱的，我现在教了四十多名学生，在县城绘图就怕影响了学生的功课”。程县长也很体谅，答应我把图拿回去绘。我原来估计需要十天，回去后白天挤时间绘、夜晚加班绘，这是第三次绘同样的县图，比较熟悉，五天之内就绘成。我送到县里来，程县长非常高兴。自后，县里找过我

几次，都是绘图，如城乡图、分区图、全县交通图等，这些图都是我挤时间绘成的。1950年春节前，学校放了假，准备过年时，中共红安县委办公室李秘书亲自找我，与我商量把原来五万分之一的详图，由立体的同高线，改为射线式的山脉分布图。除我之外，还抽调县一中的王老师帮助写字，两人合绘了十多天，完成了任务。此后，李秘书通知县教育科，把我调到陈家堂县立小学工作，1951年又调我到县政府农建科，搞恢复全县公路工作和全县水利测绘工作。我于1978年退休。

何为嘉 整理

武昌黄安学社

陈彰瑜 吴克仁

武昌黄安学社始建于清朝末年。

清末，朝廷选拔人才仍然推行的是科举考试制度。当时，我们县除考秀才的人赴黄州府应试外，其余考举人、进仕、学衔的人都须赴省城——武汉应试。黄安县地处鄂东山区，距省城二百多华里，水陆交通又不方便，考生必须提前步行到省城作应试准备。到了省城，有的考生投亲靠戚求得食宿场所，有的考生则要寄居饭店、旅馆。为了供每年赴省应试的考生有一个固定、安静的食宿和学习场所，黄安在汉的各界人士积极商议，决定修建一所专供每年应试考生居住的公寓，并将这所公寓定名为“黄安学社”。各界人士推商界名人杨显卿先生负责筹建黄安学社的各项事宜。杨显卿，红安县太平桥乡上杨家垸人，解放前曾任过汉口商会会长，他担当此任后，便向红安在武汉经商的江、吴、程、谢四姓商户募捐，在很短时间内，便建起了能容纳60多人的黄安学社。

黄安学社位于武昌蛇山中段新古楼洞左边的山半坡，原街道名为凤凰窝八号。此地环境优美、空气新鲜，西南有坡路直达武昌路，南面山腰有一道高大围墙，围墙外是今湖北省教育学院，北靠山为国立武汉大学校址，东有隙地，可通抱冰堂园林风景区。

黄安学社房屋内部 分中、东、西三幢，正中为大门，大门墙上有陈逵九先生（清末京官，红安县上新集镇桥店潭家田人）书写的“黄安学社”四个正楷大字。一进大门两侧各有厢房一

间，再往前便是一长方形天井，天井前面有一正厅，正厅左边有一门通向后面堂屋，堂屋与厅屋之间隔一道墙，堂屋前也有一长方形天井，堂屋左边有一间厨房。东西两幢房屋各有狭长天井一个，每个天井的左右两边，各有客房六间，客房内的墙壁均涂上了红油漆，每个客房之间用木板隔墙。东西两幢房屋共有客房二十四间，每间设铺位两个，共容纳考生四十八人。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提前赴省城住宿于黄安学社，不收住宿费，伙食自理。每天从早到晚，学社内外书声琅琅，有背诵于树林中，有吟咏于书斋内，莘莘学子济济一堂，学习之风盛极一时。每当茶余饭后，考生登蛇山观赏武汉三镇风光。西望汉水如带，分隔汉口、汉阳两镇，长江两岸龟山、蛇山对峙，近窥三镇楼房高耸，街道上车马如龙，行人如织，工厂烟囱林立，机声隆隆，黄鹤楼巍然屹立在蛇山之颠，紫阳桥气势如虹，俯瞰长江波涛汹涌，滚滚东流，轮航飞渡，笛声长鸣，渔舟荡漾，风帆飘拂，远眺山峦绵亘，阡陌纵横，秋天田野一遍金黄，大小湖泊罗布，排灌自如，其景美不胜收。

废科举考试后，黄安学社属黄安旅汉同乡会管理，黄安旅汉同乡会会址设于黄安学社之中，一九三〇年，陈逵九先生任同乡会会长，月薪计国民党当时发行的纸币24元。一九三二年，陈逵九先生受聘为湖北省通志馆员后，同乡会的事务交给吴调之先生（今河南省箭厂河人。箭厂河原属黄安县辖）办理。从此以后学社变成黄安各界人士赴武汉公共住宿的场所。一九三〇年以前一般是单人住宿，主要是接待考生。一九三一年以后，内战爆发，反围剿斗争吃紧，县里外流者甚多，逃到武汉的人都住在黄安学社。一九三二年，长江洪水泛滥，武汉受到洪灾威胁，灾民一度麋集学社，学社房屋不够住，便在屋外搭棚栖身。因为居住人多，空气污浊，一时病疫横生。同乡会见此情况，曾向湖北省善后救济总署领来救灾证券和多数药品。同乡会将药品和救灾证

券散发给灾民，灾民每天凭证到长春观吃两餐粥借以度日，其时在学社里居住的有：吴调之、王益山、占翠山、陈家同、吴厚树、李炳南、李云光、陈介眉、陈晓山、张开文、吴云斋父子，陈彰瑜父子三人等。学社里居住的大部分是我县学界人士，也有小商贩及手工业者，如：木匠、石匠、皮匠、缝纫、以及做熟食的等。他们都带有眷属，屋窄人稠，炉灶密集，生活条件很差，以致患病者日多。迨至洪水退后，灾民始告离去。

一九三八年日寇侵占武汉，学社遭到破毁。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学社仍属同乡会管理。此时，在学社里居住的一部分是害怕革命由黄安逃往武汉的地富人家；一部分仍是黄安在武汉的小商贩及手工业者。一九四七年刘邓大军南下，黄安所有逃至武汉的人，大多数住在学社。此时黄安学社的房屋因遭日寇的毁坏以及年久失修，已是破败不堪了。

解放后，城市建设迅猛发展。原黄安学社旧址被武昌区人民政府征用改建为区委礼堂。由于武昌区人民政府征用地基时，学社无人出面过问，历时近一个世纪的黄安学社被拆除得无影无踪了。

王文金 整理

抗日时期黄安的货币泛滥成灾

罗以谋

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黄安沦陷。从1928年至1945年的十七年中，黄安到处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老百姓既饱受国民党苛捐杂税之苦，又时刻担日寇掠夺骚扰之惊。不少的人被逼得流离失所，生活在水深水热之中。

战争给老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如当时的部队很多，在黄安城乡随处可见。为了驱除日寇，拯救民众，国共两党各自组织了抗日武装。在黄安境内开展抗日斗争的部队，有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有国民党鄂东游击队十六纵队，有打着抗日旗号的国民党别动队，有国民党黄安县城大队，各乡乡警队，小保队等。此外，河口、黄安县城、桃花、十里夏店、冯受二等处还驻有日军和日伪保安队。这些部队的供养，全由老百姓供给。日寇经常出动部队到全县各地进行烧杀抢掠，国民党则打着抗日的旗号趁机浑水摸鱼，他们用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从老百姓身上榨取血汗大发横财。更有甚的是各种货币泛滥成灾。

黄安这个仅有一千七百九十六平方公里的山区小县，有货币达二十种之多。有日寇的日钞，汪伪政府的储币，国民政府的法币，国民党黄安县财委会的货币，共产党抗日民主政府的边币，国民党鄂东游击纵队支队长袁少棋以“棋昌”商号的名义发行的袁币，国民党县大队长杨汎亲在十里鄢家店以“三益”商号的名义发行的杨币，国民党退役军官徐良臣以东上店商会的名义发行的徐币，汉奸吴子繁以“福民合作社”的名义发行的吴币。

此外还有寄居七里乡的黄宏恩，杏花十里铺的秦和畅，洗手盆的秦记“谦受益”等商人，也私人各自印发货币。更离奇的是赌棍们也合伙发行赌币。这些货币中，边币、法币、日钞、储币、袁币、徐币等是以元、角、分为单位，有一元、五元、十元，一角、二角、五角，一分、二分、五分。这些流通黄安市场的货币，除以政府的名义发行的货币是用正规货币纸印刷的外，其它货币是用牛皮纸、白报纸印刷的，纸质低劣；有的用白竹布印刷的，有的是在楠竹片上刻的，有的用毛笔在长三寸、宽二寸的白纸条上写上货币数目，然后盖上私章作为流通券，真是各种各样，无奇不有。

这些货币大部分是在麻城县宋埠镇的“求是”印刷馆印制的，有的是自己木刻印刷发行。这些光怪离奇的货币，并无黄金白银作基金，完全是靠强权霸道强迫老百姓使用。如国民党鄂东游击十六纵队支队长袁少棋，他沿路设卡，拦劫南来北往，肩挑车推，小本经营的商人。拦到商人后，以通敌汉奸为由，没收他们的货物，袁少棋便用这些货物，开设了“棋昌”、“裕昌”两个商店，又以此作幌子发行货币。老百姓用硬币、实物到他商店去购买日用品，找的钱就是袁币。而找的钱只能到他的商店去购买，其它的地方不能使用，也不能兑款，又如徐良臣发徐币，换得了大量的硬币和通用货币后，便卷款潜逃，而徐币则变成了废纸。其它自行发行的货币也无一兑现。

由于货币的种类繁多，货币的使用就要分地域。硬币和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能在全县通用，国民党黄安县财委会的货币只限于七里、紫云、华河三个乡内使用，日钞、储币只在县城和县城周围四华里以内以及桃花、夏店、冯受二、河口等日寇的据点周围使用，东上店周围使用徐币，占店以南至觅儿一带是袁少棋支队的驻地，这些地方使用袁币，其它货币只能在其杂货铺周围村庄流通。由于货币的使用受一定地域的局限，老百姓深受其害。

如到县城买紧俏的食盐要兑换日钞、储币；交纳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要兑换法币和县财委会的货币。老百姓用同等值的货币向商人兑换，每元得补水子（货币的价值差）一角。

黄安独有的赌币，却能在全县流通。赌币起源于日寇侵占县城之后，日伪维持会号召商人们进城开业经商，号召老百姓进城买物购货。然而，进城的人还是寥寥无几。维持会为了引诱商人百姓进城，专人去武汉请来姓何的楚戏班，在县城东正街（现胜利街）高搭戏台，演唱老百姓所喜爱的《郭丁香》、《白蛇传》

《梁祝姻缘》等戏。维持会便在戏台后面和两侧设赌案十几处。他们这个办法果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戏一开演，县城周围十几里地的老百姓都来县城看戏，一些避居在外的商人也慢慢返城经商，一批赌徒蚁集县城，趁机赌博。他们合伙赌四门摊，即下赌注，如果输了，赌徒们将输者的钱收光。如果赢了，便扣赢者的水子，赌徒们做的是只赚不蚀的无本生意。

为了赌钱方便，赌徒们发行赌钞。赌钞是用见方的楠竹雕刻成青蛙，上刻伍元或拾元字样，漆后涂上光油，赌徒们称赌钞为“蛤蟆”；他们又用五寸长、三分宽、一分厚的楠竹片，两端包上白铜，竹片上绘有龙凤图形，刻有一元字样，赌徒们称为“筹码”；他们还用稍短稍窄的竹片效上办法制成五角、二角、一角、二分、一分等赌钞。上赌场的人先拿硬通货币以及金银首饰去兑换这种赌钞，散场后原价赎回，但必须补水子（加息），如果赌输了，硬通货币则为赌徒们所有，因为赌钞能兑换现款，在市场上通用，所以商人和老百姓都愿意接受赌钞。有的人输光了钱成了亡命之徒，当时暗偷明抢，猪牛被劫、粮食被盗的事屡见不鲜。赌钞的出现给黄安老百姓带来了灾难。

王文全 整理

国民党逃台前的通货膨胀

罗以谋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正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经济上趋于全面崩溃的时期。那时候，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党的法币、金圆券在一天中早晚的值不一样，直至最后成为废纸。当时，国民党七十二军杨文泉部的第十五旅驻扎在黄安县，十五旅中有一个团长叫徐华，此人平时克扣军饷积下了八千万元法币。他想通过发放贷款收取高利来盘剥黄安商人，自己从中大发横财。

1946年春的一天，徐华派他的表弟，连长丁烈武到县商会联系放贷款一事，当时我是商会会长，丁向我说明来意，要我接受他们的贷款，并说贷款的利息是，每一百元月息二十元，如果借一年还要按月转，息上加息。我想，这些当兵的要放贷款不接受是不行的，但大加二的息商人们是否接受，也很难说，我虽是商会会长，这样重大的事情，我一个人也不能当家，第二天，我找商会的理事们以及县参议员，商人代表冯文斋等人商量此事，理事们有的说，交官必穷，交商必富，这是一句格言，不能同军队打交道；有的说军队贷款不怀好意，事情弄得不好商人要吃大亏，有的怕不接受他们的贷款，军方会来找麻烦等。最后我们一起分析，几年来日寇骚扰掠夺，商人们损失很大，目前从四乡进城的商人资金都很缺乏，现在如有贷款，对生意人来说，有如雪中送炭，而徐华必竟是外行，发放贷款只强调了法币的量，忽视

了法币的值，再说军队放贷款是违法的。只要同他们定好协议，我们是不会吃亏的，我们将计就计接受了这笔军贷款。我们拟定的协议条文是：第一，贷款期限一年，如中途部队调动，十天前便要通知还款，第二，利息大加二，中途不变，第三，借法币还法币。我们对商户发放贷款的原则：一是非本镇的商户不借，二是无偿还能力的不借，三是没有两家以上铺保的不借，四是平时不讲信誉的不借。原则定下后，商会召开理事会审查借款的花户，批准八十八户借款。2月20日，丁烈武送来了法币八千万元，双方在协议书上签了字，然后商会出了个总借款单。这次贷款贷得最多的商户有：印刷厂耿显礼家、成顺兴家、大同商号等都是贷款三百万元，万寿和商号贷款二百万元。贷得最少的是高叔樵家二十万元。商户借到这笔贷款如鱼得水，由于资金大量增加，各家的货物堆集如山，在短暂的一个时期中，市场上出现了一片活跃繁荣的景象。

但时间不长，市场上出现货币膨胀，货币贬值，此时，商人每天存货不存钱。我记得七月中旬的一天，丁烈武来商会催还贷款，他说徐华所在的四十三团西调，限令商会三天内还清全部贷款，哪一家不还，就叫老板跟我们送挑子。我要求按协议办。丁烈武说徐华团长对县商会很恼火，放款时二千元法币可换到一块银元，现在需六千元法币才能换到一块银元，当时八千万元法币可换进四万元银元，可现在只能换进一万三千三百块银元，前后对照亏损二万七千块银元，即使收五个月的利息，还得不尝失，听了丁烈武的一席话，的确徐华这次放高利贷想盘剥我们商人，从中赚一笔大钱，哪知道款一贷出，接着货币贬值，吃了大亏，这笔贷款如不照他规定的时间还款，势必要找我们的麻烦。于是我动员借款的商户三天之内连本带息还清了这笔贷款。

据我回忆，1946年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仅就大米、食盐、布匹等几种生活品借款和还款时的价格是：

借款和还款时价格对照表

货币：均为法币

借 款 时			还 款 时		
品 名	单 位	价 格	品 名	单 位	价 格
大 米	一 石	25000元	大 米	一 石	60000元
食 盐	100斤	15000元	食 盐	100斤	40000元
湖南青布	一 匹	150000元	湖南青布	一 匹	400000元

1946年，法币与银元的兑换价是：六千元法币兑换一块银元。

47年春，刘邓大军进驻七里坪，国民党和国民党地方自卫队闻讯惶惶逃窜，市场通货恶性膨胀，大米由九万五千元一石涨至四十万元一石，食盐由六万元一百斤涨至三十万元一百斤，湖南青布由五十万元一匹涨至一百八十万元一匹；法币九千元兑换一块银元。商人们害怕法币倒在旦夕，纷纷把货物藏起来不卖。刘邓大军离开黄安，举兵攻打黄陂县后，国民党湖北保安总队以及黄安县自卫队乘机占据县城，于是街头巷尾到处布满便衣警察监视法币在市面流通的情况，强迫商人使用法币，谁拒用，就以扰乱金融，危害国家论罪。西正街有一个卖肉的屠夫名叫周公永，原籍城关金沙人。一天，便衣警察到他的屠凳前有意用法币买五十斤猪肉，周不知详情，说我卖肉只收银元，不收法币。话音刚落，几个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当场将周公永打得头破血流，没收了猪肉，并将周逮捕关进牢房。周家的人得悉此情后，花了一百块银元，五天后才保释出狱。

1948年市场上物价暴涨，下面仅就1935年与1948

年部分物价对照比较，便可知物价上涨的幅度惊人。

一 九 三 五 年		一 九 四 八 年	
品 名	价 格	品 名	价 格
大米一石	8.49元	大米一石	4200万元
花生油一斤	0.15元	花生油一斤	102万元
食盐一斤	0.166元	食盐一斤	22万元
猪肉一斤	0.2元	猪肉一斤	115万元
平信邮资	0.05元	平信邮资	500元

1948年秋，法币在全国范围内失去效用。8月19日，国民党又搞了个金融骗局，就是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处分令”，颁发“金元券发行办法”，鼓吹金元券每元含金量0.22217克。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后，规定300万元法币折合1元金元券。在武汉，国民党当局责成中国、中央、交通三个银行定期兑换。法币兑换只搞了十天就停止了，金元券开始在黄安市场上流通。商民对金元券持不同看法，一种人认为金元券有黄金作抵押，比法币硬得多，信得过；也有一些人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要垮台了，金元券挽救不了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

1949年1月，汉口洪益巷汉丰煤球厂经理罗翔夫（我的堂兄），从武汉运来十万斤淮盐委托我在黄安出售。当时正值金元券大贬值，我主张存货不买，翔夫兄耽心这批盐在黄安有失，第三天赶到黄安亲自督卖。其时食盐十分紧缺，市场上根本买不到盐，本来食盐零售价是一元（金元券）一斤，为了赚钱，我们兄弟俩商量提价为二元（金元券）一斤，并规定每人购盐不能超过

二十斤。卖盐那天，我家的店门一打开，老百姓听说我家有盐卖，不论价钱高低，争相抢购，屋内屋外挤得水泄不通。我家用四根秤出售食盐，有的人连续购买十趟，一天便卖盐五万斤，获金元券十万元，装了满满一麻袋。市场上通货恶性膨胀，我还是坚持存货不卖，过了十天，食盐价涨到金元券十元一斤，翔夫兄将剩下的五万斤盐全部销完，获金元券五十万元。罗翔夫将金元券装了几麻袋返回武汉，正遇上白崇禧准备撤军逃跑，武汉市场瘫痪，金元券买不到货物。但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还在作垂死挣扎，下令强迫市场使用金元券，并在桥口区拘捕无辜商人三名，以扰乱金融危害国家罪执行处决。即使国民党采取杀鸡吓猴的办法，金元券在市场上仍买不到东西。罗翔夫眼看五十万元金元券要变成废纸，内心十分焦急，恰巧此时碰到一个做金融生意的退役国民党军人陈静康（湖南省人，早同翔夫有交情），才把金元券作“七五折”，按一块银元兑换三十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陈静康，陈即坐飞机到重庆出售。后来罗翔夫对我讲，做这笔盐生意按金元券赚了三十多万元，按银元却亏了一千九百元。

金元券开始发行时，国民党当局规定一块银元兑换金元券二元；1949年4月，一块银元兑换金元券三十万元；5月，一块银元兑换金元券五百四十万元，国民党垮台前货币贬值，是一天一个变化。

王文金 整理

解放前的红安妇女

吴克仁

重男轻女是旧中国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广大妇女自幼严守闺门，担负繁重的家务，深受“三从”“四德”的束缚，过着低人一等的生活。

一、溺弃女婴

封建社会，男婚女嫁，生儿育女，为的是传宗接代，这是旧社会人们的一个传统观念，不少生育女孩的妇女受到虐待，女婴被溺死和遗弃。

1932年，七里坪镇辖的张家垸农民张金德与赵氏结为夫妻，婚后第一胎是生的一女孩，张金德对此愁眉不展，认为头胎生女不吉利，要妻子将孩子闭死，妻子苦苦哀求说，活生生的孩子，我怎么忍心将他闭死，这是第一胎，无论如何要留下，到第二胎再说，经妻子的苦苦哀求，张金德留下了这个女孩。时隔两年，赵氏又生一女。孩子一出世，张金德看到又是女孩，当天，逼着妻子将女孩闭死。以后赵氏又连续生了三个女孩，都无辜被害，赵氏五胎，全都是生的女孩，产期她不仅得不到生活上的调养，还要洗衣、做饭、纺纱织布，担负繁重的家务，有时还要下地干农活。丈夫张金德稍有不顺意的事，便在妻子身上发泄。赵氏由于家务担子的重压，生活的艰苦，生育子女对身体的摧残，精神的压力，丈夫的虐待，三十多岁就结束了短暂的一生。高桥乡袁家垸农民袁文积，婚后其妻先后生育四个女孩，孩子一出世都活活闭死。

绝大部分妇女生下女孩，因受到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影响和子女过多养不活，不愿意将女孩抚养成人，但又不忍心自己的亲

骨肉惨死在自己的手中，便将女婴用小棉被包裹着，包里夹有孩子出生的年月和时辰，天未亮，偷偷地将孩子送到人多的地方，以便让人收养。1935年，高桥乡董家田垵农民董××早晨下地干活，走到离自己地不远的路上，忽闻路边有“哇哇”的婴儿啼哭，董走近一看，果然路边枯草丛里，有一个用小棉被包裹着的婴儿，时值早春，晨风刺骨，孩子的脸冻得发紫，啼哭声时断时续，董放下锄头，抱起孩子，回家后解开包裹发现是一女孩，董当时年近四十岁，结婚十多年，妻子未生育子女，夫妻两人年富力强，平时勤俭度日，家里又无其它负担，生活可过。他俩便收养了这个女孩，起名“春莲”（“莲”即“怜”意）。董××夫妇视春莲为亲生女。解放初期，春莲长大成人，聪明能干，性格温顺，尊敬父母。一天，春莲的亲生父母来到董家，当着董××的夫妇和春莲的面，述说了当时弃子的情况，要求将春莲领回家，并备了厚礼和现金，酬谢董家对女儿的养育之恩。在一旁的春莲长到十六、七岁，第一次听到自己的悲惨身世，简直惊得目瞪口呆，对自己的不幸黯然泪下，她恨遗弃她的亲生父母，感激收养她的董家二老，她当着亲生母亲说，她的父母就是董家二老，斥责亲生父母是冒认，想破坏她的和睦家庭。春莲的亲生父母，眼见女儿不会相认，看来再说也无济于事，只好含泪回家。

二、缠足之苦

解放前，女孩到六、七岁时便要缠足，我的姨母曾对我说，她生于光绪二十八年，光绪三十三年，她才六岁就开始缠足。缠足时，用的是两寸半宽，五尺多长的白布（叫裹脚布），要把一个约五寸长，正在发育的脚包成三寸金莲（旧社会称女子的脚为三寸金莲），必须把脚背骨包断，包脚先是喷几口白酒在脚上，再用裹脚布牢牢把脚缠住，最后用针线将接头缝上，防止自由松开。姨母说她开始包脚，疼痛难忍，白天痛得吃不下饭，晚上不能入眠，精神上有负担，走路不方便。有一次她掇着一盆

水，因行走不方便，脚一歪，一盆水泼在自己身上从胸部以下，全部淋湿，手背和大腿摔得青紫。在难以忍受的时候，她在家包着，外出后偷偷松开，白天包着，晚上松开。后来解开裹脚布，她的脚背凸起，脚趾和脚掌萎缩；的确成了“三寸金莲”。有的女孩，由于裹脚布包得过紧过久，血液不流通，导致脚皮肤发炎溃烂。遇到这种情况，一些女孩子害羞不敢讲，家长认为缠足破点皮，伤点骨是正常现象，没有医治，使有的女孩终身残废。听我的婶母讲，她隔壁的桂香姑娘因脚皮肤溃烂长期没有治疗，感染脚背和脚趾骨，十二岁便成了跛子。

三、童养媳的悲惨生活

高桥乡黄土院墙垅有个姑娘叫吴菜英。她一家七口人，父母亲和她们姊妹五个。姊妹五人中，年龄最大的哥哥只有九岁，一家人挤居在半间破房子里，靠父母租种不到一亩面积的佃田度日。一年中有一大半时间是吃野菜和外出讨饭维持生活。菜英六岁时（一九四三年秋），父母亲便把她送到楼子陈家垅（现城关镇辖）当童养媳。

吴菜英在陈家，饱尝了童养媳的艰辛，历尽了痛苦。她七岁时就干舂米、推磨、砍柴等繁重的体力活，一次砍柴，镰刀将左小腿割开了一条口子，血直流，她痛哭不已，撕下一块布，包扎好伤口继续砍柴。回家后，婆婆说她柴砍得太少，不由菜英分说，拿起棍子劈头便打。一年到头，不管天晴天变，菜英要放牛、扯草、喂猪，一日三餐，要等全家人吃完饭，然后她忙着收碗洗碗，再剩多少就吃多少。陈家也很穷，一家人吃完后，哪还有剩下的，有时只剩下锅底的一点砂粒拌米糊糊。菜英经常挨饿，有时饿得没法，将洗碗水里的烂萝卜捞起来，洗干净充饥，菜英幼小的年纪，白天忙里忙外，晚上婆婆还要她学做针线活，不懂事的小姑小叔在她面前也逞强。菜英确实生活不下去，几次偷偷跑回娘家，母女俩抱头痛哭一场，还是将她送回婆家，菜英到十

六岁，公婆就要她与丈夫结婚，婚后除了侍奉公婆、丈夫外，还要做家务，下地干活，吴菜英老人至今回忆起她当童养媳的悲惨生活时，仍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四、望门守节

县城往北二十华里，通向七里坪的公路边有一个垸，名叫牌坊店，现属杏花乡所辖，这个垸原名不叫牌坊店。提起它的得名，却有一段不寻常的来历。

封建社会，妇女在婚姻问题上必须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定终身，完全不能自主。有的婚后夫妇能凑合度日，有的却因父母包办婚姻酿成悲剧。陡山徐家垸的王秀兰望门守节一事便是典型一例。听牌坊店的徐洪显讲，清代乾隆五十八年（1893）七里王锡九垸的姑娘王秀兰，幼时与杏花乡陡山村徐家垸的徐伯宗订婚，王秀兰二十岁那年，徐王两家商定，择农历腊月为徐伯宗、王秀兰完婚。正值双方积极为儿女筹办喜事之时，不料徐伯宗身染重病，卧床不起，久治不愈。快到婚期，徐伯宗病死。这一突然的变化，怎么办？徐家一面派人向王家报哀，一面通知王家作好嫁女准备。徐家还是要如期来迎亲，这一不幸的消息传到王家，王秀兰的父母却说媒妁之言怎能反悔，这是女儿命中注定的。喜期到，徐家备白布缠绕的白色花轿，吹鼓手奏着悲喜交加的乐曲到七里王锡九垸迎亲。可怜的王秀兰从订婚到出嫁没有见过徐伯宗一面，此时她上穿白孝服，下穿白裙，腰系麻索，哭成泪人，只好随轿到婆家。王秀兰乘轿迎着习习寒风，秀丽的脸上挂满泪痕，一路上人们看到白轿迎亲，纷纷打听，经知其详情的人一讲，人们不仅为这位姑娘感到惋惜，并为她的遭遇感到同情。王秀兰来到婆家，当即放鞭炮举行婚礼，婚礼先奏喜乐，接着奏哀乐，在一片哀乐声中，王秀兰捧着亡夫的灵牌，跪地口喊夫君徐伯宗而后失声痛哭，徐伯宗的父母亲，参加婚礼的亲朋戚友，垸中的邻居见新娘王秀兰身材匀称，容貌端庄，年纪轻轻遭此不

幸，无不泪如泉涌，婚礼沉浸在悲痛气氛之中，拜堂毕，王秀兰手捧灵牌进入洞房，将灵牌供奉在床前的条桌上，白天三拜九叩，从早到晚香火不断，一日三餐供茶供饭，并口喊夫君请茶、请饭。夜晚将灵牌放在枕头上，陪伴王秀兰睡觉，王秀兰从二十岁起，在徐家侍奉公婆，操持家务，担负农活，终身守节至七十多岁去世。王秀兰逝世后，徐氏族以及乡亲邻里见她一生孝敬公婆，勤俭持家，为人忠厚诚挚，特别是她一生正派，便联名将王秀兰终身守节之事呈文上报知县，后知县又逐级上报到知府直至朝廷，乾隆皇帝得知此事，颁圣旨赐王秀兰“贞节”二字，准予修建贞节牌坊以资表彰和纪念。树牌坊由徐氏宗族的人出面，牌坊全部用下江石砌成，雄伟壮观，圣旨雕刻在白玉石上，耀眼醒目，牌坊矗立在陡山徐家垵右边的大路边，从此，牌坊附近的一个小垵改名为牌坊店，可惜牌坊毁于文革期间，但白玉石雕刻的圣旨，徐伯宗堂兄的后裔徐洪显至今还保存着。

王文金 整理

鴉片烟对黄安人民的毒害

陈友良

输 入

鴉片烟，我们黄安县（现红安县）人称它为大烟。鴉片是一种毒品，自输入中国一百多年来，严重摧残着人民的身心健康，致使大量的白银外流，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鴉片烟是怎样输入中国，又是怎样传入交通闭塞的山区小县——黄安的呢？据《鴉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文记载，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鴉片专卖，那时已有一千箱鴉片输入中国；到了嘉庆年间（十九世纪初期），每年输入量增加到四千多箱；到鴉片战争前几年，每年多到四万箱左右（每箱一百斤或一百二十斤，到鴉片战争爆发时，每箱在中国海口出售价格按质量高低为四百银元到八百银元。）

鴉片烟不断输入中国，吸烟的人不断增多，偏僻的黄安也受到影响。鴉片烟，这种严重摧残人民身体健康的毒品，是怎样传入交通闭塞的山区小县呢？究其历史，早在清代中朝，虽然官府对鴉片烟查禁得非常厉害，但黄安有些在外地经商的有钱人，还是经常偷偷吸食和贩卖鴉片，有的商人还靠贩卖鴉片而发家。这些商人开始是过年时节偷偷带些烟土回家，让亲友尝试鴉片烟的滋味。一些人只听说过鴉片，没有见过，更没有吸过，开始一吸鴉片烟便觉得精神大振，有一种舒适感，慢慢对吸鴉片烟产生了兴趣，有点钱就花在吸烟上。黄安有人吸烟，就为商人们贩卖鴉片烟提供了市场，为了赚钱，便不择手段把黄安县城、八里坨、七里坪、尹家河、华家河、禹王城、黄陂站、桃花、中和司等县属的几个地方以及邻县的重镇。作为鴉片烟的售销市场，随之，販

卖鸦片烟的商人（黄安人称作黑生意）也不断地多起来。有的商人在贩运鸦片途中，为了躲避检查，他们采用了多种办法，如八里坨附近东坨商人李成章、李华章在湖南贩卖杉树木料，又贩鸦片。有一次他们俩在湖南洪江购进鸦片烟，把它夹藏在载运杉树的竹排中。杉树装得很高，为了保险，他们把烟土放在杉树的第七层，从湖南运回湖北，两李自以为十分保密，哪知当地人向官府告密，途中遭检查，检查官想从中敲竹杠，在检查时，将木料慢慢一层一层往下拆卸。当卸到第六层时，两李非常精干机敏，一面请客，一面行贿，检查官不再拆卸第七层而令部下放行。这样，为鸦片输入黄安县境大开了方便之门。他们运回的鸦片烟除在黄安销售外，还在麻城县的歧亭、宋埠等镇销售。当时的购销价格是每两三角（银元），销价每两二块银元，两李从中大发横财。八里坨镇辖的下大刘家坨农民刘绍西，曾给我讲述了他一次搞小量的鸦片烟贩运的经过。1941年，他到河南做生意，在河南的息县通过熟人向“公茂生”木料行购买了大烟五两，为了躲避检查，他将大烟用硬纸和粗布包了几层，放在晾干的猪尿包内，然后混夹在其他货物中挑回来。当地购价每两法币二十六元，回到八里附近每两法币九十元（当时法币四十元兑换银元一块），获利也很可观。不少的商人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贩卖和偷运鸦片，至使鸦片源源不断地输入黄安县。

烟 馆

鸦片烟大量地输入，吸食鸦片烟的人也越来越多。有吸烟者必须要有吸烟的场所。因此，黄安县各地也有些人便趁此机会办起了烟馆。

当时有名的烟馆是：县城有西正街刘寿如烟馆，县门口张子松的祖母开设的烟馆，南正街黄香烟馆，小北街李树生烟馆，以及王幼安烟馆。这些烟馆规模之大各有四、五个铺位和烟灯（烟

具)。七里坪有朱泽咏烟馆；华河镇有陈云姐烟馆；桃花镇有罗四娘、王大女和姓殷的三家烟馆；尹家河镇有孟子功、孟继新、余大娘、孟兹坤四家，八里垵镇有梅老八和姓叶的两家。民国十几年来农村也有的地方开大烟馆。如八里垵镇属的上、下大刘家两个垵烟馆开得最盛，民国12年（1923），该垵的刘子义、刘庆科两家各有铺位三个，烟灯三盏；民国16年（1927），绰号叫寨王的开设的烟馆有铺位两个，烟灯两盏；民国18年（1929），刘述才、刘述礼两家烟馆各有铺位两个，烟灯两盏；民国20年（1931），刘庆康烟馆有烟灯一盏；民国23年（1934），刘绍海烟馆有烟灯一盏；民国36年（1947），绰号叫七洋人的烟馆有烟灯三盏。

当时经营烟馆的人有两种形式：一是到他开设的烟馆吸烟；二是出租烟枪（烟具）。一些吸烟成瘾的人，一有钱便进烟馆吸烟。也有一些富户，家里来了客人，就到烟馆租用烟枪和购买烟泡（即熬好了的鸦片烟，状如红枣核）回家招待客人。

上述这些烟馆有四个共同点：一是开烟馆的人自己就吸食鸦片烟；二是他们既开烟馆，又出售鸦片；三是可向吸烟者提供烟枪、烟灯等毒具而从中取费；四是凡开烟馆的人，当时都有一定的权势或后台作支柱，不怕查禁。

毒 害

吸鸦片烟成瘾的人，一旦没有烟吸就涕泪交流，长期吸食鸦片的人面黄骨瘦。两肩抬起，被人称为“三个脑壳”。最后有的倾家荡产，有的中毒身亡，有的生活无着自杀而死，总之，凡吸食鸦片者均受其害。如县城南正街的吴南陔才学渊博，清末是县城有名的文人，因他长期吸鸦片烟，考秀才落第。八里垵镇的上、下大刘家两垵，有不少的人吸食鸦片烟，其中刘庆典是拥有三十石田的富户，因他吸食鸦片烟卖掉了三十石田而破产。刘燧庭吸食鸦片烟，除卖掉家具、房屋外，将几石田也卖光，刘道仁（又

名四相公)也因吸鸦片烟,同样卖光了家具、房屋和仅有的三石田。七里坪镇的一些年过六旬的老人,一提到吸食鸦片烟的事,大家不约而同地谈到该镇的富户方康成。他吸烟成瘾后,先卖掉了八筒打油的榨坊,后卖掉了几十石田,最后没有什么可卖,把他母亲陪嫁的东西全部卖掉,家里落到一贫如洗的境地。

禁 烟

黄安人民深受鸦片烟的毒害,他涣散人民的斗志,摧残人民的身心健康。共产党历来重视禁烟,1927年,中共党组织为了唤醒民众,活跃在七里坪地区的共产党员,积极发动群众,宣传政策,晓以利害,收缴鸦片烟。黄麻起义后,七里坪镇鸦片烟禁绝。中共七里地区党的领导人张南一同志,曾用打鼓说书的形式,宣传鸦片烟对黄安人民的毒害,号召人民禁烟。他自编的鼓词“哭葫芦”(注:烟枪头象葫芦,鼓词中葫芦喻为烟枪。)群众印象很深,对禁食鸦片烟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今方思勉(七里坪镇人)老人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鼓词的内容是:

葫芦啦!我为你良田卖了几百石,我为你河内卖了净花船,我为你宋埠街头卖门面,我为你金银首饰都卖完,我为你卖了鼓皮卖隔扇(鼓皮,即室内用木板做的墙,隔扇,即室内屏风),我为你买了蒲团坐土砖。

葫芦啦!我吸得十二根婆罗骨根根见,手杆子瘦得象笔杆,流泪流涕阎王面前站,君家呀,你怎么不早早戒掉烟。

国民党政府也曾禁过大烟。据档案资料记载1920年10月10日,国民党湖北省禁烟总局成立,禁烟总局直接由省长监督。

1941年1月1日,国民党湖北省政府颁布“从民国三十年一月一日起,凡违犯禁烟者概处刑令”。2月15日,国民党湖北省政府颁布了“彻底肃清烟毒应注意事项令”。

1946年9月16日,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在汉口公开焚毁烟土一

万八千八百五十六两，烟具一千七百余件。据4月至12月统计，全省判处烟犯死刑者十八人，判处有期徒刑的四百五十一人。

全国解放以后，党和政府采取措施，积极禁烟。1952年3月19日，中共湖北省人民政府转发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2月24日“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各地迅速搜集烟毒情况报省。湖北省人民政府相继在武昌、宜昌市两地分头召开了禁烟毒紧要会议，部署了禁烟毒工作，并多次发出指示和布告，要求各地要作到无种、无卖、无运。

1952年8月18日，中共红安县委根据省人民政府指示精神，经研究决定在全县开展禁烟毒运动，县长马友才，公安局长李光担任禁烟毒委员会负责人。经过宣传教育，到8月底，先后有一百多名吸毒者履行坦白、登记、悔过手续，交出烟枪十支，烟土五两和其他一些毒具，全县还逮捕了二名贩毒罪犯，从此，我县结束了危害人民健康一百余年吸食大烟的历史。

王文金 整理

说 春

李明理口述

说春，也有人称其为颂春、唱春。解放前我曾说过春。我家住在红安县霓儿寺镇李家大垸。过去走驿道的过往行人必经李家大垸。相传，晚清时期，某一官员步行至李家大垸时天色已晚，便找到我家借宿。我家祖辈人口多，生活虽然十分艰难，但对待客人却十分热情。这天，家里把仅有的一点米给客人做了餐便饭吃了，并腾出床让客人住宿。这个官员还能体恤民情，第二天离开我家时，送了一本万年历（皇历即农历），述我祖辈一个春官。春官的职责是发放皇历（农历），向农民讲明24个农时节令做些什么，以农为主，为农民服务。规定每年从八月十五到翌年立春之前为说春时限。发给春官一份帖子作为凭证，以限有假冒或说野春的人。无帖子说春，是要盘根问底，追查责任的。说春的范围不能超过红安、麻城、礼山（大悟）三县境界，可以收取报酬。自此以后，我家先辈年复一年到处说春，世人都知道只有姓李的说春。其实，李家大垸几十家，也只有我一家是说春的，并世代相传。解放前夕，我的父亲（李光安）年纪大了不能出远门，就由我扮春官，把垸里的李光文、李辉约到一起到处说春。

说春是三个人：春官，述春童男，随从。春官，身穿红色道袍，腰系一根黑色有穗的腰带，头戴黑色礼帽，随身带有雨伞和若干册皇历。述春童男应为自家子弟，年纪不过十来岁，衣着随时，手拿一根两尺有余的竹篾片子。随从，是一青壮年男子，衣着随便，挑担箩筐随行。三人每到一户门前，春官向户主打恭作揖，口中念着《千家诗》中的词句，不管户主迎接与否，春官与述

春童男直入此户堂屋，春官坐在堂屋桌子的土首，面朝外，童男站在堂屋中间，右手把竹篾片拄在地上，随从则守候在大门外。

春官说春，必须熟记一年24个农时节和时节里有关的农事谚语，熟读《千家诗》。如：进出农户的门，都由春官说《千家诗》中的词句“贵府喜事多”向户主道喜祝贺。坐下后，春官：今年是××年，×龙治水水就多。童男：水呀！春官：正月立春、雨水，童男：水呀！春官：二月惊蛰，春分，童男：水呀！春官：三月清明、谷雨，童男：水呀！按这个形式一直把24个节令数完。遇到一些农户详问农事，春官在数农时节令的同时，还得说出农事谚语。如：十年难逢九月润，百年难逢初一春。正月二十晴，树上挂油瓶（结的冰棍）。雷打惊蛰前，高岗垆上好种田。二月二十晴，杨柳两道青，二月清明不用慌，三月清明早下秧。谷雨下满秧。穷人莫受富人哄，椿树蓬头浸谷种。秧好一半谷。三月二十晴，谷子下两层。三月有个桃花雪，四月有个杏花霜。四月八，冻死鸭。四月二十晴，栽秧田里冻死人。立夏前广种棉，立夏后好种豆。立夏不下（雨），无水洗耙。立夏三日连枷响。小满不满，芒种不管。芒种打鼓夜插秧。芒种忙打苞，夏至见谷刁，东一刁西一刁，四十二天过火烧，头伏芒麻二伏豆，三伏里头种寒粟。去暑拿镰不认青。麦倒小满谷倒秋，迟迟早早一齐收。去暑荞麦白露菜。寒露油菜霜降麦。小寒大寒，滴水成团。小寒大寒，准备过年，等等。春官，有口才把一年四季的24个节令说得瓜甜蒂儿落，使别人听了以后有一种“好年景”的感受，乐于听完。春官说完春词，童男述完春水，起身出门，并向户主作揖道：“自从我来贺过后，（你家）越富越贵越康宁”。户主拿出米或钱馈赠，我们从来不争多少，由挑箩筐的随从收下。事毕，辞别户主又到另一家说春。一村说春结束，便拿出一册皇历赠给某一识字户主，供他们传阅。我们年年去说春，农户认为是祖传的，遇上好年景，农户认为是说春给的好兆头，因此，说春对农户是易于接受的。

常言道：“种田不识节，那怕累死血”。春官说春，无疑可以提醒边远山区目不识丁的一些农民，不误农时的搞好播种、管理、收获。赠送一本皇历，也是对科学技术的推广。然而，对于我们说春的人来说，也有难言之苦，在那个年月，因生活贫困所迫，为了生计只得三人结伴，远离家门，翻山越岭，顶风踏雪，沿门说春，嚼干了口水说干了涎，为什么？为了讨点年饭米，要点接麦粮。名为说春，实际上是穷苦人沿门乞讨的一种形式与手段。

何为嘉记录整理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知识

一、文史资料工作的方针

文史资料工作的方针是：在基本路线的指引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文史资料在记述历史人物和事件时，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历史人物要取大德，赦小过，去隐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为了需要丑化进步的东西，也不能为了适应形势溢美落后的以至反动的东西。如：在第一辑中，我们登载过《抗日战争时期的程汝怀》一文，程汝怀，国民党中将，红安永河椿树人，曾担任过国民党湖北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专员兼黄安县长，鄂东剿共司令。我们登载的文章中，没有写他的全部历史，对他的功过没有加评论，只记述了他在抗日战争中利国利民的事迹。

二、文史资料工作的特点

文史资料工作与党史、地方志是有区别的。它的特点是：在征集和整理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四个为主”。

1、以写共产党外的人和事为主。中国共产党斗争发展的历史由党史部门编写，党外爱国人士所做的一些利国利民的事，则由政协文史部门编写。党史和文史相互印证，相互补充，这样才能客观地展示历史的本来面貌。

2、以“三亲”史料为主。“三亲”即：亲见、亲闻、亲身经历。文史资料与文献资料不同，它是以口碑材料为主的，是历史当事人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实录，它可以弥补文献资料之不足。如：《黄安县第一次武装起义》一文，记述了辛亥革命失败后，1916年5月，以秦文卿为首的一批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志

士组织的黄安县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黄安县的贪官污吏，引起了湖北省督军府的注意。这篇文章是九十一岁高龄的高叔樵老人，用他亲见亲闻的史实写成的。

3、以近现代史料为主。因为文史资料是以历史当事人口述材料为主的，所以在征集时限上必须以近现代史料为主。

4、以征集本地史料为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政协都相继成立了文史资料工作机构。为了尽快“抢救”珍贵史料，避免重复，文史部门应以记录本地重大历史事件和党外突出的历史人物为主，也可以写外地人在本地或本人在外地所做的利国利民的事迹。

文史资料是综合性的近现代史料，内容非常广泛，具有很强的统战性，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文史资料工作的任务

1、把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作为主要目的，把征集、整理党外人士所做的利国利民的事迹作为主要工作。

2、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把分散的史料集中起来，逐步做到系列化，专题化。

3、广征精编，搞好出版。

4、做好史料的发行和港澳台及海外的交流工作。

1989年秋，全国政协在北戴河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会议。会上，重点讨论和确定了文史资料工作的“两个转移”。一是征集时限从重点征集建国前，转移到以征集建国后的资料为主。当时周总理提出征集戊戌政变至建国前的史料是完全合适的，现在撰写戊戌政变的“三亲”资料需要一百一十岁的人，撰写辛亥革命的史料要八十至九十岁的人。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找不到撰写戊戌政变“三亲”史料的老人。撰写

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史料的老人也寥寥无几。而建国后四十多年来的文史资料征集出版可以说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针对上述情况，征集时限的转移，将使我们的文史工作开辟一个广阔的新天地。

二是征集内容从重点征集军事、政治，转移到重点征集建国后的经济、文化建设方面，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管理经验，发展状况、各条战线的优秀人物和重大事件。建国以来，我国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凡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均应进行征集、整理和研究。

文史资料翔实反映近代中国经济、科技、文教等方面著名人物、重大事件的情况，能帮助人们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国情，认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才能发展中国的真理，激发人们建设社会主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信心。

四、文史资料工作的作用

1、团结作用。文史资料一般是撰写党外人士的事迹。往往一篇文章能起到团结教育很多人的作用。能激起港澳台及海外人士的思乡爱国之情。它对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起着其它史料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台胞刘胤龙读了《鄂东别动队的建立与灭亡》一文后，他从台湾写信给我们，对我们的文史资料能如实记载鄂东别动队建立初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共产党能实事求是地记载他（刘胤龙当时系鄂东别动队队长）的功绩表示感谢。

2、教育作用。文史资料可以作为教材，对年轻一代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懂得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

3、借鉴作用。文史资料中，有反映解放前工商经济情况的文章和一些工商界名人经商、办厂的经验。全国政协委员，上海

市政协常委邓葆光，红安高桥邓家垸人，他曾向我们撰写了《湖北商场中的黄帮》一文，文中详细叙述了红安县南的商界名人江钜青、吴伯池、陈福澜、谢炎山等人，解放前在武汉经商，办厂的兴衰历史。其中一些好的经验，可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借鉴。

4、科研作用。文史资料可为历史研究部门提供佐证，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素材。如《血战台儿庄》、《末代皇帝》等电影、电视，都是文史资料改编而成的。

5、见证作用。一部完整的历史，往往是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如，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那么国民党又是怎样部署对苏区进行围剿的呢？史料如能反映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每一个步骤，甚至每一个细节安排，便对人民进行的艰苦斗争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和反衬。文史资料还能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以澄清。如，我们整理的《真假王度》一文打印下发后，使蒙受20多年冤屈，一直作为反属看待的王世纪老人，1989年底澄清了历史，落实了烈属待遇。

红安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1年5月